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科·阿基诺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 言

当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要我写一部关于菲律宾上届总统秘拉松·阿皇诺的传记时，我对这位驰名世界的菲律宾女总统还知之不多。我首先想到了曾经在《世界知识画报》的“世界博览”中看过菲律宾的一些简讯，于是，我把那些画报找来，重新看了一遍。真实，从1986年到1992年，关于菲律宾的记载只有下列几条：

菲2月7日举行大选，2月15日宣布选票统计结果说，已统治菲20年的马科斯再次获胜。反对派候选人科·阿基诺立即声明不承认官方公布的选举结果，并指责官方在选举中舞弊。16日，她在首都马尼拉有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抗议集会上宣布了“七点非暴力抗议计划”。22日晚，国防部长恩里莱和参谋长拉莫斯发动兵变转而支持反对党。24日上午，阿基诺夫人的支持者接管了政府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25日上午，科·阿基诺在菲俱乐部宣誓就任总统，并宣布她的竞选伙伴萨尔瓦多·劳雷尔为副总统和成立以劳雷尔为总理的新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也“宣誓”就任总统的马科斯终于被迫在25日晚携家属乘美军直升飞机离开马尼拉，先到克拉克空军基地，然后转机飞往美国流亡。

——1986年6期

菲总统科·阿基诺11月10日访问日本前夕，首都马尼拉盛传将发生军事政变。由于政府防范，没有出事。但自13日起的10天内，连续发生了3起暗杀政界知名人士的事件，其中人民党主席兼“五一运动”工会主席奥拉利比亚遭暗杀，引起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与此同时，马尼拉又传闻一部分军官和政界人士策划政变，拥戴国防部长恩里莱出面组阁。恩里莱在推翻马科斯统治时起过重要作用，但后来在一系列政策上与总统发生分歧。

科·阿基诺总统于23日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要求所有部长辞职；会后宣布改组内阁，接受恩里莱辞职，任原副国防部长伊莱接任国防部长。科·阿基诺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基本上控制了局面。

——1987年3期

1月22日，约一万菲律宾农民在首都马尼拉示威，要求政府进行名副其实的土地改革和减少灌溉费用。当他们到达总统府附近出现骚乱时，政府军和警察向他们开枪，打死17人，伤40多人。事件发生当晚，菲总统科·阿基诺在同军方领导人会晤和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后发表书面讲话，说她已命令对这次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肇事者要承担全部责任。她呼吁人民保持平静，并表示政府将加强防范任何动摇政府的企图。

——1987年4期

2月2日，菲对新宪法草案举行了全国公民投票。在登记的2500万公民中80%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占压倒多数的人投了赞成票，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是科·阿基诺在1986年2月取代马科斯成为菲总统后制定的，其中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并确定科·阿基诺任期到1992年6月30日。

——1987年5期

菲副总统劳雷尔9月16日宣布，他因与科·阿基诺总统在“某些事情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辞去兼任的外长职务。他抱怨阿基诺夫人没有让他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使他作了“局外人”。当晚，科·阿基诺宣布，由于劳雷尔不同意政府对叛乱问题（指新人民军和要求自治的穆斯林武装力量）采取的“军事进攻”与“民主战略”和“经济要求”相结合的政策，她已接受了他辞去兼任的外长职务的要求，并任命外交部副部长曼努埃

尔·杨担任代理外交部长。

——1987年11期

经过两年半的调查，美国大陪审团1988年10月21日对马科斯夫妇提出起诉，指控他们触犯了美国惩治诈骗和贪污法。马科斯因病情严重没能出庭，由其夫人伊梅尔达代表于10月31日前往纽约地方法院受审，陪审团的起诉书罗列的他们所犯的主要罪状是：在在任期间，马科斯夫妇通过侵吞、盗用、贿赂等手段，把菲政府公款占为己有；把非法所得的1.03亿美元转移到美国购买曼哈顿地产，并伪造证件隐瞒其所有权；他们还从美国3家银行诈骗1.65亿美元在纽约购买4幢大楼，还把大量金钱非法转移到瑞士、香港和美国的银行，并计划购买价值590万美元的艺术珍品准备转移到别处。如果上述罪行成立，马科斯夫妇将被判处20年徒刑并处以25万美元的罚金。11月2日，伊梅尔达的朋友、美国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的女儿多里斯·杜克为她交上500万美元的释放金后，美国联邦法官宣布释放马科斯夫妇。随后，马科斯夫人回到夏威夷等候下次传讯。

——1989年2期

拉莫斯当选菲律宾新总统：5月11日举行的菲律宾大选于6月16日揭晓，前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当选。6月30日，拉莫斯宣誓就职，成为第8任总统。64岁的拉莫斯曾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保安军司令、武装部队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

——1992年9期

我觉得我看到了菲律宾现代史的一部分。但是让我感到不解的是，马科斯拥有那么多的财富，他怎么以在统治菲律宾20年之后离任？科拉松·阿基诺，一个多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何走上总统宝座？为什么她刚刚就职就有那么多的反叛？为什么她共同起兵推翻马科斯的恩里莱和劳雷尔为什么先后离她而去？

为此，我带着一种好奇心，走进了菲律宾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世界……

科·阿基诺传

第一章通往死亡的回乡之路

1965年12月31日的上午，费迪南德·E·马科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前总统马下帕加尔，荣登菲律宾总统的宝座。把他从大马尼拉市居住地接来参加中午在卢内塔举行的新总统“汀誓就职仪式”的人，是一位年轻的议员，名叫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

尼诺伊与马科斯在政治上原同属于菲律宾自由党，同样是非律宾当时社会中引人注目的人物，同样有当菲律宾总统的渴望。不同的是，尼诺伊更年轻些，在言论上更激进些。后来，马科斯耍了个手腕，就在那年的总统竞选之前，他脱离了自由党，加入了菲律宾的国民党。国民党推选马科斯为总统候选人，并与他上在菲律宾社会发起全面竞选攻势，直到他登上总统的主座。

尼诺伊成为马科斯政治上的敌人。虽说他把马科斯从家中接来并一起参加了总统就职仪式，但是，总统只有一个。尼诺伊那时正值中年，血气旺盛，对政治充满憧憬，并对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有着更加美好的设计。他并没有因为马科斯当选了总统就放弃他的政治追求，相反，他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一定要成为菲律宾的总统！

菲律宾总统任期为6年。尼诺伊·阿基诺从马科斯宣誓就职开始，也开始了他的6年之后竞选总统的准备。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费迪南德·E·马科斯一直在总统的宝座上统治菲律宾近20年之久……

一、从美国回家去

这是 1983 年的 8 月，也是马科斯执政的第 18 个年头。

科拉松·阿基诺与丈夫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 3 年前离开菲律宾，在美国波士顿过着“流亡”生活。她虽然知道这平静的日子不会过得很长久，但她做梦也没想到，丈夫决定在这个时候马上回国去！

科拉松·阿基诺从心里不愿意他们一家人就这样告别了平静，她希望日子再有一段时间。不过，她也知道此时此刻尼诺伊在想什么：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统治，经过了近 20 年的风风雨雨，已经开始摇摇欲坠。菲律宾各党各派无时不在攻击他的专制统治，尽管他玩弄政治权术得心应手，但是，他已经无法再支撑着他虚弱的身体应付一些社会活动，更何况政权需要运筹帷幄，需要时时站起来，给公众一个完美的政治伟人的形象……对于这一切，马科斯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的肾脏已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靠着两台透析器坚持抛头露面。1983 年仲夏，马科斯又一次处于隐居状态，看见他的人都说他身体恶化的程度令人吃惊。第一次肾脏移植手术后，他的免疫系统排斥新的器官，这使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马科斯的健康状况成了国际上注目的问题。菲律宾整个社会更是倍加关注马科斯的健康。十几年的统治让菲律宾政界人士领教了这位领袖的政治才华，人们只愿他早一天离开人世，方能有他人的出头之日。有传言说马科斯很早就想让夫人伊梅尔达取而代之成为总统，来继续马科斯 20 年的统治。但是，全菲律宾各界好像并不认可。早在 1975 年，美国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就对她有这样的评价：

马科斯的夫人野心勃勃，残忍无情……她渴望财富、权力和喝彩。她那无限制的自负使她容易为奉承者俘虏。尽管她所受的教育很有限，但是她异常伶俐……她的政治组织主要由新闻界人士组成……再加上一些零散的政治家和军人。他们大部是寻求庇护的谄媚者……她的政治事业主要由她的弟弟本哈明·罗穆亚尔德经营……她的许多权力建立在她丈夫的权威和外国人与菲律宾人相信她能影响马科斯的决定的基础上……马科夫夫妇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商业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但是，没有人能确定这种工作关系到底有多么紧密。有时，两人明显地互相竞争；有时候，除非总统认为利害攸关，他也才愿意让步……

许多菲律宾人认为，马科斯已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提名他的妻子为他的继承人。尽管如此，她还不具备严肃地争取得到总统职位的才干……她不能将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因此她可能缺乏行政措施来继续完成诸多事情。……

排除了伊梅尔达当总统的可能性后，更多的菲律宾人开始窥视着总统的宝座，但是，尼诺伊认为他是唯一能与马科斯较量的人物。虽然身在美国，他却一直坚定不移地反对马科斯的专制统治，这一点他知道深得菲律宾人心；同时，他又是马科斯反对派中最受欢迎的、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议员的代表人，所以，他认定他返回菲律宾争取总统职位的时候到了。他没有任何推翻马科斯的计划，但他希望能够在马科斯之后登上总统宝座。

1983 年的春天，尼诺伊就决定返回祖国。5 月，他在纽约见到了伊梅尔达。尼诺伊对伊梅尔达说，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聘任期就要到了，心脏上的外接血管也正在阻塞，“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我的大限期之日就要到了。

我想回国！”伊梅尔达说，这个时候他还是留在美国最好。

不久，尼诺伊又在美国见到了伊梅尔达，他向马科斯夫人提到护照已经满期。马科斯夫人非常友好地拿走了他的护照，说她要亲自办理这事儿。但从此尼诺伊再也没有见到这本护照，也没有新护照发给他。

当尼诺伊第三次在美国见到总统夫人时，伊梅尔达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并许愿说，如果尼诺伊想加入马科斯政府，将给他一个总理职位；如果他继续留在美国，她就为他建立一个公司让他作买卖。尼诺伊说，他回国的目的是组织一个合法的政党，参加即将到来的1984年5月国民议会选举——这也确实是尼诺伊回国的原因之一。伊梅尔达告诉尼诺伊：“我们有很多忠心耿耿的崇拜者，他们会认为杀了你解决我们的问题。”

但尼诺伊仍固执地要回国去。他想取得旅行必备的证件，可遭到了拒绝。菲律宾驻纽约领事馆说，国内的军事情报部门发现了一个暗杀阴谋。7月份，菲律宾外交部长帕西菲科·卡斯特罗警告所有的国际航空公司，不得在没有正式证件的情况下让尼诺伊乘坐飞机回到菲律宾，否则将失去着陆权。紧接着，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也出面通知尼诺伊“至少要推迟一个月，因为我受命通知你，我们有可靠的线索提供了情报，认为如果你抵达菲律宾的话，有一些阴谋要谋害你的生命。”

但尼诺伊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乡之路。8月13日，星期六，尼诺伊先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他执有一份“从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里获得的假护照，化名为“马歇尔·博尼法西奥”。

尼诺伊认为他的行动是相当诡秘的。他从新加坡飞到马来西亚，又从马来西亚飞回到新加坡，最后于8月19日星期五又回到了与菲律宾没有外交关系的台北。同尼诺伊回国的还有一大群记者。可能是出于也是新闻记者出身的原由，尼诺伊认为如果有一些新闻记者陪同他回国，在安全上是可取的：首先，即使他被拒绝下机或回国后被送进监狱，有新闻记者同行将能确保他的这次行动获得最大的宣传效果；其次，大众传播媒介的在场，可能会减少阴谋暗杀他的可能性。结果，到了他动身时，大约有10名记者来到台北，陪伴他回到故乡菲律宾。后来，又有两个日本电视小组加入了新闻记者行列。

记者中有一人是他的妹夫柏原坚。柏原坚是旧金山一家电视台的资深记者。

就在抵达台北之前，从马尼拉来了一个电话，告诉尼诺伊，反对派的领导人将不许上飞机见他。尼诺伊对妹夫说，这是一个“坏征兆”，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不让他下飞机而原机返航，也可能将他关入囚车送进监狱单独关起来。他告诉妹夫，他感到暗杀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然而他却给妹夫看了他的防弹背心。”但是，如果他们枪击我的头部，我就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这时，他情绪非常低沉，直到午夜还没有入睡。他给波士顿的科拉松和孩子们打电话，并和每个人都简短地通了话。当他们对他们说话时，他抑制不住内心激荡的感情，开始轻轻哭泣起来。挂完电话后，他又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

8月20日，星期六。当飞机于上午10点10分抵达蒋介石国际机场时，尼诺伊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他们用“马歇尔·博尼法西奥”的名字办理行李

马歇尔是马科斯1972年军管法的双关语，博尼法西奥则是尼诺伊被囚禁七年半的监狱名称。

托运手续没有遇到麻烦。台湾警备区司令还特意关照了他。尼诺伊告诉同伙们，这位司令说事情非常奇怪，他说那天早上他接到菲律宾航空公司的一个电话，要他好好照顾我。

载有尼诺伊飞往马尼拉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811 航班是一架波音 767 飞机，里面乘坐 100 多名旅客。它于上午 11 点 15 分离开了台北。

二、菲律宾地面的两种等待

811 航班在天空航行时，菲律宾地面的两种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序。

在前一天，已经有人知道了尼诺伊到达马尼拉机场的时间和乘坐的班机号。与伊梅尔达关系极为密切的旅游部长何塞·阿斯皮拉斯和台湾的中华航空公司办公室通了海底电报，知道了一切细节，于是，阴谋活动开始按部就班地秘密进行起来。

马科斯政权的一些显赫人物则在这时极力地表现出自己不在谋杀现场：伊梅尔达在文化中心附近的比亚·马雷海鲜饭店和朋友们吃了一顿费时很久的午饭，很多人见到了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贝尔在博尼法西奥堡的秘密警察司令部，不为人知；国防部长恩里莱在瓦克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由于马科斯总统正处于手术后的恢复中，恩里莱在打球，伊梅尔达出去吃饭，因而是马科斯的追随者贝尔和旅游部长阿斯皮拉斯、新闻部长格雷戈里奥·森达纳、总统夫妇的最好的朋友爱德华德·科胡昂科（科拉松的堂兄）及忠于贝尔的将军们在指挥着国家机器，那些将军们控制着主要安全部队。

从早上 6 点钟起，森达纳和阿斯皮拉斯就在机场等着，科胡昂科则在附近徘徊。这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儿：在吕宋岛上的两个防空所里，美国空军的雷达操纵员们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菲律宾人代替。当一名美军下士询问出了什么事儿时，领头的菲律宾军官对他说：“站开，这不关你的事！”他接着说，这牵涉到内政问题。

有两架装备齐全的菲律宾 F—5 战斗机紧急起飞，想发现尼诺伊乘坐的飞机，迫使它降落在马尼拉北面 35 里以外的巴塞空军基地。但是，天空中三彩很多，这两架战斗机没能发现目标。菲律宾的地面雷达操纵员们接手了这项工作。又一架 F—5 战斗机紧急起飞再做尝试，结果仍是徒劳而返。菲律宾空军的第 5 号人物翁贝托卡·卡帕万在毗邻马尼拉国际机场的比利亚莫尔空军基地指挥着主控室，他是贝尔小圈子里的人。

在马尼拉北面的华莱士飞机场，一名美国空军少校问他的上司出了什么事。

上司回答说：“我认为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飞机上的尼诺伊好像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他开玩笑告诉摄影记者赶快拍摄，不然几分钟后，一切事过境迁。

接下来，尼诺伊又开始了他到地面前的准备工作。

他看了一遍准备在机场发表谈话的讲稿。

参议员小贝尼格诺·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

向欢迎人群发表的声明

1983 年 8 月 21 日

我自愿回国，以加入争取通过非暴力手段重新获得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行列。

我并不寻求对抗。我仅仅为在正义基础上名副其实的民族和解而祈祷，并为之奋斗。

我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决定逆忤母亲和教父的意愿，不听许多久经考验的朋友和一些我政治上最重要的良师益友的忠告。

死刑正等着我，还有两项颠覆罪指控。这两项都足以置我于死地，在 3 年前我离开时已经提出，如今又提交了法院。

我本可以在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但是我意识到特别在这种危机时刻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我的职责，正如它是每一个菲律宾人的职责一样。

我决不奢望从当局那里得到安全保护，也不企求当局的怜悯。我自愿归来。我所拥有的只是一种纯洁的良心，我的力量在于深信正义最终将凯旋般重现。

据甘地说，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的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傲慢的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3年前，当我离国去接受紧急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时，我祈祷我们人民将很快重获权利和自由，生活条件将会改善，流血将会停止。

然而，我们不是迈步向前，我们反而倒退了：死于非命的有增无减，经济恶化，人权状态更加糟糕。

在军事管制期间，最高法院审理了人身保护的请求。最高法院今年4月宣布，它将不再受理在总统命令下关押起来的人之人身安全的请求。这项决定对所有所谓国家安全的案子都适用，而且在目前局势下几乎所有的情况都适用。这不能不说是据称军事管制法被取消后最有讽刺意味的事。

国家在困境中陷得太深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重麻烦困扰着菲律宾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这些麻烦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只有在1972年9月21日之前人民所享受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完全恢复后，我们才能团结起来。

菲律宾人不奢求更多的东西，但他们也决不接受由1935年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利和自由有半点削弱。这些是创建这个国家的先辈们最神圣的遗产。

是的，菲律宾人民是有耐心的，然而，耐心是有限度的。难道我们要等到这些耐心全都消磨完了吗？

全国范围的叛乱，使一场血腥革命一触即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最终认识到，自由从来不是恩赐的，而是争取到的。难道我们只能让昔日的痛苦和流血重新在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出现？难道我们就为能像兄弟姐妹那样坐起来，发理性和善意来讨论我们的分歧？

我常常纳闷，要是争论双方只是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不强加于人，有多少争论可以轻易解决？

为了不至于出现任何误解，我将阐明我们的观点：

一、6年前，我被一个军事审判团判处死刑，但我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它的审判权力。现在是当局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它应该下令立即试行判决或释放我。

我被判处死刑，据称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的领导人。我不是共产党人，过去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

二、民族和解和统一只有在正义之下才能实现，包括公正地对待我们的穆斯林和伊富高族兄弟。这里不能与独裁者打交道。与独裁政权决没有妥协可言。

三、在一场革命中，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受害者。我们不必为了建设而去破坏。

四、颠覆活动有其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不能用纯粹的军事方法来解决。它不能由日益增加的压力来控制，只有通过更公正的财产分配、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自由来缓和。

五、要使经济重新运转起来，必须给予工人公正合理的报酬；而对工厂主和管理人员，必须使其重新燃起希望，而无这许许多多的不安，如果不是绝望的话。

在哈佛大学的一条长长的走廊里，用花岗岩石刻着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名言：“怎样保卫自由？当它受到武力进攻时用武力来保卫，当它受到谎言攻击时用真实来保卫，当它受到极权主义攻击时用民主的信念来保卫。从永恒的意义来说，最后的行动乃是用意志和信念来保卫。”

我结束流亡生活归来，面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我只有意志和信念——这是对我们人

民的信念，对上帝的信念。

（引自 1983 年 8 月 22 日《纽约时报》）

尼诺伊的确是怀着一腔热血回到故乡。他曾与他政治上的朋友说，他期望他的还乡有热烈的气氛和隆重的场面。于是，在马尼拉机场地面还有另外一些人在等待着他的归来。

反对派领导人已经要求左派集团的合作，后者能召集人数众多的游行示威。但他们不想这样做，他们认为尼诺伊必定已经同马科斯达成协议，而美国和美国情报局的一些人也与尼诺伊有关系。

但是，温和的反对派（尼诺伊是其中的一员）把群众用汽车从远处运来欢迎他。3 万人在现代化的马尼拉机场停车场等候尼诺伊。其中许多人系着黄色绸带，着黄色衬衫，这是还乡的标志，这种标志是根据美国一个动人的故事形成的，表示亲人欢迎获得自由的囚徒。

尼诺伊要求在他讲话前先会见 5 个人，他们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他们是：尼诺伊的母亲奥罗拉·阿基诺、最小的妹妹泰茜，以及反对派领袖萨尔瓦多·多伊·劳雷尔、弗朗西斯·泰克·罗德里戈和洛伦佐·塔纳达。他们和其他反对派的领袖——前众议员和参议员——都等在贵宾室。

他们无法来到停机坪，机场内门都上了锁。上午 11 点 30 分，电视摄制人员和其他在场的记者都被命令在 8 号门的通道口处集合，后来又得到指示“不得离开原地”。

这时，尼诺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最好的朋友劳雷尔交给尼诺伊母亲了一张要求人身保护权的申请书，请她签名。他们预料尼诺伊会遭逮捕，而劳雷尔的法律办公室已经准备了这个提交最高法院的文件。

三、马尼拉机场谋杀案始末

当飞机进入菲律宾领空，飞越吕宋岛时，坐在 C14 号座位上的尼诺伊开始默默地祈祷，手里数着念珠。飞机下降了，看见了离机场不远的稻田和村庄时，尼诺伊走进休息室，在他的奶油色的狩猎式茄克衫里面穿上了防弹背心。他将自己的金表交给了妹夫，说：“我只想把它交给你。”之后，他又告诉同行者说：“我们一着陆，勿忘去我家，叫人把我的东西送到监狱交给我。”在这之前，当他听说贝尔将军已经通知各航空公司不准他下飞机时，他曾预言，因为他是一个菲律宾人，他更可能被捕押回博尼法西奥堡。

飞机大约在下午一点钟后开始降落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阿基诺之死》一书是这样记述尼诺伊在飞机降落瞬间的情形的：

尼诺伊·阿基诺身穿一件白色猎装，这是他 3 年前离开这里去得克萨斯时穿的那件衣服。应记者要求，健谈的尼诺伊花去了很长时间同他们谈话。他同往常一样机警、有生气、敏锐和充满智慧。说话时，两个年轻美貌的菲律宾妇女从过道走来，亲吻了他的脸颊，她们擦去印在他脸上的唇印时，大笑起来。这一举动，明显让尼诺伊开心，他也大笑起来。接着同她们握手，对她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在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尼诺伊·阿基诺很快就去与死神约会了。

飞机慢慢驶向 8 号门附近的停机坪上。1000 名来自马尼拉警备司令部的士兵在机场附近的柏油路上各就各位。一辆航空安全司令部的蓝色轿车开了过来，从车上下来另一批士兵，包围了飞机。

在班机的左前方舱门打开，并与通向 8 号门的舷梯连接起来后，3 名身穿短袖制服的保安人员登上飞机——他们中的两名来自航空安全司令部，一名来自马尼拉警备司令部。这 3 位武装保安人员从尼诺伊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航空安全司令部的人认出了他。此人走上前，同尼诺伊握了握手，用加禄语咕哝了几句。旁边的人听清了他说“老板”两个字。

美国广播公司和东京广播公司电视摄影记者冲了上来，捕捉和记录了这一情景。这时，尼诺伊站了起来，一个航空安全司令部的保安人员提起了他的小包，另外两人紧紧抓住了尼诺伊的胳膊，检查了一下他是否带有武器，然后推着他往飞机下走去。

柏原坚跟了上去：“我跟他是一起来的，我是他的妹夫！”3 个中的其中一位没有让他跟去，他示意柏原坚坐在他的座位上，然后，跟在尼诺伊的身后离去。

这时，有人看见尼诺伊参议员一直带笑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呆滞和忧郁的表情，嘴唇抿成一条线，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当时，记者们都紧随其后，电视摄影机一直转动着。只见一个便衣警察迎面站着，还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员守卫在通往大厅的通道口：一个是保安警察，一个是航空保安部的士兵，另外还有 4 至 6 名身着白色衬衫的便衣站在飞机里。

此时，通往大厅的通道的左侧旁门打开了，通过一个梯子可走到地面。那位让柏原坚坐下的保安人员这时抓住尼诺伊的胳膊，另外两个人突然把尼诺伊抬起来，扔到了梯子的平台上。有两个穿军装的和一个人穿便衣的武装人员跟了上去。又有一个穿白衬衫的便衣快步跳到平台上，用他的背挡住了电视镜头。尼诺伊很快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东京广播公司的电视摄影人员试图将电视机举过他的头顶，立时上来一

个便衣用手挡住了摄影机不准拍摄。其余的摄影记者都举起了摄影机。摄影机发出嗡嗡的叫声，记者们向前挤着、推着，抢占有利位置。就在这时——“砰！”一声枪响，飞机上所有的乘客都惊呆了，一位妇女发出了一声惨叫。人们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陪同尼诺伊回国的记者这时不顾一切地冲破卫兵设置的防线，向飞机下奔去：只见尼诺伊已经倒在血泊中。而那3名保安人员，此时此刻却不见了踪影……有一大群士兵赶来。

人们发现尼诺伊的身旁又多了一具尸体。士兵们朝尼诺伊尸体旁的这具尸体开枪射击。人们无法猜出这具尸体的来源，但他确实早已经死去。他面朝下趴着，血已经流干，而且流向是朝上的。他死前肯定是仰面朝天的。

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也停止了呼吸。他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在地上，鲜血从他脖子上喷出。

当时，飞机内外的许多旁观者都被这瞬间发生的惨案吓呆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即使有人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也没有人敢在这时站起来。他们不知道这惨案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是谁从中作梗制造了这起惨案？现在现场是否还有他们的同伙？……人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尼诺伊·阿基诺。

后来有人计算了一下，从尼诺伊在C14号座位站起来到传来枪声，期间只有50秒钟。这个本来可能当上总统的人，结束了流亡生活回来，没想到竟永诀人世。

没有人告诉候机室里的尼诺伊的母亲和亲友，停机坪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有人过来说尼诺伊被枪击中了，但不知是死是活。尼诺伊的亲友们就到附近的巴克拉兰教堂祈祷，再后来他们回家了。

他们听到广播时，才知道他们的尼诺伊已经死去。他们跑到博尼法西奥堡的军人医院，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并把枪指向了他们的头部，但他们坚持要进入医院，并与门卫争辩者，直到最后才允许他们进入医院。

国防部长恩里莱也来到了医院，他是政府最高级官员中最早来到的。他看到了尼诺伊流血的尸体，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四、波士顿的不眠之夜

身在美国波士顿的科拉松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尼诺伊的消息。从丈夫离家时起，她就守在电话机旁。夜深了，她仍不能入睡。马尼拉和波士顿时差约为 12 小时，当尼诺伊重重倒在马尼拉机场时，科拉松正在为尼诺伊祈祷，她念《玫瑰经》。大女儿鲍尔塞走来，问母亲怎么还不睡觉。科拉松说，她睡不着。大女儿陪着科拉松。儿子诺伊也醒了，他打开了电视。

科拉松·阿基诺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尼诺伊最初是选择 8 月 7 日回国的，理由是那天是一个星期日，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回国时间。因为这一天人们将不去工作，而可能去机场迎接他、欢迎他。而且星期日下午约有五六次班机抵达，到时将有许多人在场，对他的安全有好处。因此，多伊·劳雷尔觉得这将是最好的时间，是尼诺伊最合适的时间。但是，收到了恩里莱的电报，让他最好推迟回国的时间。尼诺伊同意了，好了，就这样吧，为什么要这样不讲道理呢？

当时，尼诺伊还没有取得旅行证件。他曾向菲律宾领事馆提出过申请，但是，他们告诉他，必须等待马尼拉发来指示，看是否同意给他证件。尼诺伊的证件被伊梅尔达拿去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她既没有还给他旧证件，也没有给他一个新证件。但是，尼诺伊还是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证件。这时，“我认为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了。”“我清楚我们可能永远地呆在美国，而尼诺伊渴望回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他觉得 3 年已经太长了。此外，他到这时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度过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一关，保住了生命。当时，他感觉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健康。他已经在哈佛大学学了两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干了一年。在这些年，不管什么该做的，他或许已经都做了。于是，他又想起了他的政治。”

科拉松说尼诺伊临行前的那天晚上，他们两人都难以入睡。科拉松告诉尼诺伊，“我感到特别冷飕飕的”。这在 8 月是不正常的。那还是夏天，即使晚上有些凉意，也不至于冷得让人感到寒气袭人。”我起床穿上了袜子，对尼诺伊说，‘你知道，我的这种感觉只有在你被捕时和军事管制法宣布的那天有过。’尼诺伊似乎不愿意听到我这样的谈话，他说，‘哎呀，我们别谈这些了。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说，‘我知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感觉。’”

次日，科拉松与孩子们陪伴着尼诺伊参加了弥撒。之后，尼诺伊踏上了返乡之路。在飞机场“无票者不得入内”区外，科拉松记得她对尼诺伊喊道：“别忘了，每到一站都要给家里来电话……”

科拉松记得尼诺伊给家里来的第一个电话是他刚到洛杉矶时。科拉松告诉尼诺伊：“千万小心，你已经上报了。你记得临行前来的那位记者吧？你显然没有告诉他不要写你离开的消息。对《波士顿环球报》也是如此。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你正在洛杉矶，踏上了返回菲律宾的旅途。小心，你千万要小心啊！”

尼诺伊第二个电话是在香港打的。他没有告诉科拉松他住在什么地方，只是报了一个平安。科拉松突然觉得应该有一个家里人陪伴他回国。当时，他们也是这样安排的：让诺伊和克丽丝跟他一起回菲律宾去。后来，由于签证没有落实，这个计划也就落空了。从尼诺伊离开，科拉松就开始打点行装。她准备两周内也赶回马尼拉去，尼诺伊不在，她和孩子们都聚在波士顿有什么意思？

收拾行装到深夜，科拉松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可是她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她挂念尼诺伊，盼望着他的电话……“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在等待着他的电话。午夜已经过去了。这时鲍尔塞——我们的大女儿来到了我们的房间。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妈妈，我也睡不着。’于是，我们开始谈话。后来她问几点钟了，当时我看了一下手表，正好是凌晨1点钟。我去了卫生间，接着，我决定念珠祈祷。后来，我算了一下波士顿与马尼拉12个小时的时差，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在1点10分到1点15分之间，我觉得他被人枪杀了。鲍尔塞和我没有睡，儿子诺伊也醒着，正在看电视。我们有有线电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电视台随时都可能报导这一新闻。”

第一个电话是在2点30分左右打来的。“有电话打来了。”鲍尔塞接起电话听了听，神色不安地看着母亲，说：“这电话是共同社（菲律宾）驻纽约的一个记者打来的。他说有人在马尼拉机场遇害，他们认为是爸爸。他们问我们是否已听到了这一消息？”

科拉松接过电话：“怎么回事？”

“我们在东京得到消息说，你丈夫已遇枪击身亡。你们接到了确切的消息吗？”科拉松怔怔地放下电话。又有无数个这样的询问电话打来。最后一个电话是从东京打来的。对方是日本国会议员石原信太郎，尼诺伊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说：“科丽，我非常抱歉，我想尼诺伊已经死了。”日本的一位自由记者和尼诺伊同坐在一架飞机上，他把消息告诉了这位议员。那位日本记者说尼诺伊的头部被击中了，他看到血从尼诺伊的头上流下来。

科拉松把这个痛苦的消息告诉了孩子们。他们一家人大哭起来。科拉松抽泣地说，也许这样比长期囚禁在监狱中好。尼诺伊常说，他绝不想回到监狱中去。她泪流满面，一边开始接待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一边抽空给马尼拉家中打电话。她此时还不相信尼诺伊就这样离开了她和孩子。她着急给菲律宾的家中打电话欲得到最准确的消息。

“他们不知道怎样告诉我这一消息。他们不知道怎样把这一消息捅破。其实，在我婆婆看到尼诺伊的尸体前，他们都不相信这一消息。他们一直希望这是一个谣传，而尼诺伊还依旧活着。因此，我在事情过后很长时间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后来，他们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这一消息。”

当科拉松·阿基诺的妹妹在电话里告诉她，有许多人都去瞻仰尼诺伊的遗体时，科拉松决定：立刻回国去！

五、尼诺伊：一个伟人的光辉

坐落在马尼拉泰晤士街中层阶级居住区的一幢朴素的木结构房屋，是尼诺伊和科拉松共同生活了 20 年的家。此时，尼诺伊正静静地躺在室内大厅，安睡在木棺中。他的脸上仍旧血迹斑斑，有明显的伤痕和被子弹打穿的洞孔。子弹是从他的下颚穿过的。

他穿着的还是他被打倒在地时的那件血衣。家人没有叫人把他的尸体洗干净并另换上一套衣服。他的母亲多纳·奥罗拉坚持：“我要让菲律宾人民看看，他们对我儿子做了些什么？”

科拉松与她的孩子们搭乘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从波士顿经过 24 小时精疲力尽的旅途后，回到了菲律宾。她身体细长，有 50 岁左右；头上短短的卷曲黑发，使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一张圆脸，有一副混合着中国、西班牙和菲律宾土著的马来亚人特征的容貌。她先到福布斯公园看过她的母亲后，匆匆地赶回到自己的家。

家门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排着队瞻仰这位为国家的民主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民主英雄。此时，在菲律宾人民心目中，他已经是一个神话了的人物。无论人们对于他的正直和爱国心曾有过什么怀疑，对他的善与恶有什么纷争，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科拉松挤在人群中，一步步地走向她的尼诺伊。她神情相当平静，没有人看得出她内心的巨大悲伤。当她走近到尼诺伊时，她没有嚎陶大哭，而是仔细地、默默地端看着她的丈夫。她俯下身向尼诺伊轻轻他说着什么。最后，她吻了他，还是没有眼泪。

女儿们告诉妈妈说，她们感到了爸爸对她的满意。而后她才离开尼诺伊。

可是科拉松·阿基诺一时一刻也没有忘了她的尼诺伊。

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是本世纪七八年代菲律宾最活跃的政治家。

他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菲律宾独立战争之前。当时，科拉松家族的政治力量并不强，但阿基诺家族却已经在菲律宾的打拉省有了很大的势力。他们的家族是中国和西班牙的混血儿。尼诺伊的祖父塞维拉诺·阿基诺将军是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他反对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于 1897 年被投入监狱并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获释放，带领菲律宾人民同来犯的美人作战。尼诺伊的父亲小贝尼格诺·阿基诺是个甘蔗种植园主。尼诺伊 3 岁前后，他们一家人住在康塞普西翁，他的父亲在那里租赁了一座种植园，后因借债抵押出去丧失了所有权。他的父亲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他们一家就迁往马尼拉。不久，他的父亲又被选为菲律宾的农业部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又扶植尼诺伊的父亲为菲律宾众议院的议长。我们前面提到的劳雷尔的父亲乔斯·P·劳雷尔被提名为总统。阿基诺一家搬进靠近马拉卡南宫（有史以来的菲律宾总统府）的议长官邸，尼诺伊就在总统府和劳雷尔的孩子游戏。他们的父亲在日本投降前都飞往东京，一个月后又在东京被美国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投入了监狱。尼诺伊和劳雷尔兄弟们留在马尼拉，因为“父亲和日本勾结”使他们不敢出门。这加深了这些孩子的友谊。尼诺伊后来说，劳雷尔是他唯一的朋友。

尼诺伊生于 1932 年 11 月 27 日，尼诺伊是他的爱称。他母亲多纳·奥罗拉·阿基诺也是当时菲律宾上流社会的佼佼者，曾任菲律宾中央女子大学校长，做了 30 年的教育工作，她也是尼诺伊政治上的启蒙教师。尼诺伊在 50 年代参加竞选市长，据说曾有一名政客对他进行恫吓。他一时动摇，想离开

政界，是他母亲坚持让他继续下去。她教育他要能经得起各种磨炼，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1948年尼诺伊进入亚典尼奥大学新闻系，同时担任《马尼拉时报》的见习记者。1950年他18岁时，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朝鲜战场采访。尼诺伊曾告诉科拉松，“我是当时记者中最年轻、地位最低的一个。在老记者中，要求增加津贴和补贴费的争吵，使上司不知所措。我认为这是一条近路，我不计较薪水，努力说服上司和家人，之后，再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带着打字机乘军用飞机前往朝鲜。”

到朝鲜后，尼诺伊才发现他不枉此行。这里聚集着全世界最杰出的战地记者，他向他们学会了新闻写作技巧，如何快速发稿，如何采访。美国《生活》杂志的一流摄影师教他如何拍照。他的新闻稿件很快在马尼拉轰动。有一位政治记者评论尼诺伊说，他这个引人入胜的年轻人有胆量和决心，他雄心勃勃，反对无聊闲谈，急于成功，精心探索到达目标的捷径，从不放过一次机会，是与长者竞争并能利用其青春活力的出色的记者。

尼诺伊1954年与科拉松结婚。但婚后的尼诺伊并没有沉浸在缠绵之中。他喜欢政治。

1955年，23岁的尼诺伊就当选为打拉省康塞普西翁市市长。

1959年，27岁的尼诺伊又当选为打拉省的副省长，并连选连任共4年。

1964年，尼诺伊被当时的总统马卡帕加尔聘为特别顾问，曾陪同马卡帕加尔出访柬埔寨和印尼。

1967年，尼诺伊以菲律宾反对派自由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参议员，并以最高票当选。他是反对派中唯一的当选者，其余席位全被马科斯执政党包揽。有趣的是，按当时的菲律宾法律规定，当选的参议员必须年满35周岁，而尼诺伊却差几天才达到这个年龄。有人提出抗议，但法院没有受理。同年尼诺伊当选为菲律宾自由党的秘书长，成为该党最有号召力的三巨头之一。菲律宾政坛普遍认为，尼诺伊是一颗政治明星，是最可取代马科斯的人。尼诺伊本人也在积极准备，打算竞选总统。

科拉松记得从那时起，尼诺伊的仕途就一帆风顺。他为一个又一个胜利而殊死拼搏，而胜利也仿佛注定要到手一样，一个又一个朝他飞来。这引起了马科斯的忌恨，他深知尼诺伊才气横溢，有一定政治势力，又颇得美国人的赏识。尼诺伊已成为马科斯最大的威胁，他必须把尼诺伊铲除才算去掉心腹之患。1972年8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尼诺伊的自由党在马尼拉的米兰广场举行集会，为该党参加竞选参议员进行活动。会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9人死亡，90多人受伤。这就是菲律宾历史上著名的米兰广场事件，由此，开始了70年代菲律宾最黑暗的军事管制时期。

1972年9月21日，马科斯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法，解散议会，取缔政党，甚至连合法选出的副总统也被废黜了。同时开始进行全国大逮捕，尼诺伊被名列黑名单之首，于9月23日晚被抓走。

1973年，尼诺伊被指控犯有杀人、非法占有武器和搞颠覆活动的罪名。

1975年，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但是尼诺伊没有出庭受审。在法庭命令他一定要出庭后，他进行绝食抵制。39天后，尼诺伊的体力崩溃，被送往医院。他十分衰弱。他的呼吸有胆汁味。一个牧师开始给他作最后的祝福。

1977年，军事法庭宣判尼诺伊死刑，罪名是杀人、非法占有武器和搞颠覆活动，但他的律师向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暂缓执行。国际新闻界反映极为

强烈，国际政坛也引起反响。对此，马科斯只好作出让步。

马科斯重新建立了国民议会，并宣布 1978 年进行总统选举。同时，他也感到狱中的尼诺伊仍是他深切的烦恼和潜在的威胁。1979 年 12 月，当尼诺伊在圣诞节休假时，马科斯提出，如果尼诺伊出国就让他自由。

1980 年 5 月，经过 7 年又 7 个月的单身囚禁生活之后，尼诺伊被批准离开菲律宾前往美国去作心脏疾病手术。

在美国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但科拉松没想到她的丈夫在这 3 年中，从没有忘记政治。当马科斯身患重病的信息频频传来之后，尼诺伊就再也不会坐卧得安了。他义无反顾地走向菲律宾。科拉松想，尼诺伊肯定不知道他这是在走向死亡，如果他知道，他绝不会就这样离开自己和他的孩子们，他多爱生活啊！

科丽再一次亲吻了尼诺伊。她盯着他的脸：“亲爱的，从嫁给你，第一次看到你这样安静……”也许她是这样说的。她低声细语着……

六、一个轰动菲律宾的葬礼

尼诺伊的死在菲律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源源不断地来到尼诺伊的家，向尼诺伊致以最后的敬礼。科拉松和阿基诺家族决定，把遗体送往他家族所属的圣多明戈教堂，使公众便于瞻仰。

从泰晤士街中层阶级居住区的科丽的家到教堂有几英里的路途。科丽走在前面，后面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护送队伍。当队伍通过一些主要街区时，有人从商店、办公大楼、饭店和他们的家中跑出来，或是跟上队伍，或是站在路旁目送队伍远去。据报导，那天有5万人参加了遗体运送，人们赞美着尼诺伊的名字并高歌《我的祖国》。现在，这首民族主义歌曲已经成为反马科斯的战歌。

科丽又把遗体运到塔拉克，那是尼诺伊的家乡。它在首都以北60公里的甘蔗种植区，他们在那里作了两天的弥撒和祈祷。来到这小小的外省市镇瞻仰遗体的大约有15万人。当45辆汽车长队送遗体返回马尼拉，路经中吕宋的二省市镇时，有几万人站在公路的两旁。人们在烈日下等候整整三五个小时，为了能看一眼尼诺伊的柩车。

当反对派领袖们建议，把遗体送往国内重要大城市以激励民心时，科拉松拒绝了。她说，尼诺伊已经完成了他应尽的责任，让他安息吧！

葬礼在尼诺伊遇害10天后举行。早在凌晨5时，就有人来到圣多明戈教堂等候上午9时的仪式。科丽站在教堂半圆形后殿高高的拱顶下，神情镇定。人们呼喊着她，让她讲尼诺伊。她点头答应人们的请求。她让大家肃静，给大家讲起了她和尼诺伊最后一次通话时的情景。她回忆说，当她得知尼诺伊的死讯时的震惊现在已无法形容。她说她看到人们对尼诺伊的关注后，她平静多了。她说，她觉得尼诺伊没有白白地死去，她为此感到由衷的安慰。现在，她和她的孩子们表现出的勇敢和沉着自若，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尼诺伊期望他们这样做的。最后她说，“尼诺伊一生都爱菲律宾人民，他为菲律宾人民的民主和平等奋斗了一生。现在，我看到菲律宾人民也非常地爱你——尼诺伊！”据说，科丽的讲话由几家无线电台实况转播，电台还播转了送葬的情况。送葬气氛相当隆重，在全国5500万人中，有200万人参加了送葬。葬礼从上午10时30分开始。灵柩放在十轮卡车上，四周放满花圈和向日葵。支持者步行20里，送葬行列走了10个小时。

更多的人在黎明就开始站在路两旁，黄色和黑色的飘带系在建筑物上、树梢上和混凝土的大桥上。人们有的系着飘带，手持黄花，有的举着有尼诺伊照片的牌子。他们高喊着和歌颂着尼诺伊，在大雨中整整淋了几个小时也不散。

到了墓地，人们像波涛似地涌向前面，为了再最后看一眼尼诺伊。科丽感到精疲力尽，她已经好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她头昏目眩，但她还想看一看丈夫。躺在木棺里的尼诺伊没有更换衣服，仍旧是被害时穿着的那件血染的衣服。又有人流向前涌来，科丽闭上了眼睛。

尼诺伊的遗体缓缓地放进墓穴。这是在马尼拉公墓长满青草的有水泥拱顶的平台上。科丽流下了眼泪。城里许多人家在这一时刻关上电灯，点上蜡烛，击锅、吹号角的声音，像哀乐一样响遍夜空。

尼诺伊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多伊·劳雷尔，把盖在红柳木棺上的菲律宾国旗交给了科丽。这礼节上的举动，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什么。后来，科丽

走上政界，当上菲律宾的总统，人们想起了葬礼上的这一幕：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第二章科拉松·阿基诺——在悲痛中站起来

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他的母亲和朋友，同时，也离开了他的政治。不知为什么，尼诺伊领导菲作宾人民反对马科斯的专制统治时，人们只认为他是一个反对马科斯的勇士，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物。现在他死了，却在人们心目中突然变得高大起来。他的崇拜者突然增多，变得不计其数。他们开始把尼诺伊生前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不平凡、不普通的人的作为。

作为菲律宾人民崇拜和供奉的偶像，他们开始洗刷尼诺伊身上的任何弱点或不完美——他们敬慕的英雄必须是完美、纯洁和强壮的。甚至连厄诺伊的死亡，都被看成是天意。萨尔瓦多·P·洛佩斯在天主教周刊《真理》中写到了这一点：

一年前在机场出现了一个极少有的需要和结合：人民迫切需要一位拥戴者，而有人明显地下决心要除掉他。他虽然死了，却成了一个不死的英雄。

人们把尼诺伊·阿基诺请进了菲律宾英雄神庙中予以祀奉——他成了众神中最伟大的英雄之一。这个善良的民族把他们的英雄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洛佩斯说，他成了菲律宾的象征和英雄。他这个英雄是人民的意愿认可的，而不是什么立法机构的法令、总统的文告或者什么委员会加封的。

同时，费迪南德·马科斯一伙却乱了阵脚。在病中的马科斯大发雷霆，指责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干了这起愚蠢的勾当。他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机构，对尼诺伊在马尼拉机场被谋杀一案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工作。

科拉松·阿基诺站起来，对菲律宾人民公开说，她不相信马科斯能对尼诺伊的枪杀案有兴趣，更不相信马科斯一伙能给菲律宾人民一个真实的结果：只要马科斯在台上执政一天，就没有什么正义而言……

一、科胡昂科家族

科丽全名为玛丽亚·科拉松·科明昂科。她生于1933年1月15日，是迪米里亚·苏木朗和乔斯·科胡昂科8个孩子中的第六个。她的双亲都出身于富有且有政治权力的家庭。她母亲的父亲是参议员，她父亲是众议员。她的家族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菲律宾的名门望族。

从血统上讲，科胡昂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福建省的一个商人，他在菲律宾经营贸易。和许多来到这里经商的华人一样，他定居后和菲律宾人联姻，把种子散在菲律宾这块土地上。

科丽的曾祖父叫许尚志，又名许玉寰，是福建省同安县角尾镇鸿渐村（现在属龙海县）人。1881年咸丰年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中国政府腐败透顶。中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为了活命，沿海许多青年人奔往他乡，许尚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尚志起初住在马尼拉，后来搬到菲律宾布拉干省的马洛斯镇，在那里经营建筑承包和小种植园。布拉干是菲语，意思是棉花。布拉干省就是以盛产棉花而著称于世。马洛斯在菲律宾名气很大，它的巴拉索阿因教堂曾是菲律宾革命国会的旧址。1899年菲律宾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马洛斯由革命国会通过的。该宪法于是被命名为马洛斯宪法。这部宪法也有其独特的革命意义，它是菲律宾民族自立能力的见证，也是菲律宾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的象征（关于菲律宾民族历史，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

许尚志最后定居在打拉省的帕尼基市。该市至今保存着许尚志的纪念碑和半身塑像，碑文上写着：“同邑（安）鸿渐，皇清置考十九世纪尚志许公封。”许尚志在打拉省经营建筑业。

打拉省位于中吕宋，在马尼拉以北，以产甘蔗闻名。后来，许尚志也种植甘蔗，经营糖业和碾米业，逐渐成了当地的富户。他娶了一位漂亮的菲律宾姑娘为妻，入乡随俗，还取下一个教名叫“何塞”。在那时候，侨居菲律宾的华人教徒，也受欧洲特别是菲律宾最早的殖民者西班牙姓名排列的习惯的影响，往往也连姓带名，排在教名之后，因而许尚志也就成了何塞·许尚志。

何塞·许尚志一生有许寰等4个儿女。许寰是长子，他也就是科拉松·阿基诺的祖父。由于许寰在华人中的影响，华人常常找许寰商议大事，解决邻里纠纷等，华人内部都爱称许寰为哥，约定俗成，“许寰哥”就成了这个家族的姓氏。按照“许寰哥”在福建话里的发音，许多华文报纸按谐音译成汉文就变成了“科胡昂科”。

科拉松（科丽是科拉松的爱称）的祖父死得很早，曾祖父留下的家业是由不出嫁的氏女（科拉松的姑婆）伊丝拉和科拉松的祖母特克拉·奇奥戈继承经营的。这两位妇女很能干、很勤劳，善于治家理财。她们不但能守业，而且还能发展。1928年她们投资建立一座名叫帕尼基的炼糖厂，还买了大片甘蔗园，雇用了大批蔗农和炼糖工人，又建立了一支私人卫队来看守产业。

科拉松的父亲乔斯是马尼拉亚典尼奥大学毕业生，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菲律宾大学学习法律，获法学士学位。他曾担任过远东大学董事长，打拉省财政复兴合作委员会委员。他还创办商业银行并担任行长，在自由保险公司也有不少股份，当过该公司的董事长。但他最主要的事业还是种植业。因为他是长子，得以继承祖业，他成了打拉省的稻米和甘蔗大王。后来，他

把家业不断扩大，拥有面积 6400 公顷的“阿辛尔达”。“阿辛尔达”，这个词是西班牙语，意即大庄园。

说起“阿辛尔达”，打拉省的菲律宾人几乎都知道科胡昂科的路易西塔庄园。它在打拉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它原是西班牙殖民者的产业，1957 年才从一位著名的雪茄制造商那转到科胡昂科家族。它距离马尼拉约有 100 公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甘蔗种植园。其建筑很像中世纪时期领主居住的城堡。里面的一座座别墅式住房，错落有致。草坪上长年碧绿，亭亭玉立的椰子树婀娜多姿，枝茂叶盛的洋槐树影婆娑。庄园里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供家人做礼拜。还有一座洁白漂亮、可容 100 人居住的小宾馆，在喜庆或有其他大典时招待客人住宿。庄园里还有一个大喷水池，水柱射向天空，很远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鲜花更是争相斗艳。还有高尔夫球场和小型飞机场……那真是人间天堂，美不胜收！

庄园雇有 3000 名农业工人。农忙季节还要增雇 3000 名临时工。据说为这个庄园居住的主人服务的各式各样的职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共约 2.4 万人，他们分别居住在庄园周围的小村里。每一村落约有 3000 人，村中有商店、小学校，当然还有教堂。

科拉松的妈妈名叫德梅里亚·苏木隆。她的家族也在菲律宾极有影响。她的祖先唐·胡安就是 1896 年反对西班牙的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美国人战胜西班牙人和菲律宾后，菲律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人要通过当地有地位的人进行统治，唐·胡安很快就又成了美国人任命的菲律宾委员会少数派的委员。德梅里亚·苏木隆的父亲胡安·苏木隆 1935 年也曾参加竞选副总统，但未能成功。她的两个弟弟（科拉松的舅父）在政治上都很活跃。洛伦索·苏木隆 1946 年开始从政，当过众议院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经常参加联合国大会和一些国际会议。1960 年正是他和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联大展开辩论（关于寻求解决结束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问题），导致赫鲁晓夫激动之中脱下一只鞋子猛敲桌子，一时成为天下笑谈。还有弗朗西斯科·苏木隆，1957 年从政，当过几届国会议员。1984 年又当选为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属反对马科斯的反对派阵营。在 1987 年 5 月选举中又当选为众议员，并积极争取成为众议长。

科拉松的母亲在这种政治世家中生活，也形成了一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凡事都要斗一斗。科拉松自称：“在平常的情况下，我是和平的，但若是受到威胁，我就会奋起反抗。”科拉松认为这可能是受她母亲的影响。科拉松的这位母亲虽然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丈夫、儿子搞政治，总是全力支持，乐于为他们花钱出力。她活到 80 多岁，虽然一生富足，却从不肯闲着，常常亲自整理房间、擦地板、扫地、做饭烧菜，非常勤俭，并且要求子女也要这样。科拉松生活比较简朴，不乱花钱，没有阔小姐的派头和恶习，大概就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科拉松当上菲律宾女总统后，许多人认为科拉松是富家小姐出身，一向不过问政治，能当上菲律宾的总统，可谓一步登天！

《巴黎竞赛报》的记者询问她在过去的经历中，谁对她的影响最大时，科拉松说，她的父母亲对她有巨大的影响。她的母亲教导他们要珍惜他们拥有的一切，要他们尊重长者。她认为她自己的沉着冷静的性格，来源于她的父亲。她说，他为人平和，从不想起他什么时候发过脾气。科拉松兄弟姐妹一共 6 人，她排行第四，上有一兄二姐，下有一妹一弟。

科拉松的哥哥佩德罗，爱称“佩特”，获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

士学位。他曾任国会议员，兼管房地产。他的妻子是中央银行行长何塞·费尔南德斯夫人的表妹。菲律宾的政界特别有意思，热衷于政治的人物，基本上是菲律宾的富有者。他们利用联姻，使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后达到他们渴望的目标。还有一点就是，并不是有了亲戚关系就能结成一个政党、追求一个目标。科拉松的堂兄丹丁·科胡昂科就是马科斯最亲密的朋友。

科拉松的大姐菲茵，素以才貌双全著称。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毕业生，担任过菲律宾远东大学校长。大姐夫尼卡诺尔·雷耶斯在二战期间是美国驻非洲和欧洲 B—17 轰炸机的尾翼射炮手。他在一次战斗中，由于飞机被击落而成为战俘，1945 年被苏联释放。他担任过打拉省发展公司董事，并和其父创建了远东大学。

科拉松的二姐特雷西塔，与科拉松同在美国圣文森特山学院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其夫里卡多·卢豹是著名的菲籍华人车商，曾获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硕士学位。他是科拉松后来竞选总统的主要谋士和高级顾问之一。

科拉松的小妹帕西塔嫁给了一位运动员兼企业家。他的家庭曾是打拉省的富户之一，后来衰落。他帮助经营家族企业在马尼拉的公司，与科拉松的小弟关系十分密切。

科拉松的小弟弟何塞·科胡昂科，爱称“彬彬”，被菲律宾政界称为是“既有权势又神秘莫测”的人物。他是科拉松政治生涯的“悄悄的政策制定者和权力经纪人”，曾任民主党——自由党主席，该党是支持科拉松竞选总统及支持新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他经常出入姐姐的办公室，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科拉松很重视弟弟的主张和设想。何塞·科胡昂科原是一个大商人、大种植园主，与原农业部长拉蒙·米特拉在比科尔共同经营农场。他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圣十字工商学院企业管理系，除经营工商业和农场外，他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先后当选为其故乡帕尼基市议员、副市长和市长。他还担任打拉省市市长联盟主席，连任两届打拉省的众议员。

尼诺伊在世时，小何塞就是尼诺伊的首席政治顾问。尼诺伊被害后，他无比愤怒，更加积极地从事反马科斯的活动。科拉松竞选时，他为她筹集竞选经费，主持组织她的所有竞选活动；还为她网罗人才，组成一个顾问团，替她制定全盘竞选战略。他的妻子玛加丽塔·德洛斯·雷耶斯也很活跃。她是科拉松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科拉松执政后，她协助科拉松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曾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组织的一个派系）接触。她热衷于社会的福利活动，对科胡昂科家族的历史也非常感兴趣。据说她搜集了不少有关中文资料，1986 年 6 月曾随菲律宾农业部副部长王海棉访问中国，当时曾替科拉松寻根。她专程到其祖籍福建省龙海县参观访问，见到了科拉松的一位堂叔，叫许源兴。她还看到了许氏的一所故居，虽是百年老宅，却维修得很好。

二、含着金匙子出生的幸运儿

科拉松是西班牙文，意为“心”。大概因为许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讲究宗教的“爱心”。科拉松的父母亲希望她有一颗爱祖国，爱人类的伟大爱心，所以，科拉松·科胡昂科·阿基诺（婚后加上夫姓），是西班牙语、华语、菲语的混合，这表现出科拉松的血统、文化教养和社会背景的渊源。

科拉松可以算是“嘴里含着金匙子降生”的幸运儿，家庭富有、和睦，父母宠爱，从小受良好的教育，应该说是应有尽有，不大能知人间还会有痛苦与艰辛。

但社会却在动荡之中。菲律宾这块太平洋上的小岛屿，从18世纪起就不断地受到外族的侵犯。1942年，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马尼拉，当时的科拉松还是个小学生，就要在老师的强迫下，向日本人献花。她们必须接受日语，稍有不满足就会遭到冷眼。后来，一家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侵略，举家搬到了美国。

1946年，日本人离开菲律宾，她一家人也离开了美国，回去经营他们的产业，把只有13岁的科拉松留下来，继续完成她的美国学业。

科拉松与家人到美国后，先在费城的拉文山学院读中学。她极其安静、含羞，不装腔作势，是个严肃而带书卷气的好孩子。她的中学年刊照片上的题词，引用的是罗马教皇十二世的话：“你有责任使你现在的生活必须成为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在下面，年刊编辑赠送了她一句话：“就我们已知的科丽而言，这可以称之为对未来的预言——在她庄重的举止底下有一种友好的性情和安宁的魅力。”

1949年——1953年，科拉松在纽约圣文森特山学院主修法语和数学。这所学院是美国天主教会于1847年创办的，地处纽约市富庶的布普克斯区里弗代尔安静而隐蔽的校园里。这所学校只收女生。科拉松在那里学会了法语和数学，以锻炼她的思维能力。这对她执政后从事外交活动和考虑错综的问题很有帮助。1986年她接见法国记者时讲了一口地道的法语，使对方感叹不已。她讲演时条理分明，思路清晰，不能不说是“与大学4年的数学学习不无关系。”

科拉松在这里积极从事圣母慈善团的活动，这是一个宗教社团，专门研究宗教仪式。几年后，她的一位同学回忆说：“她经常谈到关于圣母的事儿和她的宗教信仰，每次下课她都去作小礼拜。她经常披着黑丝披肩，并以仁爱和谦恭出名。一个失明的学生与她住同一宿舍，她总是扶着她来上课。”

作为一名大学生，科拉松是勤奋的和用功的。但当时她似乎没有什么追求，人生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恐怕她也不太清楚。她生活得像普通的女学生一样，上课时就听课，课余时间听听音乐，看看电影，有时打打排球，据说球艺还不错。曾经任圣文森特山学院院长多丽丝·史密斯是科拉松当年的同学，她回忆说，科拉松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学校时，是个“既文静、稳重又勤奋好学的姑娘”，“不论念书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但科拉松“没有任何政治意向”。

与她同住一个公寓，曾经是她的妯娌的波夫西·阿基诺则回忆说：科拉松非常腼腆可爱，还有点书生气，是一个非常懂情理、规规矩矩的传统式的菲律宾少女。

的确，从她当时同学们的合影中，我们不难看出科拉松夹在一群妙龄少

女中，朴素无华，毫无特殊。据说当时她是住在穷人聚居的纽约曼哈顿第 42 街的公寓里，虽然带有菲律宾女仆侍候，但她从不摆小姐架子，也从不乱花钱。

科拉松在圣文森特山学院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还接受了传统道德教育。“修女教给我们传统价值”，一位同班同学回忆说，这所学校同时教会了他们怎样做女人，“你绝不要做有损于你丈夫面子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们之间争吵你应该让步，因为男子比女性更难认错。你切莫公开说你丈夫的不对，你绝不要做会使他为难的事。”

1953 年，科拉松大学毕业回到马尼拉。她觉得自己很空虚，需要再学点知识。于是，她进入到马尼拉的远东大学学习法律。其实她并不想当律师，只是想探讨一下法律的奥妙。但她并没有完全学完法律课程就中途辍学，准备结婚——她爱上了尼诺伊。

三、一不小心，当了尼诺伊感情上的俘虏

科拉松第一次见到尼诺伊是他们都 9 岁时。那是在她父亲的生日宴会上。两家父亲都是朋友，又都是国会议员。尼诺伊的父亲代表打拉省第一区，科拉松的父亲代表第二区。当时他们两家都住在马尼拉，科拉松的父亲还给尼诺伊的妹妹当教父。

科拉松第二次见到尼诺伊是在美国费城拉文山学院中学暑期回家时，在一次聚会上，他们相遇。但那时科拉松对尼诺伊没有什么兴趣，她更希望和一个年龄较大的人结婚。

科拉松在圣文森特山学院上三年级，回来度假时又与尼诺伊见了面。那时，他是《马尼拉时报》的记者，在报导朝鲜战争的新闻中得了荣誉，这给科拉松极深的印象。科拉松觉得尼诺伊是她见到过的最聪明、最有趣、最有表达能力的青年。她喜欢他的生气勃勃和勤奋过人。

在这里，我们引用尼诺伊在波士顿流亡时的一位他亲密的朋友对他公正的评价。他是布兰代斯大学校长本杰明·休士顿。他说，他在尼诺伊身上看到了这位菲律宾人具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集于一身的特点，“每一个在哈佛大学认识尼诺伊的人，都决不会忘记他。”他描绘尼诺伊：

活泼轻快的步子，明白准确的手势，清晰敏捷的思维，闪电般的热情。同尼诺伊在一起，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一切都一目了然。他似乎不隐藏什么，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充分地把自己裸露在世人面前，带有如此鲜明的特性。他好像一汪清水，一览无余。

然而，他又是一个拥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品格的结合体。显而易见，他也是非常复杂的。对我来说，我似乎常常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许多尼诺伊的存在，并非那张脸上始终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而是从那些变化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样子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奇迹。

首先，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一位政治领袖，具有敏感的触觉，机警的眼睛、耳朵和灵敏的鼻子，能够辨别舆论和事件发展过程中极细微的差别，并时刻绷紧弦，随时准备付诸行动。

第二，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观察和分析事物时有独特的见解，渴求新知识和新思想。尼诺伊阅读材料过目不忘，对讨论的问题了如指掌，总是发表中肯的意见。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我所遇到的掌握信息最为广泛的政治活动家，而且他还能谨慎从事，老练圆满。

亨利·伯格森非常欣赏他那一代的年轻人，像一个行动者那样思考和像一个思想家那样行动。尼诺伊看起来就是这种人完美无缺的典范。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第三，他是某种指挥一切的官员。这种人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在一个崇高的目标下，把一个人复杂的人格的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统一起来，让它分别发挥自己的魅力。尼诺伊这个人，极为关注事件的是与非，能够自觉地协调目的和手段，特别是非常清楚需要一次非暴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菲律宾现状是行之有效的。

我认为，正是这个尼诺伊，这个具有良知——还补充一点，具有信念的尼诺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回国这个命运攸关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他拒绝了许多朋友的忠告，克服了内心的矛盾才做出的。

……

这是多少年后的尼诺伊。但有时候，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他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他的聪明、他的性格、他的追求。年轻的科拉松大概就是看中了尼诺伊的这一点，也许还有他那富有子弟最缺少的正义感。

这时，尼诺伊也对科拉松产生好感。他给科拉松的情书开始像雪片一样飘向当时年仅 20 岁的科拉松。科拉松非常喜欢尼诺伊的来信，因为这些信件都不是“软绵绵多愁善感的”。尼诺伊大段大段的对国家大事的议论，让科拉松觉得十分地新鲜，她毕竟还没有投身到政治中去，政治对她来说虽不遥远，但也不十分地熟悉。她知道如何去回信。如果让她去写，她更愿意多写一些感情。科拉松后来说，“作为情侣，尼诺伊不是一个充满感情的人。”

尼诺伊向女孩子们献殷勤是遮遮掩掩的。根据他的兄弟阿加皮托·阿基诺的回忆，他不仅仅追求科拉松，他同时还护送伊梅尔达。因为他是一个很吃香的小伙子，是打拉省那些漂亮小姐的标准卫士。

伊梅尔达·罗穆尔德斯是当时打拉省城最漂亮的姑娘。她 19 岁时从外省来到马尼拉，寄住在堂兄丹尼尔·罗穆尔德斯家。有一段时间，她堂兄是众议院议长。他的妻子帕辛是尼诺伊的姨妈。尼诺伊 1953 年遇见伊梅尔达，她当时是选美儿的参加者。她去打拉省的社交舞会上并不怎么令人倾倒，因为她身材太高，对菲律宾男子不是十分合适的舞伴。

帕辛·罗穆尔德斯有时让尼诺伊保护伊梅尔达，并请求他将她介绍给城市里的朋友们。还有人说，伊梅尔达初到马尼拉时，身边围着一批富家子弟，时进时退，尼诺伊便是其中的一个。尼诺伊和伊梅尔达那年经常见面。后来，伊梅尔达嫁给了费迪南德·马科斯，而他们之间的仇恨也是在那一段时间萌发的。显然，尼诺伊起初对伊梅尔达还有一点意思，但后来就冷落了她。人们认为，伊梅尔达认定尼诺伊是那些一直排斥她的社会精英中的代表人物；何况冤家路窄，两人相遇时，尼诺伊总是冷嘲热讽，尖酸刻薄上几句，使得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不管别人怎样说，伊梅尔达自己在 1973 年的军事管制法时期，告诉很多人说尼诺伊曾经追求过她，但是，她没有嫁给他，她嫁给了比当时的尼诺伊更加成熟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爱情很多时候是为政治服务的。当然，这都是后话。

科拉松回到马尼拉进入远东大学法律系后，看见尼诺伊的次数不断在增多。尼诺伊继续向她发起频频进攻，科拉松在尼诺伊的强大攻势下，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

1953 年底，尼诺伊对母亲说，他准备和科丽结婚。他母亲问他：“你要和她一起生活，你对她有足够的认识吗？”尼诺伊说：“我已经很了解她了。”他请母亲到科胡昂科家去正式提亲。1954 年 10 月 11 日，尼诺伊和科拉松终于喜结良缘。

婚礼是在马尼拉天主教堂举行的，证婚人是当时的总统麦格赛。参加婚礼的宾客有 600 人之多，是当年马尼拉最隆重的喜事。而科拉松与尼诺伊结婚在政治上的结果是把里萨省的苏木隆家族、打拉省的科胡昂科家族和阿基诺家族这 3 个在菲律宾最有经济、政治势力的家族联结在了一起。

四、婚姻：一只飘泊不定的小船

尼诺伊生前向他的一位密友吐露心迹说，他之所以钟情科丽，并决心娶她为妻，是因为“科丽非常贤惠”。的确，在尼诺伊心目中，科拉松是一个美丽、善良、温柔恭顺、有时还带点腼腆的非常可爱的姑娘。尼诺伊确信她就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贤妻良母。

但科拉松并不是一开始就适应了尼诺伊。对于这桩婚姻，科拉松回忆她对尼诺伊婚前的印象时说：“他是我所认识到的最富有才智、最富有情趣的男人；他始终那么满怀信心，始终能够和周围的人们和睦相处。在我朋友的圈子里，他是最能够泰然自若地与我家中的每个成员——不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家的司机——谈笑风生的人。他常与我母亲打麻将，每次总是好心地让着她，只要是母亲想‘吃’牌，尼诺伊绝不去‘碰’。那时的尼诺伊就是这样特别友好的人。”

科拉松认为在婚后的早期生活中，“最让我津津乐道的回忆”是“我们的蜜月”。他们专程去美国度蜜月。科拉松带尼诺伊去参观她的母校——坐落在纽约的圣文森特山学院。他们还去了马里兰州，同尼诺伊的姐姐米拉及姐夫查利·阿尔伯特一起生活了3个月。查利当时是菲律宾驻华盛顿使馆的武官。科拉松说，就在这个时期尼诺伊开始发胖。他“是如此贪食桔汁和白巧克力，以至于当我们返回马尼拉时，他的体重增加了20磅”，“同时我也开始发福。因为我已经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鲍尔塞。”

科拉松对初为人母、尼诺伊初为人父的情景记忆犹新，而且感到无比甜蜜，水世不忘。科拉松追述说：“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尼诺伊简直束手无策。那天凌晨两点，尼诺伊和我的父母亲急急忙忙把我送到圣托马斯大学医院，在车上母亲教我数着阵痛，父亲在握着我的手。我第一次看到尼诺伊那样神情不安。到了产房，我的婆婆陪着我。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尼诺伊当时十分紧张，他踩着楼梯上上下下一直到孩子顺利地生下来，才像个孩子似地欢跳起来。“后来，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出世了，尼诺伊也不那么紧张了。他当上了爸爸，兴奋不已，可又总是毛手毛脚。孩子未满月，他从不敢亲手抱一抱，只是在换尿布时才帮帮忙。碰到棘手的事儿，他便大声叫我，要不就叫保姆。他扯着大嗓门喊，说他弄不了啦。”

关于尼诺伊喜欢孩子和教育孩子的事情，科拉松也有这样的描述：“尼诺伊和其他人一样，听人们说孩子长得像他就特别高兴。每当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优异并获得奖励时，他总要特意指出给予表扬。这一点，孩子们都随他。我想这就是他，不把那些并非个人之功全归为己有。孩子们有了差错时，他从不亲口责斥孩子，每次总是打发我出台，‘可以跟你的孩子讲一讲……’，我觉得这些年由于忙于他的政治，才把他和孩子弄得远远的。他是非常渴望和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科拉松说她这甜蜜的日子没过上几天，就被尼诺伊的不安分的性格给打破了。

尼诺伊在菲律宾为发展银行举办的拍卖中，购进一些康塞普西翁的土地，这家银行的总裁是科拉松的父亲。尼诺伊很不善于管理这些土地，因此，科拉松住在马尼拉，而尼诺伊每周末才回到马尼拉家中与科拉松团聚。不久，康塞普西翁地区的一些拥有土地者和当地有势力的家庭发生矛盾，他们鼓动尼诺伊去竞选市长。

科拉松此时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她还没有与丈夫品尝够婚姻的甜蜜，就

眼见着尼诺伊把心从家庭转移到政治上。科拉松只有把全部家务承担过来，把政治和忠诚结合起来。她刚刚生完大孩子，就协助尼诺伊竞选市长。成群的人们随时随地出现在他的家中，她必须出面应酬，虽然她感到羞怯和不适应，但尼诺伊要求她必须这样做。她说：“从尼诺伊涉入政治的那一天起，我只好告别平平安安居家过日子的所有希望。我和孩子们逐渐明白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尼诺伊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整个家庭不得不让位于他本人的政治事业而甘居其次。”

在竞选康塞普西翁市长的日子里，尼诺伊曾强迫科拉松走上街头在公众中进行宣传，有时甚至出门赶着马车以减少显贵人家的形象。尼诺伊在他 23 岁那一年当选为康塞普西翁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他们把家从马尼拉迁到沉闷的康塞普西翁这个糖业市镇，并在一所大而且旧的 5 间木头房子里安顿下来，每天下午 6 点到第二天早上 6 点才有电灯。科拉松显然不满意过这样的生活。

科拉松答应尼诺伊不追求自己的事业，但要把时间用在照料孩子上。而尼诺伊不强求她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也不要求她作为忠实的顾问。如果她有时试图提出建议，他也不允许她来影响他，特别是在众人面前。不久她就知道了，在众人面前她不可露出胜利者的样子，这一点修女们已经教导过她，她在学校期间就知道该这样做。然而她还要尽市长妻子的责任。她要用自己的车送市镇上有病的人去医院，参加宁夜，调解当地居民的家庭纠纷。她在这里没有朋友，生活得相当单调。为了排除枯燥无聊，她听广播连续剧，成了实实在在的戏迷。她要去市镇里的一家电影院时，必须带上一件雨衣，把它铺在木椅上以防跳蚤叮咬。她从马尼拉挑选一位儿科医生，这样她可以借口回马尼拉一次。

科拉松回忆说，那两年过的“是一种令人烦恼的生活。如果没有宗教的束缚，如果我未曾发誓管好与坏永远跟着他，我可能会改变主意。马尼拉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我寻找各种借口往那里去。首先我借口是为了我们的女儿，我不同意请当地的医生给女儿检查身体。我对丈夫说：‘听着，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应该给她请最好的儿科医生。’于是，我每月一次带女儿去马尼拉给她看病。”

“我丈夫当市长时，作为市长夫人，我必须参加一些葬礼之类的活动。死者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布单，我目不忍睹，晚上睡不着觉。而我婆婆，我非常佩服她，她在这种场合总能表现得沉着镇静，甚至在竞选中她也表现得相当出色，不仅善于演讲，而且在抱着孩子时，表现得仍是那么亲切自然。”

不久，尼诺伊政治上的工作被打断了。也许是因为父亲心疼女儿，也许是尼诺伊也想让科拉松过上平静的日子，科胡昂科家族为尼诺伊安排好一笔买卖：在康塞普西翁附近的圣米尔（那里农民骚乱不断）有一大片蔗田和一座糖厂，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就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产业，隶属西班牙的一个大公司。总统麦格赛告诉尼诺伊西班牙人想离开菲律宾，建议他买进这份财产，这样就不至于让它落入政治敌人的手中。

尼诺伊照顾他岳父的利益，由他的岳父以 300 万美元购置了这块地产。这笔钱由政府担保下借出的特许土地权贷款支付。菲律宾的风气好像就是这样，有权势的家族由政府贷款来购买属于他们私人的产业是很寻常的。也许科胡昂科买地时以公共利益为幌子，在要求借贷中，他许下最终将种植园土地出售给小农。1958 年金融机构批准了这笔贷款。但附有条件，即种植园土

地细分后，“以购入价卖给农民，不论任何情况和时候，出售的条件必须根据土地使用法条例。”这块种植园就是著名的路易西塔种植园。

在菲律宾最大的吕宋岛上，路易西塔种植园是最现代化的种植园。科拉松的堂兄弟爱德华德非常想参与购置这块地产的交易。在这件事上他们闹翻了，这个家族的两个支派发生了冲突，从此双方成为敌对两派：科拉松兄弟姐妹这一支团结一心，而她的堂兄弟们却永远地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上。科拉松的丈夫尼诺伊反对马拉斯 20 年，对立面的亲人则与马科斯亲密了 20 年，并与其勾结，镇压迫害他们的同一个祖先的手足。

尼诺伊成为这座种植园的经理，并搬到那里居住，当时科拉松和两个孩子留在马尼拉。尼诺伊告诉工人们，他正在改组种植园，他要使工人们成为合伙人——因为他对工会主义有兴趣，他们应组成工会参加谈判一项协议。尼诺伊告诉一个知己和政治上的合作者说，“如果我当选为总统，第一件事儿，我就要把我岳父家的种植园交出去。”佃农在甘蔗收获中以六四分成，他们仍在贫困中生活。尼诺伊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型的福利“国家”，它包括免费的公共事业、一所中等学校、奖学金、缝纫机使用法的教导以及附近菜园的佃农居住区。而在别的种植园都有一支私人保安队来维持秩序。

这个时期，尼诺伊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了一些工作。美国人认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过分左倾，他们一直支持一批企图推翻苏加诺的反叛军官，在菲律宾和台湾的军事基地为这些反叛者提供武器。尼诺伊答应山菲律宾总统卡洛斯·加西亚提出要求，同意美国人利用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反叛者的训练基地。而后，美国人又要求他混入印度尼西亚，同那里的反叛军官接触，并设法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成立一支独立的游击队。虽然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轰炸机和雇佣兵作后盾。这个计划仍然失败了。

尼诺伊说那些雇佣兵中的大多数是酒鬼和敲诈勒索者。印度尼西亚的反叛上校们统统被捕，以后又获释放——美国人又改变了方针，开始为苏加诺提供物资。

尼诺伊仍旧对他的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很快就当上了打拉省的副省长。人们说尼诺伊是个政治动物，他知道政治上的所有技巧并沉着地使用它们。他会说，“如果你的对手使用恐怖手段，我想我们将把弹药发给我们领导的人加以反击。”他很漂亮，讲话很快而又有魔力，能使听众数小时入迷不倦。他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书生气十足，而是潇洒飘逸，被认为是妇女的最典型的护卫者。他也有罗曼史——这在菲律宾政界可以说是很普遍的。

科拉松不喜欢这样的闲言。她一直躲在家中。科拉松的的确确一直生活在尼诺伊的背后，她不干顶他的政治活动。尼诺伊的兄弟巴茨在康塞普西翁同他们一起生活了 6 个月，他觉得科拉松对她丈夫的作为一个政界人士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不高兴——相爱时男人的优点也许婚后是女人最不能忍受的缺点，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科拉松勉强忍受，包括养着一群政治上的食客。尼诺伊对此并不在意，常常带二十几个人来家要吃要宿。虽然很多事情并不要科拉松亲自去干，但她要负责保证把各种事情安排好。她尽她的责任，但她不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的妻子。她对政界的领袖们并不太友好：既不向他们“叩头”，也不向他们讨好。她和学生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对社交事宜不感兴趣，除了在尼诺伊政治交往中不得不应酬，她最喜欢留在家中，她宁愿阅读、看电影、下饭店。

科拉松不常谈论政治，但是尼诺伊不论走到哪里都说：科拉松是他最美

的妻子，她是他的幕后。他的妹妹泰茜说，“尼诺伊总是在前台，他们之间和马科斯夫妇恰恰相反，他们没有竞争。因为尼诺伊是群众的指挥者，尼诺伊出现之后，任何人都往往忘却了科丽。”

在政界的换班中尼诺伊成为省长，他被调到首都。他们在马尼拉的泰晤士街买下一座平房，这是一座不吸引人的普通的牧场型的房子。有一块小小的空地使其与街道隔开，装在水泥柱上的铁栅栏把房子围住，栅栏上爬满葡萄藤，厚实而平坦的地面从屋檐下一直铺到街道旁充作停车场。那里有8间房屋，包括一大间起居室。经常有客人来坐满起居室，尼诺伊把他的朋友和政客从路易西塔种植园带到了马尼拉。尼诺伊坐直升飞机往返于住宅和打拉省的办公室。作为省长，他的任务范围是同反政府的“霍克”（关于此事，我们将在以后篇幅中做详细介绍）队员打交道。这些人在山区经常给政府制造麻烦。1963年尼诺伊又离开旧党加入新党。他曾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制定出公共工程的计划以解决资金来源。这时的马卡帕加尔总统提名他为自由党的省长候选人，并为打拉省提供很大一笔预算。尼诺伊接受了。他解释说，这是马卡帕加尔同意的他在打拉省建设道路、桥梁和给予其他方便的特许权。他最后为路易西塔种植园取得了出口份额和销售的便利。

科拉松对她这样的生活深感无奈，她不知道还有更严峻的日子摆在眼前。

五、在政治的浪尖上被抛进地狱

1964年尼诺伊便成了即将成为总统的马科斯的敌人。

当时马科斯脱离了自由党转入国民党，并被提名为总统的候选人。而作为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尼诺伊，开始了他又一高度的攀登。马科斯这一年当上总统。尼诺伊和反政府的“霍克”达成了协议。

在打拉省的“霍克”队员由一位叫丹蒂的司令领导。他是打拉省一位游击队贝的儿子，其大多数部下都是制糖工人。其中有些人就住在路易西塔种植园。当他们受到政府的威胁时，路易西塔种植园便有人为他们提供医药治疗。“你不能说不，因为那里有诊所和医生。”丹蒂是科胡昂科家的亲密朋友。

1967年，尼诺伊任打拉省长6年之后，他想当参议员。这个位置由全国选举产生。当他决定竞选后，他把康塞普西翁的田地卖给了承租这些田地的佃户，他告诉他的亲友也这样做，因为“革命已在眼前”。他要求母亲也放弃她的田地，但他的母亲分辩说，她要靠此来生活。

尼诺伊要求丹蒂司令支持他的竞选活动。他们在村庄或是甘蔗地里讲论政治形势。后来，马科斯一伙就攻击尼诺伊与共产党勾结在一起。对此，他解释道：

我为此能做些什么呢？我已经生活在“霍克”活动特别频繁的打拉省。我对我经常注意的“霍克”所持的观点是，作为打拉省的一省之长，我努力做到不流血而实现某种和平。在我当省长的6年里，最多只有21名“霍克”游击队员死亡。只有在马科斯先生上台后，局势才开始恶化。1960年到1972年，大约有1500人被杀。作为省长的我的做法是：任何人都可来到我办公室交谈，不管你是不是“霍克”，也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自由党。我坚信这是保持本省和平的唯一方式。我对“霍克”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要你不杀害别人，这个国家对你来说是自由的。你可以抨击我，可以在村子里攻击我，这都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你有发表你的见解的权力。如果人们能够最终从他所喜爱的制度，转而信奉我所信奉的制度，那为什么我要与这些人作对？

军人称之为和平共处。

我称之为生存之道。我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有最坚定信念。我坚信，如果同时面对民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们会选择民主。

.....

谈到他与“霍克”经常的会面，尼诺伊说，他安排这些会见并非是为了要求“霍克”支持他的候选，恰恰相反，他要求“霍克”不要干涉打拉省的政治事务。而其中有一次会见，是应马科斯最亲密的助手、科拉松的堂兄弟爱德华德·科胡昂科的邀请安排的。此人当时正竞选省长。

尼诺伊说马科斯不停地玷污他，是在向人们暗示他是“霍克”的庇护人，目的是从各个方面来清除自由党的任何支持。马科斯给尼诺伊扣的是共产主义的帽子，使他得不到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支持。更有甚者，为了断绝美国人对尼诺伊的支持，马科斯邀请《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来采访他。他重复了对尼诺伊的指控。他说在1973年总统大选中，如果有一名候选人来自共产党阵营——明显指尼诺伊·阿基诺，他将不得不让夫人伊梅尔达作为他的政党总统候选人。尼诺伊回击道，马科斯的8年统治就叫人够受的了，如果再加

上伊梅尔达的又一个6年，这个国家将不可想象。然后，他又对马科斯说：

“如果马科斯先生让他的夫人参加1973年大选以阻止尼诺伊·阿基诺当选，我现在就告诉他，我将不参加竞选。把你的老婆留在家里吧，马科斯先生，别让折磨人的竞选把她累垮了。我宁愿她免遭这般痛苦，我将不参加1973年的竞选，要是伊梅尔达也不参加竞选的话。让我和伊梅尔达歃血为盟，发誓都将不参加1973年的总统竞选。”

这时，菲律宾的大学生们在国会门前的台阶上集会。他们要求重视学生的权利，并抗议菲律宾听命于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他们坚决反对马科斯派菲律宾军队参加战争的决定。——在当时政坛上的少壮派、最有号召力的尼诺伊站出来支持学生的抗议。他呼吁，不论是菲律宾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应该干涉越南人的事！

社会上对马科斯管理经济的批评越来越多。台湾和南朝鲜的经济出现了奇迹，而菲律宾的经济居然从马科斯上台执政前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先地位，倒退到中间部分。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利用外资实现工业化，而一直受美国扶持的菲律宾仍旧是农业经济。——尼诺伊站出来清楚地表达了对马科斯政府的不满。他说，这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败和贪污腐化的结果。

尼诺伊是参议院负责调查政府措施不当委员会的成员，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还批评日益增大的军费开支。……

1968年12月，从菲律宾共产党分裂出去的一派又成立了一个菲律宾共产党，由一个叫西森的人领导。他是菲律宾大学的教授，因为他就游击队的战略方针问题而和原来的菲律宾共产党产生了分歧。1969年3月，丹蒂司令在打拉省遇见了西森。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了一支新人民军，作为新菲律宾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尼诺伊面对着这一政党和这支武装，表现出极大的宽宏。他让丹蒂使用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培训场地和组织基地。尼诺伊供给这支军队食物和医药，甚至还为他们印刷了丹蒂的著作：《游击队的准则和规章》。

无疑，在成千上万的马科斯的反对者中，尼诺伊成了最刺眼的一个。首都连续发生暴乱。1970年1月，马科斯和伊梅尔达来到国会发表演说，路上遇到以标语牌和纸板棺材迎接他们的示威群众。马科斯和伊梅尔达被迫躲开，警察用军棍驱散群众。数日后，强烈的抗议者成群地来到总统府前面，把鸡尾酒瓶扔进总统府内，用石块投向总统府内的建筑物。有一辆汽车被焚烧毁。消防队员用水龙头喷射他们，直到军队开来，才赶走了示威群众。

这一年，菲律宾召开了制宪会议，目的是由独立的菲律宾国家代表起草宪法，以取代1940年殖民地时期制定的菲律宾宪法。当时有一种改变与美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关系的强烈愿望，包括修改给美国人占有土地和资源的同等权利的条款。马科斯在这次制宪会议上使用行贿和欺骗的手段，企图说服大会废除总统任期只能两届的限制，但他没有成功。马科斯非常恼怒，他先谴责菲律宾共产党，接着就是尼诺伊。

1971年的普拉斯·米兰广场事件后，马科斯下令中止施行人身保护令。他宣布这个决定时说，有一场叛乱已准备就绪。不久，这个决定就因为受到各种压力而取消。对于马科斯来说，新的大选就要开始，马科斯想保住他的声誉，保住他的连任总统的计划。但事与愿违，新的爆炸事件仍层出不穷——警察的腐化和犯罪，社会经济的更加恶化……，都激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强烈不满。

1972年是马科斯第二个4年任期的最后一年，是根据宪法规定的最后一

年。人们也议论尼诺伊——这个马科斯最强烈的批评者和唯一的对手，有可能成为取代他的人。

正是这一年的年初，《菲律宾自由新闻》把尼诺伊·阿基诺画像作为封面人物刊出，并选他为该杂志的“1972年新闻人物”，还加上了下列颂扬的评语：

在11月8日，尼诺伊·阿基诺的大胆和蔑视对手的风度获得了成功。自由党参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取得了席卷一切的胜利，在南伊洛戈省，路易斯·辛格森当选为省长；在伊萨贝拉省，尽管有拉完特遣部队的存在，福斯蒂诺·戴也还是当选了省长。尼诺伊的案子毫无疑问地被证明是无辜的，就连那些最贫苦、最受欺压的人也起来竭力效仿尼诺伊树立的榜样。在打拉省，乡村农民自己出来保护他们的投票箱，组织长长的队伍，把票箱护送到市政局。这位参议员使得民主思想得以复苏，而一切玩世不恭的人曾把民主称作为空洞无用的漂亮词藻，认为民主不能点燃人生想象的火花，更谈不上让人为之献身。11月8日的“人民胜利”——正如尼诺伊所称的那样，已经证实这些人完全错了。由于为了人民的意志挺身而出，反对暴政，强压自己满腔怒火，毫不畏惧，小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参议员的确比任何人做得都多，使得这次胜利成为现实，因此，选他为菲律宾1972年度新闻人物。

这无疑又成为反对马科斯的证明。

1972年9月23日晚上，当政府的军队集结时，尼诺伊同几个国会议员正在希尔顿旅馆707室集会讨论关税法案。11点时，电视新闻报导说被马科斯刚刚任命不久的国防部长恩里莱遭到伏击。在座的几个国会议员都笑了，实际上是恩里莱自己把他的汽车借给人家拍电影。半夜，有人来说，国防部长恩里莱带来一封信，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并要逮捕尼诺伊。

几百名军人包围了这家饭店。尼诺伊成为马科斯军事管制时期的第一个囚犯。他在囚车上给科拉松打电话，说他正在前往监狱的途中，让她收拾他的衣服而后到她的父母家中。

六、从后台走到前台

尼诺伊被捕后，科拉松一直去做弥撒，她祈求上帝能宽恕尼诺伊，保佑他早早获得自由。她开始献祭一个时期。她不让孩子们参加任何聚会，自己也不上理发店做发型以及去购置衣着。但她最后还是停止了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有一个牧师告诉她，最好的努力就是正常地生活下去。

但是，她的生活并不正常。她很思念她的尼诺伊，尽管他们在一起时，她被他的政治搞得疲惫不堪，可此时此刻她却放不下他。每当电视屏幕上出现马科斯或恩里莱的脸时，她连忙把电视闭上。每次她不得不去见军方官员时，她又惊恐又不安。她企求为尼诺伊取得特赦，第一次去见恩里莱时，她服了一片镇静剂。尼诺伊要求她，绝不在孩子面前和公众面前哭泣，绝不去要求马科斯释放他。他不愿意他们中的任何人表现出软弱。

任何一件事情，当你无法改变它时，你不妨先适应它。在适应的过程中，再寻找新的办法，科拉松就面对着这样的事实：她无法改变马科斯的军事管制法，无法推翻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尼诺伊被关进监狱，这个她生活的支柱离开了她，也离开了家。她不能不生存下去。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先站立起来，带领她和尼诺伊的孩子们生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是希望。

科拉松开始自觉地加入反马科斯的行列中。她在探监时带出了一篇尼诺伊在狱中写的文章。她拿到《曼谷邮报》上登出。这让马科斯大发雷霆，尼诺伊被送上直升飞机，蒙上双眼、带上手铐带到另一处军营。

那是劳尔军营。尼诺伊禁闭在 13×16 英尺的牢房中。在木板钉住的窗户上，只有一条小空隙透着空气。一支氖气灯日夜开着。尼诺伊睡在一张钢丝床上，没有垫褥。他的衣服和眼镜都被收去，因为失去眼镜引起的剧烈的头痛时时折磨着他。他只穿内衣裤。他害怕监狱的伙食有毒，以饼干和水过活。

有一天，有人找到科拉松，把尼诺伊的东西交给科拉松，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科拉松楞住了，她不知道尼诺伊这时是死是活。于是，科拉松和另外一个在押犯的妻子去找律师。

接着，科拉松又从一个军营走到另一个军营。没有人告诉她，她的尼诺伊被关押在哪里，她只有自己去寻找——她变了，残酷的现实改变了她的害羞心理，也使他变得坚强起来。她找到律师要求最高法院给予起码的人身保护。一次又一次，最后，她终于被允许带着他们的孩子去见尼诺伊。

尼诺伊被人带了出来。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尼诺伊脸色苍白，一只手还要提着裤子——他的体重消失了 20 磅，消瘦至极。见到这情景，孩子们都哭了，尼诺伊也哭了。但是，科拉松却没有一滴眼泪。她惧怕这场面，她怕她一家人在这座冷冰冰的监狱里都哭昏过去，真是那样，他们一家就没有任何希望了。所以，她要支撑起来：支撑尼诺伊、孩子和这个家庭。她服用了 10 毫克的利眠宁，在这有生以来最悲痛的时刻，表现出最大的平静来。

尼诺伊从这以后，也大大地改变了，他皈依了宗教。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他曾询问过公正的上帝，他到底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行？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哭呢？我曾赐给你以安慰、荣誉和财富，这些是你的几百万同胞得不到的。”还是那个声音说，“现在我只是给了你一点孤寂，你就哭得像个宠坏了的孩子，这不好！”

尼诺伊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想到了基督受难时的巨大痛苦。他知道这是人生的一次考验。他终于在几个钟点的沉思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他

告诉他的朋友，他已经把生命奉献给了上帝，“他面对面地站在我面前，强使我注视我的空虚和微不足道。他帮助我找到了它。它真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的身旁。多少年来因为傲慢遮住了我的眼睛，追求早来和短暂的权力、荣誉和享乐的欲望麻醉了我的心灵，我竟没有注意到它。在暴君残害中寓有一些天意。”尼诺伊说：“如果只就我的皈依上帝而言，我应该向暴君表示永恒的感激！”

同时，残酷也考验着科拉松·阿基诺。最初，她是接受着社会的考验。由于马科斯的大权在握，使很多菲律宾的商人、政治家，包括尼诺伊的朋友劳雷尔，都对马科斯的军事管制法表示赞成。他们认为马科斯是在反对犯罪和暴乱。科拉松对这些人极为愤慨。她越来越少地走出家门，怕见到那些冷冰冰的面孔，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她的尼诺伊是搅乱社会秩序的反叛分子。这些人有时见到他，还故意装出恶狠狠的样子。

科拉松还不能哭，她不能把那些生活上的种种不愉快告诉尼诺伊，也不能把她哭泣的时候或她晚上不能成眠的夜晚告诉他。她不愿意把自己的焦虑强加在本来就很难的丈夫身上，那段时间，甚至连她的婆婆多纳·奥罗拉也从未见到过她落泪。而她每天所能做到的，除了参加群众集会，就是祈祷。“那时，我天天参加群众大会，但说真的，也许我的身子在大会上，而脑子却在别的地方。……我不能看电视，因为我一看到马科斯和恩里莱或其他那伙人的模样就受不了。”开始，她常常祈祷尼诺伊和其他被关押的人能早日释放。有时，她也反过来想，她祈祷的对象应该是马科斯、恩里莱等人，让他们改变主意，或者对尼诺伊好一点。于是，她和孩子们在一起念珠祈祷，一次祈祷长达数完三串珠，请求上帝开导马科斯、恩里莱和其他将军们。她甚至让孩子们作出自我牺牲，以换取父亲的释放。她还禁止他们参加晚会，她自己也不再外出做客，不再出现在人家漂亮的会客厅里，也不再做新衣服。后来，一位神甫劝她让自己和孩子尽量正常生活，她才改变了这些作法。

接着，是她必须尽最大努力为尼诺伊做些什么，以减轻他在监狱中的精神压抑。

1973年，尼诺伊被关押在博尼法西奥堡一年之后，他被军事法庭起诉犯有杀人、非法占有武器和搞颠覆活动之罪。尼诺伊出乎意料地宣布他拒绝出庭审判。他把这种审判称之为“一次极不公正的可悲之举”，并发表一份声明宣布他将抵制审讯，以抗议这次非正义的、不公正的审讯。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很难即席讲演。前参议员霍维托·R·萨隆加劝他根据已经起草好的原文用比较慢的速度宣读声明，以使国外新闻记者能听清楚。反对派们非常希望这些外国记者能公正地报导这次审讯，并站在尼诺伊一边。尼诺伊听从了同伙们的劝告，他用极慢的速度阐述了自己拒绝参加审判的原因。当进入讲演的高潮时，他的节奏掌握得好极了。在这里，他引用了西班牙多洛雷斯·伊巴露利的一段警句：

先生们，我知道你们是高尚的人。但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你们必须服从总统。你们或许决定让我活在地狱，但他可能决定把我送进地狱。有人建议我乞求怜悯，但是我的良心不让我这样做。我宁愿光荣地死去，决不跪下屈辱地活着。

尼诺伊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斥责军事审判，理由是他被剥夺了去民事法庭诉讼这种宪法赋予的权利。他声称，除非进入战争状态，

否则军事法庭无权审判平民。

次日，马科斯总统宣布他将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重新调查对尼诺伊的指控。这个委员会将表明所做的一切都能确保公正、超党派和客观。但是，应总统之邀的杰出的法官们都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1975年，尼诺伊一案仍旧最后由军事法庭审判裁定。军事法庭命令尼诺伊在法庭受理过程中不得缺席。对此，尼诺伊以绝食来抵制。

科拉松·阿基诺站出来，向菲律宾各界宣布了尼诺伊为抗议政府的指控、抗议审讯受操纵而举行绝食斗争的计划。在奎松市时代大街住所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科拉松·阿基诺说她丈夫在4个问题上特别提醒马科斯先生注意：

1. 在宣布军事管制法以前，军事法庭对平民的审讯被认为是违法行为；
2. 没有司法独立性；
3. 没有一家独立自由的报纸；
4. 军事管制法的高压和进一步实施。

科拉松·阿基诺代她丈夫宣布，尼诺伊将继续作绝食斗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他本人，也是为了今天受压迫和非正义之下的其他许多受害者。”

科拉松·阿基诺也成了尼诺伊和反对派领袖们的“桥梁”，她先是要求反对派号召人民支持尼诺伊对军事审判的立场，接着，就经常地和反对派领导人商议尼诺伊必须采取的何种策略，他怎样才能够继续进行反对军事管制法的斗争等问题。那时，她每天都参加反对派领导的会晤——由于尼诺伊身陷囹圄，这时的科拉松·阿基诺，从最讨厌政治的一个普通妇女，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政治中来。

尼诺伊在绝食39天后体力崩溃，被送往军队的医院。他十分衰弱，呼吸中有胆汁味。前参议员、尼诺伊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的萨隆加被批准去探望。他后来回忆说，“他身体都萎缩了，非常虚弱，面色苍白，体重大大减轻，甚至难以站立了。他呼吸中有一种异味。当他对我谈到希望死去时，他有点一反常态地哭了。现在，有一点对他来说很明显，那就是马科斯，他这位博爱的兄弟并无意写封信给他或来同他说几句话。他给我看了他用打字机打印的几份遗书，这些都是写给那些自愿为他辩护的律师的，并且每人一封，每封信都表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尽管马科斯及其助手对他是如此无情，他而永远是那样的宽厚、慷慨和仁慈。这或许是尼诺伊的性格中永远不会被马科斯理解的地方。尼诺伊·阿基诺胸怀恢弘，大悲大慈，愿意理解和宽恕那些曾极力诽谤、迫害和侮辱过他的人。”

科拉松在第二天告诉尼诺伊：“这就够了，我主绝食40个白天和晚上，你不能比主绝食的时间更长。”尼诺伊说他还能再坚持一个星期。科拉松告诉尼诺伊，“我们昨天已经宣布停止绝食。”尼诺伊惊讶地看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她比以往更加美丽了……

科拉松也说，尼诺伊在监狱的几年里，对她这个在修道院长大的女人来说，是一段艰难的经历。她把这一经历称作是“首次巨大的苦难”。她说这段生活教导她“如果我们要做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得把接受痛苦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她说这段经历“把她造就成新的科拉松·阿基诺。”他们的亲人们也发现了这对夫妇在精神上的如此默契，他们真正地达到了精神和肉体最完美的结合。尼诺伊·阿基诺的妹妹迪塔斯·阿基诺·埃布诺证实了这一点，她说：“尼诺伊在监狱这些年，使我们开始真正地钦佩她。只

要需要，总是出现在他身边；她还为全家操劳。”

科拉松同时还要克服害羞心理，这并非易事。

由于尼诺伊、反对派与全国支持尼基诺的人们的共同努力，可能还因为马科斯为了摆平国际上的种种舆论，马科斯给了他们一个星期两次见面的机会。科拉松把星期三让给了尼诺伊的亲朋好友们，把星期六留给了他们自己。

每次探监，科拉松必须将外衣全部去掉，由一个女管理人员搜身。她恨透了这个做法，她感到她受到了侮辱。但更让她难为情的是在监狱表示她对尼诺伊的爱情。牢房中装有录像机。事先有人告诉她，牢房还装有外边可以看到里面，里面却无法看到外面的透视镜和窃听器。在她第一次作为妻子来到牢房时，她带去了一个巨大的手提箱。

“科丽，为什么带手提箱来？”妮诺伊揶揄地说，“你在此只度过一个晚上，不是一个星期。”

她什么都不说，只是打开手提箱子，取出蓝色的毛巾和一些橡皮圈。她要尼诺伊用毛巾把突入的录像机遮盖起来，并用橡皮圈束住。而后她取出深蓝色的床单盖住透镜并用带子系住。她仍旧感到很紧张。

尼诺伊说：“瞧，我们已经结过婚，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科拉松说：“即便我们已经结过婚，我仍然愿意隐蔽着。”

他们又有了家的感觉，而且科拉松作为妻子，再一次感受到了丈夫的不同寻常。尤其是星期三与亲友们在一起交谈时，尼诺伊连珠炮似的发表着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看法。科拉松不解：丈夫一直在监狱中，可他似乎比外边的人们知道得更多。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对于科拉松就像读了一本国际杂志。他能从国际形势讲起，接着是讲国内大事，然后又讲起本地区和政治。最后，为了让听者高兴，他还能讲些比较轻松的话题。

渐渐地，科拉松成了尼诺伊的代言人、替身和交通员。同时，她也知道了政治。有一天，尼诺伊让她代表他主持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他口述的细节。科拉松面有难色。

尼诺伊悄悄地对母亲说：“她不愿干这个。她尽管不喜欢这项工作，但她必须干下去。”

科拉松问丈夫，如果有一天他被杀了，难道反对派就不能干去了？尼诺伊说，会有新的领袖产生的。现在，他是领袖，就要这样干下去。

尼诺伊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就在他的生命在博尼法西奥堡变得越来越虚弱时，他还驳斥了马科斯总统关于他实行的军事管制法是把共和国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手段的说法。尼诺伊说，马科斯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建立起了一个“历史上最为陈旧的社会，这个社会完全由一个人统治，这个人在过去许多世纪被称为法老、沙皇、皇帝、国王、领袖、首领、元首、主席或总统。”尼诺伊对马科斯声称的1973年1月菲律宾人民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一部新宪法进行了抨击。这部新宪法使得议会制戏剧性地变成了政府代议形式。尼诺伊说，真正的情况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是一个更糟的集权的总统，一个立法和行政集于一人身上的独裁政权。我们有一个立法的政府，而没有议会了。我们没有走向议会民主，反而倒退到了总统极端独裁制的深渊。”

尼诺伊在评论总统关于他已经限制特权和顽固的寡头政治时说：“不错，少数人的统治是被消灭了，它已经被削弱为一个人的统治。”针对马科斯所说的他不放过任何鞭撻旧社会的机会——似乎他与旧社会毫无关系，尼诺伊

号召菲律宾人民注意以下几点：

1. 在马科斯任期内，早在 1966 年，“当有大量文件表明在公共事业中存在的大量非法的回扣高达数百万时”，当他鼓励私人武装大量繁殖和在他的羽翼下身居高职的要人走私武器而不受罚时，当在科雷希多的残酷流血事件中 26 名穆斯林“贾比达”志愿人员被谋杀时，当为了确保苏禄的苏丹后嗣同意将“代理权”交给马科斯时，当共和国几乎陷入了与一个邻国的外交险境时，马科斯与旧社会的关系就十分清楚了。

2. 就在马科斯任期内，通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泛滥和贬值”，通货膨胀率高达 58%，这是 1969 年大肆铺张浪费的选举花费“过度”的恶果。尼诺伊说，根据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了解，马科斯花了近 9 亿比索来使自己重新当选。

3. 就在马科斯任期内，绝望的青年走上街头，谴责他的滥用职权和滥施暴政，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示威者在残酷的流血事件中惨遭杀害，同时，另一些人则在深夜被特务带走，杳无音信。

4. 就在马科斯任期内，马拉卡南宫用丑恶可耻的基金资助方式操纵修改宪法大会代表的选举，结果选出来的基本上都是听马科斯的话的人。这一丑闻被揭露后，立法机构威望扫地。

5. 就在马科斯任期内，修改宪法大会由于公开无耻地向与会者塞给装有一沓钱的贿赂信封而臭名远扬，这引起了对马拉卡南宫选区肆无忌惮的贿赂行为的大规模揭露。尼诺伊指出，当操纵修改宪法大会的行动受阻后，马科斯宣布了军事管制法，强迫通过了——使马科斯可突破历史记录连任总统的宪法，还将中立的领导人和反对派领导人投入监狱，因为他们在修改宪法大会上打搅了他的美梦。

6. 就在马科斯任期内，极少数受到总统宠爱、被给予种种优惠的亲信搜刮了政府金融机构数以亿计的资金；与此同时，其他的商业机构则在缺乏资金中挣扎。大量的贪污和严重的管理混乱，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濒于全面崩溃，而最后，菲律宾人失去了自由，自由的火焰被扑灭了。

正是由于尼诺伊在监狱中不间断的斗争，使科拉松还忍受着马科斯对她家族的迫害。马科斯一直认为是科胡昂科家族雄厚的经济后盾，才使尼诺伊在政治上成为他最可怕的对。马科斯禁止了科胡昂科家族计划建造一座糖厂的贷款发放；然后，他提高银行要求的资本总额而不许科胡昂科的银行合并，这种选择在别人家设立的银行中是允许的。结果，科胡昂科家族出让了这家银行。马科斯允许其它运输公司提高或增加运费，却不准科胡昂科家的运输公司采取提价决定。最后，科胡昂科家族的运输公司被伊梅尔达的兄弟本杰明·科伊·罗穆阿尔德买去。这时，科拉松的父亲佩普·科胡昂科已经去世，路易西塔种植园归属于科拉松与她的兄弟姐妹们。马科斯让中央银行的总裁写信给这一家人，查问他们按照协议应把这项财产分给佃农，他们现在作了些什么？

对于这一切，科拉松都表现出极大的忍耐性。

1977 年，马科斯总统和政府作为起诉人，对尼诺伊提出起诉，说他犯有可以想象到的各种罪行，包括非法拥有武器、谋杀、纵火和进行颠覆活动。最后，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相信的审讯宣告结束：尼诺伊·阿基诺被判处死刑。

科拉松哭了——这是自尼诺伊被捕以来，她第一次当众流眼泪，她深感

自己已经支撑不住了。尼诺伊的律师向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暂缓执行死刑。美国和与菲律宾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主张民主自由的国家纷纷提出请求，新闻界也强烈呼吁。马科斯只好让步：死刑缓期执行。

七、流亡美国

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马科斯在尼诺伊和反对派、国际民主人士的强烈声讨中，重新设立国民议会，并宣布 1978 年选举。他同时宣布军事管制法对集会和言论的禁令开放 60 天。

按照马科斯的意图，他想取消现存的政党。但是，前总统的长子、前议长乔斯·B·小劳雷尔要保留他自己的国民党。他建议马科斯成立“新社会运动”来网罗他所有的支持者。多伊·劳雷尔就在这顶保护伞下进行活动。

尼诺伊和反对派领袖们商议，他决定参加马尼拉的竞选运动。科拉松坚决反对，她认为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

尼诺伊说，他怕被人遗忘了。他告诉她说，要“由几个勇敢的灵魂去唤醒广大的人民。”科拉松被说服后，便代表丈夫走向街头，进行竞选宣传。开始时，在竞选集会上只有很少观众，科拉松认为菲律宾人民对此并不关心。有时人们来参加集会，她因为畏惧而站在后面比较隐蔽的地方。尼诺伊告诉妻子，不要失望，科拉松只好继续下去。她终于迎来了大批群众来参加她组织的集会。

群众越来越多，并勇敢地走向街头，猛敲锅、盘，对警察用大拇指和食指作成“L”形状，这是尼诺伊人民力量党（LABAN）第一个字母的表示。有些人注意到了科拉松的号召，他们走到博尼法西奥堡外边大声连续叫喊，让尼诺伊感到他并不是孤军作战。

尼诺伊在马尼拉的选票结果是遥遥领先，远远超过了伊梅尔达·马科斯领导的政党后选人。

但是，尼诺伊并没有取得 1978 年的竞选胜利。马科斯耍了一个手腕，他命令国防部长恩里莱把尼诺伊与中央情报局之间关系的真实情报档案销毁，然后让恩里莱指控尼诺伊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并且还以叛党叛国的行为来取得路易西塔种植园。马科斯让尼诺伊从牢房去电视台做解答。尼诺伊说，他承认他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系。在他与印尼政变的问题上，他说他是在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他提醒恩里莱，购买那个种植园的年份，是他改党之前（指尼诺伊从自由党转入国民党），并说，“部长必定忘记了，就是在你（恩里莱）的法律事务所办理的这件事。”

但尼诺伊的申辩在竞选中并没起到任何作用。

马科斯运用他执政十几年营造的关系网和政治手段，最终按照他的意图，让多伊·劳雷尔摘取得了胜利的果实。

但马科斯已经感到了尼诺伊的威力，他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去动一下脑袋。1979 年 12 月，当尼诺伊在圣诞节休假时，马科斯提出，如果尼诺伊出国就给他自由。尼诺伊求教他政治上的朋友，他们建议他去美国。

一天，尼诺伊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突然感到心绞痛。他被送到了医院，在当地心脏病中心的医生检查后，他又发病一次。医生动员作手术。他要求到美国达拉斯的贝勒大学中心去治疗，那里有一位菲律宾医生是他家的朋友，曾给尼诺伊的妹夫作过同样的手术。尼诺伊被批准去美国做心脏外科手术。

马科斯提出的条件是，不得在美国从事反菲律宾政府的政治活动，动完手术后要重返菲律宾监狱继续服刑。

1980 年 5 月 8 日，尼诺伊和科拉松携子女飞往美国。

5月30日——法蒂玛女神节，尼诺伊做了心脏手术。手术取得了成功，尼诺伊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他被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聘请为研究员，他在那里干了两年。后来，他又在马萨诺塞技术研究所工作了一年。

尼诺伊与科拉松把家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们住在富人居住的郊区牛顿区自己的房子里。这座房子后来被阿基诺基金会接管。这个基金会是波士顿的一个菲律宾人的组织，大部分人是医生。基金会每月为这所房子分期付款，希望最后拥有它。他们还以尼诺伊的名义将此住宅作为一间典型的菲律宾住所长久地保存下去，也许可能接收一些来求学的学生住在里面。科拉松在回忆她与尼诺伊最后3年的美国生活时，曾经谈到这座房子：

“我们选中这所房子，因为它地理位置很理想。它就在波士顿学院对面，这是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大学，由教会人士管理。我的第三个女儿就在那里上学。另外，住所离我最小的女儿的学校也很近。因此它就作为头号选择确定下来。从这个家，尼诺伊可以开车去哈佛大学。对他来说，从搏尼法西奥堡出来，生活发生了如此美妙的变化。我们又能像一个正常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了，我们全家济济一堂……”

科拉松在美国波士顿又挑起了家庭主妇的担子。她对一天往返于商店、厨房和欣赏电视节目，颇为满意。她把在波士顿的3年生活称为是最平静、最幸福的生活。她喜欢烹调，尤其是为尼诺伊烧菜做饭。她有一个专门的烤炉用于她的拿手好菜——北京鸭。她通常为尼诺伊的生日准备这个菜。在1933年8月尼诺伊飞回菲律宾的前夕，她最后一次为他做了这个菜。由于7年多的分离，她和尼诺伊彼此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他们要重新学着互相适应。尼诺伊竭尽全力去弥补他过去由于参与政治而与妻子儿女欢聚甚少的“过错”。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欢乐，这正是科拉松所梦想的婚姻。她称波士顿的生活是她的第二次“蜜月”。他们还买下了布鲁克菲尔德17亩乡间地产，5年后出售价达50万美元。

菲律宾人的社交区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们，但尼诺伊仍旧是喜欢他的政治。科拉松在这个问题上渐渐地适应了丈夫的爱好，他们之间发展到了一种精神上的默契。他们在一起讨论要通过非暴力和解的办法，去为和平和自由工作。尼诺伊把他们讨论的话题写成了文章，他指出，他现在在发展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观念；特别提到资本主义只关心政治上的自由，不大关心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共产主义所重视的又刚刚相反。他感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结合了这两种情况的优点。尼诺伊访问了尼加拉瓜、古巴、利比亚和伊朗，看到了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他得出结论：菲律宾的革命对谁都没有好处，社会的混乱和破坏，将给国家带来30年的倒退。他相信只有议会斗争才是与马科斯斗争的唯一办法。

流亡在美国和从菲律宾来美国的政客们又川流不息地涌来。科拉松平静的日子被尼诺伊不息的政治追求打乱了。她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又要接待尼诺伊的朋友。他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国内发生的事情，科拉松觉得他们一家在美国的生活只是暂时的。

尼诺伊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多伊·劳雷尔经常给尼诺伊打来电话，告诉他国内发生的情况。马科斯“军管”期间，劳雷尔没有受到牵连。他在政治上也很活跃，1978年尼诺伊没有竞选上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那职位让多伊·劳雷尔得到了，但是他仍不满足。他的父亲曾在菲律宾历史上称雄一时，是“日伪”时期的菲律宾总统，给过年轻的马科斯以巨大的帮助。他总想利用这个

“天然”的条件，再使一把劲，努力争当上菲律宾总统，使家族重新步入辉煌。他经常来美国看望尼诺伊，把国内的一些大事情告诉尼诺伊。

有人告诉尼诺伊，“留心点，你以后可能要多伊·劳雷尔斗争。”

尼诺伊说，“不，我们不会相斗。”“如果我当总统他就是副总统，或者他当总统我就当副总统，这是我们很多年前就商量好的。”

马科斯怀着种种目的曾经给了劳雷尔一些宽容，使劳雷尔也曾对马科斯报有一丝幻想。1981年马科斯撤消了军事管制法，但他仍然以他的法令来统治国家，既控制国会又控制法院。他宣布6月份选举总统，然后警告尼诺伊不许回国参加竞选。劳雷尔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对马科斯的幻想破灭了。他和他的兄弟以及其他政客组成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它是反对马科斯政权的自由党人和国民党人的联盟。劳雷尔想在竞选中与马科斯竞争。

劳雷尔来到美国波士顿看望尼诺伊，同时与他商量竞选一事。尼诺伊同意劳雷尔参加竞选，他说他也准备回国安排竞选运动。

科拉松不高兴地看着劳雷尔，“多伊，如果你坚持竞选总统，我决不和你再说话。”其实，多伊·劳雷尔绝不是马科斯的对手。马科斯宣布举行选举，只不过是一次表演性质的选举。他仍然通过他惯用的手法，以80%的多数选票又赢得了6年的总统任期。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代表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向马科斯表示祝贺，“我们欣赏你对民主原则和程序的尊重。”

科拉松注视着尼诺伊对此的反映。尼诺伊只是笑笑。

1982年，伊梅尔达来到美国，见到了尼诺伊，以给他重新换领护照的名义，拿走了尼诺伊的护照。1983年她再次来到美国，既没有给尼诺伊把新护照带来，旧护照也没有了踪影。伊梅尔达对他说：“为什么你不同我一起回到菲律宾，你我合在一起将是天下无敌的。”

尼诺伊笑了，“谢谢你，但是也不谢谢你。我永远是一个反对派人士。”伊梅尔达又给了他一张空白的银行支票，让他在美国建立事业，尼诺伊拒绝说，“我是生活简单的人，我没有多少需要。”

伊梅尔达威胁道：“如果我不能说服你同我一起回国，那你就留在美国；如果你坚持回国，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朋友们。”她说他如果回国就要被捕，而且在马尼拉已经发现要暗杀他的阴谋。

尼诺伊说，“那我只好试试我的运气了。”

此时，尼诺伊和科拉松一家在美国也开始受到警告。美国国务院警告他们切勿参加政治活动。里根再一次当选美国总统后，事情就更麻烦了。70年代中期，里根还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曾代表美国政府前往菲律宾进行国际事务的考察。不久，他和马科斯夫妇成了朋友。而对于朋友的敌人，里根怎能不另眼对待？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们开始折磨居住在美国的反马科斯的“恐怖主义分子”。尼诺伊去了一趟吉特，回来后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不允许尼诺伊一家外出旅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突然闯入他家，当时尼诺伊正在接见ASC电视台“夜间新闻”的记者。尼诺伊几次试图去见里根总统，但是都没有成功。

尼诺伊考虑去西班牙或西德，那里有人愿意帮助他们一家。后来想一想，那些国家没有像在美国那样多的菲律宾人，到了那里，他将离开政治主流，和他那些政治朋友失去接触，他觉得那样他无法生活下去。就在这时，国内传来消息说，马科斯病得很厉害，他的亲密朋友正把他的金钱往国外运。

尼诺伊又和新人民军代表在美国会晤，他们说他们正准备行动。尼诺伊

再也在美国呆不下去了，他想把已经涣散了的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

科拉松后来回忆说，他回国去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与马科斯面谈，请求他还给国家以民主，以防极端势力溢出，使一场归还民主的运动成为泡影。”科拉松坚决反对尼诺伊的决定，她说，“马科斯是不会听你的，他有一副铁石心肠”。尼诺伊说，“至少我应该去试一试，否则我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尼诺伊的母亲也劝儿子不要回国，她已经听说，“只要尼诺伊的飞机一出现在菲律宾上空，他就会立刻成为死鸭子。”尼诺伊反问母亲：“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他们为什么要让我成为烈士？”

科拉松说：“难道你准备再受一次长期囚禁？”

“不会关得那么久的。”尼诺伊说：“我的心脏有问题，我们可以经常以此为借口。”科拉松不再说话了。她知道，尼诺伊已经决定的事情别人是无法改变的。她开始忧心忡忡，她写了一首小诗：

我一生最坏的时光已经过去，
我这样希望。
而那最美好的光景，
能否立即降临。

科拉松把这首小诗念给尼诺伊听。尼诺伊听后说，“我并不认为你已经经历了最坏的时光。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还要去做。”

科拉松开始惧怕。她找了一名精神病医生，谈到怎样从感情上不让尼诺伊决定回国面对他的监禁或者死亡，她怎样再次熬过将与军事管制法公布后的那些年份同样艰难的更多年份，她寻问镇静能否有所帮助？医生告诉她，吃药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她知道她所期待的是什么……

她那时确实不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章站起来的是菲律宾民主和自由的希望

就在马科斯总统打算成立一个调查机构之前，他先发制人地声称，根据可靠的军事情报，尼诺伊·阿基诺是被一个单独的共产党枪手杀害的，他叫罗兰多·加尔曼。这让整个菲律宾都大为震惊：尼诺伊下飞机之时，马科斯政府称军队大约有 1199 名军官和士兵被派往机场，为尼诺伊提供安全保护。所有前往机场的人员据称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保安能手，在总参谋长法维拉·C·贝尔将军的亲自指挥下，部署在事先选定的位置上。人们很难相信，罗兰多·加尔曼一个人怎样能够单枪匹马地突破如此严密的安全网，走到在飞机舷梯边的阿基诺的面前，用随身携带的武器一枪杀害了他？而整个这段时间内，尼诺伊的两个胳膊都被士兵抓着，飞机旁还有那么多的士兵，尼诺伊前后也有士兵。罗兰多·加尔曼何许人也，有如此飞檐走壁的功夫，能突然降落在被害者面前？

马科斯接着下令成立一个正式调查尼诺伊案件的机构。他先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恩里克·费迪南德为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菲律宾社会强烈反对对费迪南德的任命，迫使他辞去了这一职位。总统又任命前参议员阿图罗·M·托伦提诺接替费迪南德。

托伦提诺是现任国民议会议员，在后来的总统竞选中，被马科斯提名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马科斯逃离马拉卡南宫后，此人又率领马科斯留于菲律宾的拥护者，对科拉松·阿基诺政府进行颠覆活动。他那时坚定不移地为恢复马科斯的统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当时，他对马科斯的任命却格外小心谨慎。托伦提诺以个人的名义拒绝了马科斯的这一任命。最后，马科斯把这一职位交给了已退休的女法官科拉松·胡利亚诺·阿格拉瓦。

其实，从大量的有关证人、照片、录音带和录像带所提供的材料上，都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枪杀尼诺伊的凶手就是在飞机上护送他的 3 位军方人员之一。京都电视台新闻部的植田胜尾（音译）从飞机上的一扇窗户中看到了以下情景：“我听到一声枪响，看到尼诺伊倒在飞机跑道上……我抬起眼来，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卡车旁边。”那个男人站在尼诺伊的前面，而不是后面，他手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尼诺伊是被从后上方的梯子上飞来的子弹击中的，而站在梯子上的只有他的军方护送人。子弹呈向下角度从耳朵后面射入。另一名日本记者若宫清志（音译）直接了当地谴责马科斯政府杀死了尼诺伊，他的证据包括电影胶片（一个星期后被作为分析事件的实况录像公开了）、胶卷和从中华航空公司班机上拍摄的现场照片。菲律宾的红衣大主教辛看完实况录像片后说：“事情很清楚。我认为调查委员会（由马科斯指派调查谋杀案的组织）应该看看这个片子，并得出结论，你马上就会知道凶手是谁。子弹并非从别的地方而是从上面打来的。有多少人能走上飞机的舷梯呢？没有几个人，或许就是那 3 个军方护送人……凶手就在那里。我不了解谋杀过程，但录像上一切都很清楚。我们还需要调查什么呢？”

马科斯也不想调查谋杀尼诺伊的案件真相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不在意科拉松，却非常在意美国。

由于尼诺伊的被暗杀，菲律宾当政者已经四面楚歌。国际上的呼吁，国内各党派、各群众组织的反抗，使美国的执政者担心共产党的暴动会升级，进而威胁到他们在菲律宾的利益，便出面对马科斯施加压力，让他对军队实行改革。而改革要从总参谋长贝尔将军的下台开始，由在美国西点军校受过

教育的副总参谋长菲德尔·V·拉莫斯中将接替贝尔的工作，并马上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马科斯不想轻易地放弃已经拥有近 20 年的总统宝座。为此，他离不开美国，他必须听从美国人的劝告。贝尔将军表面上离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拉莫斯被暂时任命为代理参谋长。但实质上，军队的大权仍旧掌握在贝尔手中……

菲律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在菲律宾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菲律宾：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岛国

菲律宾是由 7000 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山之国，从北到南相距近 1000 英里。吕宋岛是最大的岛屿；中部有米沙鄢群岛，它包括帕奈、内格罗岛和宿务岛；南部有菲律宾的第二大岛棉兰老和苏禄群岛。菲律宾也拥有山区，但它的气候大部分属热带性的。

菲律宾最早的居民是马来人，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据历史记载，早在 10 世纪以前，因为地域的关系，就有少量华人来到菲律宾。那时的北欧海盗正在欧洲掠夺寺院。那些数量不多的华人在吕宋岛沿岸定居下来后，用他们带来的丝绸、陶器、金属和镜子，和住在低地的马来人、山里土人（如种梯田的伊哥洛人）交换黄金，然后再同定期来此的厦门、广州、海南帆船上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渐渐地，在菲律宾就形成了华人居住区。

西班牙人也随着他们航海业的迅速发展来到这里。著名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就在菲律宾的宿务岛停泊过。他看见这里的马来人都居住在水上房屋里，与渔民和睦相处，每个居住点约有数百人，其首领称为“大图”。麦哲伦在这里被一个叫拉普的“大图”的手下勇士杀死。他的船员依然驾船前进，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之后，一群西班牙神父和征服者来到菲律宾，他们为麦哲伦报仇并发现了这块没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陆续来到菲律宾。最初，他们的根据地是宿务岛，有一部分人居住在马尼拉。

西班牙人开始用大帆船在菲律宾装满中国货物，驶向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块欧洲新大陆非常喜欢中国的奢侈品，然后，大帆船又满载墨西哥的金银财宝驶回马尼拉。西班牙商人分得利润后，就把剩下的金银运到中国，偿付货款。这种交易最初是在菲律宾的华人居住区中进行的，所以，早在 16 世纪马尼拉就已经成为华人的重要金融中心。每一个西班牙居住点的周围，都出现了一个由华人组成的辅助社会，他们为这块热带土地提供一切，包括能源。

华人怎样处理他们的金银？华人又如何把它们从厦门等地运到河内和东南亚一带进行新的交易？西班牙人和以后来的西方人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

1574 年，西班牙人把他们的根据地从宿务岛移到马尼拉湾。3 年后，一名叫林风的中国海盗率领 3000 人，共分乘 64 艘战船袭击了马尼拉。他们纵火焚烧了城市，却没能把西班牙人赶出他们的堡垒。于是，林风一伙向北航行，到达苏尔湾。他们在那里修建了自己的堡垒，开拓了一片中国殖民地。数月后，西班牙人追踪而来进行报复。他们有 300 人，加上 2500 名悠闲自得的马来人，向林风的堡垒发起进攻。他们烧毁了林风一伙的船队，围困堡垒数月之久。林风一伙弹尽粮绝，在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通过一条地道进入大海，溜之大吉。从此，菲律宾就成了西班牙人独自统治的殖民地。“菲律宾”这一国名，就是从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名字演变过来的。

西班牙人先用宗教统治这块土地。大批的天主教修道士从西班牙拥来，他们一方面向菲律宾人传播“天主福音”，一方面捞取大片大片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菲律宾人普遍信仰耶稣和教会遍布全国并拥有极大势力的原因所在。

西班牙人很害怕华人。因为华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使他们费解。况且华

人人数众多，富于进取精神，吃苦耐劳，善于理财，行踪诡秘，喜欢拉帮结派。这使西班牙人非常头疼。他们规定了华人移民入境的限额，并限制他们的活动，只许他们居住在马尼拉的少数民族区，不准他们入籍和直接拥有土地。

西班牙来到菲律宾的很多人和来到这里经商的华人一样，没有带妇女。这样，西班牙人和华人一样，也找来一些马来姑娘，和她们生下了许多不合法的混血儿。华人和马来人生下的混血儿不算华人，他们由自己的马来母亲抚养，从小就是天主教的良民。他们拥有土地，经营企业，和马来血统的菲律宾人差不多。但是，由于他们能够获得华人贷款，而已往往继承他们父辈的经商本领，使他们更有条件购置产业。他们还充当中间商或放债人，从中获得超过他人的活动本领和成绩。

西、马混血儿发财致富和掌握权力，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没有华人那种做生意的本领、活动能力和贷款途径，于是他们转向别的职业——法律。他们以法律为手段，使原来拥有土地的马来人陷入耗资巨大的法律诉讼中，从而蚕食了后者的土地，扩大自己的面积。

普通的马来人都想学习两班牙统治者，在节日、受礼日、受坚贞日、结婚日或别的喜庆日子举行烤猪宴会。这种风俗虽然愚蠢，但又很自然。他们那时过的是一种依靠大米和鱼虾维持生存的生活。他们没有现金，就向华人借贷，用自己祖辈留下的土地作抵押。如果无力偿还，就只好让债主把土地拿走。所以，任何一个马来人，如果他的土地还没有落入西班牙天主教修士手中的话，那么不久就会一方面受到中马混血儿在金钱上的盘剥；另一方面受到西马混血儿在法律上的盘剥，逐渐变成农奴。

在政治上，西班牙殖民者除了实行专制统治外，还在地方设立了一些政府机构。西班牙人把地方政府的官职卖给当地的有钱人，这样，菲律宾的富有者不仅有钱而且有权。他们随后和外国人合作，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甚至和外国人通婚。他们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权力，又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渐渐地成为菲律宾的显赫贵族——这就是菲律宾的特色。

二、美国人也伸出一只“援助”的手

1896年，中马和西马的混血儿们起来反对他们的西班牙纯种主人，策划发动革命。西班牙人采取逮捕和屠杀的手段，可惜，他们杀错了对象。他们处死的是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何塞·黎萨尔。他根本就没有参加阴谋。他之被野蛮地处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造反将军米利奥·阿吉纳尔多发动了行之有效的军事行动反对西班牙人。

自古以来，欺诈总是比战斗更有利。西班牙人提出付给阿吉纳尔多80万比索的赔偿。这笔赔款分3次付清，条件是请他离开菲律宾群岛。阿吉纳尔多也想欺骗西班牙人，他想用这笔钱购买军火。他接受了第一笔赔款后去了香港。

第二年，美国人在香港发现阿吉纳尔多境遇不佳。原来，他想从一个名叫头山满的日本奸细那里购买武器，而头山满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玄洋社”的创办人，他拿了阿吉纳尔多的钱后，却谎说从日本运武器来的那条船沉没了。

美国开始进行干涉——这不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情。当时，美国的幅员已经从东海岸延伸到西海岸，边界线已经划定。但美国经济的萧条，使人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政客们为此想转移视线：如果对古巴和别的西班牙殖民压迫地发起十字军似的远征，那倒是一件事儿。1898年2月，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被击沉，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即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香港，美国的代理人和阿吉纳尔多达成了秘密交易：美国同意把阿吉纳尔多弄回菲律宾，并向他提供武器。美国人办事很谨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承诺。阿吉纳尔多与西班牙人重新进行战斗；美国总统麦金利则派海军上将乔治·杜威率领太平洋舰队驶入菲律宾领海，随后又派遣护航舰队运去一万名美国兵。

1898年5月1日，杜威在马尼拉湾击败战斗力衰弱的西班牙舰队，自己测未损失一兵一卒。在陆上阿吉纳尔多的起义军控制了除马尼拉以外的所有农村。

1898年6月12日，阿吉纳尔多宣布菲律宾独立——可以说，菲律宾人是第一批推翻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亚洲人。然而，美国殖民主义者马上就代替了欧洲殖民主义者。

阿吉纳尔多把马尼拉周围的阵地让给了美国军队，美国军队和西班牙人打了一仗，然后接受其投降。他们把马尼拉作为战利品弄到了手——这时阿吉纳尔多才明白，美国人不是帮助他们来的。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特迪·罗斯福认为，马尼拉应该成为美国的香港。但美国的其他人士担心美国人的血会和“马来人及其他无法形容的亚洲人的”的血混合在一起。杜威海军上将也建议只保留马尼拉，其余的地方都还给西班牙人。

美国总统麦金利坚持要拥有菲律宾所有的岛屿。他说，“我跪在地上，祈求万能的上帝给予指点。一天深夜，上帝启示我：我们不能（把菲律宾）交还给西班牙人——那样做是懦弱的和不光彩的；我们不能把它交给法国或德国——那样做是蹩脚的买卖；我们不能把它留给菲律宾人——因为他们还不能胜任自治。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全部拿过来……随后我上床，睡得很香。”

菲律宾人的革命成功了，但它却无法抗拒美国的力量。这股美国力量被

称为“仁慈的同化”，由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和美国苹果饼组成，一样一半。《巴黎条约》把整个菲律宾群岛割让给了美国。华盛顿虽然自称它通过征服赢得了菲律宾群岛，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征服。美国人按照《巴黎条约》的一部分解决办法，付给西班牙人 2000 万美元。

独立就这样被出卖了。与此同时，美军和菲律宾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打了起来。许多美军军官都是在美国内战中和对付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打过仗的老兵。在他们看来，菲律宾人都是“黑鬼”或“粘糊糊的家伙”。到 1900 年，美国军队中的三分之二的力量都投入到了菲律宾，进行美国在亚洲的第一次游击战。他们残酷地杀害菲律宾人，不甘忍受的菲律宾人也拿起武器进行反抗。

那时，美国的麦金利总统刚刚被杀害，一个连的美国士兵正在菲律宾的萨马岛举行追思礼拜。化装成妇女的菲律宾游击队员混入教堂，用大刀袭击美国兵，杀死 59 人，砍伤 23 人。这又让侵略在菲律宾的美国人不能忍受。雅格布·史密斯——美国将军发誓，要把萨马岛变成“一片凄凉的荒野”。他说，“我不要俘虏，我要你们杀人放火。你们杀人越多，放火越大，我就越高兴。”于是，他手下的士兵就横冲直撞，奉命“杀死每一个 10 岁以上的人”。他们烧毁整座城市，拷打和残杀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一个叫阿德纳的少校告诉记者们，不要为“几个粘糊糊的家伙”的死亡而感情用事。

这就是美国发动的在菲律宾历史上的最凶残的一场战争。一名美国士兵写信回家说：

.....昨晚我们有个兄弟被打死，肚子被剖开。惠顿将军立即下令放火烧毁城镇，杀死看见的每一个人。干得很彻底，据报约有 1000 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我大概已经锻炼成铁石心肠，因为我只要把枪瞄准一个黑皮肤的人并扣动扳机，就感到很光荣.....请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正在为我所热爱的美国国旗和美国竭尽一切努力。

.....

我们接近城镇时，后面传来话说，不要俘虏，意思是看见活的东西——男人、女人和儿童——就开枪.....屠杀时使用了达姆弹，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子弹的名称。不用告诉，我们也知道是什么子弹。

同时，菲律宾全国的经济陷入瘫痪状态。菲律宾富有者们作出判断，有些事情比独立更重要。于是他们作出决定，支持美国人对菲律宾的战争。

这时，美国人也作出了反映：凡是继续抵抗的菲律宾人，都没有资格在殖民地的文官机构里工作。中产阶级也叛变了过去。美国人对菲律宾人的战争就这样宣布结束。美国兵撤走了，来了传教士和教师——美国人的“仁慈的同化”进入了苹果饼阶段。他们的殖民地试验从一项宣言开始了：

.....该委员会应切记在心，我们正在建立的政府，并不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称心如意，也不是为了表达我们的理论见解，而是为了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及繁荣.....应使该群岛的人民明白，某些重大的政府原则.....对于法治和维护个人自由十分必要.....为了他们的自由和幸福，必须在他们的群岛建立和维护这些治理原则和规章，而不论这些原则和规章与他们所熟悉的习惯和法律程序的冲突何等巨大。

“仁慈的同化”的确拿出了“治理原则”。他们调查了菲律宾个人和宗教组织所拥有的大片土地，并纠正了一切不法行为。但是，美国也考虑到了梵蒂冈对美国天主教选民的影响，所以教会在菲律宾的土地最后没有被没收。作为妥协，梵蒂冈同意委派非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的神父去接替被人憎恨的西班牙神父。这种轮换对教会来说构成了一点小小的不便。

但是，作为回报，美国又以 700 多万美元的代价，向梵蒂冈购买了马尼拉周围 21 处神父庄园的 17 处。有一次举行大规模的公开展览，目的是要把整个土地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结果是把神父们的这些庄园分成小块售给佃农，利率高达 8%，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马来人为了付利息，只好又向华人放债者借贷，不久后又一次赔掉了他们的土地。

由美国人扶持建立的地方官员助纣为虐，他们借助美国人和自己富有的财力，使没有文化的农民失去他们的财产。到了 1946 年，经过半个世纪开明的、民主的美国统治，菲律宾的佃农实际上比西班牙封建时代更高。

有位耶稣会的神父曾在革命前的中国呆过 13 年，见过那里悲惨的贫穷情况。后来，他又来到菲律宾盛产蔗糖的内格罗岛，结果发现那地方竟比旧中国更糟糕。他说：“我在中国从未见过菲律宾的这种人剥削人的现象。”

菲律宾的政府一直就是野心勃勃的美国人和富有的菲律宾地主和睦合作的产物。400 家百万富翁控制着菲律宾 90% 的财富，组成其核心的是 40 家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可以和巴黎、伦敦和纽约的大富翁们——罗思柴尔德家族、梅隆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相比。

菲律宾的富翁们是通过经营蔗糖发财的，其方法很反常。菲律宾蔗糖生产的效率很低，他们无法和国际市场竞争，但美国允许菲糖免税进口。作为回报，华盛顿得到了马尼拉一个强大的政治经济集团的支持，由他们出面去和菲律宾农民、中产阶级调解一切纠纷。糖业大王们掌握着政权，华人家族则控制着菲律宾重要的金融。

在马尼拉以外，地方财阀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在不断地壮大，面对着耀眼的、更充满刺激的马拉卡南宫（菲律宾总统官邸），他们无比渴望。例如，八打雁省的劳雷尔家族、打拉省的阿基诺家族和科胡昂科家族、南伊洛尔戈省的季里诺家族和克里索戈家族、米沙鄢省的洛佩斯家族等。他们经常结成临时联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美国的大工业垄断在 30 年代就已经分散，而且从那时起，美国就不断进行“反托拉斯”运动。但是，一直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的菲律宾，却从来没有采取过这种纠正措施。因此，菲律宾的财富依然牢牢地掌握在几百个家族手中。从概念上说，这些寡头政治集团属于僵化的中世纪的西班牙模式，但是，在美国的统治下，这些富有者则是一群奸诈大师，民主只是一种油光滑润的伪装。

马尼拉最流行的玩笑说，菲律宾“在修道院度过了 300 年，在妓院里度过了 50 年”。马拉卡南宫大门的钥匙捏在寡头们的手里。

三、“霍克”：民族与民主的反抗者

现在，不仅富有者想推翻台上的统治者，力图通过不断的进取而取而代之，就连一直受压迫的穷苦人，也站起来反对马科斯的统治了。

象3个活跃的教父戈麦斯、布尔戈斯、萨莫拉（这3个人都是菲律宾历史上著名人物）之死和黎萨尔被处死一样，尼诺伊的死也唤起了广大的菲律宾人。他们学会了克服胆怯，抛弃恐怖，走上了街头，手挽着手，对政府的非正义和滥用职权表示义愤。在大马尼拉马卡蒂金融区的街道上，他们不停地挥舞着拳头，一起高喊：“尼诺伊！尼诺伊！尼诺伊！”这是他们战斗的口号。他们还高呼：“打倒马科斯：打倒美国独裁政治！”

参加游行的人来自各个阶层，有商人和雇员、学生和工人、教师和农民、教士和街头小贩、社会名流和职业工作人员。游行的领导人来自马卡蒂的资产者，但是许许多多的参加者则来自城市贫民区。在当时，出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景象：富人、衣冠楚楚的混血儿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谴责马科斯政权，抗议尼诺伊·阿基诺之被害，抗议军队滥用权力和经济危机。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的人士，这些传统的革命对象如今也高喊起革命口号，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儿。

菲律宾的穷人和富人怎么能走到一起呢？让我们翻开菲律宾的历史——它几乎是有史以来，就充满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西班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反对西班牙人；美国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起来反对美国人。当富有者出卖了民族的利益时，菲律宾人民就毫不客气地反对民族侵略，又反对阶级压迫。当年，阿吉纳尔多将军被美国精良的装备逼进深山，但他并没有放下武器，一直战斗到后来被俘。尔后，他的将士们前仆后继，继续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游击战争。

美国人一方面毫不客气地打击反抗者，另一方面，迅速为菲律宾人建立了一个统治委员会。它由菲律宾少数社会上层分子参加，并逐步任命更多的上层成员担任行政职务。这些社会上层人士成为菲律宾的统治者后，试探着向美国人要“独立”、要“自由”。他们说，这是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如果这个国家由他们菲律宾人自己管理，可能会给广大的菲律宾人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佃户们就能安心种地，山里的反抗者也能放下武器，成为“良民”。尽管在这个时期宣传独立的人要受到检查、罚款和监禁，但美国人还是明智地给了菲律宾人选举的权力。

菲律宾人还要独立，华盛顿一直坚持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美国民主党总统要加快实行自治，而美国的共和党人却极力地阻止其行动；民主党人想阻止菲律宾人向美国移民和经济竞争，共和党人则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到夏威夷种植园和加利福尼亚农庄工作。在伍德罗·威尔逊当政时，美国推行“菲律宾化”；但是沃伦·G·哈丁执政时又停止了。赫伯特·胡佛在1930年否绝了独立法案，宣称美国人既未完成他们的“利他主义的任务”，而菲律宾人也未准备实行自治。议会不顾他的否决，通过了独立议案，可是当时菲律宾国会由于内部对抗，反对独立，直到1935年，菲律宾人才按照美国宪法的模式，制定了菲律宾的宪法——菲律宾共和国才诞生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满意他们所处的社会现状。这个社会的富有者们都拥有一个政党，在形形色色的政党中，他们都讲“独立”这个美丽的

词句。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政客来说，政党只是他们获得权力和享受美国人允许其经济上分赃的机器。有一个政党解释道，“人们在选举之后，通过他们身居的官职来改进他们的生活方式”。掌权的政党都有同样的哲学和党纲——可谁又把它当作了一回事？一个政客参加政党是为了家庭、友谊、地区的联系或与大人物建立联系，因此，菲律宾人改换政党成为寻常的事。政客们通过庇护和恩惠建立个人的党羽，有些政客就把自己庄园的民众当作私人军队。选举获胜的典型方式是使用“枪杆子、刺客和金子”。经济和政治上有成就的人物，同当地军阀打交道，由他们购买选票，威胁或杀死对方的候选人，在投票箱里塞满他们所需要的选票。大量农民和城市人民反对这种制度，但他们没有政治机器以表达他们的愿望。科拉松的祖父就说过，“政党代表的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和我们称之为菲律宾富豪的人，贫穷的阶级在这些党派中没有他们的代表”。

大多数的菲律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土地或者很少有土地，他们没有干净的饮水，有病得不到治疗。在选举期间，他们被迫去投地主候选人的票，否则就要被辞退。如果地主在选区内失败，他和他的卫队就要找出是谁没有投他的票。面对这样一种生存状况，菲律宾的农民暴动经常出现。这些苦难的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斗、和美国人斗、和大地主斗……。后来，日本人来了，他们联合了起来，组成人民抗日军——它的菲文缩写为 HuK（霍克），又和日本人斗争起来。那时的有钱有势的人们都跑到安全地方去了，这些“霍克”队员中的“正规军”，一直坚持抗日，另一些“霍克”队员则白天在庄园中种植稻米、玉米、卡莫特（一种甜薯）和糖蔗，收获为他们自己所用，并参加不脱产的游击战斗，帮助正规的“霍克”战士。这样的生产和战斗虽然很辛苦，但他们却比在富有者压迫下好过得多。那年代，科胡昂科庄园的南部部分在“霍克”的控制之下，更南边的康塞普西翁（尼诺伊·阿基诺的农庄所在地）也在为“霍克”所控制。作一名“霍克”队员，是民族的一种时尚，有史料记载，有的城市的市长也是“霍克”队员，统治菲律宾 20 年之久的马科斯也参加过“霍克”运动。而把土地让一部分给“霍克”，一方面保护了自己的财产，另一方面又落了个抗日的好名声，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日本人投降之后，美国人又来，时，“霍克”要求国会修改宪法，允许他们与菲律宾人有同等权力开发农业、木材和矿藏，以及公用事业和销售美国产品。“霍克”队员曾希望由于他们抵抗日本人的成就而得到赞扬和奖励。有些“霍克”队员甚至要求美国正式承认他们。美国人要求他们提出队员的名单，不久，名单上的人就成了围捕对象，他们的名字在地主和雇主中通报。

有些时候，事物本身就是矛盾的。“霍克”队员一方面要求美国人承认；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美国人同菲律宾人在经济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以及美国在菲律宾拥有永久性的军事基地。美国人岂是等闲之辈？他们以“霍克”队员拒缴武器，欲进行颠覆，甚至说他们做过亲日的勾当为名而进行镇压。美国人任命屠杀过“霍克”的一名上校为镇长。1946 年末到 1947 年，美国人和当地警察、便衣的首要任务就是疯狂地捕杀“霍克”。

菲律宾于 1947 年 7 月 4 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基础上再一次取得了独立，但是它依然是商业和土地寡头控制的世界。他们除了一般地拥护商业、拥护美国人、满足现状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新的思想意识。而这之后对“霍克”的镇压更加强了。政府军队和私人保镖把“霍克”老战士作为目标，几

千人被杀，更多的人被投进了监狱备受酷刑。最后，“霍克”和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人民解放军。军队的名称仍为“霍克”。他们要求政府撤消对“霍克”队员的迫害，反对警察和私人保镖，释放政治犯，撤换滥用职权的官员，恢复民主联盟在国会的席位和作出进行土地改革的方案，开始时先实行三七分成，最终废除佃农制度。民主联盟是1945年农民领袖与工人和左派知识分子团体一起共同组织起来的一个大联盟，它的纲领是救济无家可归者，撤消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者的高官要职，让工人、农民分享财富。它要求公正地收获、分成，承认农会合法地位，向佃农和小商人贷款，停止争夺土地和驱逐佃农。它还反对给美国人同等权利。

于是，政府军和“霍克”之间的战斗逐步升级。政府军在美国军火和装备供给下，猛烈炮击“霍克”的根据地。警察和私人保镖闯入“霍克”所在的村庄，逮捕和拷打农民，强奸妇女，毁坏庄稼，抢劫食物和财产，焚烧房屋。有些当地官员要居民购买通行证，才允许他们离开市镇；如果在途中没有通行证就要被囚禁、毒打，甚至折磨死。“霍克”队员以来福枪反击，他们绑架并杀死当地官员，也打击并毁坏躲在城里的地主和他们的财产。

到了1948年，“霍克”军队大约有5000至一万人。他们到各村宣传，举行大会甚至表演短剧和歌唱。这一年，菲律宾总统是曼努埃尔·A·罗哈斯，他宣布农会和人民抗日军都是进行颠覆的非法团体，所有的成员都在逮捕之列。但是，这位反对人民暴力的总统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埃尔皮迪奥·基里诺就任总统后，宣布赦免“霍克”的领导和成员。然而，警察和其他部门当局违背休战协议，继续逮捕并偷窃他们的财产。“霍克”队员不愿意放弃他们需要用以自卫的武器，他们开始将斗争转入到地下。

1949年进行总统选举时，基里诺手下的人威吓并杀死了“霍克”支持的候选人乔斯·P·劳雷尔。“霍克”之所以要支持他，是希望他当选总统后，对人民比较宽容。此案发生后，“霍克”队员数量猛增，许多劳雷尔的支持者也反叛政府。从1949年到1951年，“霍克”队员增至15000人。

毫无疑问，“霍克”已经成了菲律宾统治者和美国人最头疼的问题。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谍报部门的头子加紧执行反“霍克”战事，指责“霍克”受到了共产党的煽动，正在阴谋发动革命。

美国当时的谍报头子爱德华·兰斯建议当时还是菲律宾国防部长的拉蒙·马格赛，使用军事力量和改革双管齐下的方式以反对“霍克”。马格赛整顿了警察和部队，停止残杀农民，只在山区追剿游击队。

1954年，马格赛登上了菲律宾总统的宝座，他在“霍克”活动的中心地区——吕宋岛中部取得了70%的选票。美国情报局指导他的竞选活动，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经费。他当上总统之后，再一次听从美国人的忠告，对农民采取了比较好的土地租赁制度，以改进农民的生活状况。他建议扩大农业服务的机构，设立健康的诊所和地主——佃户法庭。他铺路造桥挖井，开辟灌溉渠道；他答应给“霍克”队员以土地（虽然落实到最后也不过是250户获得了小块土地），保证减租，继续努力使军队和警察收敛胡作非为行为……

尽管马格赛总统对制度没有做深入的改革，他的许多措施也只是公共关系的改动，但是，他给人以希望。农民开始可以自由组织集会和自由谈论，佃农对大米的收获能得到60%，糖能得到50%。

当“霍克”的力量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利时，每一个总统都答应给“霍克”和农民一些改良政策以满足他们并不太高的“奢求”。但是政客们采取的措

施很少得到实行，他们只是装装门面而已。菲律宾的土地分配和谷物分成，一直是菲律宾最棘手的问题——菲律宾的统治权一直掌握在有钱的富有着手里。当他们需要拥有更大的权力，以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利益时，他们作出让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一时大权在握，谁又能理会农民和“霍克”？

“霍克”几代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和迫害，将促使新的几代“霍克”人决心消灭菲律宾的佃农土地制度。

四、抗议的怒火在菲律宾大地上熊熊燃烧

现在的问题是，已经不仅仅是“霍克”一支人民武装在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几乎整个菲律宾大地，都燃烧着对马科斯愤怒的火焰。

继拉蒙·马格赛之后，又有卡洛斯·P·加西亚、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担任过菲律宾的总统，接着，就是费迪南德·E·马科斯。他1965年击败马卡帕加尔总统成为菲律宾的第一号人物后，1969年，他又击败自由党的参议员小塞尔希奥·奥斯梅尼亚，成为菲律宾第一位连任的总统。按照1935年的宪法切定，马科斯将不能参加第三次连任总统竞选。马科斯的这个任期将于1973年结束。

从1969年到1970年，全国性的反对马科斯统治的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新成立的菲律宾共产党的政治小册子《菲律宾社会与革命》成了校园中活动分子喜欢的精神食粮。以西森为主席的菲律宾共产党和以丹蒂为首的新人民军正迅速扩大队伍。追随者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雇员、学者和作家，甚至所谓无业游民的社会渣滓。正如尼诺伊指出的，马科斯花费了人民大量的钱财，加上军队的热切支持，才艰难地击败了小奥斯梅尼亚。尽管如此，这位新总统并没有得到暴乱分子和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事实上，就在马科斯于1970年1月26日按照惯例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后，马科斯已经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那天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是由温和的以爱德加·乔普森为首的菲律宾全国学生联盟组织和号召的。参加的人数多达2万至5万。这其中有工人、教师、牧师、僧侣、神学院的学生、农民。从一清早，这些人就涌进国会前宽阔的场地。人们高喊着“丹蒂！丹蒂！”此时此刻，“丹蒂”这个新人民军的首领已经成了好战英雄的化身。

总统在下午4点50分到达国会南侧大门时，示威的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呸”声，直到他进了国会大楼后，人们看不见他为止。但是，集会的演讲者们继续向人们讲述人们看不见的“国家真相”。在菲律宾全国学生联盟被批准的集会时间结束时，一些人抢过话筒，大声呼喊“革命，革命，革命！”

这时，总统和第一夫人出现在国会大楼外面。马科斯微笑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致意。人群中开始是一阵“嘘”声，少许，有人唱起了国歌《可爱的祖国》，歌声通过大会音响系统扩大了音量，全场群众都跟着唱了起来。国歌尚未唱完，又有人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总统和第一夫人由安全保卫人员护送着到了一辆等候多时的轿车旁。愤怒的群众扑上去，向他们两人扔石头、空饮料瓶子、棍子、标语版和其他随手可抓到的东西。有人还抬来了一副纸做的黑棺材和一条纸做的鳄鱼在人群中传递，最后向总统的汽车掷去。

总统和第一夫人刚刚离开现场，士兵和警察就向示威群众扑上去，手舞警棍追赶着年轻的叛乱者。一场惨不忍睹的混战就在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警察和赤手空拳的学生中展开，到午夜就有，人敲打死、数十人受伤……

1月30日，马尼拉又暴发了“马拉卡南宫之围”。就在1月26日事件后，大约有120名学生领袖在远东大学召开会议。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警察首脑辞职，并在1月30日再次举行反对政府的集会。30日前夜，4个学生组织同时举行了会议，布置了各自的集会地点，有的在国会门前，有的在马尼拉市政厅，还有的在马拉卡南宫——26日的残暴，使所有的活动组织联合起来，甚至连来自富有家庭的温和者也与革命的好斗分子站到了一

起。

这一天，一些组织先到马拉卡南宫与总统会晤。但马科斯与“革命分子”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在国会大楼前示威的群众就赶往马拉卡南宫。路上，在阿亚拉桥南端的阿亚拉街和科米利亚斯区的马克斯街交界处，年轻的革命者看见交通警察的岗楼，就升起了一团怒火，他们上去砸了岗楼然后又放火烧了它。这时，游行队伍便没有了秩序，人们一边走一边高呼“革命！革命！”并唱起了革命歌曲。当他们走到马拉卡南宫时，已经是暮色苍茫。总统府内灯火辉煌，有人喊：“把灯关掉！”接着，一个人扔了块石头砸碎了一盏灯于是群起效尤，用石头、木块打碎总统府外的照明灯，总统府前一片黑暗。

同时，在总统府外的门迪奥拉街上，年轻的暴乱者正在猛攻总统府大门。总统府警卫部队在大门外布置了一辆救火车开始用水龙头向人群喷射。大约是7点左右，马尼拉消防局的一辆救火车也来了，向示威者喷射水龙。由于水压太小，学生们抢夺来这辆救火车，把消防队员狠揍一顿后，让他们开车向总统府大门撞去。锁被撞开了，铁链撞断了，随着“咣当”一声响，总统府的大门被撞开了。学生们冲了进去，开始往总统府抛掷燃烧瓶，向建筑物扔石块，焚烧他救火车和一辆停在旁边的政府的汽车。预算委员会新楼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旁边作为医疗诊所的房屋被砸坏还点着了火，在总统府旁边有一间为等待总统接见的人的休息房间亦遭破坏，总统卫队警戒线旁的电话亭也被烧毁。

政府从保安军、陆军、海军和大马尼拉卫戍区调来大批镇压人员，1月26日的混战场面又重新出现在总统府前：军队进攻，学生后退；学生们反攻，军队往回撤。到了次日9点钟左右，军队控制了门迪奥拉街和J·Dc劳雷尔街，而学生们占据看待伯里亚斯街、莱加尔达街和克拉罗·M·雷克托街。有些学生沿阿莱吉大街后撤到奎亚帕街，一些抢劫者砸坏了陈列的橱窗，抢去了一些珠宝和鞋子。

暴乱者的“侵犯”后来被打退。一些保安部队人员和警察受了伤，但没有开一枪。当把示威者从总统府大院彻底赶出去后，大马尼拉卫戍部队冲出去追赶逃跑的暴乱者，同时，政府军队留下来保护总统府的安全，以防任何反攻。

暴乱者占领了雷克托、门迪奥拉和莱加尔达这几条街道交汇处中心。他们身附近的政府官员扔石头，并屏骂他们。在莱加尔达街的左边，另外一些暴乱分发出一阵尖叫“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批示威者，士兵们为保护大桥不得不对付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来自前方，另一方面来自侧面。

这时，士兵们开始向地面开枪，水泥地上溅起许多尘土和细微的石子。士兵们以门迪奥拉街这一边的两辆消防车为先导，跟在后面小跑，接下来是一场长时间的神经战。最后，示威者被赶到门迪奥拉大桥。有些学生向右跑到莱加尔达街，另外一些向前跑进了雷克街。在东方大学和菲律宾商学院附近的莱潘托街和雷克托街中段，他们点燃了篝火。还有一些人在东方大学街对面的一个加油站往瓶子里灌汽油，自制燃烧瓶。离加油站不远的地方停放着一辆军用卡车和私人小汽车被暴乱者点火烧着了。

这场又被称作“门迪奥拉之战”的冲突，大约在1月30日午夜才宣布结束。

马科斯对此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向全国宣布说，有一个“对政府蓄谋已久的攻击，一次反叛和颠覆行动”的阴谋。他说，试图火饶马拉卡南宫的暴

徒，不是学生或纵火犯，而是为一个罪恶目的服务的一帮人，他们的目的是摧毁或接管马拉卡南宫。他说，这项计划是由两个组织预谋的，一个组织受共产党的煽动，另一个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在他宣布事态已经平息后，他指出：“至于如何准备对付任何夺取政权的企图，将采取什么行动则必须仔细研究，小心翼翼，慎重从事，并符合法律，没有任何要剥夺宪法允许的自由考虑。”他对暴乱分子提出警告，

任何用暴力推翻现政府的企图，都将迅速被扑灭。他强调说：“我不会容忍，也不会允许共产主义接管政权。”

但是，反对马科斯政府的活动并没有就此结束。面对着即将来到的 1973 年总统选举，各反对组织都在加紧石动，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把马科斯从总统的席位上赶下去。在马尼拉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建筑物上、围墙上、商店的橱窗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传单，有的还挂有共产党锤子镰刀的标志和有红色大字的横幅。电影院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被炸弹炸得摇摇晃晃。人们的私人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还有人丢了性命，不只被炸断了手和腿。此时，政界正为了起草一部新宪法而召开大会，围绕着是禁止还是允许马科斯第三次任菲律宾总统的问题陷入激烈的斗争中。也就是在此刻，马科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要运用宪法赋予给总统的紧急权力保护人民和政府，使其免于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971 年 8 月 21 日晚上，自由党人在米兰广场举行宣布竞选参议员的大会，两颗杀伤力很大的手榴弹被人扔到了主席台上，9 人当场死亡，另有 59 人受伤。自由党的领导班子成员虽然没有死亡，但是，其中一人丢去了一只脚，小奥斯梅尼亚和萨隆加受重伤躺在病床上很长时间。接着，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法。国防部长恩里莱下令逮捕了尼诺伊等政治家们。菲律宾社会进入了颓废、病态之中。

炸弹爆炸事件还是经常不断。工人们成立了纠察队，罢工及其它活动使人们不能正常上班，许多大的商业公司被迫关门，最后，生产部门陷入停顿。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几乎不能执行，司法部门本身由许多腐败分子把持。地方警察和民政当局不能正常管理当地社会，犯罪行为 and 违法行为如同浪潮般出现。社会寄生着大量的犯罪分子，并得到军阀和腐败的政治家的庇护。绑架、敲诈、武装抢劫、拦路行凶、诈骗、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罪行泛滥一时。

政治制度的腐败和社会充满的各种弊端，使得菲律宾社会迅速滑向无政府、无秩序、无道德价值观的动乱大旋涡之中。

新人民军在混乱中再一次获得壮大，社会各反对政府的党派进入地下，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活动。越来越多的人不能容忍马科斯的统治再继续下去了。他们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把马科斯赶到台下去。

任何人都在通过各种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不论他是富有者还是贫穷者，只要他活着，他就有一个目标，他就要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着！

第四章在政坛脱颖而出的科拉松·阿基诺

1973年，马科斯颁发新宪法，把现有制度改为议会政府，抹掉了总统任期的限制。有一条款规定，执政者有1935年宪法规定的总统的全部权力，有1973年文件规定的总理的全部权力和使用政令实施的立法权。其实，马科斯的现政府，只剩下一个议会政府，但它又没有议会。……费迪南德·E·马科斯就这样又连任了菲律宾的总统。

菲律宾政界反对马科斯的呼声越来越高。原来这反对的呼声来自四面八方，口号也各种各样。现在，全国只有一个口号，惩罚杀害尼诺伊的凶手，让马科斯滚下总统宝座！

毫无疑问，马科斯还想连任菲律宾的总统。他在这个位置上得到的荣誉和利益，让他对总统这个宝座无比眷恋。为了达到连任的目的，他曾经动用了国家武装。现在，如果还用这把“硬刀子”显然是行不通了，于是，他换了一副面孔，顺从民意，成立了一个尼诺伊枪杀案的调查委员会。他想以一个自由、民主的总统形象博得人心，达到他的目的。

但是，事情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简单……

一、有结论无结果的尼诺伊枪杀案

马科斯是想通过他指定的人员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最后得出枪杀尼诺伊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或者其他什么人，但决不是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人。

两个人站出来说明他们目击了开枪杀死尼诺伊的过程。他们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当时没有出来作证。其中一位叫蕾韦卡·基哈诺，这位被称为“哭泣的女士”的蕾韦卡后来作证说，她从飞机舷窗看到站在尼诺伊后面的保安人员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

在马科斯导演的审问中，法官们宣布她的证词“令人怀疑”。她的证词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飞机的隔音舱壁使她无法听到枪声，而她那脆弱的精神状态（震惊和恐怖的混合产物）又导致人们对她证人身份表示怀疑。

1984年1月，另一个证人挺身而出，他就是机场货物管理人员赫塞巴·塞罗那。当时，他正在驾驶着一辆运货车向飞机开来，他看见有人用手枪击中了尼诺伊的脖梗，他还听到了枪声。

以后数月，马科斯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洗刷罪名活动，其中包括一个进展缓慢的调查和一次对贝尔及其他25人极为敷衍了事的审问。这些人是马尼拉警备司令部和航空安全司令部的人。与此同时，伊梅尔达让人改建了马尼拉国际机场的8号门。这个行动很可能意味着使调查人员无法重新恢复犯罪现场。

于是，调查经历了冗长乏味的过程。每天，调查委员会成员在奎松城的社会保安系统大楼的一间大厅里进行工作。这座大楼为了这次调查做了特别的准备。国内和国外的记者跟踪报导每天出现的精彩场面——菲律宾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谋杀案的调查有如此声势和被世人注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和专家小组律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目。

阿格拉瓦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始于1983年11月3日，进行差不多一年后，于1984年8月20日正式结束。这是一次耗资政府数万比索的彻底而精疲力尽的调查。所调查的这次罪行被称为“菲律宾历史上最丑恶、最知名的案件。”该案件的调查人员一共检查了1294份文件，1472张照片，14盘录像带，91份物证。它举行了125次公开听证会，到庭证人达到193人，记录材料20377页。

在调查委员会大部分人的报告中，揭露出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些将军、校尉军官和低级军官卷入了杀害尼诺伊的阴谋。这些军官却把谋杀尼诺伊·阿基诺的罪过，强加在罗兰多·加尔曼身上，说他是纽瓦·埃西加雇用的一名枪手。他们把加尔曼当作尼诺伊之死的替罪羊，士兵们把他当场打倒在柏油地上，打得他浑身是窟窿。

下面，是尼诺伊·阿基诺案调查报告中的精华部分。在经过11个月对物证和证明材料的详细分析后，调查委员会从实质上证实了专家小组的结论，而这结论与公开场合有人所宣称的完全相抵触。结论是：“军事当局事先已经知道尼诺伊1983年8月21日到达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细节，精心制定的表面上看旨在保护尼诺伊生命的保安措施，实质上是为了掩饰杀害尼诺伊生命的罪行。”调查委员会指出存在一个军事当局的阴谋，这并不只是依靠对当时情况的分析，而且还有确凿的证据。调查委员会援引菲律宾刑法条例，在犯罪同谋中，“一个人的行为便是所有同谋者的行为”。行动上实行开枪射击的人，必须同他们的指挥授意者和从精神上予以支持的人一起受到惩罚。

接着，调查委员会确认有一伙极有权势的人，上至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贝尔将军，参与了这一阴谋，并对他们提出起诉。

报告列举了罗兰多·加尔曼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证词。他们说，罗兰多·加尔曼既没有杀害尼诺伊的动机，也没有杀害他的手段。罗兰多·加尔曼于8月17日离开了在布拉干省圣米格尔的家，陪他一起出走的是他的朋友阿瑟·库斯托边奥少校和一些像他那样的军人。罗兰多10岁的儿子雷纳尔德和他的继女罗贝塔的证言说，那些带走他们父亲的人后来又带走了他们的母亲莉娜。这些证词使得调查委员会明确排除了原来关于暗杀的说法，认定尼诺伊不可能为加尔曼所杀。

加尔曼被解剖后，发现他是吃过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来机场的。如果是这样，他就必须在吃完午饭的1点零4分，也就是在尼诺伊开始从飞机上下来时，准时回到离飞机场不远的柏油路上。此外，对于一个有经验的枪手，他竟没有准备任何逃跑的工具，死后发现他口袋里仅有2.1比索，这点钱是不够回到布拉干的圣米格尔的。

阿格拉瓦委员会一致认为，尼诺伊案件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他们看到，整个事件有两次玩弄了掩盖手法；一次是事前，另一次是事后。一个委员会成员说，通过运用军事术语和土语，用一个公开的安全计划，掩盖着见不得人的计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尼诺伊·阿基诺是在他走下飞机辅助楼梯时被护送者其中之一人开枪打死的，几乎是同时，加尔曼被其他士兵击毙。

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出来后，科拉松·阿基诺站出来发表了一份声明。下面，是科拉松·阿基诺声明的节选：

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职位有多高，难过暗杀尼诺伊这样一个至为重要的政治决定会是他自己做出的？

马科斯先生会用尼诺伊的话来说，“用我的血洗他的手”吗？

或者，马科斯先生对在尼诺伊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一无所知吗？

阿格拉瓦的报告证实了我们早已经知道的一切，那就是：不是加尔曼，而是一个军事阴谋集团开枪打死了尼诺伊。但是，报告中没有回答自从1983年8月21日以来一直使我困惑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军方要暗杀尼诺伊？

我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正好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在尼诺伊被监禁时期，我们非常清楚，涉及尼诺伊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得到马科斯先生的批准。事实上，当马科斯先生宣布军事管制法时，尼诺伊名列拘禁人员名单之首。记录表明，已定于1972年9月23日早上将尼诺伊第一个抓入克拉梅兵营。尼诺伊在被捕同时，被解除了他作为共和国参议员的职责，这明显是违反宪法的。马科斯先生行使和坚持掌握着涉及尼诺伊的一切问题的全部控制权，没有马科斯的点头，与尼诺伊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不得进行。让我列举几例，让事实说话。

1. 军事审判团对尼诺伊的审讯是在马科斯先生的控制下进行的。

2. 被指控对监禁尼诺伊负责的胡安·庞塞·恩里莱部长和整个军事当局都受马科斯先生的控制。1974年8月17日，由于我大女儿的生日，胡安·庞塞·恩里莱答应给一张回家的通行证。就在生日当天，通行证突然被取消了。当我向博尼法西奥堡的军官们询问时，我被告之，更高一级人士取消了国防部长的通行证。谁还有可能比国防部长更高呢？

3. 尼诺伊被释放的条件和获释放的证件，也是掌握在马科斯先生手中。

其一，1978年6月9日，恩里莱部长等人来到博尼法西奥堡告诉尼诺伊，马科斯先

生同意特赦释放他，但是尼诺伊应该离开这个国家，去过一种流亡生活，还要求尼诺伊给马科斯先生写封信，保证他不再进行损害政府形象的活动。我本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国家，恩里莱部长说：“这个月底以前。”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大家是多么兴奋。可我们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到6月底而且是很多很多月后，尼诺伊仍旧是一个囚犯。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到了1980年5月8日，马科斯才最终同意我们离开。

其二，在1982年4月赫拉多尔·罗哈斯去世期间，尼诺伊在纽约市遇到了伊梅尔达，并同她谈了话。尼诺伊要求她帮助他延长他的护照有效期，可是他再也没有看到护照。第二年，1983年5月21日，尼诺伊又一次看到了伊梅尔达。他把准备回国的计划告诉了她，并又提醒她别忘了他的护照一事。尽管他通过他的律师埃尔尼·马塞达反复向菲律宾驻纽约领事馆要求得到旅行证件，但唯一得到的答复是一份恩里莱部长要求他推辞回国的电报。

根据以上这些，难道我们现在还能相信尼诺伊死于在马科斯先生控制下的军方之手，而马科斯先生则清白无罪吗？难道我们还能相信尼诺伊被暗杀是在马科斯先生不知道或者没有表示应允的情况下策划和实行的吗？

.....

科拉松在后来的一些时候说：“说到底，不管我们或迟或早、有没有我所认为的那一个真正主持正义的法庭，它都不会把尼诺伊还给我了。”

科拉松认为把时间耽误在与马科斯控制下的法庭争论是非上，还不如为她的尼诺伊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但是，她能做些什么呢？

二、科拉松：走进政治旋涡

科拉松从尼诺伊去世后，就被菲律宾的反对派带出家门，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政治旋涡。菲律宾的一些史学专家撰书指出，从更大的意义上来看，尼诺伊的遇害或者是被暗杀，标志着菲律宾的一个历史性进步：费迪南德·E·马科斯走进历史，同时，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走到了时代前面——科拉松·阿基诺的崛起，是菲律宾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划时代的标志。

就在尼诺伊案件调查委员会全面开展工作后，1984年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竞选准备工作也全面开展起来。政治上的反对派，包括前参议员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小阿基利诺·皮门特尔和小何塞·科胡昂科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自由党内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由参议员霍维托·R·萨隆加为首，另一派为首的是前参议员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还有一些独立的地方政党组成的组织和一些见风使舵的政治组织……所有这些组织现在都高举起尼诺伊·阿基诺的大旗，喊出了推翻马科斯统治的口号。但是，这些反对派都有各自不同的反对马科斯和马科斯新社会运动的方式，对国民议会选举问题，也是各抒己见。

一些反对派的组织准备抵制而不参加大选。尼诺伊的弟弟阿加皮托·巴茨·阿基诺就反对参加。他是著名的街头竞选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反对派人士认为，参加大选将证实马科斯政府的合法化，而他们反对派一直认为它是非法的。

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尼诺伊的妻子。由于她在菲律宾当时的影响，她的主张对于反对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科拉松·阿基诺却选择了参加大选，而不是抵制。如果考虑当时主张抵制意见的人的数量和能量，这可真是一个个大胆甚至不怎么受人欢迎的决定。但是，她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她说，尽管1978年的大选是马科斯宣布进行的，但尼诺伊本人仍然参加了那次大选；尼诺伊曾敦促人民运用选举而不是通过抵制来拯救自己。

“即使在1978年，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公众的支持，尼诺伊还是说要去参加选举。”科拉松这样说：“尼诺伊认为我们要和平地更换政府，只此一个方式可供我们采纳。除非某人从天而降，带来一个更好的方式，否则我们只有照现有方式行事。我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再努力一次。如果我们努力后毫无进展，我们将从此相信菲律宾人不需要采用这种方式。但我认为应该作最后一次努力。”但是，大部分反对派要求她抵制这次国民议会选举，只有一小部分反对派支持她的主张。要在参加与抵制之间做出选择，这使她左右为难，极度痛苦。她曾希望自己梦见尼诺伊，他在梦中教她怎样做才是对的。她承认，由于争论双方各持一理，均有说服力，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也举棋不定，但她感觉到她必须站在同意参加选举的这一边，她相信应该给菲律宾人一个参加的机会。在她的信念中，即使决定参加，那些希望抵制的人仍可按自己的意见行事。

科拉松开始对所有人——不管是主张抵制大选还是主张参加大选的，做劝说工作，说她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团结起来。她将这一情况告诉了菲律宾著名作家尼科·华金。她说，他们采取什么策略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目标上应该联合起来。他们不应脱离上述目标。一些人不懂，她与小叔叔巴茨同属一个家庭，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主张？她回答说：阿基诺家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头脑，都相信民主制度。

接着，科拉松·阿基诺走出去，敦促菲律宾人民参加投票而不是抵制选举——她为反对党候选人竞选，并帮助他们选进国会。

毫无疑问，国民议会的选举对科拉松是一个智慧和心理的考验。科拉松·阿基诺首先要站在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克服讲话时的胆怯心理。她还想看自己是否就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人，是否也能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她想要知道自己在群众中的魅力，是否能吸引、迷住甚至感动广大群众，让他们如醉如痴……

科拉松跑遍了全国进行竞选，哪儿有反对派候选人，哪儿就有她的身影。她很快便对这段经历心满意足，甚至津津乐道。当她发现自己在这些政治旅行中一直向公众发表演讲时，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说：“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当尼诺伊作为候选人时，我最多只是去市场和工厂同人握握手，我从来没有站到台子上演讲过，过去这种事与我毫不相干。”

但这次她必须向人民演说，这并不是真正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谈尼诺伊。她的大部分听众特别是年轻人，不是真正了解尼诺伊的，因此她要向他们讲述尼诺伊在监狱中的故事，讲他们两人昔日的生活，讲尼诺伊为什么要回国。她告诉他们尼诺伊怎样忍受一切痛苦，因为他不愿意向独裁者屈服。然后，她说她希望他们也自愿为自由而斗争。她又补充道：“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应在这个国家重建民主的斗争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说她以前只是一个在家中照看孩子的妇女，而如今她也在为这一目标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过去她常常躲在群众大会听众的最后边，听尼诺伊节奏明快、起伏跌宕的讲演。她记得他的讲演总是使听众入迷。那时，她总是尽量避免坐到主席台上，她害怕别人发现她让她去台上讲话。但是，1984年竞选期间，她甚至甘愿爬到主席台上去，讲上哪怕是几句话。起初，她把自己的讲话时间限定在5分钟左右，当她意识到这样不能满足那些步行数里特意来看她、听她演讲的人时，她开始越说越多了。后来，人们吃惊地发现她一口气竟然能讲上30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连她的女儿都惊喜地高叫：“妈妈，您真行！您一口气可以讲演30分钟了！”

同时，这次参加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竞选活动，也给科拉松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往事：那是在三描礼示的一个镇子时，因为下起了毛毛细雨，她准备缩短讲话时间。她对听众说，她不想让他们淋着，他们或许会得病，不能去投票。但是，群众不在乎老天下雨，请求她继续讲下去。后来毛毛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可听众们仍然没有动。

因力绝大多数城市属于执政的新社会运动党（该党属于马科斯领导的政党），不允许科拉松、反对派候选人和反对派领导利用广场，他们不得不常常在野外举行公众集会。他们利用篮球场、稻田和教堂、场院作为会议地址。在三描礼示省的伊巴镇他们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仅有3个灯泡来照明，科拉松辨别不清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告诉她这是一块稻田。突然下起雨来，她淋湿了，只好同别人一起跑去避雨。糟糕的是这片稻田离公路很远，她彻底地淋透了。来到一个人家，人们首先将她的衣服用电风扇吹干。这是她第一次经历一个政治家必须经历的一课。由于这场瓢泼大雨，她猜想下一个集会的人们肯定已经离去。当她出现在奥隆阿波时，她发现人们正在等待她。

在里萨尔省的拉斯皮里亚斯城，会场太泥泞了，她只好坐三轮车到主席台上去，而这辆三轮车还载有一位新社会运动候选人的追随者。会后，科拉

松发现那辆三轮车还在等着她，三轮车夫自豪地宣布，他已经把那些新社会运动的追随者赶走了。

1984年的菲律宾国民议会竞选结果，证明了科拉松·阿基诺的主张是正确的。由于一大批反对派与科拉松的共同努力，使反对派有60名候选人当选，约占国民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一。

科拉松收到了一些来信，其中有的把她捧到了天上，认为她是菲律宾政界一颗崛起的明星；有的则谴责她，说如果尼诺伊在世，她不会去这样做。对此，科拉松说：“不管怎样，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有人说1984年的国民议会竞选，为科拉松·阿基诺两年后另外一次大选做好了准备工作，实际上它是一次彩排，其报酬则正是菲律宾的总统宝座。

现在，科拉松·阿基诺又向新的高度迈进：她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马科斯从总统宝座上赶下去！

由于尼诺伊的被暗杀，几亿美元由于商人们对未来政局的捉摸不定而通过黑市流出。没有留下多少钱供给工商业流通，许多公司近乎倒闭或破产，无职业者日益增多。银行关闭，比索贬值38%，物价高涨，满街怨声。

经济情况由于这个国家两大出口产品——蔗糖和椰子油世界价格的暴跌而更为恶化，经济增长减少到零，而后还在进一步地下降。全国有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化之下。在城市，穷人挤在旧木板、铁皮和硬纸板措成的小屋子里；在乡村，穷人住在以草盖顶的茅屋里。人们缺电、缺水、缺乏卫生条件，他们以捡破烂、捕鱼、挖掘泥土出售给建筑工地为生。他们沿街叫卖，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稀少的稻子，在有钱人家或中等阶级的人家当仆人。在马尼拉，有几百户人家住在称为冒烟山的垃圾山脚下（因为从腐烂物中散发出沼气，所以叫冒烟山）。他们每天随着垃圾车到山顶，而后穿过一堆堆恶臭的垃圾寻找塑料、锡罐和瓶子卖几个钱。孩子们和成人在街头一面躲让机动车，一面向轿车、吉普车以及装在吉普车身上的涂得五颜六色的敞篷车里的人们兜售香烟、糖果和报纸。

所有马科斯圈子之外的菲律宾工商业经理们也深感不安。他们对支付佣金、行贿、垄断企业的勒索不胜厌烦。“没有人能够进口肉类，因为有丹丁·科胡昂科经营的一个集团垄断青。”马卡蒂商人俱乐部主任乔斯·罗梅罗解释说，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包括菲律宾许多重要的商界领袖。“业务都给进口局包下了，官僚结构永远存在”，这种垄断意味着消费者负担更高的物价，“只有恢复了市场制度才是正道”。

正因为如此，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尼诺伊葬礼以后有整整一个月，实际每天晚上都有祈祷者聚会。他们抗议暗杀，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恢复民主。科拉松的家属和朋友们召集了一些集会，其他城市的当地政治领袖们也举行集会。最积极的反对派团体是“行业组织”和新建的“进行抗议”的团体，而不是传统的政界人士。这些社会活动分子和团体包括学生、教师、律师、工人、农民以及贫民，他们动员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的领导者和反对派政界人士开始在广泛的政治战线中一起工作，在联合战线中并不讨论意识形态。他们都设法保持义愤和反抗的情绪，而政界人士还同时设法在自己社区里提高他们的地位。

9月中旬，一些马卡蒂工商界领袖和律师在证券交易所后边的乌加广场上举行集会，选择这个金融中心开会的目的在于震撼国际社会。马卡蒂是这个城市的商业地段，那里高大而现代化的建筑物同其它部分倒塌的房屋形成

了尖锐的对比，这个地段还包括富人居住的马尼拉用围墙围住的社区。组织者从其他地方招来 500 人，因为他们担忧他们召集不起足够的商业地区参加者。实际上，他们不用担心，有 10 万人上街并大声喊要马科斯辞职。人们撕碎纸片和电话簿从办公室窗户掷下。

马卡蒂的集会每周都在举行。中层阶级的马卡蒂的商人们，甚至传统保守的教士们都第一次卷入了这场风暴。在 11 月 27 日，尼诺伊生日那天，有 10 万人在商业区黎刹纪念公园集合。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适合于政治性集会，一般称之为卢内塔。群众来参加弥撒，并要求听马科斯辞职的讲演。许多人穿着黄色的 T 恤衫，围上头带，这些都是运动的象征；黄色的旗帜在他们头上飞飘，黄色的气球在天空浮动。群众喊着尼诺伊的名字，而后祝他生日快乐。有一个露天剧场正在上演剧目，他们把马科斯描绘成像吸血鬼似的“黑暗国王”。

菲律宾人民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科拉松更不能平静。她开始了更加频繁的政治活动。在军事管制实施第 11 周年时，科拉松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她站在新古典希腊式建筑的邮政总局大楼前，向博尼法西奥广场上的几十万群众说，要为自由、主权和民主而奋斗，为实现尼诺伊的理想进行团结的非暴力的斗争。

科拉松也开始和更多的反对派人物接触。他们中间，中产阶级、工商界、温和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目标是摆脱马科斯的统治；工会工人、学生和民族主义分子则认为，美国是控制国家的关键，显然这时的反对派还没有形成一个核心，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想通过各种努力和各种方式，把马科斯的旧政权推翻。

科拉松在试图消除反对派之间的鸿沟。她同友派会晤，并出席他们的一些集会。科拉松也经常出现在“街头国会”中。这是在尼诺伊 51 岁生日那天形成的一种集会方式。科拉松不是“街头国会议员”中的关键人物，但是许多集会让她发言。在尼诺伊去世之后，科拉松开始熟悉了在公众场合下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做法。她几百次地接见新闻记者，她向公众表示，除非能激励大家以行动反对独裁者，不然，尼诺伊的死将是没有意义的。她的演说主要是诉说她的苦难和引用尼诺伊过去的谈话。

1983 年 8 月 20 日，尼诺伊的塑像竖立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尼诺伊被枪杀的现场和圣多明戈教堂几个地方。红衣主教辛和 200 位牧师及 10 位主教为尼诺伊举行弥撒。红衣主教号召反对派和政府之间实行全国性的团结与和解。

辛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主教，有一张中国血统的脸。他在 1974 年 46 岁时就成了马尼拉的大主教。他主持一个富人和有权者联在一起的保守教会。现在，这个教会逐渐趋向关心穷人和被压迫者。这位红衣大主教完全了解菲律宾当权者和反对派领导人的自我服务手段。他说，“新的政治选择必须引向团结而不是达到个人的野心。”

科拉松则向拥挤在教堂里外的 5000 名群众说，“正义的实现已经拖延了一年了，可是这也是表现了菲律宾人民的勇气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一年，也是人民战胜他们自己、战胜他们在统治者面前胆怯、战胜他们在强大力量面前害怕的一年。”

在这之后，科拉松率领着人们从教堂走出，有很多群众在街道两旁欢呼着，按汽车喇叭，赞成红衣主教辛和科拉松的主张，更多的人加入游行队伍，最后有近 100 万人集合在公园。

科拉松在 1984 年尼诺伊的生日时，决定将组织一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庆祝。她说，“人民经常参加纪念他的逝世和诞生的集会，太劳累了。这次让我们给人民点新东西”，她说她要组织一次歌唱家和音乐家的庆祝会。她曾担心群众大会的参加者不多，而马科斯会对此大作文章。她要求参加集会者带来一些罐头食品和旧衣服送给穷人和政治犯。但人民愿意上街去示威，并且这样做了。7 支队伍从城市周围出发到卢内塔开会，在那里几万人庆祝尼诺伊 52 岁生日。庆祝的方式有：做弥撒、欢呼、放爆竹、歌唱以及齐声欢呼……

科拉松·阿基诺变了，她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女人。她仍旧没有野心，她只是想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尼诺伊想于却没能干成的事业完成一部分。她想成为一个关心社会、关心普天下劳苦人民的有用之人。科拉松的长女鲍尔塞试图解释发生在她母亲身上的这些变化，她说：“很多人不理解我母亲和她面对的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成长中，她经常在厨房操作。她总是同我们在一起。她伯真正任务是为了孩子。她知道她的位置在哪里。但是父亲死后，一切都变了。”

尼诺伊的妹妹也说，“科拉松·阿基诺只有在尼诺伊去世后才变成真正的科拉松·阿基诺。因为尼诺伊去世后，每个人都把注意力转移到她身上。”

人，有时候是通过外部原因而发生变化的。

三、谁来当菲律宾的下一届总统

现在，菲律宾政治人士对总统可能提前进行大选猜测不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马科斯因为健康不佳和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他把预定于 1987 年 6 月的总统选举提前进行。虽然马科斯一再否认，但是整个菲律宾满城风雨。人们确信无误地传说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他的红斑狼疮更加严重地侵害了肾脏，他越来越少地在公共场合上露面。而马科斯最强大的同盟者——美国白宫的主人也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们担心马科斯面临的内外压力使他不能控制共产党的暴动，这将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的空海军基地的稳定。白宫方面恳切地希望马科斯能对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美国参、众两院的委员会在调查菲律宾使用援助资金的情况，并建议政府削减军事援助。国际货币基金也会明确地指出，如果菲律宾不采取行动以促使其经济和政治的稳定，该组织将不提供新的贷款。

现在的问题是，谁将是未来的总统？有消息说马科斯的第一设想是在自己百年之后实行集体领导，让邦邦（马科斯的儿子）当指定的继承人，伊梅尔达当摄政者。马科斯想建立一个马科斯王朝，它将在邦邦和伊梅尔达的统治之下，再由贝尔将军领导的军方联合技术专家组成一个支持群体。将来，第二个故事就开始了，伊梅尔达为了她的利益提出“退休”，然后，将政权交给军方接管。在邦邦担任傀儡领袖的情况下，贝尔将会允许“在秩序已恢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伊梅尔达。但她一直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反感。在马科斯发迹之时，她是一个广受欢迎的竞选活动分子。军事管制时期，她那令人咋舌的巨大开销、极为奇特的私生活和公开议论使她的声望急剧下降。她被认为是“马拉卡南宫中的女狂人”，虽然她极为关心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1979 年马尼拉的《快报》在它星期日出版的杂志《全景》上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内容为谁是这个国家最为敬佩的公民。结果，马拉卡南宫命令停发了这期杂志。虽然马科斯总统名列榜首，但伊梅尔达却排在耶稣基督、尼诺伊·阿基诺和身陷囹圄的菲律宾共产党主席何塞·玛利亚·西森之后。

马科斯曾对一位美国电视采访人说，他的妻子不会接他的班，但是，“真正接我班的人需要她的帮助，否则他将无法接班。”自此以后，有关伊梅尔达担任摄政王的说法就多了起来。菲律宾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邦邦若上台，伊梅尔达则“垂帘听政”。

伊梅尔达也说，“如果我说自己不希望（邦邦）有朝一日当总统，那我是伪君子。每一个母亲都有权希望她的孩子前程远大。”她又详细说明道，“我试图使邦邦多和他父亲在一起，并且坐在一台拖拉机上。他跟随他的父亲去麦格赛堡，并且坐在一架直升飞机上。他现在正在学习柔道、游泳和骑术。”

在尼诺伊谋杀案进行调查之时，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邦邦）正好 25 岁。所有记录都表明他是一个被溺爱的孩子。他先被送往英国学习，后来又到了美国。一位伊梅尔达的菲籍传记作家写道：“他的每一个念头都得到了满足。尽管有一位严厉又公正的英国校长警告说，如果他永远不知道‘不’这个字的含义，他就不具备做艰苦又严肃的学术工作。”

伊梅尔达喜欢拐弯抹角地说邦邦毕业于牛津大学，但实际上他连美国的宾西法尼亚大学都没有读完。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他喜欢枪支、姑娘以

及和贝尔将军的儿子欧文在外面闲逛。欧文是他最好的伙伴、保镖。在一次美国之行中，邦邦因驾车超速在新泽西州被拦住，州警卫队从这位旅行者的座位下面发现一支装有子弹的枪，由于邦邦有外交豁免权，对他的指控才方被撤消。马科斯极力地想让邦邦成为他的继承人，他任命他为菲律宾通讯卫星公司的董事长，而且有权动用钱款。在马科斯政权最后的3个月里，他从公司基金中提走了50万美元。邦邦作为加冕王子的最荣耀的、最叫以得意的的事情，就是尼克松保证他将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菲律宾人。

但在菲律宾，盯着总统宝座的并不是马科斯一个家族。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谈到了菲律宾这个将殊的国家的现状，几十个大家族在国际上都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想在竞选中获胜，为家族和个人带来利益荣誉，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力量都无法和马科斯相抵抗。

在众多的反对阵营中，觊觎总统宝座的也不是一个人。老资格的政治家多伊·劳雷尔和小阿基利诺·皮门特尔便是这其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前者是一些反对党团体的庇护组织——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主席，后者则是合并后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全国主席。在198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两个反对党都曾为各自的候选人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一些席位。

其他有可能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一位是前参议员霍维托·R·萨隆加，他在结束流亡美国的生活后已经回到了菲律宾。他是尼诺伊生前最亲密的顾问，尼诺伊关切地称他是“教授”，另一位是前参议员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她在1984年曾作为马尼拉市的代表当选，进入参议院。

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最大的把握登上总统宝座。由于尼诺伊·阿基诺现在深孚众望，拥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这些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开始努力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他们与尼诺伊，阿基诺关系极为亲密的深刻印象。

例如，多伊·劳雷尔反复列举他与尼诺伊·阿基诺两人曾经做出相同的牺牲和两人经常就一些重大政治问题进行磋商的事情，刻意突出他曾与这位遇害的参议员过从甚密；皮门特尔则不厌其烦地大谈尼诺伊曾说过他相信皮门特尔将是下一位菲律宾的新总统（在马科斯之后）；萨隆加更是到处宣扬说，恰好在他与危诺伊在参议院共事时，他对尼诺伊这位年轻参议员起到过密友和顾问的作用（一种良师益友的关系）。至于埃娃·卡劳，她所强调的是自己曾作为一名“天才的反对党人士”给尼诺伊以帮助，且与尼诺伊沾亲带故。她声称自己从未与乌科斯及其故府有过任何联系。

显而易见，这些反对党的领袖们、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总统的政治家们、都想借助尼诺伊的名字，来赢得那些尼诺伊的崇拜者、曾从尼诺伊那熟为人知的恢宏气度中受益的政党领导人的支持。这时的科拉松·阿基诺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提名作为总统候远人的可能。当时，反对派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各团体之间缺乏团结。整个菲律宾，从南方到北方，小的反对党团多如牛毛，尤其是在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情况重为突出。这些小的反对党团体，几乎都分别隶属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剩下的则拒绝加入这两派而宁愿保持独立。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是一个富有传统的政党，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则侧量于奋斗目标和意识形态，加入该组织首先要经过为期两天深入细致的讨论。所以，要想把以邻为壑、互不相让的劳雷尔和皮门特尔撮合到一起，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儿，何况这两人始终都盯着总统的宝座

但是他们也都把推翻马科斯的统治当作自己党派的目标都希望结束马科斯从 1965 年首次当选总统以来所建立的政权。他们心里都清楚，除非两派联合，否则，推翻马科斯依然是一种妄想和虚无飘渺的幻想。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有一位在威望和力量上都超越自己的领导人的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这样才能解决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使反对派团结一心，共同反对马科斯政府。两派领导人打算先组成一个以前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塞西莉亚·穆尼奥斯·帕尔玛为主席的全国联合委员会，科拉松·阿基诺则是委员会的另一位领导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反对派联盟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多拉选票。

从此，科拉松、阿基诺又开始为竞选总统尽心竭力。她虽然不是候选人，但是，她能够参与聚集潜在的候选人商议出一个选择统一候选人的办法的活动。一些人经常来她家开会、商议问题；最初，她总是默默地听着，很少发言，当与会者们出现争吵时，她就站起来说，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团结。

有一天，前参议员无党派公民领袖洛伦佐·塔纳达特突然对科拉松说，“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全部过程呢？为什么你不当候选人呢？”

科拉松急忙站起来反对说：“我认为我不应该是候选人。”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候选人？我可以尽我的最大努力促进反对派的团结，我认为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反对党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领袖劳雷尔和自由党中保守派领袖尼诺伊的表妹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没有表态。多伊·劳雷尔是尼诺伊青少年时期的好朋友，他的父亲乔斯·P·劳雷尔曾在日本统治时期被提名为总统。小劳雷尔多年来一直在拼命努力，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菲律宾总统。尼诺伊被刺之后，他更加努力地活动。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建立竞选的地方机构。他还试图以建立全国统一会议来挑选候选人的办法，为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恢复首创精神。他非常明智不去当这个会议的主席，因为那样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走进他的设计中，为他当选总统作一个小小的铺垫。

卡劳也是一个“总统狂”，她聪明能干，有丰厚的财富和广泛的交往。但她缺少的是，因为尼诺伊的死而在科拉松身上产生的大众魅力，和劳雷尔那多年参加竞选的经验。

那么，反对派们将选出哪一位去代表他们参加竞选呢？

四、科丽：如果人民要求你参加竞选

现在，众多的反对派领导人等待取代乌科斯的位置。可光有一个全国联合委员会，解决不了反对派众多组织分散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反对派形成不了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整体，取代马科斯就仍旧是一纸空文。经过数月的非正式商谈后，除去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组织和皮门特尔的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外，众多的反对派又成立了一个人民“召集人小组”。小组召集人不是候选人，但是他们能够聚集潜在的候选人商议出选择一个一致的候选人的办法来。它包括工商界人士贾米·古平，翁格平、前参议员无党派公民洛伦佐·塔纳达和科拉松。

同年12月的一天，科拉松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那是远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反对派领袖内普塔利·冈萨雷斯所作。他在文章中建议由科拉松代表反对派参加总统竞选。他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讨，他认为只有科拉松站起来才能终止反对派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

科拉松很不高兴，她去找冈萨雷斯，说：“请停止你这一古怪的念头。”

科拉松的婆婆多纳·奥罗拉问：“现在我们不正在继承尼诺伊的事业，走进政治吗？”

科拉松说：“不，我知道政治是什么。现在我们可以参加集会，集会后可以正常地休息睡觉。如果我是总统，我满脑袋装的都是种种问题，那样，我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睡眠，我永远睡不好觉。”科拉松总认为她更合适于做一个幕后人物。她在圣诞节时访问了几个政治犯，这包括一个造反的牧师，一个前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一个前学院院长。她和他们一起讨论了他们面临的政局。

全国统一会议计划在次年3月份召开。科拉松被邀请前往参加会议，同时，她也想参加劳雷尔控制并组织的全国统一会议。

召集人小组和反对派《团结宣言》的签名者竭力反对她的前往。他们说，在这个会议上，多伊·劳雷尔将宣布他是候选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劳雷尔成立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并不当这个会议主席的原因，就是要当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

自由党右派领袖人乔维托·萨朗加告诉她，“我们只有一只宝石戒指，那就是你。你参加那个会等于把宝石扔掉了。但是，最后的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科拉松深感不快。她前往开会没有其它的目的，她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一条团结的出路。对于人们的反对，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也就是这个全国统一会议，曾试图制定出出席推选候选人全国大会的代表选择办法。会议之后，国会议员和前最高法院法官、担任全国统一会议主席的塞西利娅·穆尼奥斯·帕尔玛，在一次记者圆桌碰头会议上告诉记者们，“如果说有一个能团结反对派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科拉松。如果她同意竞选总统……”这让劳雷尔和他的支持者们特别不快。

科拉松也很恼怒。由于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她感到自己象被人操纵了一样。她不喜欢这样。她总认为人们对待她仍象尼诺伊在世时一样，把她当作是一个只会倒咖啡的女人，即使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对她的朋友说，她更希望人们把她看作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而不仅仅是尼诺伊的遗孀。

科拉松再次出现在召集人小组会议上时，她没有讲稿就发表了一个小时

的演说。她说，“当我参加本小组时，我想我将是促进统一的人。但现在，我发现我只是一个派系中的一部分。如果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退出这个小组，如果你们愿意我留下来，我就要发挥更关键的作用。”她说她总是受人吩咐。当地要想做什么的时候，

总有人来钳制她。她说她对此感到特别的难过。“请注意，你们这些人可能都比我出色，你们可能甚至有95%是对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想听一听我那5%的正确建议？我不愿意你们再钳制我去做本应该去做的事情。你们常说，我对你们很重要。事情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该去做我想做的一切呢？除非我是独立自主的，否则我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她有些动情地说，“我们看来忘记了马科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我们彼此不是敌人。”

科拉松被召集人小组留下来，他们让她去同那个让劳雷尔不快的帕尔玛谈判团结问题，同时拟定出一个挑选候选人的方案。

科拉松得到消息，帕尔玛也得到全国统一会议批准同科拉松商谈同一个问题，此时，马科斯再也不在公共场合上露面了。他患有“流感”，而且是“病毒性的”。科拉松和帕尔玛以及所有的反对派们深感时间越来越紧迫了。科拉松和帕尔玛经过一个月的协商、讨论，最后达成协议：由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良由党、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联合会各选出一名候选人来，然后由上述组织的代表召开会议，推荐出最后人选。科拉松被越来越多的反对党派要求参加竞选。科拉松态度坚定地说，“请你们发发慈悲吧，我该做到的我都已经做到了。如果要评论我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想我做到的比我应做的更多。”召集人会议和全国统一会议开始同意支持单一候选人。劳雷尔请求科拉松接受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科拉松拒绝了。她说这与她努力团结反对派的目的相悖。劳雷尔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一次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有很多传统反对派的支持，所以，他作为候选人的目的很快就能达到。现在，其他党派因为内部矛盾重重而未最后选定他们的代表，但他们表示说，一旦选举时间公布，他们将很快决定他们的人选。可问题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左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变得日益明显。召集大小组决定开会选出一位候选人时，有关各党派却要求扩大选举团体的范围，这包括群众性和部门性的团体。面对这么多的团体，他们又不知道“该向谁去说？”于是，又有一个大组织出现了——全国民主同盟，这其中有尼诺伊·阿基诺家族中的成员。他们集合了许多的团体，他们反对马科斯已有多年，他们掌握进步团体和部门团体的网络系统，而且他们同意反对派中较小的组织分享全国民主同盟的领袖权，左派（也叫国家民主党人或民族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应各占同盟领袖的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是，左派又没有坚守着这个信誉，选进领导圈的左派人数超过执行委员会的半数。温和派马上退出了这个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班迪拉”，这个词在菲律宾语中的意思是“旗帜”。它由已茨·阿基诺领导，这个组织开始赞成科拉松。阿基诺和萨朗加为总统候选人。

科拉松的亲朋好友劝寻她不要被左派所利用。她拒绝了左派和民族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以及民主联盟的邀请在尼诺伊被杀的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演。她说，她已经同意在另一个大会上——班迪拉集会上讲话。在一年前，这几个组织曾经在一起示威游行，而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一起了——这就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特色。他们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都有强大的国际背景，都有一大群可爱的拥护者；他们互不相让，互相

抵制。这时，如果没有一个公众认可的候选人出现，那么，马科斯王朝将继续下去。

科拉松在尼诺伊去世两周年的那天早上，先前往圣多明戈教堂做弥撒，然后就同她的拥护者一起走向马卡蒂公园集会。劳雷尔的讲话一结束，拥护“科丽竞选总统”的旗帜就在马卡蒂集会上空迎风招展。左派的游行队伍穿过城市，参加的人数在2万人到5万人之间。

对此，科拉松并不乐观。她说，“如果温和派不能取胜，我认为很少有希望能和平地移交政权。”

科拉松渐渐地成为反对派竞选总统候选人的目标。人们认识到，只有科丽才能激起反对派的公众信心，她能团结反对派。人们开始对劳雷尔疏远。虽然他在尼诺伊流放期间与其关系密切，但他曾在1978年选举时参加新社会运动竞选，直到1982年才与马科斯断绝来往。他辞去国会议员时说国会没有用，只是一个橡皮图章。人们认为他是一个保守的，传统的政客，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从事政治的人们难道不是个个如此吗？

科拉松走进电台告诉听众们，主张她自己参加竞选同她努力于团结反对派的宗旨是相违背的。“最好不要提我的名字。”她说：“组织起来吧，不是为了科丽·阿基诺，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现在，国家的利益就是请马科斯先生下台，他要为我们所有的困难负责。”她私下对朋友说，“我对于总统知道什么？”她确实确实不想去当那个菲律宾的总统。当有人问起她有关经济计划时，她告诉菲律宾工商协会，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不精通经济学。但是她相信政府对人民应该忠实可靠，要做到收支平衡。一个工商界的朋友告诉她说，“科丽，请勿过低估计自己！”

科拉松的亲朋好友们却加快了她的竞选准备。她的兄弟乔斯·佩平·科胡昂科，尼诺伊的弟弟保罗·阿基诺和她的表兄埃米格迪奥·丁·科胡昂科建文起一个组织的核心，科胡昂科说，“没有让她知道”。他们开始同政治上的朋友接触，筛选决定各省协调人名单，编制财务计划，建立基本的情报和安全机制。

在这个组织开会时，科拉松有几次走进科胡昂科的办公室，他们想躲开她，但是他们感到她已经知道了什么。

又有人向科拉松提出参加竞选总统的事情，在尼诺伊·阿基诺基金会理事会上，报纸发行人乔昆·切诺、罗切斯对她说，“如果你不当候选人，人民若需要你，你就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当候选人。”

她开始沉默不语。

罗切斯接着问，“假如人民需要你去当候选人，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呢？”

科拉松抬起头，问：“我怎么知道人民需要我去参加竞选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科拉松说者无心，听者却十分在意。就在谈这件事情不久的一天，有五六个人在马尼拉湾的一个小茶馆里呷咖啡谈论政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政治领袖，没有一个是与团体候选人有关的人物。罗切斯曾经同尼诺伊囚禁在一起，他只是报纸的发行人。还有一个前银行行长、一个饭店顾问和一些商人。他们愿意科拉松竞选总统而且想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在一起商议，要发动一次“征集要求科丽·侧基诺竞选总统的签名”的运动。他们要征集100万人，以此来说服科拉松参加竞选。

“征集要求科丽·阿基诺竞选总统的签名”的运动很快就在菲律宾全国开展起来。倡议者把该运动的总部设在普莱伍德工业大楼（该楼是罗切斯兄

弟所有），并派出人员在离开教堂的人群中、在市场的顾客中、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候车站等车的上下班的职工中征集签名……

劳雷尔来找科拉松，问这是怎么回事？

科拉松说，她没有鼓励人们这样去做！

当人们问起科拉松，他们应不应该在征集书上签名时，她告诉大家：“我的家族和朋友都没有签名。”

在宣布签名运动一星期后，科拉松在世纪公园希尔顿饭店作了一次讲话。她谈话的内容仍旧是“我作为妻子、母亲和担负双亲责任的任务”。妇女们向她，是否想要竞选总统？她说，她不追求任何政治职位。她没有说她是不是要去竞选总统，她说这个问题她现在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

“如果有一个签名运动，你该如何看待？”

“科拉松说：“这个国家没有过签名这样的事情，只有台风和狂风。”她风趣地说，她可能去参加竞选，但事先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马科斯宣布仓促选举，一是签名运动征集了100万人同意她为候选人。

科拉松一直以为人民害怕签名，而100万是难于达到的。

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菲律宾民主党——人民斗争和班迪拉都宣布她为他们的提名人选。她感到很不安。走到科胡昂科的办公大楼，她看到她的亲人们组成的半秘密运动小组正在开会，她问，“填报候选人证书时是否把所得税也一起报上？”但科拉松的儿女们不愿意他们的母亲去参加竞选，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母亲像父亲一样成为政治的殉难者。

科拉松走进了迷茫之中，她不知所措。100万的签名运动已经结束，比预料中的结果还要好。

1984年的10月份，美国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代表里根总统拜访了马科斯，在透露出来的消息中，证明马科斯已经决定提前举行选举，美国人非常赞成他的决定。

11月2日晚上，科拉松·阿基诺在看《福尔肯·克雷斯特》和《王朝》的录相带，想让自己轻松一下就睡觉。她服用了一些抗敏药上床躺下。那天夜里她睡得不多。鲍尔塞在午夜一点半钟叫醒她说，有人从旧金山打来电话，马科斯接见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并回答了她的采访，他告诉美国观众，他将下令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接着，帕尔玛在早上也来电话说，她要召开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会议。那一天，科拉松记得是“如此混乱，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又参加了一个会议。我感到我再也不能够逃避越来越难以逃避的现实。”

但是，科拉松还是没有更大的信心去竞选总统。有些人给她看了一个调查的结果，它说明菲律宾现社会中的很多人并不理解正义和自由的概念，他们关心的就是就业、住房和食物。她想，“我的上帝，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人民？”她请求一个牧师答复这个问题。她不知道人民是否理解是马科斯引起了他们的痛苦，而现在反对派可以给他们较好的生活。这位牧师告诉她，有必要把正义和自由之类的概念用具体形象告诉人民，所以候选人必须要有与马科斯完全不同的形象。

科拉松同时也意识到：她必须果断地作出选择，马科斯用近20年的时间营造的强大权力机构，有很多办法能击败主在为推选候选人而争论不休的各个反对派组织，而现在要想把反对派象预期想象的那样团结在一起的希望相当渺茫。科拉松觉得她应该参加竞选，不然的话，她会谴责自己不去尝试。

科拉松静静地在“永远敬慕”女修道院竹石花姐妹会那里。她为马科斯和劳雷尔祈祷，为与暗杀尼诺伊有关的人祈祷。由于作为候选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召集人小组已经停止请她参加会议。此时，他们在反对派经常召集会议的菲律宾俱乐部（这是个反对派的传统中心，曾是19世纪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之家）开会，一致通过科拉松·阿基诺作为反对派召集人小组各党派的候选人。

科拉松去见婆婆多纳·奥罗拉，她告诉婆婆说，她决定参加竞选。如果她不接受这场挑战，她将永远不能宽恕自己。“我知道马科斯不会让我们取胜，但我仍然想试一试。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挑战，现在我觉得不能逃避。”

此时，她觉得轻松至极。她内心清澈，她知道她在参加竞选之前要解决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劳雷尔。

五、与多伊·劳雷尔一起宣布参加竞选

政治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而参与政治较量的人与人之间，更是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他们好象都是在为一个目标奋斗，可关键时刻又走得很远。科拉松和劳雷尔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中。

不论人们怎样说，劳雷尔都是尼诺伊最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长大，他们一起竞选总统，尼诺伊在美国期间，人们对劳雷尔有种种议论，但尼诺伊说，我们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战斗。如果我能当上总统，那么多伊·劳雷尔就是副总统；如果他能竞选成功当上总统，我愿意作他的副手，帮助他。尼诺伊死后，劳雷尔组织菲律宾人民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悼念活动和反对马科斯专制政府的抗议游行活动。现在，问题出现了，总统的座位只有一个，尼诺伊的妻子和劳雷尔都想得到这个宝座，怎么办？

科拉松决定和劳雷尔谈一谈她的设想。劳雷尔去了美国，向华盛顿官员和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说明选举的事情。11月23日，劳雷尔回国，科拉松和她的婆婆多纳·奥罗拉、尼诺伊的兄弟巴茨等人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他。那天夜里，他们在泰晤士街谈了许久。他们讨论菲律宾的政治形势和他们今后的工作。他们达成协议，将互相商议他们各自的行动。

科拉松告诉劳雷尔，她已经把事情想得很透，候选人既要有道德上的领袖能力，又要清楚地意识到他将是马科斯政权下的又一个牺牲者。然后，她对劳雷尔说：“多伊，我希望我们不要争吵了，因为我们的争吵会使我的婆婆十分不安。她常常提醒我，阿基诺家和劳雷尔一直有长期友好的关系，而且我记得，尼诺伊告诉过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学和朋友们遗弃你们两人时，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友好。”她说，今后几周出现的事情是对他们的友谊和意志的一个考验。“多伊，我真的很在宣布参加竞选了！”

劳雷尔说，“以前我问过你有没有兴趣竞选，而你说没有。现在，我已经做完了所有的组织工作……”劳雷尔不想再说什么，他觉得说什么都毫无意义了。

科拉松还不愿意让劳雷尔作她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竞选。她认为劳雷尔在道德上不符合进行竞选所必须的标准。但是她的顾问们告诉她，她必须接受劳雷尔，因为他在竞选上有一套组织方法。

劳雷尔也并不想竞选副总统，他的目标就是总统。他在他的全国统一会议上，对曾经提议让科拉松成为候选人的帕尔玛大发雷霆，他大声斥责帕尔玛是个独裁者。他说他怀疑她的忠诚。他想象她会保持中立，但是他得到的消息却是她为科拉松尽力。党派的排列次序对于一个一心要在政治权力中寻找前程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占支配地位的反对党有权利指定选票监视人，这是一项重要的组织信赖设施，它为当地的领导人提供威望和保护他们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反对派信任他人计算他们的票数的行为是忠诚的。

科拉松听说此事后感到很难过。她去探望帕尔玛，这件事对她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她说，“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当总统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选劳雷尔做候选人的理由。”科拉松告诉她的亲朋好友们，决定参加总统竞选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巨大的责任使我害怕”，她说。“我感到它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我的肩上，我不能也不愿摔掉它。”也许就是这个多伊·劳雷尔，让她久久不能安静下来。她总是做梦，这时，她又一次来到修道院，她祈求上帝给她指引：“因为我面临这个巨大的问题，

我需要神的引导。”

她犹豫不定，头脑里重现梦境。她梦见自己未到了一个教堂，并向她认为是装着尼诺伊躯体的棺木探视，但是，里面是空空的。她相信尼诺伊在她身上重生。

她最后决定参加竞选。她走到家人中告诉他们她下决心参加竞选，绝不退却，她说，“我们必须提出某一个受难者。我也许不算坏，但是我现在最著名。”

很快，“人民斗争”宣布它支持科拉松为候选人。

5天之后，科拉松去见劳雷尔，告诉他她决定参加竞选并决不退却。

接着，科拉松的支持者们开始指责劳雷尔过分野心勃勃和渴望权力，与马科斯相差无几，从此，科拉松和劳雷尔的矛盾冲突变得激烈起来。劳雷尔的支持者反击说，科拉松缺乏经验不适合当总统。科拉松的顾问们与她统一了观点，认为劳雷尔已经不应当作她的共同竞选人了。……

于是，马科斯还没有宣布自己退出总统席位，竞争总统的人们又开始了一场战争。有一些人认为反对派中最有可能成为总统的两个人，将在互相残杀中伤痕累累，最后渔翁得利——马科斯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走上总统宝座。还有一些人认为，劳雷尔将凭借他多年竞选总统的经验把科拉松打倒在地，更多的人开始觊觎时机，暗地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便东山再起。

帕尔玛劝科拉松把劳雷尔作为她的副总统候选人，科拉松没有表示反对，她开始意识到政治斗争有时是需要讲究一些策略的。

在科拉松 100 万人支持音的签名册正式呈交仪式举行之时。科拉松再一次去见劳雷尔。她说，“多伊，我知道你很难接受我的竞选现实，因为我是一个妇女。但是，公众的感觉是，我能得到比你更多的选票。”这时，她向劳雷尔正式提出，他能否作为她的副总统候选人。劳雷尔说他要考虑一下。

科拉松走进了教堂。她作祈祷。她告诉尼诺伊和上布，“如果你们在考验我，我正要你们知道我将要被打垮了。我一直在接受这些考验。现在，你们最好来帮帮我。”她说 100 万人的签名令人兴奋和愉快。她要好好感谢她的支持者们。她告诉尼诺伊说，“如果我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我今晚站在你们面前会感到无比幸福。但是我不是那种政治家，当我想到困难的日子正在前头时，我就紧张不安……”她慢慢地起身向教堂外望去。

教堂外，人声鼎沸，4000 群众举着黄色的旗子和标语牌，标语牌上写着“我们爱科丽”和“科丽，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的词语。科拉松面对着激动不已的群众说，她将在法令签署之后作出决定。“请你们放心，你们会听到你们愿意听到的消息的！”

一片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掌声回荡在教堂上空。人们高喊着“科丽，科丽，科丽！”人们紧紧地围着她，触摸着她，同她握手。在走向她的泰晤士街住所的路上，烛光驱走了黑暗。她到家后，人们把用黄色带子缚着的签名册正式呈交给了科拉松。

菲律宾法庭再一次开庭，宣布贝尔和其他 25 人谋杀罪不成立，予以撤诉，法庭坚决认为是罗兰多·加尔曼枪杀了尼诺伊。又有上千的人们走向街头，谴责这项判决。标语牌上写着“我们不会忘记和原谅杀害尼诺伊的凶手”，并在马科斯的照片下与上“第一号嫌疑犯”的字样。另一组游行队伍走向马拉卡南宫，在通往总统府的桥堍上焚烧马科斯的模拟像。抗议者敲打锅罐和燃放爆竹，汽车拖着马口铁罐子，燃烧的车胎照亮了街道。

科拉松不再犹豫了。她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我认为第一号嫌疑犯是马科斯先生。因为那些被告人中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这样，我就不太关心那些人中是一个人还是全体宣告无罪。”她说，这判决证明她不参加调查是正确的。贝尔先生在被起诉后已经停职，但是马科斯立刻又把他召回并宣布军方改组。所谓改组当然仅是装装门面的事情。

马科斯对宣判之后的菲律宾人民的呼声的反映是，宣布进行总统的提前选举，时间是1986年2月7日为选举日。

科拉松扎人转告劳雷尔，她将宣布竞选总统！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1985年12月3日，在马卡蒂的蒙德拉很大楼（这是一座现代化白色水泥和玻璃结构的办公楼，它为科拉松的一个支持者所有。）科拉松步履平稳地走向讲台，她宣布，她决定顺从人民的意愿参加总统竞选。她说，竞选的关键是信任，这一点马科斯没有。

有人问她的竞选条件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也许将给多于100万的菲律宾人以希望，这就是我能带来改革。”

有人说她并没有太多的经验，该怎么办？

她说，这是真的，她的确缺乏训练，但这不是主要问题。马科斯是一个非常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给菲律宾人民带来了什么？她说她将尊重美军基地存在到1991年的协议，但是她要做到基地最终撤消和不允许有其他外国基地设立在菲律宾国土上。“谁知道从现在到1991年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宁愿等待事态的发展并按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我不愿使我的立场太呆板。”

她说她的经济计划的目的是解决饥饿和贫困。她要努力建立起可靠和正直的形象，以吸引本国和外国投资。

她说，她希望说服反叛者回来并抛弃以武装作为达到改革的手段。“他们必须做到的是保证对共和国忠诚并斥责一切形式的暴力。”

在回答问题时，科拉松说，她已经请劳雷尔先生作为她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商讨之中。”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下面群众的反映。她注意到，每当一个问题提出来时，支持她的反对派领袖们都显得十分的紧张，她觉得他们如果有可能冲到台上递张纸条帮帮她的话，他们一定会奋不顾身的。当她完满地回答成功一个问题时，他们都如释重负。她告诉自己，她一定要做得更好些。她终于回答完了全部问题。台下一片掌声、欢呼声。她看了看反对派的领袖们，他们都放下了刚才那种紧张的情绪，和群众一起呼喊起“科丽，科丽！”

劳雷尔找到了科拉松，他们继续谈起关于反对派单一候选人的问题。劳雷尔对科拉松宣布自己为反对派的候选人感到不可理解，科拉松说，她的宣布并没有损害他们在竞选问题上合作的诚意。但劳雷尔还是很愤怒，因为他听说科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他看重的是副总统的职位。他没有再与科拉松继续谈下去。

反对派中的工商界人士、政治领袖和其他一些人力图缓和劳雷尔与科拉松之间的关系。这时，支持反对派的美国人也出面对劳雷尔施加压力，要他接受第二号职位——最初华盛顿是支持他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由于菲律宾人民选举科拉松，他们的态度也渐渐地转到了科拉松。

劳雷尔找到了科拉松的竞选顾问索克·罗德里戈，他提出他已经不知所措，他想把事情交给上帝。“让我们去见红衣主教，给他两张纸片，一张写

‘总统’，另一张写‘副总统’。然后我们跪下祷告，由抽签决定谁为总统候选人。”

罗德里戈把劳雷尔的这一计划转告给科拉松。

科拉松笑了笑说，“我的上帝，在这样事情上我们为何要抽签呢？”

科拉松又去找劳雷尔，劳雷尔终于同意竞选副总统。

紧接着，科拉松在科胡昂科大楼召集“人民斗争”领袖人士举行午餐会议，她宣布：“我同多伊·劳雷尔想邀请你们出席12月8日在劳雷尔的兄弟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届时，我们将宣布你们一直期待的声明。”

但问题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就在那天的早上，巴茨·阿基诺在伊斯兰组织开会前说了一段话。有人问他劳雷尔和科拉松是否达成了协议，巴茨说，很可能有一份阿基诺——劳雷尔的联合竞选人名单。

劳雷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在此之前，他曾独自去他的家乡的一座海滨住所休息，他的计划，还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是在巴茨宣布之前就计划好的了。他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后急忙赶回，一到家就看见满屋都是担忧的同党人。他怒气冲天，大骂报纸说他已经同意接受副总统候选人“纯属猜测”和“恶意中伤”。他的党的领导人要求他，如果他接受第二号地位的话，他还是设法取得明确的条件为好，如官职和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名额。

劳雷尔再一次去找科拉松。他要作最后的努力，他为此已经奋斗了许多年，他的确不能就这样放弃总统的竞选，这对他一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他来了科拉松，心平气和地要她同意竞选他的副总统。但科拉松坚决地回绝了他。她说她决不让步。劳雷尔退一步说，如果她要竞选总统成功，他能否要求担任总理并由他选择内阁成员？他要四分之一的内阁职位给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人，所有任命都要与他商榷。他要求科拉松必须尊重他承诺的1986年地方选举提名，如果仓促选举取消了，科拉松要保证在正规选举中同意他竞选总统。

科拉松在凌晨两点打电话给召集人小组的秘书伊曼纽尔·诺伊亚·索里亚诺：“我要求你电话通知我们所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每一个人，并告诉他们不要去了，因为我也不去了。理由我在今日上午稍晚时候给予解释。”

早上7点，科拉松和索克·罗德里戈去劳雷尔的家。

科拉松问劳雷尔，“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在你要竞选前告诉我？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我，你有责任作为候选人，我就不会卷进去了。事实上，我问过你，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置身一边。但是你说你没有。”劳雷尔谴责道，并再一次提出：“我现在要求你以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名义去竞选。因为它是有机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反对派的唯一政党。”

科拉松极其果断地说，她不需要任何政党。她要超越各党各派。

劳雷尔进一步地说：“我所求你的是把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加在你的候选人证书上。在你的旗帜上，你可以加上你所要加的政党。”

“不，我绝不同意这样！”

科拉松与劳雷尔就这样决裂了。

劳雷尔在无线电台发表了讲话。他说，科拉松开始同意以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名义参加竞选，这样就有几个副总统候选人声称支持她。这是唯一保证她竞选成功的途径。几个党派的票数加在一起将会给她带来很多的支

持者。但是不知为什么，她把诺言收回了……

科拉松一个一个地告诉她的顾问们，事情并不象他劳雷尔所说的那样。劳雷尔要求她科拉松做到一系列事情，“倘若我接受了，菲律宾的总统就是他劳雷尔。”“这难道不是在敲诈我们？”科拉松的顾问们也感到万分愤慨，但他们认为这时的关键仍旧是在竞选中获得成功。他们要科拉松同意劳雷尔的内阁职位的要求，答应他尽最大努力地给他当总理。但这个职位要国会最后决定。他们要科拉松答应劳雷尔保证给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 30%的内阁席位，但人选必须是可以接受的。对于下层较低官员的任命上，必须进行磋商。科拉松的顾问同意她可以不参加正规选举，但拒绝其它要求。

科拉松再次感到了绝望：“生存还是死亡”，这个莎士比亚的名句再一次出现在脑海中。顺其自然，这很容易，但她不愿如此。一切都顺其自然，上帝造就我们做什么？走下去，一定要走下去！

科拉松面对她的顾问们说，“我大概要多谢诸位的好意。请记住，我拥有权力解决我和多伊·劳雷尔之间的问题。我相信我会和劳雷尔达成协议的。”

科拉松走出去，对等候在外许久的记者说，她谢绝了作为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候选人去竞选，因为“人民斗争”已经同意提名她为候选人。现在，“人民斗争”希望和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携起手来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可是，劳雷尔又不同意这个美妙的新建议。他说，选举法禁止候选人以两个政党的名义竞选。他宣称，科拉松·阿基诺必须成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一举动，连他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秘书长都认为“多伊过头了”。

夜，静静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在无声地眨着眼睛。科拉松驱车来到红衣主教的白色别墅，来拜访菲律宾宗教界的头面人物。她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说：“阁下，我为此事作过祈祷。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去竞选总统。尼诺伊生前曾鼓励我，希望我做任何事情都要坚决、彻底。我现在别无选择。”

红衣主教告诉科拉松，“我愿知道你凭什么条件进行竞选？你有政治机构吗？”

科拉松说她没有。

红衣主教问，“你将同谁一起竞选？”

科拉松说，她不能同多伊劳雷尔一起竞选。

红衣主教说：“科丽，你不能一个人进行竞选。你只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你没有政党，没有选票监督人，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机构。你必须要用一个政党来参加竞选，只有这样你才有一个机构。不要太固执了，不要做愚蠢的事情——还没有去竞选，就让法规和政策宣布了你的失败。你下那么大的决心去参加竞选，你难道愿意因为固执而葬送你的竞选前程？”

科拉松豁然明朗。她向红衣主教点点头，说：“阁下，我来之前就打定主意，不管你说怎样，我都会照你说的去做。”

劳雷尔在 12 月 9 日星期一提出候选人的申请书。他指责科拉松的顾问们使谈判失败。他说，“如果她来单独谈判，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劳雷尔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科拉松的顾问塔纳达·萨朗和菲律宾民主力量——“人民斗争”领导人阿基利诺·皮门特尔，都阻止她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名义下竞选，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想当她的竞选伙伴。劳雷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矛盾的关键所在之后，又说，他的和解大门仍然开着，并愿

意指派代表与科拉松会晤，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科拉松也在两天之后提交了她的候选人申请书。

现在，双方都在窥视着、等待着对自己一方有利的时机。

就在这时，马科斯的新社会运动举行会议。在冷冷清清的气氛中，他们很快就选出了阿图罗·图林·托伦提诺作为马科斯的副总统竞选伙伴。马科斯是在加强他选举阵容的威信。托伦提诺曾经是国会参议员，又是198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在马尼拉获胜的唯一新社会运动的候选人。同年6月，马科斯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但9个月后，他因为公开批评总统及其政策而被撤职。他享有宪法学家的良好声誉。马科斯认为他可能在马尼拉拉到选票，而马尼拉居住着20%的选民。托伦提诺假若能和马科斯站到一条战线上，只能对马科斯有利而对他马科斯又形成不了威胁。

六、和劳雷尔握手言和

科拉松与劳雷尔最终被确定为反对派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同时，反对派内部的矛盾开始在这两个人中间展开了。

劳雷尔有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支持，该组织庇护国民党（劳雷尔派）和自由党（卡劳派），被认为是能控制全国联合委员会这样的“所有反对党团体、派别的最大联合组织”。由于帕尔玛在竞选总统问题上提出由科拉松作为总统候选人，与劳雷尔发生争执而辞职，全国联合委员会主席经过一番讨论、筛选，最后确定由前参议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戈接替帕尔玛出任主席。

为了确保劳雷尔能成为所有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全国联合委员会要求在12月8日举行一次全国性政治集会。但科拉松的支持者们拒绝参加这个集会。并强调说，科拉松·阿基诺应当凭借人民的征召，而不是依靠一次全国性的政治集会来获得提名。他们认为，这次由全国联合委员会呼吁召开的集会，实际上是鼓动人们投票支持其他候选人，对阿基诺夫人并非有利，正如奥斯米纳指责的那样，“全国联合委员会原来的选举原则已被改得有利于其他候选人了。”

科拉松有国家力量党联盟支持。这个联盟由一个主要政党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自由党的一派（萨隆加派），召集人小组、新爱国联盟以及一些诸如“为精神与目标的人民团结组织”这样侧重于奋斗目标的集团所组成。此外，还有9个地方党派支持该联盟：三宝颜关心民众组织、棉兰老联盟、布拉于解放全国联盟、比科尔萨诺组织、中吕宋尼诺伊战斗组织、基督教社会民主党、穆斯林联邦党等。为了指导和组织科拉松的竞选，支持她的联盟组织了一个竞选指导委员会，前议员萨隆加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主要负责成员还有洛伦佐·塔纳达和法官帕尔玛；前参议员约翰·奥斯米纳——副主席、伊曼纽尔·索里亚诺——负责国内事务的副主席、特奥皮斯托·吉尼戈纳——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阿加皮托·阿基诺——委员会秘书长；玛丽·康塞普西翁·鲍蒂斯塔——委员会司库。此外，委员会还云集着代表全国各政治派别的反对党领导人。

支持科拉松的联盟，在反对科拉松联盟参加全国性政治集会外，还不同意科拉松选择劳雷尔作为她的竞选伙伴。他们认为，劳雷尔从前与马科斯的新社会运动有着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他的家族与马科斯家族的友谊更是源远流长。为此，劳雷尔的名声已不那么好听。此外，他们还觉得劳雷尔是从那种传统政治家模式中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其发展将有损于反对党联盟在联合声明中已经明确的许多原则。

很明显，为了争取提名，一场劳雷尔对阿基诺夫人或阿基诺夫人对劳雷尔的战斗已经在所难免。为此，在基层发动、组织竞选的同时，科拉松的支持者们又开始掀起了一场大造舆论的浪潮。现在，劳雷尔阵营由于劳雷尔同德高望众的塞西莉亚·穆尼奥斯·帕尔玛发生激烈争吵而大大动摇。劳雷尔正在试图笼络、稳住支持他的30名国民议会议员。而科拉松则能够依靠大约20名国民议会议员。这些人希望成为她的同情者，可以继续劝诱劳雷尔的支持者转变立场。

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形势对科拉松·阿基诺有利。同情劳雷尔的人对科拉松表示出了极大的不信任。他们认为，科拉松在某些商业和政界领袖于幕

后为她准备和制定纲领的情况下走入竞选，实际上她一直是在佯装一位政治上的门外汉。他们甚至断定，当初科拉松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竞选推举，之所以在宣布接受前坚持那两项先决条件，其实都是在作冠冕堂皇的表演给人们看。说到底，是她为从劳雷尔手中夺得反对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采取的综合战术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场施展权术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就连帕

尔玛辞去全国联合委员会主席职务一事，也被他们认为是科拉松竞选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是一种旨在提高她获胜机遇而使劳雷尔丢脸的拆台战术——劳雷尔的支持者只有诋毁科拉松所独具的、无可争辩的和广为人知的突出优点：道德上的纯洁，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就在反对党内部四分五裂、争吵不休时，执政的新社会运动党宣布了它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这才使反对党各派意识到，再争论下去，就意味着实力强大的马科斯——托伦提诺联盟将赢得这次大选的胜利。科拉松不想再与劳雷尔争执下去了，她找到了劳雷尔。

现在，在更深意义上说，他们两人都必须为推翻马科斯的统治作出重大的个人牺牲。

就劳雷尔而言，这意味着他将放弃一次最有希望成为国家总统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已经付出了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如同尼诺伊一样，他盯着总统宝座也有很多年了。人们都看到了，在以往竞选中，劳雷尔为了争取获得全国范围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总统候选人资格，曾横穿菲律宾群岛四处奔波演讲，而这仅是他为了使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这个国家头号人物所进行的突击战式的准备。他的让步，表明他以往所作的全部努力，包括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都将付之东流。

而科拉松·阿基诺，在同意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旗帜下，而不是在自己的国家力量党的旗帜下去竞选总统，也是一个巨大的牺牲。有人也把它称作是政治赌博。在党内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来看，她的这种作法就是一种投降，是屈服和妥协的权宜之计，所以他们认为她同一般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政治家们并无两样。科拉松·阿基诺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同时也把自己政治上纯洁的形象给扭曲了。从此以后，她的形象同传统的政治家一样了，其生存和取胜能力，是与其独断专行、韬光养晦、幕后交易和玩弄骗局的手段高低来衡量了。此外，她将不得不同来自党内那些反对劳雷尔的人，特别是那些资历较深的政治家的阻力作顽强的斗争。

科拉松事后说，“许多为我担心的人不能理解的是，究竟为什么政党和组织的利益将对我们为反对马科斯政权而真正联合组成一支强大兵团构成某种严重的障碍……我得出结论，即尽管各个党派的政治利益显然是重要的，但在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菲律宾人民的利益就变得更为重要，而且远远超过了这些党派的利益。”

同时，马尼拉红衣大主教海梅·辛也扮演了政治上的丘比特的角色，为这一政治“联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2月11日的早上，天空晴朗。临近在卢内塔举行圣母玛利亚年礼拜式时，一直隐居在平克修女赫门迪修道院的科拉松·阿基诺对主教大人说：“参加总统的竞选，也许是上帝的旨意，我已别无选择。”

“很好，”红衣主教海梅·辛说：“请跪下，我祝福你。”

后来，这位红衣主教回忆道：

我问她：“你打算去卢内塔游玩、散心吗？”

她说：“不，我打算去参加竞选。我丈夫在鼓舞、激励着我。”

我告诉她，“假如你和多伊联合起来，你们就能胜利。但如果你们不联合，那么等待你们的将是失败，而且这样去参加竞选是愚蠢的。”

“其次，我认为你能获胜。首先，你是一位妇女，而在你面前失败对于马科斯来说是十分丢脸的。但这是上帝的旨意——挫败强者，因为你是圣女贞德。”

于是，她双眼微合，跪在我面前。我为她祈求上帝的赐福和保佑。我说：“科丽，以上帝、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义，你会成功的。”

劳雷尔稍晚一会儿也来找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对他说，“你有政治家的手腕，却没有光彩照人的吸引力，没有人愿意投你的票。这一点，科丽比你强。她是非正义的受害者。人民同情她，对她抱有很大的希望。与科丽一起竞选吧，你将会取胜的。”劳雷尔没有说话。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红衣主教轻轻地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必须克服你的骄傲心理。今夜 12 点是最后期限。现在出去走走，然后再作决定。”

晚上 7 时，劳雷尔和他的兄弟——前众院议长乔斯·B·劳雷尔和前驻日大使乔斯·劳雷尔第三，他们一起来到科拉松的婆婆多纳·奥罗拉的住所。科拉松和她的兄弟佩平也如期赶到。他们和多纳·奥罗拉一起交谈了 30 分钟，以前的所有恩恩怨怨都化为乌有。科拉松同意在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旗帜下竞选。而劳雷尔也表示愿意作为科拉松的竞选伙伴，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关于条件，他们都说以后再谈。接着，他们开起了玩笑。他们的亲朋好友陆续赶来，由衷地祝贺阿基诺家族和劳雷尔家族又在共同的目标上走到一起来——此时此刻，离总统候选人报名截止日期仅有一个半小时。

第五章 一场龙争虎斗——领袖权位战

在这里，我非常想回忆一下菲律宾过去的一段往事。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菲律宾沦陷之后，日本人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马尼拉。他们烧杀抢夺，使菲律宾社会很快又形成了两种势力：一是亲日派，一是反日派。由于日本人的惨无人道，激起了反日派的极大愤慨。他们躲到暗处，见到日本人就杀，见到亲日的菲律宾上层通敌者也不手软。他们的反击也是惨绝人寰的。

于是，日本人便迫不及待地组织一个傀儡政府。老劳雷尔便是他们看中的人选之一。1943年6月6日，反日武装乘老劳雷尔打高尔夫球之际，开枪打倒了他。

老劳雷尔伤势很重，一颗子弹从他的心脏旁边擦过，另一颗擦过他的肝部，还有一颗击中他的锁骨。最后一颗子弹按照他儿子小劳雷尔的说法，“打中了睾丸的下方”。老劳雷尔在马尼拉总医院卧床7个星期。这家医院已被日本人接收，作为治疗日军军官的医院，它对老劳雷尔来说是非常安全的。日本专家从东京飞抵这里抢救老劳雷尔。

老劳雷尔侥幸逃生，因祸得福，颇为日本人欣赏。这时，日本人虽然发现何塞·巴尔加斯作为日本人傀儡政府的首脑显得太软弱，但是，抢在美国人前宣布菲律宾独立事关重要——这是赢得菲律宾人广泛支持的唯一办法，而且这个总统必须是非菲律宾人。除了那位软弱的何塞·巴尔加斯，日本人还在菲律宾成立了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党，叫“卡利巴比”。这其中有3个人比较受日本人的青睐，一个就是尼诺伊的父亲贝尼格诺·阿基诺；一个是何塞·劳雷尔（老劳雷尔）；最后一个是曼努埃尔·罗哈斯。罗哈斯是战前一代精英人物中最年轻、最受欢迎的一位。日本人想让他担任独立后的菲律宾第一任总统。但是，罗哈斯声称他患有冠状动脉症。日本人只好将目光移到下一位候选人——老劳雷尔身上。企图谋杀老劳雷尔这件事让日本人确信他们是他们的人。

老劳雷尔出院后，担任了日本人支持下的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总统。这也是劳雷尔家族最辉煌的篇章。

日本人投降之后，老劳雷尔和贝尼格诺·阿基诺一起被美国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日本抓回投进监狱。大概从那时起，劳雷尔家族和阿基诺家族的后代们就为再度家族的辉煌不懈地奋斗着。当尼诺伊为了这一辉煌献出生命，那辉煌的机会对劳雷尔来说就落到他一个人的身上，放弃机会对劳雷尔来说是何等的艰难！阿基诺家族的科拉松拥有这次机会是何等的不容易！

当科拉松作为反对派的候选人准备竞选时，当她肩负菲律宾人民重望的同时，也肩负着劳雷尔和阿基诺两个家族两代人的重托。她能最后取得胜利吗？

一、恩里莱和他的军队改革运动正在准备发动政变

科拉松与劳雷尔达成协议的第二天，便开始了她真正的竞选活动。她大概还不知道这其中的艰辛，就与她的顾问团、她的支持者们和劳雷尔的“同盟军”们乘坐一长列车从马尼拉劳雷尔家的院子出发，驶到八打雁省——劳雷尔的出生地，停下来做弥撒。劳雷尔的支持者们没有时间制做一面新旗帜。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绿色的党旗上写着的“劳雷尔当总统”的字样，现在加上了一个“副”字。它很粗糙，一看就是后来加上去的。

科拉松和劳雷尔的亲友、同伙们做完弥撒就分头行动。他们以各自的车队和团体，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讲演，以声势浩大的气魄震撼整个菲律宾。科拉松和劳雷尔大概还不知道，这时，还有一股力量在窥视着总统宝座，那就是拉莫斯和恩里莱领导的军人“改革武装力量运动”。

它成立于菲律宾军队中。数年来，马科斯在军官队伍里塞进了数以千计的亲信，这就造成了军队内部矛盾日益增多、尖锐，并且复杂的状况。通过关系被提升的军官对上为他们的主子卖命，并利用职权在下又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士兵们被指使去参与选举中的舞弊，殴打、威胁反对派，逮捕、拷打、处决各阶层持不同政见的人士的活动。虽然军队中的卫道士顽固地坚持说，只有穆斯林和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才使用酷刑，军队是不会这样干的。但是，批评军队的人却列举了无数个军队使用酷刑的实例。装备精良的菲律宾武装在军事上过于无能，他们手持现代化武器却仍然对付不了新人民军和共产党的武装。他们必须借助于美国兰斯代尔式的恐怖手段。虐待狂和精神错乱式的恐怖行为，已经成为数十年来菲律宾风光的组成部分之一。马科斯政府纵容和鼓励这种恐怖手段，因为它可以用来恐吓反对派。除非有一个长时间的全国运动或激烈动荡帮助起建立一套新的道德标准，否则，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将继续下去。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残忍。但在军队中还是有许多有良知的官兵，还有一些不甘忍受马科斯统治的指挥官，自从军事管制以来就开始秘密串联，其中大部分是职业军人，他们大部毕业于菲律宾军事学院，并在欧洲或美国接受过进一步的培训。他们自称为军队改革运动组织。

很快，美国的五角大楼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了这一情况。经过周密的调查，美国人开始在这军队改革运动组织中又动上了脑筋。他们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谈到了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安全利益的全景。最终归结为两大问题：美国是保留其在菲律宾基地并冒着陷入“另一个越南”的风险，还是在关岛或雅浦岛另建基地？如果美国保留其在菲律宾的基地，尼诺伊·阿基诺的枪杀使贝尔一伙已经无法控制军队的局面，那么就只有利用军队改革运动来掌权。

在菲律宾，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军队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谁控制了军队，谁就决定了未来。所以，菲律宾出现了贝尔将军必须体面地离职（美国曾劝告马科斯让贝尔离职，马科斯以尼诺伊案件正在查处之中为理由，暂停了贝尔将军的职务，但没有多久，贝尔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职位上。这当然是后话），他的属下必须保持中立的情况。中央情报局在军队改革运动组织内部、外部都有其影响力，它将以此来操纵军队改革运动去完成夺权任务。军队改革运动在军界的主要代表是拉莫斯中将。他负责指挥马尼拉地区和全国警察力量，同时还是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拉莫斯中将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

军官、可靠的亲美人士。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政界主要人士是恩里莱，他是马科斯总统的亲密盟友。许多人认为他有政治野心，而且颇为自负。

华盛顿会议一结束，美国就立即开始行动：向马科斯施加压力，促使他疏远贝尔，重用拉莫斯；暗中扩大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势力和影响；采取措施扩大拉莫斯的知名度，并帮助他树立“忠诚指挥官”和“最有前途的参谋长”这一形象；培养恩里莱并鼓励他站稳立场，如果事态发展能促成恩里莱和拉莫斯携手共事，拉莫斯则是幕后核心，恩里莱可以在台上唱主角。

刺杀尼诺伊及给军队带来的耻辱，使军队改革运动十分不满。恩里莱的美国朋友趁机向他放风，对他没有掌握政权表示惋惜。美国人甜言蜜语，凭他恩里莱的聪明和智慧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声望，他可以使菲律宾回到体面中去，可以重新赢得美国的信赖和支持，并重新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信任——这正是恩里莱多年以来的真正心愿。他在1984年前对此还藏而不露，随着马科斯总统威望的日趋下降，他开始在公众场合表示，如果有朝一日马科斯对总统一职不再感兴趣，他希望自己届时能成为总统。欲望的种子埋下之后，恩里莱在军队改革运动中的“小伙子们”自然不会谈忘主子这以后将给他们带来的希望。借着美国人的东风，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成员，卖命地干起来。

1985年，恩里莱和他的同伙们开始策划夺权。此时，马科斯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以至于他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未能对军队改革运动的政变构成威胁。军队改革运动决定把政变的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凌晨两点，或一周后即1986年新年元旦的凌晨两点。根据行动计划，400名突击队员将溯帕西格河而上，从背后袭击马拉卡南宫，打垮总统卫队；其他军队改革运动的部队负责去占领电台和电视台；拉莫斯将军带着他的人马参加进来，同政府军队进行最后的摊牌。

恩里莱一直在家乡卡加延河谷组建其私人军事组织。他把招募来的人员运到卡加延河以外的小岛上进行训练。这个岛是恩里莱用作秘密退路的地方。这些人员可以用直升飞机迅速运到马尼拉参加军队改革运动的行动。

根据恩里莱和拉莫斯的计划，政变以后，将由一个军队改革运动的执政团组成新政府，恩里莱是政治领袖，拉莫斯指挥军队；2年至5年后举行选举，届时恩里莱将作为执政团的候选人。

二、马科斯也在积极准备着

马科斯尽管已经病入膏肓，但他对权力的欲望却有增无减。这大概与他的中国血统有关。有人传说他是一个华裔后代的后代，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华人与菲律宾混血儿的后代。不论怎样说，马科斯的血液中都有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他确实希望建立一个马科斯永久的王朝；他曾设想，如果邦邦不能成为总统，他还有一个颇为象他的女儿伊米。有人推测说，马科斯一旦把他的儿子推到总统的宝座，伊梅尔达摄政 10 年后，将由伊米继承她母亲的摄政权。

伊米是一个极其聪明，并很小就表现出政治才华的女孩子。她的父母也为她的成长颇费了一番苦心，在 70 年代她被送进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她父母亲为她在校园外准备了一套豪华别墅。在保护伊米的幌子下，贝尔将军得以派遣大批特工人员进入美国，监视反马科斯的流亡者。伊米的上学费用是通过菲律宾国家银行资金支付的。通过马科斯基金会，伊米还获得了一份投资财产。为了跻身政界，她在傀儡国民议会里“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获得管理经验，她领导了一个青年组织，这个组织把马科斯奉若神明，而且举行纳粹式的半夜仪式，为了证明她不受别人的摆布，她在美国驻菲大使馆外领导反美游行示威。

伊梅尔达一直希望把伊米嫁给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此路不通以后，她又想方设法将伊米嫁给香蕉大王安东尼奥·弗洛伦德的儿子。但是美梦又没有成真，那个男孩儿和别人结了婚。伊米开始自己处理婚姻大事。她和一个叫托马斯·马诺托克的男人一起私奔。这个男人是个业余高尔夫教练和职业篮球教练，与妻子结婚有 10 年，并且有两个孩子。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在菲律宾却没有法律效力。他又与伊米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林顿举行了民事结婚仪式。当伊米和她的托米（托马斯的爱称）双双出现在马尼拉时，伊梅尔达气得暴跳如雷。除了这男人是个离过婚的有“前科”的人以外，伊梅尔达还生气这个男人有两个姨妈嫁给了反马科斯的人物，劳尔·曼格拉普斯和洛佩斯·欧亨尼奥。伊梅尔达对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而托米的哥哥的妻子又是另一个反对者、保守的反对派领袖埃娃·卡劳的女儿。

马科斯默认了这个事实。伊梅尔达却变得象河东母狮一样狂暴。托米说他从来就未受过如此残酷的虐待。由于伊梅尔达拒绝承认这门亲事，这对伴侣被迫分开。托米失踪，马拉卡南宫的官员打电话给托米家，向他们保证军队正在进行寻找工作。拉莫斯中将告诉新闻界说，有人送来一张绑票。马诺托克家族的人都认为是马拉卡南宫搞的鬼。6 个星期后，托米出现了。在恩里莱主持、贝尔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托米说自己是被共产党人绑架了，被关在山中一个秘密地点。他是被军队的人救出来的。他坚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是伊梅尔达下令绑架了他。最后，伊梅尔达退出了这场战斗——这当然都是题外话。

马科斯不论怎样也要赢得这场竞选的胜利。他在美国的压力下，于 1985 年 11 月 3 日宣布提前竞选，他坚信自己一定是赢家，他要向菲律宾人民和全世界证明他统治的菲律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选举日期定在 1986 年的 2 月 7 日，他觉得他完全可以通过他庞大的关系网，顺利战胜对手，延续他 20 年对菲律宾的统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马科斯总统的从政史。费迪南德·E·马科斯天生就是一个能言善辩，胆量过人的政治家。他想象力极其丰富，有一股从不认输的性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位来自一度被人遗忘的吕宋岛北伊洛尔戈省的年轻人，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且信心十足地代表他的选区，坚定迅速地迈入了用历史壁画装饰的国会大厅。由于在国会里政绩显著，仅仅在求婚 11 天后，马科斯即同众议长丹尼尔·罗穆尔德斯的侄女伊梅尔达·罗穆尔德斯结婚。此后，他迅速向参议院进军，成为一个由 8 位参议员组成的反对派领导人，甚至被推举为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作为一位时刻盯着总统宝座的年轻参议员，马科斯向德高望众的参议院议长老欧洛希奥·罗德里格斯发动了一场争夺议长职务的闪电战，并且成功地在这位老国王太岁头上动土，占据了议长这一高官。自此，马科斯离马拉卡南宫只有一步之遥。

马科斯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要想得到总统宝座，就必须有一支效忠于他的庞大军队作为掌权的基础。于是，他开始网罗自己的军事武装，同时，向总统权位发起进攻。当时，总统一职是由自由党人迪奥斯达德·马卡帕加尔担任。马卡帕加尔的家乡是在中吕宋的邦板牙省，从前他是以一个“来自卢巴奥的穷孩子”为招牌参加竞选的，而且达到了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他与马科斯同属于一个自由党。按照惯例，每一个政党在选举期间只能推选一个总统候选人。1965 年总统竞选期间，马科斯向马卡帕加尔发出挑战，声称他已经得到了自由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马卡帕加尔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他自己正在寻求第二个 4 年总统的任期。由于急于当总统，马科斯声称马卡帕加尔已经违背了先前所许下的不再连任总统的诺言，同时宣布退出自由党，并在众议院议长小何塞·B·劳雷尔的监督帮助下，宣誓加入国民党。

作为一名新国民党员，马科斯为争取党内提名开始与国民党内的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展开了你争我夺的厮杀。

菲律宾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马科斯是一位战略家和天才无比的斗士，他具有的政治家手腕和勇猛果断，在党内的这场斗争中不仅得到了检查，而且也为自己赢得了声誉。在战胜了党内一些位居要津的卓越领导人后，马科斯获得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被马科斯击败的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包括：

参议员吉尔·J·普亚特；

参议员阿图罗·M·托伦提诺；

前副总统费迪南德·洛佩斯；

前副总统、现任参议员伊曼纽尔·佩莱斯……

显然，马科斯由参议院议长到获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给国民党的打击和创伤是多方面和沉重的。但是，由于紧随其后的“秘密武器”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马科斯的帮助，马科斯很快就使这些创伤愈合。接着，他又赢得了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支持。马科斯着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不仅使其改造成为一部能灵活运转的机器，而且还使其运转效率进入了最佳状态。

马科斯还继续扩大自己的个人组织，成立了令人恐惧的“北方帮”或伊洛尔戈人集团。这是纯属于他个人的统治基础，完全不同于政党组织，是以个人和家族的联系为纽带的。

马科斯在崛起后，为了达到掌权的目的，他抛弃了一些昔日的旧朋友和盟友，而以他自己的亲信或组织来取代。为此，马科斯的一些政敌抨击他残酷无情，心硬如石。但无论别人怎样攻击，他仍旧是我行我素，从未放弃过

他想获得的东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道：“就友谊和忠诚而论，那些到达顶峰尤其是在政治领域里攀上权力之巅的人，必须发扬某种铁石心肠般的现实主义精神。”

马科斯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向他以前在自由党的同事、现任总统马卡帕加尔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他攻击政府“无能”，并不停地对这位在任总统叫骂：“滚开吧！”

马科斯后来自己也承认，他在支持者的数量、财源接济等方面处于劣势，但他富有创造性，能巧妙地部署自己的力量，致使竞选大获成功。1965年11月9日，马科斯登上了菲律宾总统的宝座，开始了菲律宾的一个新时代！

1969年是菲律宾另一个总统选举年。此时，马科斯在国民党内部已经没有一个政敌。4年的总统任期，他向国民党人证明了他是党内无可争议的领袖，而且他还迫使国民党成员充当实现他个人目标的重要工具。

马科斯再次获得了国民党内部的一致提名，向自由党及民众充分表明了整个国民党领导层和国民党力量已牢固地团结在他的周围。自由党的一些派别也转向支持马科斯。如：拉蒙·麦格赛派、科尔内利奥·比利亚·雷亚尔派和由邦板牙省长弗朗西斯科·内波穆塞诺领导的先总统马卡帕加尔派。这些党派的加入，大大增强了马科斯集团的领导人和支持者的实力，从而也壮大了马科斯个人的核心集团。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写道：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之上，破旅次之；全卒之上，破卒次之；全伍之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兵，善之善者也。”

马科斯正是运用了这一权术再次获得了1969年总统大选的胜利。

虽说1969年国民党内部一致通过马科斯为总统候选人，但是，马科斯作为一种策略，仍坚持举行选民的政治集会。他把这样的集会不仅看成是一次战斗的机会，而且还视之为显示党内所有领导人精诚团结和一致对外的良机。马科斯要向反对党和民众表明，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国民党领导人能够再次团结成为一支强大的、高效率的战斗队。……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85年11月，马科斯故伎又演。就在他获得了他的新社会运动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他又坚持在马尼拉饭店举行规模盛大的新社会运动的提名大会。马科斯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坦然宣布已选定阿图拉·托伦提诺作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同时，又以特有的政治智慧，向全国各地的代表招手致意，公开承认和感谢以往这些代表给予他的政党的支持和捐款赞助。作为一种感谢，马科斯宣布增加对这些代表的资助和保护。这就是马科斯！他善于利用众多的社会事件，先给一些政党领导人尝点甜头，然后，就用鞭子驱使他们走上他自己规定的轨道。他对地区、省、市的领导人经常施以必要的压力，以迫使他们在选举中最大限度地投他和他指定的竞选伙伴的票。

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战略家，马科斯对保持一个组织或一个机构的高效率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党的机构，他认为，应有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才具有了“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要素”，因为只有一个组织才能使一位候选人走遍全国各地，而这些地方常常是候选人本人根本不希望探访和深入的地区。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一个组织同时也是贯彻和执行候选人提出的竞选纲领的有效工具。

马科斯的竞选计划是由一个小组和智囊团班子提供的，马科斯本人只是

对此定下基调。正如他所说的，这是因为竞选纲领对他关系重大，也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自己应当去做什么。通常，他总是仔细地研究与竞选纲领有关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包括怎样处理派别纠纷，对投票监督员的任命，平衡资助和恩赐，对付新闻界的报导等，对任何细节他都亲自过问。同时，对他自己阵营的帮派还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还必须有一个只忠于他自己的嫡系宗派。当其他一些党内领袖悄悄地回避地方官员中尔虞我诈时，马科斯却对此大加赞赏，并且驱使他们陷入这些纠缠不清的派系之争中，他坐收渔翁之利。

马科斯一向是一位苛刻严厉的党的领袖。他从不给自己的部下留有争夺候选人的“余地”。无论别人有什么理由，他都坚持自己确定与他结伴的候选人。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团结、巩固得像一个有纪律的战斗机构一样，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出现，最大限度地行使了权力和发挥出作用。有人公正地说，自从马格赛总统领导国民党以来，国民党从未象今天这样强大和高效率地运转。

.....

马科斯在谈到他这些年的成功经验时说：

1. 必须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能战斗，什么时间不能战斗；
2. 懂得在什么时候及如何利用大小派别的力量；
3. 确保自己的队伍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
4. 谨慎地等待马虎大意的敌人；
5. 有一群能干和忠诚的军队将领作支持。

.....

这些都是一般情况下的一般处理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他已经不象以往那样既有韬略又光彩照人，他已经病人膏肓，所以，他在坚持他以往的方针和手段的同时，他也耍了一些“小”的恐怖手腕，迫使人民惧怕他而投他的票。就这样，菲律宾在 1985 年末，出现了一系列暗杀事件，其中之一，就是马科斯的肾脏病医生之一的波滕西亚·巴凯被人残忍地杀害了。

杀死波滕西亚·巴凯的原因很简单：他泄露了马科斯病情详情。马科斯这时最怕别人提起他的病情，不巧的是，波滕西亚·巴凯无意中说了出去——马科斯的第一次肾脏移植手术是在 1983 年 8 月进行的，也就是尼诺伊·阿基诺遇刺前后。这次手术失败了。到了圣诞节，马科斯只能靠另外一个状态不佳的肾来维持他的生命。他绝望至极。曾乞灵于宗教。1984 年 11 月中旬，马科斯再一次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满菲律宾对此议论纷纷，说他再一次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还有人说他为了减少体内对移植肾脏的排斥反应，坚持要求患有阿氏美尔症而濒于死亡的妹妹伊丽莎白提供她身上的器官。据马尼拉医学界传出来的消息，伊丽莎白根本无法拒绝她哥哥的这个要求。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他再一次作了肾脏手术，开始向华盛顿方面提出转移支持对象的建议。这使马科斯极为恼火，他下令一定要惩治泄密者。

贝尔被指派调查此事。贝尔明知这不是有人故意说出，只是有人对美国记者轻描淡写地说过此事而已，但他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

贝尔了解到巴凯大夫和马尼拉国家肾脏中心主任恩里克·奥纳大夫在与《匹兹堡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嘴巴不严。他们告诉记者说，马科斯已在肾脏中心作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在 1983 年 8 月，第二次是在 1984 年 11 月。中心的肾脏专家巴凯补充说，第一次手术的主刀是贝尔德·赫尔弗里希，他

是乔治城医药中心的肾脏移植主任医师。手术后出现了排斥现象，又由巴里·卡汉主持进行了第二次移植手术。汉卡是美国休斯顿赫尔曼医院的人体器官移植部主任。他在手术中使用了新药，以阻止人体对新移植器官的排斥。

贝尔手下的人埋伏在巴凯家四周，等巴凯一回来，就当着他家人的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并带出家门。不久，人们在他的汽车中发现他躺在血泊中，身上有近 100 处刀伤。这就是东南亚人特有的酷刑，叫“千刀万剐”：先从四肢开始扎刀子，然后再扎躯干和重要器官，以此来迫使受害人极度痛苦并供出情报。警察部门对公众说，这是盗窃团伙所为。所有有正义感的人对此都嗤之以鼻：如果这是一起盗窃案，为什么被窃物品未被带走？为什么窃贼非要等巴凯回来？为什么要绑架他、拷打他？

当然，这只是马科斯 1986 年参加总统竞选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马科斯在这次竞选中使用的伎俩远远不仅如此。

当科拉松支持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时，科拉松也面临着巴凯一样的处境：她在棉兰老地区进行竞选演说时，一个菲律宾民主党——“人民斗争”竞选运动的主席被人枪杀。目击者说，凶手是平民家园保安队的队员兼当地市长的警卫。科拉松的情报组织也发现有要置她于死地的阴谋。有几次她几乎是靠运气逃脱危险的。那次还是去棉兰老，途中飞机被一场暴风雨所阻而不能降落，只好改道去第二站。后来，人们发现，在第一站的机场上，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欢迎队伍”已在那等待多时。在三宝颜市，科拉松在珀欣普拉扎与近 5 万群众一起交流。突然一声爆炸响在人群最远处。在讲台上，男人们的面部显得相当紧张，台下群众在波动。科拉松回过头，有人紧紧地抓着她的手。爆炸声再次传来，这是手榴弹的爆炸声，有几个人倒下去；没有死亡，但人们还是把科拉松推进了汽车。

马科斯还没收了路易西塔种植园。当初，政府在批准科胡昂科贷款购买这一种植园时，附带的条件是，种植园土地细分后，“以购入价卖给佃农，不论任何情况任何时候，出售条件必须根据土地使用法的条款”。竞选之时，马科斯政府机构莫名其妙地将种植园收为国有，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动机。科拉松在对人们谈起路易西塔种植园时说，她的这个种植园对农民的政策是仁慈的。种植园和属于一个工会的 6000 名工人订有集体商定的合同。从科胡昂科 1958 年接管以来，这里没有罢工，“在糖业中我们付给蔗农最高的工资。”工人们每天工资为 2.9 美元。大部分工人只有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一年做七八个月的工。“这种小规模糖业生产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科拉松对马科斯的行径极为嘲笑，她严肃地说，如果她能当选成为菲律宾的总统，她将同她的兄弟姐妹们商量，用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真正土地改革的试点，“让路易西塔种植园的工人们取得利润中较多的份额”，“也许他们可以分享利润或者成为共同的所有者。”

马科斯原以为提前竞选能改变国际、国内对政府形象的看法，并以此向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炫耀，他是唯一能领导这个国家的领袖。他认为选举胜利是人民对他反叛乱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新的授权。他有一套强有力的基层机器建立在政府官员身上，包括全国每一邻里的区长的联络网。他控制着大部分宣传媒介……他没有想到反对派、科拉松有这般无比巨大的魔力。反对派的报纸已经出版，他不能封闭它以维持自由选举的形象。他没有想到反对派又团结了起来，他执政期间出现的物价、失业、政府贪污和腐败以及侵犯人权又成为竞选期间抨击他的论据。他看到科拉松魔术般地成了菲律宾眼下的中

心，他有些胆怯了……

马科斯现在准确无误地将目标对准了科拉松。他说她没有经验，由她来统治社会将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他说她的某些顾问是接近共产党者，并谴责她与新人民军有联系。

他问，“难道我们要成为另一个越南，另一个柬埔寨，另一个尼加拉瓜或者加一个萨尔瓦多？”他预言如果科拉松当选为菲律宾的总统，共产党就会取得胜利。他指责她谋求美国的帮助——这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这20年统治的背后站着的是哪一个国家；而美国人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它对任何一个有可能成为菲律宾的统治者都要伸出一把手去，为它的美军基地作铺垫。

马科斯的确有些神经错乱，他还攻击科拉松是个新手，外加又是一个女性。马科斯宣称这是“一种烦恼，同一个妇道人家竞选”。

马科斯还说反对派把共产党作为伙伴，如果这是他们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是最崇高的。我们要再次站起来作为真正的主人。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是高贵的民族，我们一定不能让自由丧失。马科斯这样宣称。他的经济复兴计划恰合实际，叛乱问题可以立即解决。但是如果反对派胜利了，将取消他的改革。他同时警告说，倘若科拉松·阿基诺取胜，军方将接管政府，内战将随时发生。到那时，菲律宾将一片混乱，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华盛顿方面也不失时机地发表言论说，如果菲律宾落入共产党之手，“就别指望还有下一次选举。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来解救这个国家”。

马科斯已经很少走出总统府了。竞选期间亦如此。他的身体已力不从心，他走到哪里都不再有吸引力。甚至在他的家乡北依罗戈省，也不像以往有无数群众在欢迎他。他走到哪里，哪里都冷清。他于是开始出钱买人来听他的竞选演说。人们陆陆续续都来了，拿了钱又不知所向。马科斯又用汽车拉来了电影明星助战，可来参加马科斯讲演大会的人们把注意力却转向了这伙人的演出。他偶尔在电视上露面。人们看到的马科斯面部肿大，脸色焦黄。第二次肾脏手术后，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他不得不象婴儿一样戴上尿布。所

以，他在电视上面对观众的永远是上半身。他把竞选宣传事宜全权交给了阿图拉·托伦提诺。当他听说科拉松·阿基诺竞选声势如排山倒海之时，极其恼怒。

流言再次传来，说一旦科拉松·阿基诺取胜，“将意味着一场流血的对抗”。

科拉松发给马科斯一封电报：由于老独裁者越来越少的亲朋好友带着他伪造的勋章蟋缩在他的府邸里，我警告他不要在星期五那天欺骗人民。已有报告说他正在重唱恫吓和欺诈的故技。如果这样做，他将付出代价。科拉松充满信心地说，从20年暴政灰烬中，将出现一个新的开始！

三、竞选中的科拉松·阿基诺

就在马科斯宣布提前竞选之时，恩里莱、拉莫斯的军队改革运动的武装政变决定暂缓行动，静观时局，而后再确定政变日期。科拉松却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中来。她的顾问团给她制定的战略是尽可能多地深入到全国各地，以讲述她的苦难为主要活动内容。科拉松还和她的婆婆商量说，她是否应该向人们表示她建立一个廉洁政府的诚意和决心？她对婆婆说：“我说起话来是不是象个政客？允许这个或那个。我不愿意我说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告诉他们，我是这个政权的一个牺牲者。我们受过很多苦。我的真诚是真实的。我将使人民消除恐惧。”

科拉松在马尼拉第一次大竞选运动集会之前，就到圣多明戈教堂同 2000 名支持者一起做弥撒。然后，她带领着他们行军二小时与聚集在博尼法西奥广场上的 5 万群众会合，在那里开始了她的第一次竞选演说。她说，她的竞选宗旨是正直、真诚、坦率和信仰虔诚。她说在马科斯统治时，她深受苦难，“但是我不求报复，只求正义。这不仅仅是为了尼诺伊，而且也是为了受苦的菲律宾人。我在这里要求你们援助我推翻马科斯的政权。”她号召他们“参加我的为真理、正义和自由而奋斗的十字军。”“少考虑我们自己，多想想我们的国家。”

她对马科斯说“她没有经验”的指责，说：“我同马科斯先生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知道如何去说谎，不会捉弄别人；同时，我也不是一个独裁者。我感谢上帝，我确实非常同他有区别。因为如果我们真要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非常不同于马科斯的领袖。”

她似乎为了尽可能生动地表明这一点，而许诺她如果真正成了菲律宾的总统，她不准备住进马拉卡南宫。那地方曾经住过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总督。“菲律宾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住在炫耀辉煌的宫殿中，是与他国家的现状不相称的。”

她讲起了自己苦难。从尼诺伊囚禁开始，她说到了博尼法西奥军营，她流着眼泪。当她说起尼诺伊的死亡时，她说他是为成千上万个菲律宾人民而死的——这一点很象耶稣基督的殉难。而后，她谈到了作为马科斯政权受害者的她，为什么要继续战斗和当总统后的打算。

科拉松的支持者对她的讲演感到惊讶：“她散发出一种真诚。”一个省的政治领袖安东尼奥·托尼·丘恩科说：“尽管她不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不是我们政界人士所想象的在讲台上夸夸其谈的演说家，然而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惊讶——出现了一位气度平常的讲演者，她用单调的语气和人们讲话。但是，所有听众都是那样的全神贯注。她讲她的不幸引起了许多人掉下眼泪。他们为她的真诚、诚实和单纯而爱她。他们因她的丧偶而为她悲伤。”而科拉松恰恰就是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她看来有一种永远也使不完的力量。她每天服用大量的维生素，外加 7 天连服的药丸。她可以一天在 12 次集会上讲话，从早上 8 点直到接近午夜。她的讲话基本上是即兴的，除非在重大的场合下。她老是讲她的苦难和遭遇，到后来才涉及到实质，比如说国家的债务、人民的贫穷以及马科斯窃走的财富。有记者问她能否换一个话题？科拉松说，这就是她演讲的主题和中心。

科拉松也谈政治问题。

一、对马科斯的垄断政治。科拉松说，她要使人民享有社会中公平的一

份。她保证撤消由马科斯及其一伙控制的垄断政治，释放所有政治犯，号召在政府和叛军之间停战 6 个月，并发起同共产党武装进行对话。她说，游击队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反对政府，就是因为马科斯政权的不公正和镇压，“我们将使一些年迈的将军们退离他们现在的岗位，让更多的年轻上校走到重要岗位上。”

二、对于国家的经济，科拉松和菲律宾的经济学家们和工商业领袖举行了几次交流会谈。参加人有吉米·翁格平和诺伊尔·索里亚诺……，他们都是菲律宾首要的经济学者和有名望的工商业家。他们简要地向她提出了关于国家发生经济问题的原因，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垄断制度和政府太多的干涉引起的。他们告诉她，解决的办法就是停止垄断、企业私有化和量入为出。他们警告她，不要过分集中精力于任何一件事情上。所以，在科拉松的讲演中，她没有很详细地解释如何解决激起社会冲突的经济问题，怎样对待 20% 的失业，40% 的就业不足以及即将达到的 25% 的通货膨胀。她说，她将建立能鼓励当地和外国投资的信誉。至于其它，她说她会做到让人民满意的。

三、土地改革，她说马科斯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好的，只是没贯彻。她批评马科斯的农业是“农产品垄断者的利润”，马科斯把大量土地给予他的亲朋好友或者外国投资者，从而使菲律宾的农民流离失所。她在为了草拟涉及土地改革的一次用尽脑汁的会议材料中，她和她的顾问们对种蔗土地问题进行讨论。有几个人建议，也许应该使农民成为糖业公司的部分所有人，路易西塔种植园可以作为典型。科拉松说这个主意很好，她要说服她的兄弟姐妹们。科拉松是乔斯·科胡昂科父公司的司库，这个公司是种植园和包括一家制糖厂、销售公司、酒厂和两个不动产公司在内的其它企业的控股和管理公司。当马科斯的政府没收了路易西塔种植园后，科拉松向公众表示，如果她能当选总统，她将把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真正的土改范例。她说她的土改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和土地利润及所有权平等分享。她要实行适合于小农、无地工人的部落菲律宾人社会需要的土地改革。“对于长期农田开垦者和分成佃农来说，耕者有其田必须成为现实，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对无田者而言，可以移民定居和举办农业合作社。她强调说，土地首先必须用于人民对食物的需要，而后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创造财富的工业上。她保证她要在路易西塔种植园使用同一政策。虽然糖蔗地不在土改之内，“我要同我的家属探索如何在路易西塔种植园中实现土地所有权及利润公平分配的双重目标，并使其能够作为全国其他地方的范例。”

四、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她这时已经完全离开了她最初的立场——她曾签署号召取消美国军事基地的“人民斗争”的联合纲领。但是，她现在告诉新闻记者，“要采取灵活的态度”。

在竞选运动期间，她的兄弟去了一趟华盛顿。他回来后告诉科拉松说，那边的人们希望她要求扩大基地。“他们还要什么？我说过我将尊重基地到 1991 年为止，就是这些。”科拉松对人民说，她将在协定满期前二年的 1989 年对基地问题制定更坚决的政策。她还公开抱怨说，马科斯在基地上的年收入只有 1.8 亿美元，而其他国家以较小的设施就能取得较高的金额——西班牙是 4.15 亿美元，希腊是 5.01 亿美元，而土耳其为 9.83 亿美元。

1986 年新年元旦那天，科拉松在代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劳雷尔和代表人民斗争联合会的萨朗加签署的协议上签名，同意在 1991 年前尊重基地协定——这一点背离了联合会要求撤消外国基地的立场。他们要求在国内禁止

贮存核武器。

五、改善工人的命运。她声称大部分工人是“个人贪婪和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以及敌视工人的劳动法规的牺牲者。”她知道，工人要求公正的工资、适当的工作条件并真正地参与商业和工业决策过程。但是，当他们试图组织起来时，他们就要遭到打手、警察或军队的折磨、恐吓和暴力驱散。科拉松许诺她要结束压迫性的法律和废除“使工人处在半奴隶状态的经济结构。”

六、对于工商业，科拉松的态度是在马尼拉洲际饭店一次午餐上发表的。她答应停止政府干涉工商业，虽然政府将要在那里“保护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她要取消垄断组织和促进向劳动密集的以农村为基础的中小规模农业投资。为了迎合民族主义情绪，她说，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要留给菲律宾人，但是在当地资本不足的地区，她欢迎外国投资。她将延缓考虑进口自由化计划，并且要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荐的某些税收。

七、对于反政府的各个派系，科拉松逐一拜访他们的领袖。全国民主联盟要求科拉松保证以“真正”的土地、银行国有化和支持国家工业化政策代替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要求的作为贷款条件的自由进口政策。联盟还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镇压性的法令等。科拉松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科拉松还来到菲律宾北部部族地区（那里是新人民军的根据地）访问。她在这里也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她伴随着铜锣声跳舞走进卡林加部族人的人群中。他们举着标语，抗议马科斯政权掠去了他们祖先留下的土地，使许多卡林加人被迫离开家园去修建奇科河大坝（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游击队）。科拉松答应卡林加人取消这一大坝的建立。

穆斯林分离主义者领袖努尔·米苏阿里在马德里会见了科拉松的代表巴茨·阿基诺。他们达成了协议。作为总统的科拉松将承认穆斯林在棉兰老和其它南方岛屿的独立。消息传来，引起全国一片议论、巴茨否认他与穆斯林分离主义者签定了这样一个协议，只是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他们双方同意地方自治，但决不是分离。巴茨私下请求米苏阿里，在穆斯林地区尽量少撒谎。可米苏阿里说的比做的更多。他指示他的手下们为科拉松直行宣传。科拉松只好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易。但是，如果她竞选能取得胜利，她将同打了13年游击战争的分离主义者会谈。她尊重渴望自治的感情，但以与国家领土完整相一致为限。

科拉松还与棉兰老的新人民军接触。她指出，新人民军叛乱者是为追求他们想象中的正义社会而被迫走向战争的，“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对“马科斯政权失望了”。她答应“立即宣布与叛军停火”，释放政治犯，并开始同叛军对话，内容包括纠正政府缺点以消除他们合法的不满。

科拉松确实在走向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光。她毕竟是一位女士、从小娇生惯养，成年后养尊处优。当尼诺伊在激烈的政治旋涡中拼杀之时，她只是一个在幕后担惊受怕的妇道人家。她渴望安宁、恬静，一家人平平安安，厮守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但命运改变了她的追求。

竞选期间，马科斯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在马尼拉集会上告诉码头工人听众说，科拉松“没有化妆，也没有涂染指甲”。

科拉松从决定参加竞选开始，就开始了她所说的“奴隶劳动——整日劳作，毫无消遣”。她在第一次竞选演说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对在场的菲律宾记者和3名外国记者说：“我仔细地打量着我自己，我看到了一个正在灾难中越陷越深的国家。”这话让人想起了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

那激动人心的演说。科拉松说：“我仔细地打量了我自己，我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即便是在他们无法肯定有下一顿饭吃的情况下，也依然勇敢地保持着微笑。的确，他们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正越来越感到愤怒和绝望。我感到在我们的人民当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孤独感，有一种正在蔓延的悲观情绪，人们的脸上无论承受多少屈辱和痛苦，人们都无法改变现状，用心干任何事情都无法除旧迎新。但无论怎样，我仍然坚定地认为，尽管我们国家的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这决不是不可克服的。我相信，菲律宾能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而且最终能够在世界伟大国家的行列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恰当位置。现在，我们必须为我们全体菲律宾人民所追求的这一历史性变革尽心尽力，我们梦寐以求的伟大目标才能实现。”

科拉松再也没有时间去染指甲，没有正点吃过饭。这位 53 岁的知识女性，这时才开始发挥她的全部能量，为她自己的人生描绘出最精美的图画。同时，她也迎来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欢腾——她成了耶稣的化身。

科拉松走到了宿务市。有记者从宿务发回报导说，当科拉松和多伊·劳雷尔的飞机刚刚降落，当地居民几乎全城出动。到处都回荡着雷鸣般的欢呼声。科拉松和劳雷尔顿时陷入前来欢迎的人山人海的包围之中。据估计，至少有 50 万选民走出家门和办公室。人们拥挤在从麦克坦国际机场到市区的 10 公里长的大街两旁，热烈欢迎反对党领袖人的到来。美联社报导他们的宿务之行时说，这是“本月（指 1986 年 1 月）竞选活动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声援集会，并且使得迄今为止的由马科斯号召举行过的所有政治集会都相形见绌。”这家新闻媒介感叹他说，人群蠕动，里三层外三层，致使阿基诺夫人的车队花了 4 个小时才慢慢地穿过人海。而通往机场的路程平时只用半个小时。

科拉松就是这样吸引着人们。

在打拉城，一万人排立在街道两旁。十几岁的男童用黄带缠头，爬上树梢、车顶或墙角，为科拉松的竞选助威。黄色的纸屑象雨点一样纷纷洒下。甚至政府官员也冒着失业的危险加入支持科拉松的群众队伍中。有些农民从牛背上用手形成“L”字样标志。那场面现在回忆起来，让人感到比尼诺伊得到的欢迎场面还要浩大。有些人把公民自发的热情比作“适度的群众歇斯底里”。有一位观察家叫这种情绪为“科丽狂热症”。大多数妇女想方设法去摸摸她的头发、脚或者是衣服的边缘。她们更希望科拉松来触摸她们，那种期望就如同对罗马教皇一样。

在莱特省聚集着欢迎人群。让人们终身难忘的是，当科拉松和劳雷尔来到比科尔地区时，该地区出现了犹如汹涌奔腾的洪水般的欢迎大军。来自社会各界的成千上万名群众，不分男女老少，如同遵从了一个命令，成群结队地潮水般地涌向辽阔的讲演现场。

科拉松来到安蒂克省。1984 年国会选举时，当地军阀奥图罗·帕西菲卡多尔下令在一座桥上屠杀了几十位反对派的支持者。科拉松到那座桥上去祭奠，并点燃了一支蜡烛为死者祈祷。有位遗孀抱着她哭着说，“科丽，你是为我们的丈夫伸张正义的最后希望。”科拉松同情地握着她的手说，她们都是马科斯政权下非正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她许诺一定要主持正义。

军队改革运动的将士们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获得军队中 70% 的军官们的支持。但是如果一旦科拉松·阿基诺取胜，他们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她当选

总统——这在菲律宾的历史上，武装军官们在国家重大历史关头第一次直接了当地采取如此鲜明的立场。

对于马科斯的威胁和恐吓，科拉松说她决不会屈服。“如果投票明显地于我有利，而总统企图挫败人民的意志，我将号召人民起来，到街头上和平示威游行，而且我甚至会领导这场示威。”

科拉松说，她将要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菲德尔·拉莫斯中将退役，“他已经可以退役。”她提出，倘若因为严重欺骗和恐怖行动而使她失败，温和派人将放弃选举办法，而激进分子将接过领导权。她说，她决不参加叛乱。

红衣主教发布一封信给教区人民，他揭露通过贿赂收买教师、地区竞选运动经理和其他选民的选票的丑行。主教告诉人们：你们可以拿下这份定钱（马科斯为了拉拢更多的选票，动用了国家银行资金，分发给前来听他竞选并投票选举他的人们），但是这份向您提供的钱没有办法强迫您投票给特定的候选人。”

.....

面对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科拉松变得沉着自若。

在内格罗斯岛，科拉松和劳雷尔进入了马科斯的拥护者、军阀阿曼多·占斯蒂控制地区。有人劝告说，此人曾经在这里制造过屠杀反对派的埃斯卡兰蒂惨案，如果科拉松和劳雷尔前往，肯定要有很大的危险。果然，汽车走到途中就接到报告说，请不要继续前进。一个安全卫队队员跑到科拉松面前说，“市区有危险，你们千万不可以再往前行了。”科拉松让车队继续向前。“如果我现在就停下，人们认为我害怕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是懦夫。”科拉松注意到，这个地区的人们，没有其它地区人民的狂热。站在街道两旁“观看”的人们，偷偷做出“人民斗争”和“L”的手势。沿途站着面容冷酷的平民家园保卫队。“危险地点”是指市政厅屋顶上架着的两挺机关枪。平常日子它们只是摆摆样子；那天，有人在上面操纵它们。科拉松蔑视地瞥了一眼那张牙舞爪的杀人凶器，转过头来，向车下的人们致以亲切的敬意。

菲律宾人很敬重勇气。科拉松要向人们证实，她一点不比男人们差。当她在菲律宾人民面前显示出聪颖、智慧、热情和胆量时，她知道，她这个尼诺伊的遗孀，离总统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政治学家——律师和政治科学教授，发表了他们运用政治科学规律对这次大选所做出的客观专门分析。据《菲律宾每日问询报》报导，参加该调查的科学家们分别来自：亚当森大学、马尼拉阿特尼奥大学、拉刹中学、菲律宾基督教大学、菲律宾女子大学和圣三一大学。根据他们的报告说明，如果这次提前大选按正常方式进行，马科斯本应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因为，传统的菲律宾选举，取胜的基本条件乃是被人称为“四个先生”的金钱、竞选班子、新闻媒介和人。

一、金钱。一场竞选必须有充分的后勤作为保障。“虽然有充足的资金的竞选并不能绝对保证选举获胜，但这能使胜利成为可能。”为了争取选票而对投票者进行收买和给以甜头，这种做法在菲律宾历次选举中司空见惯。为此，候选人通常要在手头上保持一半的选举资金，以便用于决战时刻的选举活动。二、竞选班子。候选人周围得有一批有组织的核心骨干支持。这些人作为候选人与选民联系的基本渠道而为候选人效力。在选举这天，应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机构为候选人分发选票，并且确保能统计出选票。

三、新闻媒介。“到处宣传”竞选活动，如挨门挨户拉选票、在公众场

合上发表演讲等，应该按照对投票起作用 and 发挥影响的自然时间限制进行。为了确保竞选活动的信息对多数投票者产生主要影响由大众传播媒介发动并提供“大甩卖”式的竞选机会，是绝对必要的。

四、人。候选人不论是男是女，所有竞选努力必须使选区的选民欢迎并支持候选人。在公众眼里，所支持的候选人在政治对手面对面的交锋中应当是略胜一筹。因为菲律宾选民通常是根据候选人的性格，而不是根据候选人相互间的争论点来选择支持对象的。

因此，参与制定者认为，2月7日的选举可能是一场非传统选举。这场竞争的双方，一方是有组织严密、地位牢固的政党作支持的老政治家，另一方是意气风发、在公众同情的海洋里乘风破浪的初学者。斗争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尽管如此，这些政治家还是指出了两位主角身上各自存在的强、弱点。

马科斯的强项：

1. 基层政治组织遍布全国，且有经过考验的得票潜力；
2. 拥有乡镇“公民大会”和包括官方机构及地方自治机关在内的地方政府的支持；
3. 几乎控制了全国所有传统的新闻媒介，使得他和新社会运动的宣传覆盖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数量庞大的听众和观众；
4. 在管理政府和同外国人打交道上有丰富的经验；
5. 被证明是竞选运动的战略家和老练的组织者；
6. 具有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和使老百姓感到和颜悦色的特点；
7. 拥有多年经营打下的牢固的政治基础；
8. 作为总统，拥有相当多的竞选优势。

马科斯的弱点：

1. 健康情况受到人们的怀疑。尽管有些选民仍想再次委托他执政，但其中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身体太虚弱，将无法有效地履行总统职责；
2. 人们谴责马科斯及其政府的贪污和腐化。马科斯和他的密友及亲属们涉嫌侵吞国家财产，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
3. 伊梅尔达·马科斯和法维拉·贝尔上将，既是马科斯的支柱的宠臣，同时他们的存在及所作所为也构成了马科斯的弱点。新闻报导经常揭露和谴责伊梅尔达挥霍无度，生活奢侈。至于贝尔将军则要对尼诺伊·阿基诺的被暗杀负责；
4.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残酷迫害。军方滥用职权横行霸道，法律和司法制度受到践踏；
5. 经济每况日下。物价飞涨，失业率高，商业萎缩，市场混乱；
6. 马科斯及其政府“在菲律宾人民当中，而且在外国人眼里”也失去了信任。

科拉松·阿基诺的强项正是建立在马科斯的弱点上：

1. 1983年8月21日尼诺伊·阿基诺的被害，在人民心目中激起了巨大的同情；
2. 科拉松·阿基诺有令人理解和信服的诚实品格；
3. 人们认识到，科拉松是菲律宾社会改革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一点也许未必仅指阿基诺夫人个人，但却表明民众对现行制度下的生活已感到厌倦

和不耐烦。”因此，只要任何一种新事物或新人物出现，清除现实社会弊端，人们都是乐于接受的；4.民众中对科拉松抱有的巨大同情心，极有可能影响那些未拿定主意的选民；

5.天主教会上层明确支持科拉松，称赞她具有诚实高尚的品格，并对她提供组织帮助。

科拉松·阿基诺的弱点是：

1.缺少有办事效率的分发选票机构。她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也是支离破碎的一团散沙；

2.反对党内部四分五裂不团结，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菲律宾民主党——人民力量党彼此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对方；3.对担任总统职务缺乏经验和毫无接受此职的准备。“如果她当选，人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会感到忐忑不安，心中没底”；4.在解决诸问题如共产主义、美军基地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棉兰老岛自治等问题上将进退维谷。相当多的选区选民不愿为毫无从政经验的科拉松·阿基诺领导菲律宾下赌注；

5.由于她依靠自己的“顾问们”，加重了她对总统职务没有经验和毫无准备的弱点；

6.明显缺乏足够的竞选后勤保障；

7.尚未拿出切实可行或“特殊的”政府执政纲领。

那么，她会顺利地当上菲律宾人民的新总统吗？

第六章最后的冲刺

就在科拉松与劳雷尔携手并肩一起与马科斯较量之时，他们首先在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每一方都迫切地要求得到指派投票监视人的权力，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组织信赖设施。它为当地的领导人提供威望和保护他们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反对派信任别人计算他们的票数是诚实的。对于劳雷尔支持者的要求，科拉松的支持者指出，他们不认为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非常努力地在他们的地方为他们的候选人工作。而且，竞选快要结束时，有谣言传说，马科斯要安排劳雷尔当选副总统与他一起主宰菲律宾国家的命运。

看来，我们的女主角奋斗得并不轻松。在比萨扬群岛中最重要的宿务岛，反对派内部较量尤其激烈。她不得不去参加两个集会：一个是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竞选集会，由玛丽亚·维多利亚·奥斯梅纳·斯图尔特主持。另一个是她的堂兄的竞选集会，她的堂兄约翰·索尼·奥斯梅纳与她的观点一致。前后两者都是科拉松的堂兄妹，他们又都想当市长。奥斯梅纳家族属于寡头政治集团——包括前总统塞吉奥·奥斯梅纳——管理这个市和这个岛已有几十年。这对堂兄妹认为这里是他们所继承的地盘。科拉松在两个奥斯梅纳和两个 1984 年当选的国会议员之间分配了选举监察的名额。……

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干扰着科拉松，她不得不在百忙之中妥善处理。因为有实力的人向她要的就是这个，而她要想走近总统的宝座，必须拥有这些人的支持。而此时，科拉松竞选的第一号对手马科斯已经在用他手中的权力网络的系统和他那政治天才，进行最后的冲刺。

一、选举前夜

军队改革运动的突然改变计划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现任美国总统里根顽固地反对马科斯下台，这终于使美国情报官员的计划化为乌有。

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向国会警告说，新人民军的力量在迅速壮大，有可能夺取政权，危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和其他利益。这些虽然是危言耸听，但却有助于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在马尼拉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如果马科斯无法站住脚跟，而他挑选的继承人或凶残或怪癖，不易合作，美国则必须有所作为。

里根总统似乎是原则上同意，但据说他仍坚持认为马科斯政权应该维持下去。

里根和马科斯的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从60年代就开始接触。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用他们特有的交际手段，使里根从那时起就被他们紧紧地吸引住了。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应该从伊梅尔达的国际文化中心说起。

60年代初期，马科斯刚刚就任总统不久，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就筹划把马尼拉的那座有城墙环抱的老城——因特拉穆罗斯开辟为旅游胜地。她还想在马拉尼湾的海滩上填土，建立一个面积很大的文化活动中心，使之成为太平洋上现代雅典之城。她想在这里模仿巴台农神庙（祭祀雅典娜女神的神庙，现在希腊雅典），修建一座电影中心。伊梅尔达设想在这里举办电影节，选举世界小姐，组织拳击比赛等。当时她宣称，“是的，菲律宾人是住在贫民窟里，但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菲律宾人民是面带笑容的。他们的微笑是因为他们还很健康，还有文化，还有人爱护他们。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指标是人民的微笑，而不是经济指数。”“我们的教育应该从研究精神贫困和道德贫困入手。在追求物资目标时如果丢掉了优良传统，丢掉了我们的优良思想，丢掉了崇高的精神，那么将会什么也得不到。”

伊梅尔达宣布，她修建这座文化中心完全不依靠政府的力量。马科斯贡献了罗哈斯大道上政府拥有的一段滨水区。这是一块黄金地段，与对面的巴丹群山隔水相望。伊梅尔达又批准了一项征地项目。不到数月，她便筹集到一笔相当数量的资金。她曾对人开玩笑他说，“我和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劫富济穷的绿林好汉）一样抢劫富人……只不过我是含着微笑这样做的。只有富人害怕吓唬。穷人本来就是一无所有，无所谓。”这项工程大约到70年代才初具规模。伊梅尔达要在竣工之时举行开幕庆典。

那时美国总统是理查德·尼克松。马科斯夫妇本想请他与夫人前来，至少，他们希望朱莉·艾森豪威尔和戴维·艾森豪威尔能来菲律宾。但是，尼克松只派了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长罗纳德·里根前来祝贺。

马科斯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会因此表现出丝毫不满。他和伊梅尔达极其盛情地款待了这对从美国来的朋友（南希也随同一起前来）。伊梅尔达得知里根夫妇将乘总统座机“空军一号”前来马尼拉，竟异想大开，设想让一帮好莱坞的朋友们在这之前来到马尼拉。计划被白宫拒绝后，马科斯夫妇又通知里根州长在萨克拉门托的办公室说，里根州长抵达马尼拉时，恰逢马科斯总统52岁生日。里根只好带了一份礼物送给马科斯。南希·里根想得很周到，也为伊梅尔达带上了一份礼物——由她本人设计的一株翡翠树。美国国务院建议里根，他应该准备一件正式的已隆衫，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为能系领带（西班牙统治时期是只允许菲律宾人系领带的）；下身穿晚礼服

长裤，为能用吊裤带。上装内应穿圆领 T 恤衫。

里根夫妇到马尼拉作客表现得完美无缺。美国驻菲律宾使馆正式向华盛顿报告说：“州长和善的举止富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就是从此，揭开了马科斯夫妇与里根夫妇长期友好情谊的开端，几乎每到关键时刻，里根总是挺身而出，一直到病人膏肓的马科斯坚持要继续他的统治，里根也在所不辞，来效犬马之力。

但是，马尼拉仍是一个不平静的港湾。竞选之时，也没有象里根总统设计得那样一帆风顺，而是风云四起，情况比里根总统想象得要悲惨得多。

有人预计，马科斯自从 1949 年在北伊洛尔戈省赢得他父亲的国会席位以来，在宦途上从未受挫折。现在，他已非同以往，他肯定要在选举中进行大规模的欺骗；

科拉松警告马科斯，她的支持者决不会接受欺骗行为。她会号召和平示威运动。倘若无效，人们可能不听她的话；那时，将造成的一切后果，她一概不负责任。

马科斯说她以内战相威胁，说明了科拉松的绝望。

红衣主教力劝菲律宾人要“忍受侮辱”，不要以更大的暴力对付选举中发生的冲突。但是他又说，教会在考虑，假若发生欺诈行为，要发动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

里根总统派来了以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为首的美国官方代表团。他们告诉菲律宾人，如果出现了信得过的选举会使美援大量增加。

菲律宾现在已经无法顾及美援，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个与马科斯不同的总统——马科斯对菲律宾 20 年的统治，已经使菲律宾人吃透了苦头，他们渴望竞选，竞选是他们压抑多年唯一的希望。如果没有科拉松·阿基诺，他们也不会把期望再寄托在马科斯的身上。于是，马科斯的这次提前选举，出现了一个极其复杂、尖锐的局面。

根据候选人在选举委员会填写的候选人登记书，候选人共有 4 位竞选总统；6 位竞选副总统。他们是：

1. 费迪南德·E·马科斯，代表新社会运动（KBL）。
2. 科拉松·C·阿基诺，代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U-NIDO）。
3. 鲁本·R·卡诺伊，代表社会民主党（SDP）。
4. 纳西索·S·帕迪利亚，代表争取真理、秩序和正义运动（MOTOR）。

以上是总统候选人名单。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如下：

1. 阿图拉·M·托伦提诺，代表新社会运动（KBL）。
2. 萨尔瓦多·H·劳雷尔，代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U-NIDO）。
3. 埃娃·埃斯特拉达·卡劳，代表自由党。
4. 玛丽亚·维多利亚·奥斯梅纳·斯图尔特，代表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

5. 鲁道夫·T·甘佐，代表自由党。

6. 罗杰·V·阿里恩达，代表争取真理、秩序和正义运动（MOTOR）。

——这种情况，大概是在菲律宾历史上，自 1935 年 11 月美国被允许菲律宾成立“自治政府”以来，第十次总统选举中，首次的提前总统大选和在 1969 年 11 月后首次的同时选举正、副总统。那一天，全国将有 2600 万选民在 8.5 万多个投票站投票，选出任期为 6 年的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各一人。由于此时的菲律宾处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选举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其一，它不可能按照程序进行。

菲律宾从有选举历史以来，就有一个政府选举委员会。到了1984年又成立了一个组织，由天主教、工商业组织、工人和公民团体支持的全国民主自由选举运动，它是公民监督的力量。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准备在总统选举时起到关键的作用。就在它成立之初，马科斯谴责它是反对派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是在全国范围教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唯一能与马科斯及其一伙竞争的组织力量。全国公民自由选举组织运动大约有80万志愿人员，他们要监视全国近90000处投票场所，和验明预期有2600万投票人的选票。人们将在60个城市和1500个市镇投票，正式宣布全部票数要几天的时间。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将根据政府选举委员会的选区记录的副本为基础作出迅速计算。

为了防备万一，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给予“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成员身份证，让他们进入投票处和它的总部。

马科斯最初并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美国人要求他做出一个不在意的样子来。这样，在美国人的压力下，马科斯认可了这个组织。

科拉松还有她的一套方案：秘密地成立一个比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速度更快的计算组织，分散到各地投票处提供准确的数字，然后将结果送到他们控制的无线电台、——这大概也是菲律宾选举史上史无前例的。

其二，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2月7日这一天是星期五。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天文研究服务局报告说，这一天，全国晴朗，尽管有热带风暴即将进入菲律宾，但目前它离菲律宾海岸尚很远。

主持选举的政府选举委员会对新闻记者三令五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记者，均禁止在投票期间进入投票站采访。政府选举委员会还拒绝了菲律宾外国记者协会要求允许外国记者进入投票站的申请，同时，他们却向美国政府观察小组敞开了大门。

政府选举委员会同意美国政府观察小组进入投票选区，以便能近距离地观察到投票情况。美国政府观察小组还可以询问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美国政府观察小组于2月5日抵达菲律宾，他们称此行的目的是来观察选举过程中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前来评判是非的。

投票选举如期于2月7日举行，全国上下都进入1986年总统选举的投票阶段中。

科拉松在她的一批安全人员和记者的特护下，于下午7时半来到路易斯塔种植园的打拉小学。她得到几百个佃农的欢迎，而后，她在一间木板墙的教室里排队等候了3分钟，有3个人先于她投票。她投票后走向草地对记者说，“今天是我的日子，在我一生中对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像这样有信心，我一定能获胜。”而后，她回到马尼拉的马卡蒂几位朋友的家中……。

马科斯在他的家乡北伊洛尔戈省已塔克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唐·马科安诺·马科斯纪念小学投票。他按照他成为菲律宾全国闻名的政治家以后的习惯作法，安排了一大批支持者等候在那里向他欢呼，祝他交一好运。多年来，在这些支持者、同乡和亲友的欢迎中，马科斯拥有了20年的辉煌。现在，他的竞争对手是一名妇女，而且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这让马科斯“倍加小心”。据政府新闻机构菲律宾通讯社报导，马科斯总统填完他的选票时，显得情绪高昂，信心十足。当时，马科斯上身穿的是人们熟悉的红色夹克衫，

内穿一件红白格子的衬衫。他是第 10 选区的第 75 位投票人，选票号码是 5777。5777 是马科斯的吉祥数字。1965 年他就是以这个数字赢得了那一年菲律宾大选的最后胜利。现在他用这个选票号码，也是为了讨个吉利。

陪同他来参加投票的有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贝尔将军和马科斯总统的孩子们。马科斯把选票投入到选票箱后，周围响起了“总统还是马科斯！”“马科斯万岁！”的欢呼声。

在一旁等候多时的一支乐队，奏起了一支伊洛加诺歌曲《集锦曲》。

总统这个简短的投票过程，却被在场的众多记者予以详细拍照和报导。伊梅尔达，马科斯同时在圣塔梅萨地区马帕中学投票站投票。她是早晨 7 时之前到达这个选区的第一个投票人。此时，这位菲律宾的第一夫人称这次大选是“对国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次选举，并且表示希望给人民带来和平和满意的结果。她吟道：“民声即天声。”她说：“愿上帝赐福，帮助马科斯和托伦提诺在大马尼拉获胜！”

.....

这两个地方的投票秩序井然。他们都极其坦然，岂不知其他各处却是另一番情景。

其三，血腥的投票选举。

2 月 7 日投票选举菲律宾的总统与副总统，是菲律宾空前规模的一桩大事。这个拥有 2000 多个岛屿的千岛之国，投票点遍布全国 74 个省的 60 个城市、1532 个乡镇或自治区。在如此庞大的地域投票选举两个势力不相上下的总统，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30 多个反对派的工人被谋杀。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监督人发现他们的汽车被破坏，有些人被绑架或受到打手的恫吓。马科斯的新社会运动领导人以美元或大米进行贿赂收买选票。士兵们强迫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的代表们离开他们的岗位。

棉兰老竞选地区统一指挥部公开拥护马科斯。海军陆战队在纳加市登陆，与其他武装分子一起围住市政府大楼并勒令停止选票，他们要进行所谓的检查。准军事性部队在一些选区制造恐怖，他们由马科斯的人发给武器。

在打拉首和其他省份，军队司令官提出他们战士的名单，作为马科斯的选票。

在马卡蒂，有一支吉普小队“飞行投票人”。他们腰间别着凸出的武器，进入投票站投票，而后再驶向另一个投票场所。在许多情况下，暴徒们推开人群进入投票场所，恐吓选举官员和监察人，夺走投票箱。在一个投票场所，科拉松根本就没有列入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在另一个城镇，记录选票数字的清单上，选区数量比实际选区多出了 12 个。

反对派后来推断，马科斯雇佣的“工具”们，通过在拥护反对派地区减少登记人数，使反对派损失了 10% 的选票；制造假选票充塞投票箱、“飞投票”和篡改选票使反对派损失 10% 的选票；通过贿赂和恐吓又损失了 5% 的选票。

菲律宾 1986 年 2 月 7 日的选举就这样拉开了它的帷幕。

二、“两个赢家”，一场较量

选举结果缓慢地进入了两个计算机总部：一个由选举委员会管理，它设在菲律宾国际中心有空调设备的大厅里，这是由伊梅尔达耗费巨资建造起来的。另一个由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管理，设立在拉萨尔体育馆。

2月8日，《今日公报》报导说，政府选举委员会和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之间对选票结果出现了不一致，或者说出现了一场争论。这家报纸说，最初的非正式统计表明，马科斯和托伦提诺得票数遥遥领先于科拉松·阿基诺和劳雷尔。政府选举委员会以“验明过的部分统计报告”表明，选民中，赞成马科斯总统连任的有54.4%，反对的占45.3%，根据这一报导，在大马尼拉的选举竞争中，双方势均力敌，而在最后，阿基诺夫人可望以大幅度的领先票数获胜。

2月8日凌晨，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公布的第一批统计结果表明，马科斯得票2758张，阿基诺夫人得票2269张。但是同时，由监督这次选举的民间组织——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计票

中心公布的结果却与其有所不同：科拉松·阿基诺得票180083张，费迪南德·马科斯得票128391张。前者在大马尼拉获得领先优势。

2月8日中午12时45分，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公布选票结果：马科斯以得票11593张对科拉松6575张，暂时领先。然而，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的统计数字表明，科拉松以得票883220张对马科斯得票614432张，暂时领先。与此同时，在副总统的选票统计上，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公布托伦提诺得票9651张，劳雷尔得票7086张。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是：劳雷尔得票836632张，托伦提诺得票586746张。

紧接着，是势均力敌的两个硬派人物分别利用他们各自的宣传工具，向菲律宾和全世界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马科斯在实况转播菲律宾大选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天”电视节目里发表谈话说，这次大选总的来看，似乎是干净利索。所以，如果能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他和托伦提诺将在全国73个省中获胜。

科拉松也毫不示弱，她在德维里塔斯电台宣布她是这次大选中的胜利者。“马科斯符咒失灵了。”“他的无可匹敌的神话灭了。尽管他有枪、打手、黄金，菲律宾人民还是最后赢得了胜利！”“这个趋向是清楚和不可避免的。人民和我将取得胜利，我们知道这个。”“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在这一天争得到的自由从我们手中夺去！”科拉松认为她稳操胜券，因为有证明表示，在1490万张选票计数以后，她拥有的选票数量比马科斯多80万张。

第二天，她便告诉记者，她希望同马科斯立刻见面，安排顺利而迅速的政权移交。有人问她，她对美国人有什么要求。她说，也许他们可以让马科斯先生知道，对他来说，承认失败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他拒绝让权，她将每天领导和平示威。以后，她驱车到马卡蒂市政厅表示她对几百个人（绝大多数是青年）的支持，他们从昨夜起就在那里守夜，保卫投票箱。

为了表示充满信心，马科斯在2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可能的最坏的结局”，是他最后仅以领先120万张选票的优势战胜阿基诺夫人。因为在他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他领先阿基诺夫人220万张选票。与此同时，科拉松也宣布，“对马科斯总统来说，目前放弃他现在拥有的权力才符合我

们国家的最大利益。”

到2月9日，在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工作的30名计算机操作人员伤心地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以抗议“明目张胆地篡改他们正在输入终端的直接从选区报上来的选举结果”。这一辞职行动由16名在那里工作的程序编制人员发起，尔后又又有14名其他工作人员跟着提出了辞职，一起加入抗议的行列。

到2月10日，马科斯继续宣称，根据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布的统计结果，他以压倒一切的优势获得连任总统的资格。同时，托伦提诺的票数多于劳雷尔。拥护科拉松的国民自由选举运动公布的结果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在总统选举中负责正式检票和宣布最后选举结果的唯一合法机构是国民议会。

这个机构宣布2月10日下午开会，以便开始正式清点从全国73个省、59个市和大马尼科市7个区汇总的选举统计报告。按照法律规定，除非有足够的合法理由推迟，否则，国民议会必须在自检查选票统计之日起的15天内宣布大选的获胜者。据政府副总理何塞·A·罗诺称，如果所有检查选票的证书都能及时提交，那么，国民议会就能在48小时内完成正式的验票统计。

现在，选票已经无法有一个统一的结果。马科斯和科拉松各抒己见，让世人难辨真假。

马科斯再一次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面对新世界”节目记者的采访。他说，尽管有报导说他可能想使这次总统大选无效，但他并没有这种打算。他还强调说，他不会解除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法维拉·C·贝尔上将军的职务，因为有可能取代贝尔上将军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菲德尔·V·拉莫斯中将已卷入了一件侵犯人权的案子。马科斯总统在接受采访时，突然尖锐地反问记者：“当他（贝尔）已由总统个人选定时，为什么你们要我任命另外的人担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同时，科拉松又来到圣多明戈教堂和巴克伦拉教堂做感恩节的弥撒。数千名礼拜者跟着她，教堂里挤满了人，有一些人不得不在教堂外面收听广播。他们穿着黄色和绿色的（这是科拉松和劳雷尔的颜色）服装。

红衣主教说，选举是“人民力量”和“集体团结表现”的证据。他赞美全国公民自由选举运动的志愿人员，并说，“上帝不会原谅马科斯”。

四周的人们高呼起“科丽，科丽！”并打着“L”的手势。

科拉松刚要走到讲台上发表讲话，她的安全人员突然把她从祭坛上推下。有人发现一个腰间别有手枪的人，正站在群众前面。他们上前大声指问他为什么带手枪来参加弥撒？那人匆匆离去。

应邀前来菲律宾的美国参议员、菲律宾大选美国观察小组的组长卢加尔离开了菲律宾。他在离开菲律宾之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有关这次大选的统计选票工作，由于秩序混乱已受到舆论的谴责。因此，他在返回华盛顿后，将向里根总统提交一份美国观察小组对选举中出现滥用职权和弄虚作假等不正当行为的初步报告。他强调说，他和他的同事在菲律宾目睹了新闻报导所揭露的对这次大选的公正在暗中进行破坏和干扰的企图，而且无论是在投票还是在点票过程中，这种破坏的企图从未有过收敛或停止，整个大选过程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麻烦。

美国政府开始对此表示深切的不安。在这一敏感的时刻，海地的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被迫乘坐一架美国空军的飞机离开了他的岛国，流

亡海外。美国政府说，自从 1985 年 11 月 28 日海地爆发全国性反对杜瓦利埃 15 年暴政的抗议活动以来，已有 50 到 60 人死亡。这还是保守说法。杜瓦利埃家族统治这个加勒比岛国有 28 年之久，美国政府透过杜瓦利埃的命运，万分担忧菲律宾的前程。

但是，里根总统不顾国务院顾问们的劝告，在实况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在菲律宾大选中：“双方都有舞弊行为”。里根似乎认可马科斯是赢家。这令白宫的许多助手处境尴尬。里根含糊其辞道：“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真有足够的证据来继续指责。我甚至可以肯定，即使在我们自己国家的选举中，某些地方也有舞弊现象。我不了解那里的舞弊程度究竟如何。而且，我们是否能证明所有这些指责不过是出于偏见，或者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舞弊，不过是一种选举战术而已？”他同时要求科拉松和马科斯“一起工作，组成一个有活力的政府”，并“进行改革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两党制”的办法。他说，美国将保持中立，在投票数字计算完毕以后，“我们希望那时同菲律宾人民依旧有和过去历史年代所保持的同样的关系。”他提出，“双方必须共同工作来实现为保证稳定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改革。”

科拉松非常愤怒，她在科胡昂科大楼竞选运动总部挤得满满的记者新闻发布会上说，不知道里根总统在美国电视里是否看到了菲律宾选举中的暴力事件，或者是否听到了他所派遣的观察员的报告。她说里根总统在对菲律宾选举发表见解以前，应该与他的大使馆、外国观察员和新闻媒介核实一下。

“没有一个菲律宾总统曾经象我一样在选举中得到压倒多数的选票给予的援助。对于一个民主政体的朋友选择与马科斯合谋在菲律宾人民的解放问题上欺骗他们的做法，我对他的动机有怀疑。”她呼吁美国，“不要为了目光短浅的自我利益作出错误的行动，去支持马科斯。”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听了科拉松·阿基诺的讲话，急忙到她的总部去做一番解释，不要误解美国的里根总统。

里根宣布他将派遣善于调解纠纷的外交老手菲利普·哈比卜调查菲律宾选举舞弊一事。哈比卜曾于 1974—1976 年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菲律宾比较了解。这位哈比卜受命于 2 月 14 日抵达马尼拉。在他到达的两小时后，菲律宾国民大会宣布：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多出对手 150 万张选票再次连任菲律宾总统。

三、竞选马拉松

据说，这并不是哈比卜的意思。哈比卜一下飞机，就直奔马拉卡南宫。贸易和工业部长罗伯托·翁平受命代表政府与其会谈。翁平后来说，哈比卜向马科斯施加压力。美国并非要马科斯辞职，不过是要要求马科斯作出一个姿态来，改组一下内阁，以此来平息美国国内批评他的声音。哈比卜提出的其中一个条件是让拉莫斯替代贝尔。这些是白宫继续支持马科斯政权的条件。里根和哈比卜没有要求马科斯下台，相反，如果马科斯能采取这些行动，里根将支持他作为菲律宾总统继续留在马拉卡南宫，至少到1987年干完他这届总统任期为止。

马科斯却一口回绝了哈比卜的要求。政治中的勾心斗角才是真正他说也说不清楚。马科斯靠着美国撑着他的政权，美国靠着马科斯保护着他们的军事基地。当这种默契受到某种利益冲击时，他们就不会站在一条战线上。现在，美国需要的是基地永久地存在下去，马科斯需要的是再次当上总统；美国认为马科斯已经难以登上菲律宾总统宝座，而马科斯对未来仍旧充满信心。所以，马科斯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建议。他知道他的对手什么时候在犹豫。很明显，里根的态度并不坚决。翁平说，问题的焦点是贝尔的去留。贝尔一直在对马科斯说他的处境不安全。马科斯最终同意由拉莫斯接替贝尔担任总参谋长，但后者仍要留任秘密警察的头目——这种安排不过是修饰门面，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翁平说，对于马科斯的这一安排，哈比卜同意了，但交换条件是让翁平代替科伊出任驻美大使。此外，还要作一些内阁调整，可能是要解除旅游部长阿斯皮拉斯和新闻部长森达纳的职务。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人与尼诺伊·阿基诺谋杀案有关，因为当时他们都在场。马科斯意识到他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就同意了哈比卜的要价。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胜利。事实上，他并没有付出什么。与哈比卜的谈话一结束，他就公开宣布贝尔将军将从总参谋长的位置上退下去。但他在这个决定的具体生效日期上闪烁其辞：贝尔将军起码还要干到3月1日，在这之后，他仍将是秘密警察的头目和高级军事顾问。哈比卜在马科斯身上的计划完成后，下一步，就是去找科拉松阿基诺。

但科拉松·阿基诺没有给哈比卜一个满意的答复，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

就在里根总统宣布派出哈比卜之时，科拉松·阿基诺就不屑一顾他说，这个人在最近结束黎巴嫩内战的使命上并没有显著的成绩。此时此刻，科拉松正同她的支持者们商议，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与马科斯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那些日子令人们焦躁不安。

人们奇怪科拉松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一个志愿团体的领导人向科拉松提出建议：成立一个由主要反对派领导人组成的研讨会。

科拉松同意了。她在蒙德拉贡大楼接见了350名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工商业者、专业人员、政界人士、城市贫民、教士和军人，讨论他们准备发动的抗议运动。于是，一个新的联盟成立了：它包括温和社会民主反对派团体、教会、武装力量的改革分子。但这个联盟没有全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激进左派。

温和反对派的许多领导人坚决要科拉松采取强硬的立场和举行游行或群众集会，他们希望这些行动可以导致攻击总统府强迫马科斯交出政权。有一

次开研论会，他们甚至要号召武装斗争。科拉松对此感到吃惊，就她而言，如果他们要通过暴力撵走独裁者，他们可以我一个新领袖。

科拉松反对示威，她担心示威可能导致暴力。她也不愿干被认为与激进分子有联系的任何事情。她认为这种联合将给马科斯以进行镇压的借口，或者使良好组织的激进分子有机会强迫他们服从。把全国民主同盟排除在外是容易的，因为它抵制选举，丧失了代表的权利。有人问她是否愿意接受全国民主同盟参加，它的百万成员和全国范围的组织将为公民不服从运动提供有经验的领导人和广大的支持者。她回答说，“我没有同全国民主同盟的人说过话。塔纳达告诉我，他们很想同我谈一谈。我告诉塔纳达，最好还是请他们同他谈话。”

科拉松也不喜欢另一个建议，就是把大粪倾倒在美大使馆门前，以表示他们对里根政策的厌恶。她说，“我相信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太不卫生了。”她决定采取她的顾问团向她提出的另一个建议，到全国各地旅行，要求她的支持者实行这些决议：在马科斯就职总统那天，在圣多明戈教堂为选举牺牲者举行追悼会；次日举行总罢工和大声齐呼非暴力的讲演会。80个工商协会的联合团体——菲律宾工商业联合会主席稍后宣布，允许所属工厂和商店的工人参加一天罢工。

2月15日，里根总统对菲律宾大选一事发表了谈话，他说：“不幸的是，选举中出现了大量的舞弊和暴力行为，其中大多数明显与执政党有关，而且其程度是如此之严重，以至于无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美，人们都对选举的可信度表示怀疑。”他没有说他要抛弃马科斯，相反，他对马科斯给予了许多的同情。他要求菲律宾的反对派停止争吵，与他在马拉卡南宫的那位老朋友作笔生意。他说：“在这个困难时刻，所有有责任心的菲律宾人都应该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避免暴力。后者只会让那些反民主的人坐收渔利。”里根的讲话被众多的人理解为是为了美在菲律宾的基地。

2月16日，科拉松·阿基诺在100万市民参加的声援阿基诺夫人的集会上发言。最初；她的支持者们并不赞成她召集这样一个集会，他们认为，菲律宾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习惯于选举暴力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安蒂克省前任省长埃弗利奥·贾维埃就在投票选举后不久被人枪杀在省会大厦外面。科拉松坚持这样做。她说，“如果人民不支持我，我要知道；如果他们支持我，我也要知道。我一定要彻底知道人民是不是仍然相信我取得了胜利。”倘若没有大量的人民参加集会，那么，领导这样快就忘掉对选举行为愤怒的人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科拉松单独作出了举行这一集会的决定。给予她的是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她面对支持她的人们，更加信心百倍。她发誓说，她要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撵走马科斯——这是在菲律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惊人之举，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简单得体的紧急措施迫使马科斯下台。

科拉松也想要使马科斯明白，目前他统治的这个国家并非受人民之托，因而也就不存在他继续统治下去的必要。科拉松·阿基诺的这一非暴力学说，起源于印度圣雄·甘地创立的“真理的力量”学说，是一种要求人们以爱为基础做出彻底牺牲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本世纪的30年代，印度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那些誓死忠于甘地的支持者们跟随甘地来到印度沿海的盐场举行反对英国统治的非暴力民众不服从游行。这期间，他们任凭当时前来镇压的警察的拳打脚踢，从不还手。这场运动最后导致“食盐进军大屠杀”，由

此使得甘地的支持者和印度人民为从英国人手中争取独立而更加努力战斗，最终完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印度社会改革。

科拉松·阿基诺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迫使马科斯放下他手中的权力。她向全菲律宾人民号召说：

（一）联合抵制阿基诺夫人所指的“嫡系”报纸。例如：《马尼拉每周公报》、《每日快报》、《时代日报》、《人民杂志》和《时代》周刊。

（二）停止资助和光顾那些为马科斯的亲信所拥有的公司，例如：圣米格尔啤酒有限公司、鲁斯坦百货公司、联合银行、商人皇家银行、联合椰子种植者银行、菲律宾国家银行和其他一些公司及企业。

（三）延期交付水电费，直到因拒付款而使那些水电管理机构将要倒闭为止。

（四）督促警察和军队凭良心办事，停止效忠“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总统”。

（五）政府雇员和私人企业雇员提出贷款申请，集中攻击社会安全制度和政府福利保险制度。

（六）在马科斯作为总统宣誓就职这一天，全国罢工，各阶层人民对马科斯政权进行联合抵制（马科斯预定在他被国民议会宣布为当选总统 10 天后，也就是 2 月 25 日宣誓就职）。

（七）在非暴力原则下，组织各街道和社区举行协调一致的抗议活动。

2 月 17 日，哈比卜与马科斯再次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讨论里根总统妥协方案的细节部分。哈比卜告诉马科斯，他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并与反对派分享政权，不然的话，他将失去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马科斯反击说，如果里根停止美国援助以抗议欺诈选举，他将废除基地条约。

哈比卜又同科拉松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极力劝说阿基诺夫人要顾全大局，但被科拉松不客气地拒绝了。她说，她唯一能接受的条件就是马科斯立刻下台。“不要再来看我，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我应与马科斯先生的政府合作的话。”

事后，科拉松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这是菲律宾的事情，将由菲律宾人民来解决，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每一个地方民主政治的朋友的理解和支持。马科斯先生试图夺取胜利而使用的暴力、恫吓、欺骗和贿赂是不健康和不民主的勾当。试图混淆这个极为明确道理的任何人在不是在帮助菲律宾人民，而是背叛了他们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

哈比卜又专程拜访了红衣主教辛。他们谈到阿基诺夫人时，红衣主教辛赞美地说：“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天使。”

在这之前，伊梅尔达·马科斯也曾几次来找红衣主教辛。她送给他一个十字架，上边布病金刚钻并刻有“你的亲爱的”的字样。

红衣主教辛把第一夫人赐赠的礼品给卖了，他把钱捐给了慈善事业。

有一天，伊梅尔达·马科斯下半夜来找红衣主教，要求辛干涉主教们反对马科斯的会议。红衣主教拒绝了，他说：“夫人，请你不要夜间来此，人们会猜疑你和我睡觉，这很不好。天亮以后来就可以了。”

2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以 85 票对 9 票通过了一项谴责菲律宾选举的决议。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说：“科拉松·阿基诺在选举中获得了完全的胜利。”美国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小组一致通过决议，暂停对马科斯政府的军事援助，今后美国将只通过民间和教会的渠道提供援助，直到菲律宾建立合法

政府为止。这是自菲律宾这次提前选举以来，美国上层之间相互矛盾的第一个结果。

尽管这结果不代表里根的意思，却对马科斯打击极大。他指责这种行为是外来干涉，并发誓菲律宾不会屈服于外来压力的。马科斯还警告说，如果他的对手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将煽动暴乱罪控告他们。

科拉松·阿基诺此时正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举行的集会上发言。她说，反对派积极开展的非暴力斗争的立场决不会动摇，除非“我们使马科斯先生屈服、下台”。

让集会群众开心的是，科拉松说，马科斯总统是“另一个正在生成的杜瓦利埃”。她以此来暗示马科斯在不久的将来也要紧步杜瓦利埃之后尘，最后逃离菲律宾。

2月21日，美国特派员哈比卜再一次劝说科拉松·阿基诺作出一些让步，结果也不尽人意。科拉松此时正准备离开马尼拉去宿务，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会。

据法新社发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报道说，正当菲律宾的动乱日益恶化时，里根总统终于改变了最初的主张，决定支持反对马科斯总统的力量。报道说，里根表示，2月7日的菲律宾选举中，“主要由于马科斯领导的执政党新社会运动以欺骗和暴力手段作恶”，使这次大选的公正可靠性“变得令人怀疑起来”。与早些时候支持马科斯总统的立场相比，美国总统的立场有了很大的改变。据说当时里根曾保证说，如果马科斯连选连任，美国将扩大对他的支持和援助。显然，里根总统发表的这一新声音，是他收集并研究了菲律宾观察大选的美国观察小组的报告的结果。里根说：“虽然我们的观察小组迄今尚未结束其使命，但事实已经有了，明显地令人感到悲哀。这次菲律宾总统大选已被主要由执政党广泛采取的欺骗和暴力手段所操纵，情况如此严重，以致无论是在菲律宾还是在美国，人们对这次选举的公正可靠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科拉松和劳雷尔及所有的反对派对此感到了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科拉松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虽然这是菲律宾自己的事情，将由菲律宾人民自己来解决；但是，我们期待每一个地方民主政治的朋友的理解和支持。马科斯先生试图夺取胜利而使用暴力、恫吓、欺骗和贿赂，这些都是不民主、不健康的勾当。试图混淆这个极为明确道理的任何人，不是帮助菲律宾人民，而是背叛了他们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科拉松宣布，她将继续走向全国，以温和形式的公民不服从的非暴力抗议。

科拉松还和她的主要支持者们同欧洲国家及日本的大使接触。两天之后，12国欧洲议会谴责菲律宾的这次选举是一个骗局，并表示支持科拉松·阿基诺。

哈比卜向科拉松·阿基诺提出，能否在与马科斯分权的基础上产生一个方案？

阿基诺夫人断然拒绝了美国人的建议，尼诺伊不是为与马科松分享政权而离开美国波士顿的，科拉松也不会拥有了权力分享而就此罢休。

美国人又在菲律宾武装改革运动组织中打起主意，这正中恩里莱的下怀。

那么，科拉松是怎样夺得最后的胜利的？

第七章巷拏大地谁主沉浮——菲律宾的 2 月革命

科拉松知道，她在此时既不能相信美国，更不能与马科斯组成什么联合政府。她忘不了专制独裁的马科斯对尼诺伊的不公正的判决。

尼诺伊调查委员会将他们的调查报告提交最高法院后，它被称作“世纪审判”案。该案在反贪污法院备审案件目录中被作为刑事案件第 10010 号（谋杀小贝尼格诺·阿基诺）和第 10011 号（谋杀罗兰多·加尔曼）而记载。这两个案子被法院合而为一，当作一个案子来处理。

反贪污法院第一处的法官曼努埃尔·R·帕马拉主持审理这一案件。他保证审理过程不托延，最多不超过三四个月。但托延是无法避免的，帕马拉最后用了 7 个月的时间，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判决：贝尔将军与其他涉嫌的 26 名被告均被宣告无罪。

一位记者在总结这一案件调查过程时写道：“以帕马拉为首的法庭在注意到被告方面论据天衣无缝的同时，又在原告方面提出的论据中找出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该法庭决定以裁定被告有理的方式排除了所有疑问。至于最后的结论，恰好证明在暗杀事件后，马科斯总统提出的有关此案调查分析的结论：一名受雇于共产党的凶手，在阿基诺正准备登上一辆有众多士兵护卫的敞篷车时枪杀了他。”

最后的现实也正像马科斯设计的那样：已过退休年龄的贝尔将军由于被宣判无罪而官复原职，继续担任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而代理总参谋长的拉莫斯则退回原职，仍然担任副总参谋长。

这一结论的得出，正好在大选前两个月的 1985 年 12 月 2 日。科拉松·阿基诺没有再发表任何声明，对马科斯所有的指责、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她最好的斗争结果，就是把马科斯赶下菲律宾总统的宝座。

一、革命前夜的菲律宾

哈比卜于2月23日提前离开菲律宾。

美国政府自从里根总统的新态度明确以来，对马科斯总统开始实施了更加强硬、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他下台。里根总统已经确信，他的多年的私人老朋友已经老朽得对美国不再有用；特别是马科斯在大选中的所作所为，明显地在菲律宾人民中失去了他以往的魅力。作为美国总统的里根，此时此刻不能不考虑他们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不能不考虑美国的社会舆论。

由于科拉松·阿基诺拒绝美国人的和谈企图，美国国务院、国会和美国的情报部门强烈要求里根总统不要陷得太深，要让马尼拉的各种势力自然发展，尽管这种自然发展中显然有许多不自然的东西，但他们请求他们的总统在这个时候还是尽量保持沉默为好。

里根总统已经别无选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好像就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时里根总统还要一意孤行，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要受到极大损失。所以，他只能如此。

现在，美国政界在菲律宾问题上已经统一了观点，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国家的局势。美国人说，“我们现在考虑的不是马科斯是否打算下台的问题，而是他怎样下台和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他们认为，马科斯在菲律宾掌握权力的时间越长，在菲律宾的共产党的势力就会变得越大。所以，美国政界权威人士开始向马科斯施加压力，美国军界人士则把注意力转移到拉莫斯身上。

就在科拉松·阿基诺和多伊·劳雷尔在菲律宾掀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蓬勃开展之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华盛顿的同行们在讨论，是否为军队改革运动计划开绿灯。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有关有面早在哈比卜离开菲律宾的前两天（2月20日，星期四）就已经把最初的信号传给恩里莱和军队改革运动，因为这个组织就是在那一天决定将政变计划暂定为星期天凌晨两点。如果马尼拉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不敢肯定里根的妥协建议注定要失败，如果他们认为无需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他们是不会发出信号的。

这些人甚至没有征得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的同意，就自己武断地作出了决定。从理论上讲，只有在里根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哈比卜带回来的情况并作出决定后，美国才能对菲律宾政变发出最后同意的信号。

几年来，在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里根总统不理解、也不关心这一领域工作的微妙敏感之处。因此，如果能让政变在里根不得已首肯前数小时发生的话，那是自然再好不过的了。

里根此时还没有最后给中央情报部门一个小小的示意。

恩里莱也没有向任何美国知己表达他的打算。军队改革运动组织虽然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但军队尚未部署。直到政变前48小时，军队的指挥官们还在品尝着美酒加咖啡。恩里莱私人军人组织的成员们仍在卡加延的营房里抽着香烟。当里根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时，恩里莱开始动心并有所行动。

恩里莱的朋友们给他出谋划策，让他和军队改革运动立刻行动起来，既不让华盛顿知道，也不让里根总统插手。就在哈比卜最后一次拜访科拉松·阿基诺时，恩里莱开始起草他的辞职报告。他对外界的朋友说，他准备星期一向马拉坎南宫递交辞呈。第二天就是马科斯原定的总统就职仪式日子，恩里莱的辞职报告不过是一种手段。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安排。因此，

如果国防部长打算在星期一履行其正式辞职手续，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恩里莱在电话中毫不隐讳地向记者提起这事儿，并说准备在第二天上午，在马克蒂区的阿特利姆大厅举办一个咖啡招待会，解释他辞职一事的原委。

一直是菲律宾总统和美国人的交易中心的贝尔也有他的一番打算。他已经开始拟定内阁中背叛马科斯的黑名单。他们是：贸易部长罗伯托·翁平，内阁总理塞萨尔·比拉塔，国防部长恩里莱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拉莫斯。

比拉塔是一位不关心政治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他的行政管理能力评价很高。在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机构的压力下，马科斯把比拉塔提到了总理的位置上。外国人对他的称赞使贝尔误认为他也是一个对马科斯统治不满的人。同时，为了防止比拉塔与其他政治势力沾边，贝尔将他的警卫人员全部换成了他自己的人，昼夜“保护”他的安全。据接近比拉塔的朋友讲，他说他“被吓得连大便都屙不出来了”。

贝尔企图用同样的方法对付翁平。当他提出要给翁平提供一队“保镖”时，翁平也真地被吓了一跳。他婉言谢绝了贝尔的“好意”，马上去找恩里莱求援。恩里莱给他派了一队全部由军队改革运动军官组成的警卫。作为菲律宾华侨金融社团的领袖，罗伯托·翁平和海梅·翁平兄弟俩儿一直是让贝尔头痛的人物。几年来，贝尔一直想接管马尼拉唐人街的金融资金地下交易所和厄米塔旅游区，但是他失败了。华裔社团控制着菲律宾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并效忠于翁平家族，他们与贝尔手下的流氓团伙经常发生冲突，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这帮恶棍的毒打是家常便饭。所以，贝尔一直仇恨翁平兄弟。

贝尔是一个很有心劲的人，他直到把一切真相调查明了，才向马科斯汇报。此时，哈比卜还没有离开菲律宾。

贝尔说，哈比卜来菲律宾是在煽动一场政变。贝尔告诉马科斯，翁平、恩里莱和拉莫斯都卷入了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刺杀马科斯的阴谋，刺杀任务将由军队改革运动来完成。有消息说，几艘美国军舰停泊在菲律宾近海待命。贝尔还向马科斯提供了一份哈比卜逗留期间同军队改革运动的几次秘密聚会和正在策划的阴谋的材料，其中包括哈比卜同恩里莱和拉莫斯的会面。

贝尔声称，翁平利用其首席代表的身份密谋反对马科斯。

贝尔还将翁平拒绝接受他派去的保镖而接受恩里莱的保镖作为证据，来证实他的观点。贝尔还说，恩里莱派去的保镖，实际就是受过训练的军队改革运动的刺客，他们效忠恩里莱和拉莫斯，准备借助警卫身份随翁平一起进入马拉卡南宫谋杀马科斯。

马科斯当即命令贝尔马上逮捕翁平的警卫。

贝尔也是一直等到天黑才得手，将翁平的警卫都抓进了马拉卡南宫。贝尔将这些警卫逐一审讯。他原设想一旦这些人交待了暗杀计划，就立即让他们上电视，将军队改革运动的阴谋公布于众。但是，在审讯中，贝尔意外地了解到了军队改革运动的真正计划，那就是早在6个月以前就拟定好的、在这个星期日（即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统仪式这一天）凌晨两点用突击队从帕西格河攻打马拉卡南宫。现在，贝尔掌握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主动权。他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美国情报部门也很快就掌握了贝尔的行动计划。几年来，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菲律宾建立了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电讯网络和情报基地。它能够监听全亚洲无线电以及微波电话的传送情况，并且与监测卫星相连接。

监测卫星甚至能辨别汽车牌照上的数字。虽然这些设在菲律宾的设施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但它们也同样密切注意着菲律宾的情况。美国人能很容易地监听到贝尔在群岛上的所有秘密联络。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帮助贝尔获得了自己的通讯联系网络，菲律宾国家情报保安局和总统安全卫队也使用这条网络。80年代初，这套设备又增加了最新的电脑系统。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不仅可以监听到贝尔的全部联络情况，而且可以随时切断系统内的传递信号，或者塞进假情报。如果贝尔使用密码进行联络，美国人也能立刻毫不费劲地破译出来。

美国的情报人员很快就发现了贝尔发给马尼拉郊区部队的密码信号。就在2月18日，哈比卜穿梭于马科斯和科拉松之间，为里根的和平妥协建议而奔波时，恩里莱的美国朋友向他透露：贝尔将军将对军队改革运动采取行动，同时还可能对拉莫斯、恩里莱和罗伯托·翁平下手。这一天是星期二。

星期三，恩里莱的朋友再次提醒他说，贝尔已命令总统安全部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他们把最新获悉的情况提供给恩里莱。

星期四，贝尔将其在马尼拉市郊的部队进行了重新的部署。恩里莱和他的军队改革运动组织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变化。此时，如果让贝尔继续下去，美国大使馆在菲律宾的许多重要内线人物将被迫保持中立以保护自己。哈比卜此刻仍居调停，但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向军队改革运动发出了同意政变的信号。定于星期天凌晨发起的政变，立即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大使馆随后谎称说，菲律宾军队改革运动自行作出了抉择；此时政变计划已进入运行轨道，再想改变已是不可能的了。

星期五，恩里莱的朋友通知他说，贝尔已下令，准备逮捕一连串的反马科斯政权中的政府人物。

星期六上午，恩里莱驱车来到马卡蒂区的阿特利姆大街，在第365号俱乐部出席咖啡招待会，与前来采访他辞职一事的记者见面。就在他们闲谈时，恩里莱接到一个电话，获悉贝尔在夜间逮捕了军队改革运动中负责保护翁平的小组。几分钟后，翁平本人也来电话，证实了这次逮捕行动。翁平提醒恩里莱要多加小心。于是，恩里莱国防部长缩短了他的记者招待会，直奔家中吃午饭。

一到家，他就看到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格雷戈里奥·霍纳桑上校、爱德华·卡普南上校和一些军官及国防部的亲信助手们正等着他。妻子克里斯蒂娜在那儿忙着招待客人。这些人提供的可靠消息证明，贝尔已指派他的人马盯上了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霍纳桑对恩里莱说，“如果他们对我和其他人发出逮捕令，最终会牵连到你，你可能也难逃幸免。”

恩里莱的美国朋友送来了另一条紧急消息，他们刚刚截获到贝尔的一个命令，他已经下令逮捕恩里莱、拉莫斯、翁平等人。原定的计划已经告吹了。如果他恩里莱还想有所作为，他就必须采取行动。

哈比卜提前3天离开了菲律宾。如果这里即将风云骤起，里根总统的特使是不宜留在马尼拉的。否则，人们都会认为他与此事有关，或者要对此事负责。

恩里莱在书房里对他的“小伙子”们说，他们有两个选择：四下散去或进行战斗。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军官们主张立刻分散到各个岛上，先隐藏起来，然后再组织进行战斗。他们问恩里莱选择什么。

恩里莱沉思了一会儿，他的膝盖抖得很厉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站

起来。军队改革运动组织可以转入地下，但他却无法作出这种选择。他从椅子上支撑着站起来，疾步来到柜子前。柜子里摆着他心爱的渔具和枪支。他把手伸了进去，拿出了一支乌兹冲锋枪，又拿起了一件防弹背心穿在身上。他的两脚仍在不停地颤抖。他抓起电话要通了克拉姆军营的拉莫斯，向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他们约定马上在阿吉纳尔军营见面。

二、恩里莱与拉莫斯

独裁政治的一个痼疾，就是一旦密谋成为一种惯例，政权内的一些人就开始为争夺继承权不择手段。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由于它地处亚洲，又受美国政治的影响，所以它的政权内部出现的竞争派别、集团和个人崇拜者也有它的特殊性。他们靠着崇拜获得利益和向外拓展的机会；任何一个拥有了机会的政治家们，都想通过他们在国外的势力求得更大的权力，恩里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年过六十的胡安·庞塞·恩里莱是一个整洁的男人。他一头浓密的黑发，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小得许多，清晰的脸上戴着一幅无框眼镜，看上去，让人觉得他更象学者。他出生于1942年的情人节（2月14日），那时，他居住在吕宋岛东北部的加延省一个叫贡萨加的小镇。他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名叫佩特拉·弗鲁加南。恩里莱是一个私生子，所以母亲给他取名为华尼托·弗鲁加南。同马科斯一样，他的真正的父亲是一位极为有钱有势的人。不同的是，恩里莱没有象费尔南德·马科斯那样从小就受到他亲生父亲的庇护、暗中资助，据说，他的亲生父亲根本就不知道有他这样一个男孩子。他在穷困中长大，读书时期，他曾赤脚上学，但学习成绩却是名列前茅，他梦想自己将来当一个科学家。他靠在城里给一个富翁的女儿当家庭教师，贴补生活。

17岁那年，4个暴徒袭击了他。他的胳膊、肚子和咽喉三处被刺，险些丧命。康复后，他向地方当局控告。当地官员说，要么忘掉这件事，要么离开小镇。于是，他动身前往马尼拉去找他的父亲。他做过渔民、铺路工，几个月以后，他才到达马尼拉。他的父亲对他的来到感到吃惊，最后，还是承认了他。

恩里莱的父亲叫阿方索·胡安·恩里莱，出生在菲律宾的伊洛尔戈，是马尼拉大公司律师中的一员，同时，也是德威特——珀金斯——恩里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负责处理麦克阿瑟将军的本格特金矿之类的大公司事宜。唐·阿方索决定承认这个儿子，并同意支付他的教育经费。从此，华尼托·费鲁加南便成了胡安·庞塞·恩里莱。

恩里莱进入了耶稣会设立的阿特尼奥中学。

1953年从菲律宾大学毕业时，他的法律考试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

1955年，他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回到马尼拉后，他成了父亲事务所的帮手，并很快成为群岛最机敏的公司律师之一。

1955年——1962年，恩里莱还在菲律宾远东大学任教，教授法律。

1964年，恩里莱被马科斯招来负责处理他的个人法律事务——这是一个错综复杂又有利可图的工作。

马科斯当选总统后，任命了恩里莱一系列职务，其中包括海关总监、司法部长、国防部长。恩里莱是马科斯最亲密的部下，他常常受命为马科斯想采取的行动寻找合法借口。恩里莱对马科斯的了解也许要比他的其他密友了解得更多。许多人认为，恩里莱才是军事管制法的真正设计者、主要执行人，他对这项法律中的虚假和过火之处负有很大责任。他后来承认，他伪造了袭击他的座车事件以此作为军事管制法的最终借口。

尼诺伊长期监禁期间，恩里莱充任监狱“看守”，谁想到尼诺伊的单人房间去探牢，都要得到他的批准。

恩里莱作为马科斯顾问期间，获利极大。他是接管椰子工业的主要人物。

除了总统以外，他的最亲密的伙伴是科拉松的叔叔科胡昂科。因而，恩里莱在菲律宾是居马科斯、科胡昂科之后的第三大富翁，远远超过了圣米格尔的亿万富翁安德列斯·索里亚诺和金融家恩里克·索菲尔。

恩里莱住在马尼拉一幢最豪华的住宅中，他在卡加延河谷占有大片地产。他拥有8家伐木公司，为他的泛远东与欧亚火柴公司提供原料。他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许多董事会的成员，以及菲律宾国家银行和其他银行交易所的主席。在回答关于腐败的指控时，这位极其聪明的政治家说：“如果你在一张地契上发现我的名字，这张地契就归你了。”为了安全起见，他又补充说，他要让陷害者“吃下文件”。

恩里莱娶了容貌出众的克里斯蒂诺·卡斯塔涅尔为妻。他们有两个孩子杰基和卡特里娜。当恩里莱在加利福尼亚州购买一幢价值180万美元的住宅时，他用的是“尔涅塔斯卡”这个名字。这是他妻子未婚时用的名字的倒拼。他们还有一家名为“杰卡”的公司，用的是他的两个孩子名字的组合。

1970年，恩里莱竞选参议员，但没有成功。到了80年代，恩里莱开始受到马科斯的排斥。马科斯的一个亲戚、曾充当马科斯的司机和保镖的费边·贝尔于1981年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和伊梅尔达在马科斯的支持下，在恩里莱的家乡卡加延省与支持恩里莱的政治对手抗争，使恩里莱更远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于是，恩里莱以他国防部长的身份，加强了他嫡系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那时就有

人疑心恩里莱要建立武装根据地，准备武装政变。

贝尔的儿子欧文在1983年向马科斯提供一份有关恩里莱安全小组活动情况的报告，包括恩里莱的暗杀、绑架训练。欧文告诉马科斯，恩里莱的这些活动是针对他马科斯的。

马科斯把恩里莱找来报告和对质。恩里莱与拉莫斯在1983年7月，同马科斯谈了他们和总统及手下人、特别是贝尔的关系。恩里莱和拉莫斯请求马科斯免除贝尔及一伙的职务，马科斯拒绝了，他说他需要他们。

恩里莱对马科斯说，如果马科斯不想连任总统的话，他可能参加下届竞选。于是，恩里莱成为当时政府内部有可能继位总统的耀眼的3位人物之一，另外两人一个是伊梅尔达·马科斯，一个是费边·贝尔。有人说恩里莱脾气暴躁、残酷无情。但是，恩里莱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给人以恬淡的微笑，使人觉得他既聪明又迷人。

他的书架上放着汤因比、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我的奋斗》和《资本论》也被显眼地陈列在上面。他周围任用了一帮被描绘为“迟钝的智囊团”的男人——恩里莱具有误用滑稽词汇的天才，他说他的这帮子人是“急于赶路却踏上了刹车”。

马尼拉的记者声称，恩里莱收集了很多晾干了的穆斯林造反者的死人耳朵。但这些不过是招徕观众的伎俩和浮夸而已。那些真正了解恩里莱的人说，他是一个严肃的天主教徒，是一个缺少抵抗马科斯、科胡昂科（指科拉松的叔父）、贝尔，自然也包括伊梅尔达的勇气的人。他喜欢密谋，但却是一个宁愿由别人来实施、而自己则在一旁观看的人。这对马科斯来说，是一个优点，他不对马科斯形成威胁。

军队中还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菲德尔·拉莫斯中将。此人是准军事保安军和全国警察的头头、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拉莫斯是马科斯姑父纳西索·拉莫斯的儿子，纳西索曾经是菲律宾的一任外交部长。菲德尔·拉莫斯毕业于

美国西点军校，进而又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硕士学位，然后他作为一名青年军官在朝鲜战场上服役。他选择过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热衷于跳伞和举重运动，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跑步。在军队中，他极受尊重，特别是他的自我约束更受人崇敬。他靠自己菲薄的军人薪水过着俭朴的生活，常常被人描绘为少有的保持完全清廉的高级官员之一。多年来，在他的周围聚集着一个追求相同准则的年轻军官的坚固核心。

拉莫斯酷爱写作，具有军人当中不寻常的天赋。据说，他曾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暗示他有可能辞去他的军职，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这样做。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对贝尔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指挥官中滋长起来的那种“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现象的批评者。所以说，他同恩里莱一样，尽管他坚持说他没有任何参与军队改革运动的抗议计划，但实际上他却在暗中悄悄地支持军队改革运动。

拉莫斯是在总统一贯对待武装部队的态度上开始清醒起来的。据他说，菲律宾武装部队目前早已不是一支保卫人民利益的名副其实的军队了，他为军队内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出类拔萃的军官组成的反叛集团深感痛心，并且以十分具体的措辞对此发表了看法。

拉莫斯说，他曾向马科斯汇报过有关在菲律宾武装部队和保安军及国家警察内部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也谈了他自己对日益恶化的国家形势的看法，然而马科斯总统对这些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在此期间，他深感失望。因为他发现总统总是把他的名字作为“一种化妆品和一种除臭剂，为的是有助于维持其统治”。同时，这位将军还看到，马科斯批准向一些未经确认可靠的人发放武器，而这些人反过来又用政府发给的武器威胁菲律宾人民，企图永远保持他们已获得的国家权力。

一般说来，拉莫斯不那么咄咄逼人，他不是一个冒险家。在对抗中，他也许是一个强硬对手，但他缺乏超凡的魅力，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坚强有力。他严格的道德标准正在使他在争夺军队领导权中败给贝尔。

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制定的长远战略是树立拉莫斯的形象，确立他作为一个真诚的指挥官的声望，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来栽培恩里莱，鼓励他坚定立场。如果能安排恩里莱同拉莫斯联合起来，那么，拉莫斯有勇，恩里莱有谋，珠联璧合，好梦就能成真。

其实，恩里莱和拉莫斯早就有自己的一番打算，那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组织”。

大约从1983年以来，军官们就开始谈论贝尔在军队中的贪污腐化导致士气低落，以致于削弱了对付共产党叛乱的能力的问题。1985年初，一群上校发起了“改革武装运动（RAM）”，聚集了约700名成员和在军队中的15000名军官，另外，还有超过此数的同情者。他们开始散发文件，揭露军队中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缺乏训练和纪律涣散及福利供养不足等弊端，并指出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治机构的军队已经被马科斯和费尔破坏了。那些高级将军，许多已过了退役年龄，由于与马科斯和贝尔的关系仍然身居要职。

许多外省司令官与地方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势者结成联盟，他们中有些实际上就是军阀，养着几千名私人军队。上校们的行动受到一些退役将军的鼓励，但军方高级官员却指责他们在制造麻烦。

这个运动在1985年3月菲律宾军事学院（PMA）毕业典礼上公开了它的组织。当时，军官们身穿T恤衫，上面写着“我们属于……”（菲律宾改革

武装运动)。他们挥舞旗帜，要求结束军队中的贪污和对人权的破坏的现象。5月，恩里莱和一个军官核心小组开会计划发动政变。首先向恩里莱提出这个建议的是38岁的霍纳桑和国防部特别作战小组组长，也是38岁的陆军中将爱德华多·雷德·长普南，他们都是菲律宾军事学院1971届毕业生。恩里莱说支持他们。另外两个与这场阴谋有关的关键人物是国防部情报管理组组长、43岁的海军上尉利克斯、图林根和为恩里莱编制计划的助手、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发言人43岁的雷克斯·罗伯尔斯。

改革武装部队运动擅于建立支持政变的军事网络。他们开始在全国“游说”。利用“改革运动”的联系，在年青军官中进行非正式谈话。政变计划并不打算把马科斯赶走，而是想赶走他的“缓冲圈”——贝尔将军和由马科斯提升到高职位的他的老朋友。

密谋者准备进行的政变，得到了上校、少校、上尉们的支持。他们在9月份聚会，把政变日子定在圣诞节或元旦。恩里莱为准备工作提供资金，购买了1000件武器，大多数是以色列制造的攻击步枪和机枪。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占领马拉卡南宫。他们打算建立一个为期2年或5年的军政府，直到能够进行总统选举。马科斯将作为一个傀儡继续在位。

陆军中将拉莫斯同情改革者，但他反对发动政变的建议。尽管他的一些随从人员也参与了此事，他仍告诫他们说：“停止推翻总统的行动，这有可能导致他最后的报复。”他对部下说，“千万不要恶化局势，我们已经够容忍你们了。”

拉莫斯仍旧是四平八稳。他能容忍马科斯的奚落，容忍马科斯的军事警察的辱骂。尼诺伊被暗杀后，贝尔一度受到审查，马科斯任命拉莫斯顶替贝尔工作。这段时间，军队改革没有做任何事情。拉莫斯说是马科斯束缚了他的手脚。

当11月马科斯宣布仓促选举时，政变计划暂时被搁置一边。但是，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发现，他们的组织在竞选中有扩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于是，在1月份，他们便发动了意识运动。这是一种军营祈祷集会，促使官兵支持公正选举计划。“它给我们提供了检验武装力量的精神状态和用以组织、联系工商界、宗教界、政界和市民组织中人士而获得资金的办法。”一个与改革运动有关的军人这样说。阿基诺的主要支持者，如翁平等人，就把钱给了他们。有一些人则答应他们，如果遇到了麻烦，将提供庇护或职业。这一计划是为公众壮胆的手段，目的是让他们知道军方有人反对欺骗。

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现在还不愿意他们做出对马科斯不利的事情。“不要流血或暴力，但是你们可以为保护自己而行动。”

这样，改革武装部队运动成员的军人们找到科拉松，先是问她是否支持他们的武装政变。她知道这些军人需要她，是因为她现在是拯救菲律宾人民脱离苦海的唯一希望。尼诺伊的死，无疑在她的头上现出了一束光环，她是被菲律宾人民承认和接受的唯一总统候选人。科拉松知道这些军人的意图。她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傀儡。”她问自己，如果不是通过选举取得政权，我自己的政权又是哪一种政权呢？

改革武装部队组织的“小兄弟”们后来又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说他们要采取行动，问美国将做出什么反映？大使馆的方针是不理会他们援助的要求。就在选举前一周，一个改革派的上校还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打电话，要求美国给一点反坦克武器。可是大使馆坚持要这个上校说出获得这些武器的目

的。结果，改革者并没有要到武器，贝尔却对他们的计划有了了解。

贝尔受美国人的威胁，并不想逮捕这些密谋叛乱的军人。他设想把他们的进攻马拉卡南宫作为捕获他们的陷阱。他制定了一项“永久性计划”，包括逮捕、暗杀反对党领袖和恩里莱、拉莫斯以及改革武装力量运动的军官们。接着，就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永久性”的意思是这个计划将使现在的政权永远存在下去。

拉莫斯对此感到了愤怒。这个身材修长，光滑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边，戴着一幅飞行员的眼镜，神态举止温文尔雅的将军，此时正在家中与科拉松的“人民进军力量”成员周旋。这伙人都是拉莫斯的邻居和朋友。他们对拉莫斯说，如果他不支持科拉松、劳雷尔，就要在他房子的四周竖起标语，写上“拉莫斯辞职”和“调查安蒂克（即在投票选举中被暗杀的一个前省长埃弗利奥·乔维埃）谋杀案”。拉莫斯问大家是不是就谈这一个问题时，有人告诉他，有人要逮捕恩里莱。

拉莫斯对他的邻居和好友说，下一个就是我。电话铃又响了，是恩里莱的电话。恩里莱在电话里向拉莫斯介绍了他了解的关于贝尔的行动计划，拉莫斯不再犹豫了——生存就是如此，在这个时候，要么鱼死，要么网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拉莫斯决定与恩里莱、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人们一起，为推翻马科斯的统治而奋斗。

三、2月革命

恩里莱就在与拉莫斯见面后不久，来到了阿吉纳尔多军营的国防部。恩里莱穿着防弹背心，斜挎着那支乌兹冲锋枪。副官们忙着将军队改革武装力量的支持者们集合起来。

恩里莱先打电话给红衣主教辛，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辛保证说，他将支持改革武装部队的小伙子们。

随后，恩里莱又分别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无论是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当时都表示要尽快向各自的政府做出相应的汇报。恩里莱事后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我们失败以后全世界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

接着，恩里莱又让他的妻子将这一消息转告其他新闻界人士，并通过一个朋友，马上与反对党各派联系，要求他们对兵变在政治上给予支持。而这位朋友是前工商部副部长，昔日恩里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国民议会议员勒内·凯耶塔诺。他后来回忆说，恩里莱早在2月17日就告诉他说，他与妻子同时处于危险之中，而且一些人要暗杀他和军队改革运动成员，一些反对党领袖也将被逮捕。说话间，恩里莱的情绪十分激动和愤慨。恩里莱要求凯耶塔诺保证，如果他被杀害，就将此事公布于众。接着，根据凯耶塔诺的请求，恩里莱写下叙述这段经历的留言。他把留言装进一个棕色的信封，封好后交给凯耶塔诺时，他流下了眼泪。在信封上，恩里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勒内，万一我遭暗杀身亡，请在新闻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向他们公布这封信，以便使全世界和所有的人都知道事情的真相。非常感谢你。请看在过去的情份上照顾好我的家庭。

除此之外，万一被捕，恩里莱还请求凯耶塔诺做下列事情：

1. 打电话给外国新闻界通报此事；
2. 去见美国驻菲律宾大使；
3. 找反对党里能够帮忙的朋友（“假如我还活着，可能会被安置隐藏一段时间，向他们发出警报并请求帮助”）；
4. 打电话给红衣主教海梅·辛；
5. 照顾好他的家庭。

恩里莱最后告诉凯耶塔诺说，他准备辞去国防部长一职。“我将要求总统口头上允许我离职。”他说，“我已为他服务了20年，而现在我必须为国家服务了。”

恩里莱和妻子通完电话，他又把电话打给驻扎在兵营后面的宪兵队司令佩罗德·巴尔巴尼罗准将，呼吁他提供帮助，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和护卫兵变部队的背后。他说，如果这样做不可能的话，那么假如有政府派来围攻的突击队抵达，巴尔巴尼罗和他的宪兵可以在两军对垒中暂时充当一种缓冲力量。这位宪兵司令在电话中答应提供帮助。

现在，恩里莱和他的手下人开始准备迎接中外记者和“那些将向我们挑战的人”的到来。

拉莫斯来到了军营。这位戴眼镜的将军，仪表修饰整齐，如同恩里莱一样，他根本就不象在参加一场反叛。在与恩里莱会面后，他们便一起在这座

玻璃混凝土建筑的军营里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恩里莱仍旧穿着那件防弹背心，外面罩着一件长袖工作服，下身是蓝色工装裤和一双轻便运动鞋。拉莫斯穿着的是灰色丛林上衣和裤子，象往常一样，吸着粗大的雪茄。

恩里莱非常聪明，他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变一事，而是说，“我从我的部下那里得知，政府要逮捕改革运动的所有成员。于是，就在今天下午，我的一些小兄弟到我家里来请求我进军营。”“现在，我不能问心无愧地承认马科斯总统是我们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我相信人民的授权不属于现政权。我知道在这次选举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扪心自问，我感到我不能为一个不能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政府服务。”他声称，“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马科斯没有真正赢得这次提前竞选的胜利。”

恩里莱还提到了个人的苦闷。他告诉记者，任何提升、晋级都不与他和拉莫斯商量。国防部成了一种装饰、一副除臭剂。“我们对宪法忠诚，对菲律宾人民忠诚，对我们国家忠诚。我呼吁内阁中所有正直的成员，政府中正直的官员和正直的菲律宾人，受过教育并且热爱我们的国家、尊重我们的宪法的菲律宾武装官兵们，都应该早日觉醒，支持改革运动。”他说，他们与科拉松没有任何联系。

记者们问恩里莱，是否愿意接受科拉松为菲律宾的总统？

恩里莱说：“我不作任何结论。无论是谁，只要是菲律宾人民认为代表了他们的意志，这个人就一定会受到任何人的欢迎。”“我想，在这个时候，任何支持我们的人都将受到欢迎。”

有记者问，如果科拉松就任总统，恩里莱愿意在她手下工作吗？

恩里莱回答道：“我谈的是国家和人民，不是谈我们应该为谁效忠。”他声明，“我对权力和政府中的职位不感兴趣。我现在这样做不是因为我要荣誉、财富、和权力，我这样做是在尽我对人民的义务和责任。”

记者们仍感到不尽人意，继续追问道，如果科拉松堂堂正正地当选为菲律宾的总统，恩里莱是否支持她？

恩里莱被逼得走头无路了，他说，“是的，我在道义上确信菲律宾人民挑选了阿基诺夫人。那时，我们有义务支持她。”

拉莫斯随后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马科斯曾经强迫军方把武器发给他的追随者以进行政治恐怖和欺诈行动。他还揭露了总统计划逮捕反对党领袖和军方改革派人员的细节，由于他与恩里莱在菲律宾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他能将马科斯政府中的一系列罪恶全盘托出。恩里莱甚至承认说，他与他的部下曾在选举中往投票箱塞进了 35 万张假选票。

会场外是一片宽阔的绿地阅兵场。此时，恩里莱身边站着 200 名支持者，另外 200 名同盟正在前来的路上。这部分人就是原计划用来攻打马拉卡南宫的兵力，此刻正在缓慢地集结着。

难以置信的是，在眼下这种关键时刻，所有的一切运行节奏都格外缓慢。如果贝尔发起进攻，军队改革武装部队毫无反击之力。

恩里莱向他在卡加延河谷的武装部队发出指示，命令他们立即准备，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利用克拉克基地从空中飞过来。即使有了这些人，恩里莱仍嫌力量不强。在他们的四周，是贝尔 1 万名总统安全卫队，此外还有贝尔从马尼拉警备司令部和航空司令部调来的由伊洛戈人指挥的数千名士兵。

恩里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拉莫斯身上。

拉莫斯也在调集他的亲信部队。作为保安军和统一的警察部队首领、作

为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拉莫斯可以支配数千名士兵和警察。但是，这些人分散在各个岛上。拉莫斯和恩里莱两人都在给各个支队的指挥官打电话，要求他们支持。有些人马上积极响应，纷纷赶来，更多的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如果在这时，贝尔将军采取一个行动，恩里莱和拉莫斯的政变计划就会成为泡影。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贝尔一直没有对他们的行动有所察觉。他是不是对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的东西熟悉太多，而对军事指挥的基本知识又了解太少？总之，他错过了机会。他把时间白白地送给了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小伙子们”。他“让”他们思考、作出抉择，还让这伙人未受任何阻拦地走进阿吉纳尔多军营——这段路程要走一个多小时。甚至到了对手走进军营后，贝尔仍旧没有举动，一直到木已成舟。

后来，人们才发现，贝尔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前几天，马尼拉遍地是阴谋，贝尔仍旧认为一些小人物掀不起大浪来。他与伊梅尔达正忙碌着比森特·皮乔少校儿子的结婚典礼——在拉莫斯的空军基地教堂。贝尔手下的人非常惧怕他，不敢贸然闯入。一直到婚礼结束，贝尔才知道这个坏消息——这场婚礼，让马科斯一伙失去的是王位的代价。

马科斯在恩里莱的新闻发布会后，召开了一个电视新闻发布会。他揭露了这个政变的“阴谋”，并说，它已经流产。他宣布要逮捕几个与此事有关的军官。此时的马科斯显得越发苍老，他面对着电视机，有气无力地说，这一伙叛乱分子想要进入总统府，俘获他和伊梅尔达。他说据他的手下逮捕的人揭露，他们想要他辞职或流亡国外，邀请一些可靠的人领导这个国家；让科拉松、前总理塞扎·维拉塔、拉莫斯将军和红衣主教辛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共同领导这个国家，直到起草一个宪法和进行选举。

马科斯说，“我感到悲痛。我想不到恩里莱和拉莫斯竟会犯下这么大的叛乱罪。”

凌晨两点，贝尔给恩里莱打电话说，“你一定告诉你手下的人，不要进入总统府。”

恩里莱的条件是要求贝尔的军队不要进攻他们所在的军营。贝尔同意了。他们商定明天再共同协商有关事宜。

之后，贝尔开始调动他的军事力量，而恩里莱则用电话打给全军司令官寻求支持——其实恩里莱的战争就发生在电话中。恩里莱通过电话争取到了关键的军官和空军的直升飞机指挥部。

与此同时，马尼拉的红衣主教在维里塔斯电台发表了讲话：“我深深地关心拉莫斯将军和恩里莱部长的处境。我呼吁，到阿吉纳尔多军营去，在这个紧要关头表示出我们的人民与他们的休戚相关。他们没有吃的，让我们把食品给他们送去！”

巴茨·阿基诺也到了维里塔斯电台，他号召“全国一致的精神和团结”成员，同他一起到阿吉纳尔多军营去。

……不到凌晨两点，阿吉纳尔多军营外已有两三万群众聚集在那里。有些军官也参加了政变。马科斯让一名将军率兵去驱散人群，有一半多官兵投向了叛军一边。几小时后马科斯又让人阻止维里塔斯电台的广播，这时已经没有人再理会马科斯这个总统了。

阿吉纳尔多军营外，一片欢呼。近5万人举着小旗和标语，支持恩里莱、拉莫斯等改革武装部队运动对马科斯的背叛。

美国政府在这个时刻发表了一项声明，特别提到了恩里莱和拉莫斯的辞

职。声明说，他们指责的选举中的舞弊“极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关注，最近的选举被舞弊所玷污，表明执政党的专横与霸的作法以致破坏了选举的信任和合法性，削弱了菲律宾严重的叛乱和经济困境的能力……”

四、第三条战线

就在恩里莱和拉莫斯在马尼拉召开新闻发布会之时，科拉松阿基诺和劳雷尔刚到宿务，准备发动那里的人民进行非暴力不抵抗马科斯选举的行动。

晚上9点多钟，科拉松与她的兄弟佩平，和克里斯、邱恩科夫妇坐上从当地政界借来的一辆崭新的白色福特轿车。佩平没有让他们的安全人员跟着他们，就把轿车启动了。他告诉车上人不要说话，不要问到哪里去。

科拉松没有说什么。从参加竞选以来，她一直在这时保持着沉默，冷静地思考她即将要去做的问题。

轿车在公路上奔驰，科拉松感到他们又回到了他们离开时的那条大街。

克里斯问：“我们这是去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佩平说，他们要去该地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他们对当地的情况还不太熟悉，“这样做是为了避开跟踪我们的人。”这时，在车上坐着的其他人才发现有一辆摩托车一直紧紧地跟踪着他们。

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有一道高高的围墙，大门紧锁着。邱恩科按了按轿车喇叭，有一位修女从里面打开了大门。轿车开了进去，停放在一座巨大的混凝土大楼前。科拉松与众人一起走进大楼，佩平和邱恩科开始收听当晚的广播。科拉松躺在一张没有床垫的简陋床上。修女前来询问是否能睡得习惯，科拉松微笑地点点头。修女告诉科拉松，这里的很多人都支持她成为菲律宾的总统，她们准备誓死保卫她。

次日清晨，科拉松比预定时间还早一些就来到了宿务的马盖伦饭店，主持在那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有人告诉了她马尼拉的最新消息——恩里莱与拉莫斯举行了军事例戈。科拉松显得很兴奋，她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恩里莱与拉莫斯，让马科斯马上下台。她说，她对里根总统有了明显的态度转变感到极大的欣慰。

有人问她，这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发表声明，阐述你的观点？

科拉松说，她的朋友们看她太劳累了，所以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没有人告诉她。

新闻发布会后，科拉松与她的支持者一起前往机场，乘坐上她的私人飞机“塞斯纳号”离开宿务，飞往马尼拉。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飞机上，乘务员、机场技术员、乘客们都向她欢呼致意。飞机飞得很低，为的是避免马科斯可能派来跟踪科拉松一伙的喷气式飞机——在这竞争最危急的时刻，谁知道大权仍在紧握的马科斯会狗急跳墙到何等程度？科拉松一语不发，她只是低着头，在心里默念着《玫瑰经》。科拉松一到达马尼拉，就前往她的一个政治朋友家，给红衣主教辛挂了一个电话：“这里有一个大难题，出现了第三种力量。”科拉松问红衣主教她该怎么办？

对方在电话里说，“不，他们举行这次叛乱是因为他们要支持你当总统。到那里去感谢他们吧，没有这场行动，你只能每天组织群众去示威游行，你仍旧不是总统。但现在你是总统了，你能够看见上帝之手正在帮助你，这就是他对我们每天祈祷的回答。”

科拉松先与恩里莱用电话进行了联系，然后一行人随后赶往克科梅军营。恩里莱与拉莫斯正在紧张地工作着。拉莫斯在广播中呼吁人们前来保卫

军营，他说，“一支压倒多数的马科斯的部队已经调集，正向我们开来。”恩里莱则打电话告诉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他们的一个纵队和两个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前往的路上。如果马科斯一伙向他们进攻，将有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包括新闻记者和几个美国人。恩里莱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马科斯，对于他们的镇压，他们是不会束手待毙的。一旦马科斯发动镇压，他们就毫不留情地进攻马拉卡南宫。

恩里莱又打电话给贝尔将军，告诉贝尔说，如果政府军进攻，他和马科斯一样将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的罪人。

贝尔同意阻止装甲车前进。但马科斯一意孤行，他容忍不了他的部下对他如此无理，他要打下去。遗憾的是，他调动来的部队并没有按预定时间到达马尼拉。坦克、装甲运输车及3000名士兵在即将抵达阿吉纳尔多军营的路上时，就被一堵堵人墙挡住了。

修女们跪在地上念经祈祷，姑娘们则爬上装甲运兵车向士兵们献花，并邀请他们下来参加到反对马科斯的阵营来。人墙从几万人最后增加到了几百万。参加与镇压军队对峙的有街上最普通的市民，也有菲律宾的中产阶级。此时此刻，两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内心感受到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自发的集体意志和过去从未培植过的共同信念。这种发现令他们激动不已，很多人泪流满面。有人开始高唱，菲律宾真正的“人民的力量”就要诞生了。

科拉松也激动万分。

恩里莱向她保证说，他和拉莫斯“将把任何收获都交给科拉松阿基诺。”

佩平答应恩里莱和拉莫斯，将带来更多的人以保卫军营。

恩里莱对反对派领袖们建议：对阿基诺夫人来说，现在最好是马上就宣布成立她的政府，时间最迟也不要超过下星期二（这一天是菲律宾的星期天）。下星期二也是马科斯宣誓就职的日子。恩里莱说，他们反叛军队承认科拉松是通过“正当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准备无条件地在她的政府部门工作。

科拉松马上前往电台，呼吁人民起来去保卫恩里莱和拉莫斯及反叛部队。她说，她为他们能及早退出专制政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希望马科斯政府的其他正直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能以恩里莱和拉莫斯为榜样，早一天走向光明。

科拉松的呼吁得到了反映，不断地有人群拥来。他们中有牧师、修女、神学院的学生、上层社会的家庭妇女、青年妇女、工商界巨头、政治家、工人、学生和富有经验的街头示威者、街头流动小贩、夜游者和空想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众聚集在兵营周围。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巴尔巴尼罗将军关闭了阿吉纳尔多兵营，阻挡人们拥入兵营。随后，他组织起食品运送队，前来接收群众捐赠给兵变士兵和一些参加守夜者的食品物资。

据《每日快报》估计，午夜之前在阿吉纳尔多兵营和克拉梅兵营四周喧闹的人群有5万之多。当人们不停地吹吹打打、载歌载舞和按汽车喇叭时，整个这一地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狂欢节尽兴表演场。两个兵营的反叛者们都夜不能寐。拉莫斯向聚集在克拉梅兵营门口的群众发表讲话，人群中不断爆发出“拉莫斯！拉莫斯！拉莫斯！”的欢呼声。在发表完简短而鼓舞人心的讲话后，拉莫斯这位和蔼可亲的将军在返回兵营的路上，对《每日快报》记者说：“嘿，我们现在都失业了！”尽管局势十分紧张，但拉莫斯的情绪却很高昂。

此时，一个营的兵力正忙于准备阿吉纳尔多军营的防御措施，同时，克拉梅兵营也已经被兵变部队完全占领。这样，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两个主要兵营已经处于倒戈的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拉莫斯将军的完全控制之下。

虽然贝尔将军向恩里莱保证说，这一天晚上不向兵变部队发起进攻，但是，在这两座兵营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整夜未敢合眼。他们都相信，号称“北伊洛尔戈省的勇敢男孩”的马科斯总统，是一位极能掩饰战争的老手，对参加兵变的部队肯定会采取镇压行动。对这种可能性，甚至连那些满不在乎的新闻记者也提心吊胆。“使每一个人部感到安慰的是，这一夜晚平安无事，没有发生一起流血冲突。”《今日快报》记者这样写道：“唯一一件加剧紧张局势的事情是巴尔巴尼罗收到一份报告，称明天国防部将被坦克和海军陆战队包围。于是，巴尔巴尼罗再一次呼吁，为避免流血和伤亡，不要执行镇压计划。”

第二天凌晨，留在军营外大街上的人数不多时，反叛军队窃听到了总统府的电话，得知政府军队要在黎明时发起进攻。

清晨4点30分，4辆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果然向反叛军队所在的军营逼近。防暴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驱赶走了街上稀少的群众。一个小时后，政府军队攻占了恩里莱所在的阿吉纳尔多军营……

科拉松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克拉梅军营的情况。那里处在阿吉纳尔多军营对面。两座军营只相隔一条街道。阿吉纳尔多军营被攻陷后，克拉梅军营的战士们开始听着弥撒，接受着宗教的赦罪。他们奏起菲律宾军事学院的校歌乐曲并相互道别。他们确信无疑地认为他们不久将要死去。

破晓后大约6点钟左右，他们听到了直升飞机声。抬头远望，只见直升飞机似乎正在向军营俯冲过来。过了一会，直升飞机还在他们头上盘旋，然后向高空飞去。又过了一会，被马科斯派来镇压的武装直升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地着陆——他们弃暗投明了！军营内爆发出欢呼声，起义者拥抱着反叛者，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3架直升飞机起飞飞往马科斯效忠部队控制着的马尼拉维拉莫尔空军基地，毁坏了原来停在那里的6架直升飞机。然后飞往美国军事基地——克拉克空军基地，在那里装满弹药和燃料。

海军司令官也背叛了马科斯，他们派遣了一艘军舰对准马拉卡南宫。

科拉松想知道美国政府这时的反映。根据电台报导，就在恩里莱要求科拉松马上宣布成立她自己的政府之时，华盛顿的几个主要白宫顾问拜访了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下午，他们又找到里根总统会谈。他们认定马科斯政府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希望里根总统能做出明了的决定。很快，白宫当局就有了他们新的衷场：任何试图用武力来解决紧张局势的作法都将引起流血和国家的分裂，并造成同美国关系的极大损害，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如果菲律宾现政府使用我们美国的援助对付得到群众巨大支持的菲律宾军方和其他力量，美国政府将不能继续美国现有的军事援助。”

接着，里根总统以他个人的名义给马科斯发了一份电报，他希望马科斯一家能来美国。

科拉松派人前往克拉梅军营与恩里莱和拉莫斯联系。她的一些同盟者想获得一些武器，以防克拉梅军营一旦被占领，他们能从外面采取军事行动，进去解救反叛军人。但恩里莱没有满足他们的请求。恩里莱说，军械库在马科斯手下人控制之下，而他现在使用的武器，仅够他的手下人进行抵抗。恩

里莱告诉来者，让科拉松·阿基诺马上进行宣誓就职的准备，即便马科斯不下台，他们也应该坚持就职仪式。他让他们转告阿基诺夫人，新政府暂时任命5位内阁成员。“你们告诉科拉松和多伊，组织一个文职政府，由你们处理民事工作，我们处理军事工作。”

正说着，马科斯总统把电话打进来，他请恩里莱听电话。

总统显得热情而友好，他说他已经原谅了一切，马科斯说道：“让我们停止目前所有的敌对行动吧。”

恩里莱说，现在已经太晚了。

夜，漆黑一片。经过一天激战的马尼拉，渐渐地寂静下来。不论是政府军还是反叛军以及拥护科拉松等人的群众，都从正面对峙转入“地下斗争”。反叛军队密切注意着总统府的动静。贝尔一伙手下，将一些大炮搬进了阿吉纳尔多军营，并把炮口对准了克拉梅军营。

拉莫斯与手下不停地开着玩笑，以缓和着这寂静中紧张、焦躁的气氛。

但是，这一夜政府军队没有向反叛部队发起进攻。此时，马科斯正在忙于他的退路。按照他的指令，一条驳船在黑暗中沿着帕西格河悄悄开到总统府里的码头上。300个捆好的大板箱在这里装船，大多数箱子都沉沉的。市中心银行和货仓地下室已经被搬空，“山下藏金”（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把掠夺亚洲人民的大量黄金运到菲律宾。珍珠港事件后，它由一个叫山下的日本军人负责将这批财富埋藏在菲律宾。后来，人们称这批财富为“山下藏金”。马科斯执政以来，他就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它。他运用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寻找到了“山下藏金”的一部分。人们都不知道马科斯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哪一笔是“山下藏金”。）开始了它神秘的旅行。

驳船在夜色的掩护下顺着帕西格河驶出马尼拉湾，来到了海军总部。船上的货物很快就被转移到“总统号”游艇上。游艇起锚，先是抵达香港，后来谁也不知道它的去向——后来查问这游艇上的有关人员，所有的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与此同时，马科斯的已丹海滨别墅地下室内所有的东西也被搬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科斯下决心投降、放弃总统府，他此时只不过是预防万一。

第二天上午11时，马科斯在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科斯一家全都坐在外室，而不是主厅。因为新闻发布会已经用不了太大的地方，没有多少记者和摄影师到场，街上有比这里更精彩的新闻。

马科斯的脸肿得像只苦瓜，眼屎留在上面，给人一种极不清醒的感觉。他说起话来仿佛是在梦中吃语，他的病情好象又严重了。

有记者问，已经拥有数十亿美元的总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体面地辞职，回到别墅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过一种田园般的生活？记者认为，他这样做对国、对民、对自己都有利。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安全而幸福的晚年？

马科斯已经显得非常疲劳。20年来，他一直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独启作出任何决定，没有人敢打断他，限制他。现在他已经不再那么辉煌。反对派的势力好似澎湃的潮水，不可阻挡地向他扑来。他的政治手腕与权术，在这时已经不起作用——这就是人的渺小，他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从中作出英明的决策。他总是想到他以往的灿烂与辉煌，用他以往的信心和勇气面对以往也出现过的反对潮水。他并没想到积重难返啊——人往往是一念之差，就会酿成千古之恨。

马科斯如果这时放弃他的固执，也许他会名垂千史，流芳百世。但他现

在没有这样做。贝尔将军背着他向克拉梅军营采取了最后的“自杀性的进攻”。

美国政府得知消息后，立即发表一篇声明。里根总统已经开始公开要求马科斯辞职。他说：“用暴力手段来延长政权寿命的企图是徒劳的。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和平过渡到一个新政府。”美国大使馆向马科斯宣读了这一电文并提供给他一架飞机，供他用以离开这个国家，哈比卜还要回来帮助安排政权的转移。

贝尔并不在意美国，他再次拿起电话，准备下达进攻的命令。

又一支部队倒戈。

科拉松的发言人雷内·萨基塞格告诉报界，其实美国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实际上承认”了阿基诺政府。

马科斯仍然要搞他的就职仪式。因为，只要他宣誓就职下一任总统，他认为他不论走那里都是菲律宾的总统。他把最高法院大法官拉蒙·阿基诺（与科拉松·阿基诺没任何亲属关系）叫进总统府请他吃晚饭，并让他在马拉卡南宫住了一夜，以便这位大法官能领读宣誓词。邦邦、伊米、伊雷内以及两姐妹的丈夫陪同大法官共进晚餐。危机发生时，总统府内所有的食物都是由比亚·马雷饭店提供的。当初，阿基诺遇刺，伊梅尔达就是在这家饭店吃的午饭。晚饭由从饭店来的穿着制服的侍者伺候着。马科斯的孩子们一整夜都与他们的父亲呆在一起，因为父亲想同他们交谈。

在这漫漫长夜里，马科斯给美国国会山办公室的保尔·拉克索尔特参议员打电话，当时马尼拉时间是凌晨1点，华盛顿时间是下午2点。他们在电话里交谈了20分钟。马科斯有一个想法，即美国人用飞机把他们从马拉卡南宫救出去并带到克拉克空军基地，接着换乘飞机往北到菲律宾的伊洛尔戈地区。马科斯想暂时逗留在那里，然后再集结忠于他的部队，重新夺回政权。拉克索尔特参议员表示他将亲自同里根总统讨论此事，然后再给他打电话。

拉克索尔特参议员开车驶向宾西法尼亚大街直奔白宫。他向里根总统解释了马科斯的计划。里根说，此事已经解决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马科斯已经难以维持他的统治，但是，他的安全和尊严，可以得到保证。

拉克索尔特参议员再回国会山给马科斯挂电话时，已是马尼拉时间5点30分。

马科斯对里根的态度几乎还不相信。他沉默了许久，才说，“我非常、非常地失望。”他不相信里根总统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他。伊梅尔达给南希·里根挂电话，希望她能给丈夫做做工作。南希回话说，欢迎他们一家到美国来。

马科斯还不省心，他一时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给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老战友、劳工部长布拉斯·奥普尔挂电话。奥普尔证实了美国十分明确的态度。奥普尔尽量温和地问道，你们为什么不一走了之？

马科斯吱唔地说，是伊梅尔达不愿意离开。“她现在就在我身边。她不想走。”

马科斯又出现在他女儿伊米控制的电视第九频道上。他竭力装出极其平静的样子，说：“我们没有出国的打算。我们将誓死保卫共和国，直到我们咽下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流完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马科斯再次给恩里莱挂电话，提议建立一个由恩里莱、科拉松阿基诺和他共同执政的临时政府。他和恩里莱有这样一段对话：

总统：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恩里莱：总统先生，我的确不知道该怎样解决。

总统：难道我们不能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吗？我只是想寻求一条体面的出路。我可以取消这次选举，我可以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我将作为名誉总统任职到 1987 年，因为我希望室能清白和按部就班地退出政界。

恩里莱：总统先生，我不懂你说的，而且我们并非真的对权力感兴趣。我们的使命不是想建立一个军政府。此外，总统先生，现在一切都晚了，因为我们已经向阿基诺夫人表示支持她。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唯一使命是保证人民的意愿受到尊重，无论赢家是谁，是你还是阿基诺夫人。

总统：我们是否可以安全离开菲律宾？

恩里莱：怎么会不安全呢？总统先生，这是你的祖国，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起码在我们这一方，没有任何理由要伤害你。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很愿意为你和你的家属提供保护。

总统：如果我出国了，你认为我还敢返回来并在这里平安无事吗？

恩里莱：当然可以，这是你的祖国，总统先生，为什么不能回来呢？

总统：那贝尔将军怎么办呢？

恩里莱：总统先生，这事我无法回答你。

马科斯此时还不死心，人可能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科拉松·阿基诺与多伊·劳雷尔的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已经开始。地点就是著名的菲律宾俱乐部。

五、罕见之举——两个人进行总统宣誓就职仪式

菲律宾俱乐部一直是一个中立的公共场所，它同时还是早期民族主义者和后来的反马科斯的反对派举行会议的中心。恩里莱开始不同意科拉松在那里举行总统就职仪式，他更希望科拉松·阿基诺在克拉海军营举行这个不同寻常的总统就职仪式，理由是，菲律宾俱乐部难以保证他的安全。但是，科拉松坚持她的主张。“我不打算在军营里发表就职文告，因为那样做会给每一个人有错误的印象。”

这一天早上凌晨，就是恩里莱给她的总统宣誓就职日期的最后期限，科拉松在她的泰晤士街家中告诉她的顾问们，“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克拉梅军营对我和人民意味着什么。那里是尼诺伊和每一个政治犯被带往的第一个地方。也许，今天无比辉煌，但我忘不了它的过去。许多拷打、行刑和未经审判就拘留等行为都发生在那里。所以，我决定不在军队单位举行就职典礼。我是一个平民总统。”其实，更主要的是，她还不愿意在仪式中显露出她是通过军事政变就任总统的。

拉莫斯将军极力建议她乘直升飞机去俱乐部，也被她拒绝了。她说，“我不愿意陷入这样一个境地，飞行员要把我带到哪里就到哪里。”

外面，仍旧是硝烟弥漫。反对派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军还在展开激烈的战斗。科拉松在她的保安人员护送下，离开了泰晤士街的寓所。恩里莱和拉莫斯则各自乘坐着直升飞机飞过4个街区从克拉海军营来到菲律宾俱乐部。

这时，菲律宾俱乐部的大厅内已经挤满了人，他们都是菲律宾的上层人物。尤其是讲台前几排的就坐人，基本上国家的精华。几千名“人民力量”突击队员把脸贴在玻璃窗上，观看着不同寻常的总统就职仪式。

科拉松·阿基诺乘坐着一辆她竞选期间常用的白色雪佛兰轿年来到菲律宾俱乐部。她穿着作为运动标志的黄色的带有刺绣衣油的上衣，神采飞扬，面带微笑，不断地向欢呼人群挥手致意。她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却十分典雅，既充满女性的魅力，又透露出刚毅与坚强。

最高法院大法官克劳迪奥·泰汉基主持了科拉松的就职仪式。

科拉松·阿基诺在泰汉基面前，庄严地举右手，她把左手放在她婆婆多纳·奥罗拉拿着的《圣经》上，宣誓道，“我将忠实和认真地履行我作为菲律宾总统的职责……我要呼吁每一个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和解而努力工作，这也是尼诺伊回国的目的。”她说，在胜利的时候她是宽宏大量的，她号召那些不曾支持过她的人也要和她一起重建国家。然后，她和厅里、厅外的人们一起唱天主教歌，唱民族主义的赞歌《人民颂》和国歌，她举起手指成“L”形，表示着她的最后胜利。

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任命劳雷尔为总理兼外交部长，恩里莱为国防部长，拉莫斯中将将为菲律宾新武装力量参谋长并晋升为上将。

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是在科拉松·阿基诺就职仪式后两小时开始的，地点是马拉卡南宫。早已经说好来参加他的就职仪式的副总统阿图拉·M·托伦提诺、总理塞萨尔·E·A·比拉塔、工商部长罗伯特·翁平和能源部长赫罗尼莫·贝拉斯科，届时没有在场。与科拉松·阿基诺的就职仪式相比，马科斯就职的现场显得十分冷清。

伊梅尔达很早就为这次就职庆典预定了7件豪华的外套和裙。但是在仪式上，她只穿了一件普通的白色、膨袖的菲律宾民族服装。整个仪式中，她

都在流泪。同时，旅游部长何塞·D·阿断皮拉斯和土改部氏孔拉多·埃斯特雷利亚也不禁潸然泪下。

伊米、伊雷内和邦邦穿着定做的制服始终默默不语。

近 5000 名马科斯的支持者进入总统府观看这一场面。

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一起在台上为大家唱了一道名为《因为有了你》的歌曲。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仿佛是旧戏重演。人群中有人被打动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马科斯另外还有一位夫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她同马科斯的其他孩子住在马尼拉市的另一面。

有人向马拉卡南宫进行漫无目标的射击。马科斯打电话给恩里莱，要求他派军队改革运动保安人员到总统府来，以阻止任何枪击事件。他对恩里莱说，他计划马上就离开马拉卡南宫，他已经要求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提供直升飞机。

晚上，大约有 8 点钟左右，四架直升飞机飞到了总统府。在这之前，马科斯曾乘游艇渡过了帕西格河，到总统府公园去了一次。那里有一个较大的停机坪，总统的人马正准备乘美国人的直升飞机撤走。马科斯到这里来是与恩里莱见最后一面的，此刻，恩里莱正由自己的军队改革运动组织的卫士保护着，在暗处等着马科斯。两个人共事有近 20 年的历史，他们互相配合，投桃报李，其感情程度之深已经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他们彼此十分地了解，熟知对方的一举一动，这在旁人眼里是看不出来的。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会面结束时，两个人实现了和解。他们分手时长时间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

晚上 9 点多钟，马科斯和他的家人以及最亲密的朋友登上了最后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马科斯旧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同机前往。美国海军的一只船儿沿着帕西格河驶入，将一部分人运到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一些没有赶上这只船的人到帕西格河的另一处，登上了停在那里的直升飞机。有一位名叫霍利·贝尼特斯的副官没有赶上最后一只渡船，只好屈尊雇用了一只独木小舟摆渡过河。而我们所熟悉的贝尔将军，是用一枝乌兹冲锋枪吊起，爬上了马科斯乘坐的飞机。邦邦是最后一个登机者。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驾驶员看到了一个穿着昂贵的战斗服的年轻人跑来，并粗暴地示意他们把门打开。机械师把头伸出了出去说，飞机已经满员了。邦邦挥舞着手上的枪硬是挤了上去，他嘴里骂道：“我他妈的是他的儿子。”

直升飞机飞走后，贝尔的安全部队放弃了总统府，开始考虑他们自己的出路。不出几个小时，未上锁的总统府被洗劫一空。伊梅尔达和马科斯的画像被人从墙上撕了下来。一些年轻人闯入了他们上锁的房间，在马科斯的私人房子里四下搜寻。这里的一切还没有受到损害。伊梅尔达的房间，堆满了衣物和照片。1200 双鞋子、500 副胸罩和一大堆 42 号的紧身衣。在地下室里，还有一副防弹胸罩。在马科斯的单独套间里，放满了医疗器械和肾脏透析器。马科斯总统的最后一顿饭只吃了一半，就留在了桌子上。

在克拉克空军基地，总统的人马一直熬到凌晨 2 点才得以动身。晚上，马科斯与美国的官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马科斯要求飞到伊洛尔戈家乡去，美国官员不同意。他们说他们有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命令，要送他去美国。直到凌晨 4 点，马科斯不再坚持了。他的亲朋好友困倦而又闷闷不乐地登上喷气式运输机，飞往关岛和夏威夷。

值得提一笔的是，就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博斯沃思曾打电话通知科拉松·阿基诺，并转达了美国华盛顿发来的一份电报，

询问马科斯等人是否能在北伊洛尔戈停留几天。新总统开始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允许他的要求。她问博斯沃思，马科斯是不是要死去了？

博斯沃思回答说不会的。

科拉松·阿基诺的顾问告诉她，马科斯的离开将是一个可能导致流血的恢复点。于是，科拉松·阿基诺拒绝了博斯沃思的请求。“告诉马科斯继续他的美国之行吧，为了菲律宾人民的利益，他得离开这个国家。”

这样，马科斯最后的计划没有实现，这与新政府的坚决态度有相当大的关系。

科拉松·阿基诺当然不知道，马科斯离开时，席卷了菲律宾几百万现金和相当之多的黄金、裘皮、股票、房地契和存款单。马科斯在克拉克空军基地被迫给菲律宾留下 300 万美元，其余的东西全部随人离开了菲律宾。

美国华盛顿，舒尔茨国务卿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赞同马科斯总统的决定。理智和同情占了上风，从而使一切都朝着最有利于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发展。在他长时间的总统任期内，马科斯一直是美国的坚定朋友。在他担任领导的许多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尊严和力量，再一次在这个时刻发挥了作用。我们为他能平静地离开自己的岗位感到高兴。”

马科斯就这样离开了菲律宾。现在，美国人、全世界人都把眼睛盯住了科拉松·阿基诺，人们要看看这个非常普通的女人怎样治理这个非常特别的亚洲国家。

第八章科拉松·阿基诺：世界的一个惊奇

马科斯政府能延续 20 年的统治，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菲律宾的确被那个独裁者牢牢地控制着大权。马科斯的秘密警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他的军队极为强大，而马科斯本人又具有常人无法比及的天赋。他的表演才能和异常的残暴统治又夸大了权力和无所不知的效果。平民百姓们被吓破了胆——这是兰斯代对人性肤浅认识的符合逻辑的结果。这种认识在越南没有得到验证，但在菲律宾完全符合实际。菲律宾人民对于进行抵抗毫无经验，也不习惯武装斗争。当他们满腔怒火地涌上马尼拉街头时，马科斯一家却能够毫不费劲地逃走。对此，没有谁能比菲律宾人更加吃惊了，他们还曾以令人欣喜的天真创造了“人民的力量”这个词……

就在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仓促逃走之后，许多菲律宾人认为一切事情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科拉松·阿基诺也认为，她成了菲律宾的总统，她就能按照她的意志治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她没有想到这个长期遭受彻底洗劫、甚至连生存都成为问题的国家，要想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是多么的艰难：在内格罗斯岛及其它岛屿，饥荒现象仍在继续；在马尼拉，街头乞丐的数目与日俱增；华盛顿更感兴趣的是使菲律宾保持现状，而不是进行剧烈的改革。保持现状意味着尽快恢复强人统治，同时对民主原则装出一脸虔诚的样子。有关支持成立一个健康的反对派和纠正大多数菲律宾人的封建农奴地位的问题，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美国人的保护下，该国的统治方式，仍旧是精英统治，由行刑队强制实行，完全是“三 K 党”式的民主。

科拉松·阿基诺用她的善良，使出全身力量进行土地改革和纠正其它长期以来遗留下来弊端，但她遭到了众多戒心重重的反改革派的反对，及致于她不得不无限期地推迟她的改革计划，以巩固她那岌岌可危的地位。

只要菲律宾不进行真正的改革，在这里赚到的钱就会继续流向更安全的地方。于是，便有人这样评价菲律宾：它虽然风光如画，却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而不是我们人类安生过日子的“天堂”。

科拉松·阿基诺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面前，实施自己的计划，施展自己的才华的？

一、内阁成员的任命

人与人之间的内涵就是互相支撑。

科拉松·阿基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普通妻子，能成为菲律宾的最高统治者，是因为菲律宾那时极其特殊的现状：马科斯统治菲律宾已经有 20 年之久，下层百姓在这 20 年间的生活，没有一点改变；中产阶级得不到机会跨入更高阶段；而上层富有者，不情愿马科斯在菲律宾总统的宝座上迟迟不让位于他们。所以，马科斯下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拉松·阿基诺成为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则是一种偶然。试想，如果没有尼诺伊·阿基诺的被暗杀，在菲律宾这个夫权统治的国家里，谁能容忍一个妇女坐在总统的宝座上？如果没有菲律宾上层大人物的鼎力相助、出谋划策，科拉松·阿基诺能在与一个老政治家的较量中赢得最后的胜利？是的，科拉松·阿基诺靠着一个强有力的智囊团。竞选总统要靠他们，总统国家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霍克尔·阿罗约，是科拉松最亲密的政治顾问，律师出身。在马科斯统治时期，曾为许多共产党人和有“颠覆”嫌疑的人进行过辩护，指责马科斯政府屠杀政敌和滥施酷刑。他还揭露当时担任国防部长兼戒严令执行官的恩里莱在单独囚禁犯人许多个星期之后才承认他们已经被拘留。所以，恩里莱一直视他为死对头。阿罗约曾因参加反马科斯的街头示威游行而被捕入狱，是菲律宾人民称赞的坚强的民主斗士和人权律师。他是第一批科拉松·阿基诺的支持者。他以他的聪明和智慧，帮助科拉松·阿基诺取得了很多的选票。科拉松·阿基诺执政后，即委任他为总统行政秘书，为新总统出谋划策，处理重大国事，并总管总统府的事务，拥有“小总统”之美称。恩里莱和军方一些人嫌他“极左”，曾一再要求新总统把他撤掉。但是，科拉松·阿基诺一直保留着他的职位。

阿基利诺·皮门特尔，民主党——战斗党的创建人，尼诺伊·阿基诺的挚友。由于他们两人有着很长时间的交情，科拉松·阿基诺一直对他另眼相看，他也是律师出身，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因所谓“支持菲共”和反对 1973 年宪法，抗议马科斯在 1978 年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而 4 次被马科斯投进监狱。出狱后，他参加了竞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1980 年，又当选为菲律宾卡加延德奥罗市市长。在科拉松·阿基诺竞选总统期间，他积极助选。“2 月革命”后，他担任地方政府部长。他大刀阔斧地将数千名马科斯的官员撤职，得罪了很多人。军方和一些右派分子屡次要求新总统撤换他，科拉松·阿基诺在重压之下免去了他的地方政府部长职务，但马上又聘请他作总统顾问，在决策中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是政府与“菲南”穆斯林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首席代表。1973 年 3 月，他因要参加竞选参议员方才辞去该职。

海梅·王彬，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出自民族英雄罗曼·王彬之家。其祖父罗曼·王彬曾积极参加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倾家荡产地支持菲律宾革命党人，为菲律宾的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纪念罗曼·王彬，马尼拉市政府把一条街命名为王彬街，并在街头竖起了王彬铜像纪念碑。海梅·王彬 20 岁就取得了美国哈亚尼奥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24 岁时，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成为全菲律宾最大和最早建立的本格特矿业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还兼任菲律宾工商银行、马巴哈伊交

利公司及其他一些企业的董事。他原是一位企业家，过去很少参加政治活动。1981年后，因不满马科斯家族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和官僚资本操纵市场，才开始参加反对派。他曾激烈批评马科斯的经济政策，认为只有马科斯下台，菲律宾的经济才有可能好转。1983年，尼诺伊·阿基诺被杀害之后，反对派成立了马卡蒂俱乐部，他被推选为该组织主席。马卡蒂俱乐部是反对派聚会串联和商议国事的场所，也是一个出谋划策的地方，在反马科斯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4年底，反对派为推选一个总统候选人，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海梅·王彬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他成为科拉松·阿基诺竞选智囊团的核心人物，不但充当她的经济政策顾问，而且是她竞选发言稿的起草人之一。科拉松·阿基诺执政后，立即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对他寄予厚望。他在解决菲律宾外债延缓偿还问题、吸引外资问题、借新外债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贡献。他同教会也有很深的交往，属于天主耶稣会派，他从政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他有一个哥哥罗伯特·王彬，是马科斯政权中的工业贸易部长。海梅·王彬对中国也有非常友好的态度。1984年11月，他写信给福建省要求“寻根”。福建省有关部门查明他的祖籍是福建省晋江县清蒙村。那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清咸丰年间王彬的祖先从菲律宾寄回30元大洋兴修祖庙的文字。

何塞·康塞普西翁，新政府的工贸部长，56岁，1955年获阿拉内塔农学院学士学位。他是一个大企业家，拥有许多公司和股份。1971年曾任制宪委员会委员，因反对马科斯而被监禁数月。1983年发起组织国民自由选举运动并任主席，该组织在监督198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曾动员25万人到全国各个监票站监票计票，在1986年2月大选中，其志愿工作人员猛增至150万人。他们无酬地监督全菲的投票、点票情况，并有自己的计算中心单独进行统计。正是该组织计算出来了科拉松·阿基诺的选票多于马科斯。新政府成立后，科拉松任命他为工贸部长，并且他还兼任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主席和东盟工商委员会召集人。他积极推行引进外国资金和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曾随科拉松访问过印尼、新加坡、美国和日本，争取这些国家为恢复菲律宾的经济伸出援助之手。为了专心做好本职工作，他放弃了1987年5月举行的参议员

竞选。

拉蒙·米特拉，新政府的第一任农业部长。1987年3月，因参加参议员竞选，才放弃了农业部长一职。他与科拉松一家关系极为密切，同科拉松的小弟彬彬在比科尔合营了一个农场。米特拉既是畜牧场主、椰子商，又是一名政论家，并任民主党——战斗党吕宋地区副主席。他还是科拉松政府同全国民主阵线谈判的第一任首席代表。他曾在圣贝达学院攻读法律，1952年取得碧瑶学院文学士学位。他又在美国纽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进修过高级国际关系学，毕业后，当过摄影记者，写过一些政治方面的文章。1954年到外交部任职，并被派往联合国工作过。1964年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后来转到国会。1965年当选为众议员。1971年又被选为参议员。1984年为临时国民会议员。1987年6月当选为众议长。拉蒙·米特拉积极支持科拉松竞选总统，科拉松很欣赏他的多才多艺。由于他同全国民主阵线的谈判代表奥坎波·苏梅尔是老朋友，由此被委任为官方谈判代表，担任该职期间，他为争取双方达成停火协议60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内普塔利·冈萨雷斯，科拉松的亲信和顾问。他原来是联合民族主义民

主组织代主席。1985年11月参与创建人民战斗党并任该党主席。人民战斗党是科拉松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成立后，在全国发展党员，大力宣传新宪法。他年逾六旬，出身贫寒。他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木匠、书记员。1949年在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当上了律师，经常为穷人办案。1967年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当过黎刹省的副省长、众议员、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后来成为国会反对派领袖的重要助理，是著名的《人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该宣言由150名全菲知名人物签署，宣布科拉松和劳雷尔已被人民授权担任正、副总统。科拉松与劳雷尔正是依据这个宣言，于1986年2月25日上午宣誓就职的。次日，他就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积极协助科拉松释放政治犯，处理历次谋反事件。1987年3月，他被科拉松任命为执政党24名参议员的候选人。同年6月，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

华金·贝尔纳斯神父，科拉斯的主要政治顾问之一，著名的政论家和宪法专家，菲律宾闻名的亚典尼奥大学校长。1957年获贝尔切门斯学院硕士学位，后来又在纽约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1974年起，他在亚典尼奥大学法学院任教授。1976至1982年为菲律宾耶稣会大教区修道院院长。他是科拉松政府制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对中国非常友好，1986年11月，曾应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访华。他到中国参观了一些大学和教堂，代表亚典尼奥大学同厦门大学签订了文化交流原则协定。他还到山东德州拜谒了苏禄王墓，并访问了附近菲裔聚居的北营村。他认为中国有能力解决10亿人口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中国在农村实行农业改革和农、工业并重的经验值得菲律宾借鉴。

除上述人物外，科拉松最重要的依靠就是她的兄弟彬彬。因为在第二章中已经对佩平有了一些介绍，在这里就不再累赘。现在，我们把1986年2月26日，前总统马科斯从马拉卡南宫逃走19个小时后，科拉松·阿基诺宣布的内阁主要成员名单介绍于下：

姓名	现职务
科拉松·阿基诺	总统
多伊·劳雷尔	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总理
胡安·庞塞·恩里莱	国防部长
内普塔利·冈萨雷斯	司法部长
海梅·王彬	财政部长
阿基利诺·皮门特尔	地方政府部长
洛德斯·R·奎萨姆宾	教育文化体育部长
罗加查诺·梅尔卡德	公共事业与交通部长
拉蒙·米特拉	农业部长
霍维托·R·萨隆加	总统兼政府委员会主席
何塞·康塞普西翁	工业部长
霍克尔·A·阿罗约	总统执行秘书
勒内·萨吉萨格	总统发言人
路易斯·F·比利亚富埃特	总统改组委员会主席
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	旅游部长
埃内托斯·马塞达	自然资源部长
特奥罗多·洛克欣	新闻部长
阿尔贝托·罗慕洛	预算部长

何塞·B·费尔南德斯

中央银行行长.....

注：菲德尔·V·拉莫斯，新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上将军衔。作为军方领导人，未包括在公布的名单中。

随着第一批重要内阁成员的任命，科拉松·阿基诺建立了她自己的政府机器。

但拥有了一个新领导班子，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一切都会朝着有利于人们的新总统的方向发展，恰恰相反，在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的本质和复杂后，我们就能想象到她的艰难.....

二、菲律宾第三部宪法的诞生

在解决了内阁成员问题之后，科拉松·阿基诺终于在马拉卡南宫掌了权。她住进被粉刷一新的屋子里，这是一座狭长形的正面是落地玻璃门的两层建筑。阳台与房子一样长。几间房里的家具被搬走了，改放了办公桌。但是铺着带绿青色绣花垫子的白色竹椅和竹榻被留了下来，放置在新布置的门厅里。一本描写2月革命的名为《人民力量》的画册放在咖啡桌上。

科拉松·阿基诺忘记不了2月革命。

因为她是在这一历史力量和事件的和谐组合的推动下，肩负起菲律宾的总统职务的。在这之前，她并没有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谋取这一职务；她仅是被一场悲剧性的突发事件——她丈夫尼诺伊·阿基诺的被暗杀——推上总统宝座的。随着这位杰出的前参议员之死，在人民和那些反对马科斯总统的政治集团领导人的劝说下，她作为庞大的反对党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总统竞选。但是，她并没有获得成功。马科斯和他的竞选伙伴托伦提诺利用执政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宣布了他们的压倒多数的票数。于是，科拉松·阿基诺发动了一起民众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恩里莱与拉莫斯在这时领导了一场迫使马科斯退离总统职务的兵变，使她最终成为菲律宾的总统。

作为总统，人们希望把科拉松·阿基诺同其它一些国家的女首脑作比较，其中最著名的有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前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以及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然而，科拉松·阿基诺的地位与上述这些世界闻名的女政治家又有所不同。例如，作为菲律宾总统，她既是菲律宾国家元首，又是菲律宾政府首脑，而这些职务通常在其它地方是由一位总统和一位国王，要么是一位女王来担任的。

科拉松·阿基诺肩上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就在她就职宣誓结束后，她想起了处在同一时刻的果尔达·梅厄。

当果尔达·梅厄真正成为以色列总理时，她说：我诚心诚意地表示不想承受总理这一职责带来的责任、压力和过度紧张，但是，“当投票结束时，我知道我已经泪流满面了。我双手抱着头……我从未谋求总理这一职务，事实上我根本不想谋求什么职务。”“我认为也许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

作为总理，她意识到政府的权力并非象其似乎表现出的那样毫无限制，她认识到自己只能做这么多。懂得了这一点，她说：“政府不能一举做完每一件事情。政府无法同时既要挥动一根魔力指挥棒，又要满足任何人的要求；不征税便要根除社会贫穷；打赢战争；继续接收移民；发展经济；而且还要给予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

没有一个政府能同时做这些事情。”

毫无疑问，科拉松·阿基诺也面临着这些问题。现在，她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树立一个与马科斯完全不同的总统形象，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改变马科斯统治这个国家20年所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在她宣布新政府内阁名单的同时，又有三号公告随后发布。“宣布一项人民授权实行改革的全国性政策，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力，起草一部临时宪法，争取在一部新宪法指导下过渡到一个新政府”。科拉松·阿基诺设想，在这个公告下产生一个“自由宪法”（3月25日，科拉松·阿基诺政府颁布了这部自由宪法，它后来被史学家称为临时宪法）并在其指导下，成立临时革命政府。政府将采取的第一批正式行动之一，就是废除马科斯的国民议会，

随后将立法和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中。

这将是全盘否定马科斯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步履是相当艰难的。

马科斯的崇拜者们围绕着的新的社会运动，在菲律宾仍拥有广泛的基础，他们是菲律宾富有者的组织，他们也拥有外国强大的“靠山”。他们是菲律宾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当阿基诺政府宣布要以一部新宪法取代马科斯时期的旧宪法时，新社会运动就站起来公开说，如果阿基诺政府保留旧宪法和国会，他们就答应在国会中承认她的政府的合法性——的确，科拉松·阿基诺是坐在总统的宝座上，但是根据旧宪法，没有国会的认可，她的政府就是不合法的。

新政府也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劳雷尔和恩里莱建议保留旧国会。他们说，旧国会的很多议员已经同意批准某些民主化的改革，并正式宣布科拉松·阿基诺和多伊·劳雷尔分别为菲律宾的正、副总统。

科拉松·阿基诺坚决反对与忠于马科斯的分子作出任何妥协、让步。她指出，有必要消除繁琐的程序，推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科拉松担心受到新社会运动多数人的欺骗。政治家的伎俩，她在竞选中就领教透了。她想，那些人也许会先作出允诺以便继续掌权，但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诺言，再清除他们就相当之艰难。所以，她果断地作出决定：国会是“我们政治制度中的肿瘤，必须割掉。”她说，“正如马科斯的党朋关系能挫伤我们的经济一样，新社会运动在国会中的多数也会败坏我们的政治。”于是，就在她宣誓就职一个月后，她宣布废除了旧宪法和旧国会，积极筹组制宪委员会，尽快制定出新宪法来。

科拉松·阿基诺委任了48名制宪委员，它包括各党派（除菲律宾共产党外）工、农、商、学、兵、宗教各界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还有一些全国知名的法律专家、法官和原马科斯政府的成员。制宪委员会主席是72岁的前女法官帕尔玛夫人。制宪委员会中年长者83岁的前大法院法官罗伯特·R·康塞普西翁，最年轻的是20多岁的一名学生代表。阿基诺夫人原要求制宪委员会在3个月内（从6月份开始）三读通过新宪法草案，9月2日呈送总统审阅。但是，由于委员会对新宪法的内容提议有许多争议，因此直到10月12日才三读通过。10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签署仪式（制宪委员会成员们一一在文件上签名），然后呈送总统。

从制宪过程上看，委员们的工作是十分认真和辛苦的，气氛也是民主的。

一名委员回忆说，“阿基诺夫人虽然任命我们为制宪委员，但却从未对我们施加过任何压力，我们受到的压力倒是国会大厦的大门口。”那段时间，每天都有来自各阶层的群众在制宪委员们工作的地点——国会大厦的大门外示威喊口号，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都要制宪委员们接受并写到宪法中去。他们用高音大喇叭对着国会大厦大喊大叫，搞得制宪委员们不得安宁。法学专家们和各界代表们常到门口去看望群众，认真听取他们的要求和意见。在此期间，舆论界也各抒己见，纷纷表达他们自己对新宪法的期望和要求。一些右派和“马科斯忠贞分子”则四处散布谣言，极力低毁制宪工作。围绕着新宪法，全菲律宾上下展开讨论，也充满了斗争……

科拉松·阿基诺阅读完送呈上来的新宪法后，对制宪委员们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她说，这是“向民主国家过渡的重要一步”。各报也发表评论，有的称新宪法是全菲律宾人民“智慧的结晶”；有的说它“充分代表了菲律宾的民族精神”，“是全国精英呕心沥血之作”。当然，在菲律宾这个

特殊的国家中，对一个重大文件的产生，不可能都是赞美，一些人对新宪法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的人甚至全盘否定新宪法。

科拉松·阿基诺对新宪法的制定表示出了极大的祝贺。她说：“我极其重视即将来临的新宪法的公民投票，因为我国人民对它的通过，将为我们提供政治稳定，并且是完成恢复我国民主的关键。我把这部宪法视为我们给予下一代菲人的遗产。他们不仅将根据我们对其价值的认识来评价我们，而且将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形成其决定的过程来评价我们。这部宪法也是我们菲律宾人应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文件。它是我们政治信念和智慧的成果。”

新宪法和菲律宾过去颁布的 1935 年和 1973 年的两部宪法有很大的不同。1935 年的宪法是美国给予菲律宾自治权时由美国参与制订的。它带有着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如其中明文规定，美国人在菲律宾享有同菲律宾公民同等的权利等。这部宪法一向不受菲律宾人民的喜欢。另一部宪法是 1973 年马科斯为延长他的统治而制定的。它明文规定政体由美国式总统制改为英国式总理制。在过渡期间（即军事管制期间）由马科斯这位总统兼任总理，集大权于一身。1981 年，马科斯对此宪法又进行了修改，规定总统可以不断连任，任期期间的所作所为离任后不受任何法律追究……。菲律宾人民认为这部宪法是马科斯的御用工具，是为了扩大马科斯的权益而制定的，根本就不属于人民。

科拉松·阿基诺主持制定的新宪法与这两部宪法大不相同。

新宪法共有 18 章，包括 8 个方面的内容：

1. 总统的权力。为了防止再出现马科斯式的个人独裁统治，新宪法对总统职权有了许多限制，并作出了如下规定：总统任期 6 年，不得连任；总统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政府内重要职务；总统只有在参议院三分之二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有决定签订国际条约的权力；总统委任官员必须与国会协商；未经中央银行批推，总统不得向国外借债；总统只可能在国家发生叛乱或被侵略时才可以颁布军法统治令，颁布后必须在 48 小时以内向国会报告，被国会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如果国会多数不同意军管，就可取消总统军管令，军法统治不能超过 60 天，延长需得国会同意。另一条规定是，国会通过的议案如被总统否决，国会可以再讨论，并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对总统的否决进行反否决。

2. 立法方面。它确定菲律宾实行美国式两院制，参议员任期为 6 年，只能连任一次；众议员任期为 3 年，最多连任 3 届；禁止参议员在任职期间担任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公职。

3. 司法方面。20 年来司法部门将首次被委任监管总统的政令是否符合宪法；司法及律师协会将负责提名法官，总统的最后选择只限于这些提名。

4. 军队方面。军队不得参政，不得支持任何政党。

5. 民权方面。为了吸取马科斯利用法律搞独裁统治的惨痛教训，为了避免菲律宾人民再次丧失民主、自由，在保障人权方面作了许多新规定：“未经适当的法律程序，不可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或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除法官外，其它人不得随便签发搜查和逮捕令”；“不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愿望而随便将其投入监狱”；“禁止设立秘密拘留所，不准使用秘密监禁或其它类似的方式”；……

6. 美国军事基地的提法。宪法规定比较灵活。条文称基地协定维持到 1991 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再延长。实行菲律宾国土内不准有核武器

的政策。

7. 经济和土地改革。它明确规定，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并鼓励外资投入，但限制其参与的百分比。国家根据公正的赔偿原则，鼓励和负责实行公正的土地分配。

8. 特别行政区。新宪法规定要将穆斯林聚居的棉兰老和北吕宋的科迪拉勒地区划为特别行政区，并给予当地穆斯林一定的自治权。

在这部新宪法起草过程中，据说有不少“小花絮”。例如，在讨论总统要限时，对是否明文规定现任正、副总统不必重选，可延续任职到1992年的问题争论相当激烈。一些人认为宪法不应该这样规定，正、副总统应在1987年重新选举，或者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问题，由公民投票决定。斗争的结果是在第18章《过渡条款》第5条中写道：“在1986年2月7日中选举的现任正、副总统的6年任期……延至到1992年6月30日中午。”

在讨论外资的比例时，有些委员认为宪法条文对外资过于优待，有损于民族利益。但持其意见者居少数，在没有得到一致通过时，有人一怒之下，拂手而去。

在讨论美军基地的废留问题时，不但左、中、右各派意见分歧很大，反复开会多次，十分辛苦疲劳，连美国驻菲官员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天天到国会大厦打听消息，在会外进行活动，深怕作出对美国不利的决定，往往弄得满头大汗。

新宪法决定于1987年2月2日由全国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取舍。阿基诺夫人为了发扬民主，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决定从1986年11月2日到1987年1月31日止，赞成和反对新宪法的人都可以向群众宣讲自己的观点、理由，供人民投票前考虑定夺。

科拉松还下令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对新宪法进行宣传解释，并保存制宪委员会的各项会议记录和其文件。

1986年10月，菲律宾宪法协会、律师工会、商会基金会三个组织签订了联合宣讲新宪法的协议。此外，自由党、民主党——战斗党、菲律宾民主社会党、全国基督教联盟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表示支持新宪法和拥护新政府。

菲律宾马尼拉的红衣主教辛在新宪法公布后就立即表态，称赞这是一部“最佳宪法”，它可以保证菲律宾走向自由和民主。他呼吁全国天主教徒投赞成票。这个一诺千金的红衣主教，在科拉松·阿基诺的政治生涯中，一次又一次给予她支持、关怀和爱护。

但这不一定就能保证新宪法在公众中得到通过。这不是一般的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是菲律宾走向民主进步有无保证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菲律宾人民今后的生活，也牵扯到科拉松·阿基诺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是否能确立的大问题。如果新宪法能顺利通过，她就是合法的菲律宾总统，可以继续任期6年到1991年。

科拉松·阿基诺为此又开始了新的努力。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新宪法给予应有的支持。以恩里莱为首的政府内部一批右翼分子反对新宪法，说它只是对科拉松有利；某些右派也从原来支持新宪法的立场上转为抵制，他们指责科拉松向右转，说新宪法是“亲帝国主义、反人民的”，组织一些数量相当可观的群众抵制新宪法。

1987年1月，菲律宾政界对新宪法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科拉松·阿

基诺不得不亲自召集支持新宪法的民主党——战斗党等 5 个执政党领导人进行布置，并召见了 172 名省长、市长，要求他们在各自省市确保新宪法顺利通过。同时，她又亲自到战火硝烟弥漫的棉兰老地区进行新宪法的宣传，向无地农民颁发土地证书，向当地政府增加拨款，修建农田水利和公路设施。她在宣传新宪法的万人大会上，呼吁人民投新宪法的赞成票。

1987 年 2 月 2 日，决定新宪法命运和科拉松前途的公民投票如期举行。没有发生动乱，全国的气氛比较平和。有 2500 万人参加了投票，结果，新宪法获得了压倒一切的通过。

如同菲律宾大选一样，美国政府也派人来观察此次投票。事后，他们发表言论说，这次新宪法的公民表决，是“公正、和平和民主的”，没有发生贿选等丑闻。里根和美国国会立即向科拉松·阿基诺发来贺电。东盟成员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也表示祝贺。

印尼总统苏哈托说：“菲律宾宪法获得通过，这是为今后，12 月的东盟首脑会议铺好了路。”日本首相中曾根、中国总理赵紫阳、欧洲共同体的首脑也纷纷来电祝贺。

这不能不说是科拉松与她的政治团体的胜利。从政治生涯上说，她是幼小的，但她充满智慧，她终于战胜了种种艰难，获得了自己政权下产生的新宪法的通过。

1987 年 2 月 12 日，科拉松·阿基诺在马拉卡南宫宣布 1986 年宪法获得通过。她带头宣誓效忠新宪法。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在栗色的书皮包着的宪法文本上签名，随后，她把签名用过的 6 支金笔送给了副总统劳雷尔、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郑建祥、前总统马卡帕加尔和制宪委员会主席帕尔玛，另一支送给了国家博物馆，她本人留了一支。

科拉松说：“现在已是菲律宾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共同目标的时候了。我们应以和平和民主的途径来解决分歧和意见。”

三、艰难的参、众两院选举

是的，作为新总统，无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她都希望民主地解决菲律宾的一切问题。她总认为，她现在是菲律宾的总统了，她完全可以按照她的设想去改造马科斯专制了 20 年的国家。但是，菲律宾的上层人物都不满意自己的权力和科拉松极力想造就的一个民主的国家。新宪法刚刚通过，社会上就出现一片混乱。根据新宪法第 6 章“立法部门”的规定：立法权授于菲律宾国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参议院共有 24 名参议员，他们由菲律宾合格的选民普选。参议员在选举当天至少要满 35 岁，选举前两年至少在菲律宾居住两年。参议员任期 6 年，最多连任两届。众议院由 250 名众议员组成。其中 200 名将从各省市与大马尼拉市按比例选出。每个区的代表人数，根据其人口等比例分配。另 50 名众议员由全国性、地区性和社会各界的政党或其他组织推出，由总统委伍。众议员在选举时必须年满 25 岁，选举之时必须在菲律宾居住满一年。众议员任期为 3 年，最多只能连任 3 届。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两院的选举定于选举年的 5 月第二个星期一举行。

1987 年 2 月 2 日新宪法通过后，政府决定在 5 月 11 日举行两院选举。自此，政府与政府反对派便开始了激烈的竞争。

参议院候选人名单由 4 个政党提出后，由科拉松·阿基诺总统最后一再斟酌，最后确定。上报来的名单上，包括了教育、劳工、穆斯林、妇女界代表以及 5 位人权律师。他们中有不少是知名人士。

原廉政委员会主席、自由党萨派主席霍维托·萨隆加，他曾任总统外交政策顾问、阿基诺的法律顾问。1971 年，他在自由党集会上被弹片炸伤一只眼睛和炸聋一只耳朵。1980 年他因为反对马科斯的军管被拘留和软禁。1981 年流亡美国一直到 1985 年。

宿务市长约翰·奥斯敏纳，曾任参议员。他的家族在宿务很有势力，但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却遭到排挤和压制。

前外交部长、菲律宾自由运动主席劳尔·曼格拉普斯，是一个学者和教授，也是天主教会的领导人之一。过去在外交界有一定的影响，因与马科斯发生了矛盾，长期流亡美国。

前海关专员维格贝托·塔纳达，是前参议员洛伦索·塔纳达的儿子洛伦索在五六十年代很活跃，是一名法学教授、阿基诺的辩护律师，也是菲律宾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

参议员候选人还包括科拉松的小叔子巴茨·阿基诺，他曾为科拉松竞选总统出过力。科拉松执政后，他成为菲律宾穆斯林组织谈判的总统特使，在促进摩解与政府合作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对此，我们将在以后的篇章中作详细介绍）。

新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莱蒂西亚·沙尼哈尼，她是总参谋长拉莫斯的妹妹，也是马科斯的表妹，却较早地站到了科拉松一边。莱森大学校长索特罗·劳雷尔，他是一名教育家，曾担任过奥斯米纳总统的私人秘书，是现任副总统劳雷尔的二哥。反对派为了竞选这两院的议员，其主要两个组织：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和马科斯的新社会运动党，经过一个月的艰难谈判和形势分析，达成协议，组成“菲人协会”，并由该组织推出了 24 名参议员候选人、官包括马科斯的竞选伙伴托伦提诺和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恩里莱。

托伦提诺是一个 76 岁的老政客，马科斯执政期间，对这个总统是小骂大帮助。马科斯出走后，他便成了马科斯在菲律宾国内的代言人之一。他与马科斯亲信们紧密联系，还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发动过一次政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介绍这场政变的全过程）。他一直是新政府的反对者，并在菲共与新政府的关系上大作文章。他在马尼拉地区和占选民 30% 的加禄人中有一定的影响。新政府的国防部长恩里莱，因为不满于科拉松政府给予他的权力，曾多次发动政变，后被科拉松劝说辞职。他脱离新政府后，就与马科斯余党合流，充当了国民党的头头。他原来的奋斗目标是众议长，后来认为政府提出的 24 名众议长候选人阵容不强，便改变主意，决定竞选参议员。他为了争取选民，竟在马科斯家乡的北伊洛尔戈向选民表示歉意，说他背叛马科斯是出于无奈，“现在，就任凭你们处置”。菲律宾的报纸对此十分鄙视，并预言他这样做反而会失去很多选票。

除托伦提诺、恩里莱外，反对派参议员候选人中知名者还有比森特·普雅特，他是一位银行家。还有奥普莱，他是马科斯政府的劳工部长，马科斯对他十分信任和重用，但他对马科斯的任用亲朋好友、贪污自肥的作法非常不满，对马科斯产生离心倾向。马科斯倒台后，他又出面改组新社会运动党，成立了国民党。他宣称和马科斯脱离关系，不受马科斯的控制。但他与马科斯渊源颇深，国民党的成员又多是马科斯的崇拜者，实际上仍受马科斯的影响。

另外，劳雷尔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秘书长雷内·塔斯皮纳也是反对派的参议员人选。

左派政党如人民党也选派 7 人参加参议员竞选。他们大多数是在马科斯统治时期被捕入狱的，新政府成立后才见光明，这包括原新人民军司令丹蒂。人民党一直否认他们与菲共有关系，他们表示他们是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但很多人认为这是菲共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变体。

此外，还有几个无党派独立人士报名竞选参议员。其中较知名者是曼努埃尔·马纳安。他年逾七旬，是全菲农业复兴会会长和合作社基金会会长。他长期从事合作社运动，他的组织拥有 600 万会员，1700 个合作社，总资产超过 20 亿比索。马纳安在 60 年代非常活跃，当过参议员。有人预测，他入选的可能性很大。

据统计，全菲报名竞选参议员者有 130 余人，经国家选举署审查，获得竞选资格者共 84 名；登记竞选众议员者是 1899 人，代表各党派和一些独立的人士。根据当时菲律宾的报纸分析，执政党在参议院可能得到 16 席，在众议院只有把握拿到 14% 的席位。因为众议院是由各地区分别选举，政府对许多地方势力未能控制，在有些地区政府方面由于提不出候选人，只能采取“两害取其轻”的策略，设法让对手中较可争取的人当选。

竞选展开后，出现了许多戏剧性的事情。

有一个叫阿达萨的政客（反对派参议员候选人）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他抛出 3 盒录音带，内容是科拉松的弟媳玛加丽塔同美国驻菲使馆人员的谈话片断、同菲慈善马票公司经理秘书的一段对话。谈话内容是玛加丽塔需要美国大使馆和菲慈善马票公司给予帮助，让他们送钱给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主席萨拉马特，以换取萨拉马特与新政府的合作。阿达萨指责科拉松不应重用近亲插手解决穆斯林问题，更不应该让美国人介入。

政府方面则斥责阿达萨搞窃听是非法行为，指出 3 盘录音带是经过剪辑

的，是断章取义的。

据说菲律宾反对派对政府官员甚至对总统都搞电话窃听，就连科拉松给儿女们和内阁同僚打电话都要使用暗语。

继录音带事件后，反对派又抨击科拉松和副总统劳雷尔的许多近亲参加竞选参议员和准备8月份竞选地方官员，说这是科拉松和劳雷尔要建立“政治王朝”，同马科斯没有什么两样。反对派说，除科拉松的小叔子巴茨·阿基诺竞选参议员外，她的小姑子特西·阿基诺·奥雷塔也宣布用以劳雷尔为首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成员身份，代表马拉班等地的选民竞选众议员；科拉松的同胞兄弟佩平代表其家乡打拉省选民竞选参议员；科拉松的舅舅弗朗西斯科·苏木隆和侄女科美娜·阿基诺·本图拉也分别竞选参议员。科拉松的一个堂兄弟恩里格代·塔华特科则准备8月份竞选黎刹省省长。

科拉松面对这些数不尽的攻击，她表示说，她无权阻止她的亲戚参加竞选，因为这是他们个人的民主权利。她也不能决定他们个个都能当选，因为这要看选民们是否看中了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一向支持科拉松的美国舆论界也开始批评科拉松：《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自从科拉松·阿基诺执政以来，菲律宾一些传统家族得以东山再起。这些家族在马科斯统治时期大多数被排斥在权力圈子边缘。现在，他们又站起来了。文章还说这是“一种政治王朝的复辟”。《远东经济评论》也发表长篇文章，抨击科拉松的弟弟利用权势，垄断货运业，而且这一行正是由伊梅尔达的一个弟弟控制着。过去伊梅尔达的弟弟把货运业交给自己的密友经营，现在科拉松的弟弟也把它交给自己的密友经营，何其相似乃尔？

同时，还有报纸说科拉松的弟弟插手操纵赌场，科拉松的两个亲戚在一家大银行得到要职等等。

科拉松否认她的亲戚在银行担任要职，也否认她的弟弟操纵赌场，并要求反对派拿出证据来。她反击说，反对派的候选人大多数是马科斯的余孽，他们正是马科斯镇压人民群众的帮凶，和马科斯沆瀣一气，巧取豪夺，刮尽民脂民膏。这样的人哪里配当人民代表？

科拉松一边反击反对派的指责，一边南来北往，象宣传新宪法一样，为执政党提出的候选人作宣传。她强调说，“投他们一票，就是给我又投了一票！”

科拉松并没有因为反对派的攻击，就放弃了民主。她给予了反对派一个民主总统的最大的帮助。她特别拨给反对派电视节目时间，让他们在荧屏上作竞选宣传，使他们有充分表达他们的主张的机会。

在选举期间，科拉松还特别邀请了11个国家的24名代表来菲律宾观察选举情况。她作了大量的工作，使摩解和菲共都保证在选举期间不进行任何干扰。两院选举在比较平和的气氛中结束。地方政府部长费雷尔向总统提出报告说，这次两院选举，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廉政的选举”，选民投票率最高，候选人最多，竞选女性最多，选民与历次选举相比“到得最早”；暴力事件是军管以来最少的一次，打破了大城市是反对派“最大的基地”的神话，许多获胜的众议员是新面孔而不是职业政客……

无论别人怎么说，政治都是男人的事业。一个普普通通的政治家的妻子，涉足政治，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完成了一部宪法和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人们不能不刮目相见：科拉松·阿基诺，世界的一个惊喜！

四、内部问题、外部问题——收获的艰难

英国有位哲学家叫霍布斯，他说：对权力的渴望只能导致死科拉松不是一个对权力有欲望的人，但命运把她送到了菲律宾最高权力的主座上——这也是一种死亡，因为，她从此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有无数个问题等待她去解决。外部问题解决了，内部问题又出现了首先是劳雷尔的组织——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的一些人与新总统有分歧。秘书长雷内·埃斯皮纳指责科拉松·阿基诺新政府是马科斯旧政府的翻版，是又一个“独裁统治”。就在新政府刚刚拉开帷幕之时，他说，新政府现在所作的一切都不能与它的同盟进行商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雷内·埃斯皮纳公开说《自由宪法》是极权主义的货色。他说激进派在政府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而在立法机关中的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成员，也许会加入重新召开的与新政府对立的国会，反对阿基诺政府——脆弱的选举联盟开始分裂。

联合民族主义民主组织对政府充满敌意，骨子里的原因在于它的领导人认为它的成员没有得到足够的任命。他们只得到了很少几个内阁职位，没有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足够的中等和低等的职位。后一点，他们认为尤其重要。他们说，他们这个党派基础的巩固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马科斯内阁的成员。显然，由于科拉松坚决地颁布了《自由宪法》，使他们也必须离开国会。于是，又有一支反对力量向科拉松·阿基诺政府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他们指责新政府是正在建立新的独裁制度，威胁要去街头举行示威。马科斯政府的劳工部长布拉斯·奥普尔说，科拉松已经“打开了滥用职权的闸门，违背了她自己要成为菲律宾民主战士的主张。”

在这些人的煽动下，很多菲律宾人开始对被驱逐的马科斯的官员的指责半信半疑。

科拉松·阿基诺最信任的皮门特尔也认为自己的党得到的职位太少。他向新总统建议，既然马科斯旧政府中的官员对新政府官员展开工作不利，应该马上进行大规模的更换工作。职位的授予，要以新政府与选举中支持过科拉松的团体协商为基础。地方上的主教和教士对选举也发挥过重大影响。但是，“这些是政治上的职位，应该十分重视当地公认的政治领袖的意见。”

科拉松采纳了皮门特尔的建议，大规模地撤换了70多个省长、1600多个市长和一万多个地方议会议员，结果引起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剧烈的抗议风暴。

科拉松·阿基诺意识到这个作法严重地削弱了她的政府和作为总统的她的声誉时，冲突已经发生了。她号召用和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被解雇的官员说他们是选出来的，他们要求政府允许他们干到下一次选举为止。一些从马科斯政府留下来的官员也认为科拉松是一个软弱的女总统，并决定利用她的弱点。这样，有些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以他们的任期受宪法保护为理由拒绝辞职。许多新的任命引起被撤职者去组织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他们有时用障碍物把自己堵在办公室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只好出面前来说服。

科拉松新政府对刑事调查局的人员的任命也是相当仓促的。出于担心在职人员由于对撤职不满而销毁文件，盗走马科斯留下的资料的考虑，对被撤职人员和被新任命的人员都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

皮门特尔说，他任命的人都是他最了解和信得过的。但是，他是菲律宾民主党——“人民斗争”的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对刑事调查局人员的任免，只是一个简单的试验：一看他是不是这个党的党员；二看他是否忠于他的野心。

每一个人都清楚，对于地方官员的控制，就是操纵了政治机器的基础。拥有了这个基础，就能在即将到来的全国和地方选举中获胜。

科拉松指示说，刑事调查局的人如果要参加竞选，必须在选举前90天内辞职。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取消了这个命令。她解释说，要找到全部代替他们的人，的确是太困难了。

菲律宾这个国家有一个政治习惯，那就是为了拥有权力，他们可以马上放弃他们的组织和党派。最后，那些在政治上有野心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人物，都通过各种努力得到了他们渴望的职务。无论如何，他们都感谢皮门特尔。副总统劳雷尔认为，内阁是为皮门特尔“1992年菲律宾民主党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科拉松每天都接到大量的来信和电报，指责刑事调查局的问题。而定时举行的内阁会议，也变成了劳雷尔和皮门特尔在这件事情上争论的场所。科拉松提议由皮门特尔、劳雷尔和政务部长托尼·邱恩科组成一个仲裁委员会来清除那些不合格和不胜任的职员。但是，这3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日程，最后，矛盾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科拉松开始接手处理。她将24名新社会运动的成员派到南依洛尔戈，在马科斯的势力范围内担任市长，因为他们得到了当地强有力的支持。

科拉松对人们说，这次刑事调查局的人员更换工作出现了些不愉快，是缺乏经验造成的。“我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们经验太多，他们恐怕早就是马科斯手下的人了。马科斯掌有政权20年，与他相比，我也是没有经验的。如果我有经验，我也会是马科斯政权中的人物，不会来领导你们争取自由。”

人们并不会因为你年轻而把你当作孩子，只要你走向社会，你就是一个人物。同样，人们也不会因为你没经验就原谅你的过失，只要你坐到总统的宝座上，菲律宾人就要求你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一旦这些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就有一个人、二个人……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大街反对你——科拉松·阿基诺就工作在这样一个处境中……

内部问题还没处理出一个眉目来，两院选举后的失败者又跑到街上，向新政府发起了“进攻”。为首的是恩里莱，他带领着300人来到选举署，要把署长给“揪出来”。次日，恩里莱又调动人马上万人，在2月革命中的激战地区——克拉梅军营和阿吉纳尔多军营中间地带集会，指责这次两院竞选是一场骗局，攻击科拉松政府在选举中“舞弊”，要求宣布此次选举无效，重新进行一次选举。恩里莱想用2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再与新政府较量一次。10天之后，他又组织了3万人来到这里，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使马尼拉市的交通堵塞达7个多小时。恩里莱和他的同伙们，在街上强行拉人来充斥他们的队伍，并要求人们“坚持到底”。后来，据参加者自己说，这次集会的大多数人是恩里莱用钱雇来的：参加4小时的游行可以得到50比索；如果能揭发选举中的“舞弊情况”，可以得到5000比索，外加奖金。他们还专门雇用了一些律师，教唆这批人怎样作伪证。有人揭发说，流亡在外的马科斯一伙拨款40亿比索作为反科拉松政府的各种活动经费。

与恩里莱一起领导2月革命的拉莫斯参谋长站起来了，他说：“不可能

再有一次2月革命了，因为对象、情况都不同。”拉莫斯严令军人不得参与任何示威集会，不得参加任何党派的活动。结果，尽管恩里莱声嘶力竭，两个军营的官兵没有一个出来响应他的号召，跟着他一起反对科拉松·阿基诺政府。于是，恩里莱宣布，反对派抵制国会，即使有人当选也不参加国会。可后来，随着恩里莱票数的变化，从26、25、到22位时，他又宣布说，不参加国会要再考虑。

1987年6月25日，选举署正式宣布参议员的竞选结果，执政党获得压倒一切的胜利，在24席中占有22席，反对党只得2席。名列榜首的是霍维托·萨隆加，此人我们已经在前面有所介绍：他是自由党萨隆加派的领袖，著名的民族主义者，素以廉洁正直闻名。1961年就是黎刹省国会议员，1965年和1971年都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参议员，后一次所得票数还打破了历届选举的得票记录。他是菲律宾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后进美国那鲁大学深造，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因学习成绩优异，那鲁大学曾想聘请他留校任教，但萨隆加决意回国创业。他在菲律宾是律师，同时还担任远东大学、莱森大学的教授，并从事著述。是制定公立学校章程及大学奖学金法规原提案人之一。他因不满于马科斯的统治而流亡美国多年，直到1980年初才回到菲律宾。2月革命后，他领导的自由党萨隆加派成为执政党之一。科拉松曾任命他为新政府廉政委员会主席。萨隆加主张建立一个廉政的政府，经济不受外国的垄断。为了保障劳工利益，应该多组织合作社和信贷会社。

在这次选举中，只有一位女性当选为参议员，她就是科拉松手下的一员女将——莱蒂西亚·沙哈尼。莱蒂西亚·沙哈尼可以说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妇女政治家，是菲律宾的第一位女大使、第一位女外交部副部长，今年（指1985年）66岁。她出身于吕宋中部塔尔克望族，已故的父亲曾担任过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国会议员，在新闻界也很活跃。她的哥哥就是现任总参谋长的拉莫斯。她曾在菲律宾女子大学学习，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和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她还在巴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为了专心读书，她拖到32岁才同相爱已经有10年的一位印度作家兼教授结婚。1964年她进入外交界。1975年至1978年她先后担任驻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大使，开创了菲律宾妇女担任驻外大使的先例。1980年她成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发展中心和人权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2月，就在科拉松与马科松斗争最激烈时她辞去了联合国的工作来支持科拉松，成为旧政府最早倒戈的外交官，轰动一时。科拉松执政后，她被委任为外交部副部长，直到确定参议员候选人，她才辞去此职。

莱蒂西亚是女权运动积极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她曾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主席，参加过墨西哥、哥本哈根召开的妇女年大会并担任主席。她主张菲律宾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要继续发展菲美关系，又要加强菲中友好。为此她曾经两次来中国访问。

当选的参议员中，有一位反对派的“压轴”人物，他就是电影明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他是亚典尼奥大学的马波亚科技学院的毕业生，曾5次被选为最佳电影明星。他是电影工作者福利基金会的发起人和会长，曾任菲律宾电影制片协会会长。由于他拥有成千上万名的影迷，反对派每次集会，都把他安排到最后一个讲话，用他来吸引听众。他组织过新菲律宾人民行动党，同自由党卡劳派关系密切。1967年，他曾以无党派人士当选为黎刹省圣胡安市市长。1970年他再次当选。他在任期内，为该市建造小公园、公共市场、

市立中学，铺筑水泥道路；扩大卫生与营养服务；建造市政府大厦并改善市政行政管理。1972 年被选为公共行政管理十大杰出青年和杰出的圣胡安市长。1980 年，他受伊梅尔达的邀请，出面呼吁所有市长、省长在马科斯的新社会运动的旗帜下联合竞选，因此被视为亲马科斯人士。他最近表白自己虽然身在反对派的民主大联盟阵营，其实还是“独立”的。他和托伦提诺亲自去马拉卡南宫会见科拉松，承认过他们的失败——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在种种艰难之中，众议员的选举也在 6 月底完成。执政党和独立派人士获得了 191 个席位中的 162 席，反对党获得了 29 席。7 月 1 日，众议院以 95 票的多数推选拉蒙·米特拉为众议长。

科拉松·阿基诺搬到了阿莱圭街 151 号政府的宾馆居住。这是一座白色混凝土、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红瓦屋顶，楼上有围着栏杆的阳台。在 14 间房屋和把它与马路隔开的铁栅栏中间，种着几株纳拉幼松。纳拉是菲律宾的国树，由于它木质坚硬耐久而为人喜欢。菲律宾人民希望他们的女总统能象这些纳拉松一样，尽管幼小但却一定要坚强！

第九章马尼拉饭店事件

科拉松说话语音平稳，处理事情极其稳重。她并不参加每天的祈祷，但却常常提起上帝，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演讲中，她都提到了上帝。她相信是上帝指点了她的行动，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她必须要做些事情的话，上帝会照料她。她还是个宿命论者，她认为死亡在注定的时该才会来到。那些想恐吓她的人应该认识到，她的信念和她的宿命论将使她成为一个甘心情愿的殉难者。

科拉松最信任的人就是她的丈夫尼诺伊。尼诺伊死前在飞机上照的一张照片，挂在她办公室最显著的地方。她说，当她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而被弄得不知所措时，她就会面对墙上的照片，轻轻地问：“尼诺伊，你将做些什么？你将如何处理它？”——她是因为爱，才在丈夫被枪杀的血泊中站起来走向政治的。她不喜欢政治，可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在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既然木已成舟，你就必须尽力把你身边的关键问题处理好。”——科拉松·阿基诺。菲律宾的“故事”成千上万，你讲不明白其中的奥秘。同样，菲律宾要做的事情也是太多，你必须灵活机智，才能在旋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托伦提诺、新社会运动与马科斯的亡灵

远在马尼拉之外，在吕宋岛西北角有一片干燥、贫穷的地区，名叫伊洛尔戈。这里遍地黄土，尘沙弥漫，红砖砌成的教堂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它更象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富有太平洋地区天堂般的风光。这里有两个小省份，分别叫作北伊洛尔戈和南伊洛尔戈。一道蓝色的山岭把这两个省份同吕宋岛的其他地方隔开。

伊洛尔戈人面色呈褐色，饱经风霜，给人一种冷漠、排斥他人的感觉。据传说，他们是很久以前被人从婆罗洲（今天的加里曼丹岛）赶出来的，之所以选择此地居住，是因为这里荒凉而人烟稀少，何况也没有地方要他们。伊洛尔戈人习惯于这片令人生畏的景色后，变得比菲律宾群岛上的任何其他少数民族更加机智，更加狡猾，更加喜欢拉帮结伙，更加喜欢打击报复。

第一个来到伊洛尔戈的欧洲人是个年轻的西班牙贵族，征服者胡安·德·萨尔塞德。1571年，他年仅22岁，从宿务岛的旧西班牙殖民地乘船北上，到马尼拉建立新居民点，然后到吕宋岛北部的岸边探险，创立了许多至今还存在的城镇。他被任命为伊洛尔戈的副省督，但到了27岁时忽然发高烧病死。

西班牙人对衣不蔽体的伊洛尔戈人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他们比南面的加禄人“更野蛮”；有些人则认为他们“是一群文静、沉稳的人民，厌恶战争，谦恭有礼”。伊洛尔戈人的确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非常和蔼可亲；另一方面，当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便会变得十分凶残，其凶残的程度就是住在菲律宾的马来人也是少有的。在他们中间，手枪和步枪就象牙签一样普通平常。男人以当上神枪手或者空手道好手为荣。男孩子们随身携带蝴蝶刀——即菲律宾式的开关刀，它轻轻一碰就能打开，手腕一抖就能关上。近年来，如果家庭发生纠纷或政治纷争，他们就采取用喷火器焚毁整个村庄的办法来解决。

伊洛尔戈人对家庭和家族要求绝对忠诚。这就意味着在憎恨其他所有的人。伊洛尔戈人盲目地崇拜自己，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菲律宾人。他们以家庭和血亲为核心，通过结拜兄弟的办法结成一系列的同心圈，向外以密友的方式结成宗族。遇到需要时，伊洛尔戈人可以使全村人都结为兄弟，最后甚至整个民族都结成兄弟。

这就是马科斯家乡的特点。当马科斯离开菲律宾之前，他为什么执意要回到他的北伊洛尔戈去，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马科斯走了，但是，马科斯的这些家族兄弟却仍在菲律宾。这无疑科拉松·阿基诺新政府最大的隐患之一。而他们还没有联合起来对新政府发动进攻时，马科斯的竞选伙伴托伦提诺先他们一步开始了反政府的叛乱。马科斯时期制定的1973年宪法规定，就职总统必须在6个月之中宣誓就职，否则他就丧失了资格。马科斯在他离开菲律宾时，已经匆匆地进行了一次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但是，托伦提诺还没有人生这一辉煌的时刻，没有了整个菲律宾人民的“承认”，就等于他托伦提诺一生都没有当上菲律宾的总统——他已经七十有余，人生中也许只有这唯一的机会，他不愿意就这样轻易失去他当总统的机会，何况马科斯在国外时时告诫他留在国内的手足们，问题并不会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马科斯的政府还在运行着，只不过是暂时转入了“地下”。这样，托伦提诺就开始与马科斯的残党们紧密联系，向科

拉松新政府发起频频的进攻。

4 月份，马科斯的追随者们每一周肯定要在卢内塔广场举行一次集会，有 5000 至 7000 人参加。他们穿着原来马科斯时代的 T 恤衫，挥舞着红、白、蓝三色旗帜（忠于马科斯运动的颜色），高呼运动口号“马科斯回来！”并要求竞选副总统的乌科斯的“亲密”伙伴阿图拉·图林·托伦提诺代理总统。

托伦提诺站了出来。这位 75 岁的政客，向新政府发出威胁，他要宣誓就任总统。他还在这个月去拜访了恩里莱，告诉他马科斯指示他去宣誓就职。

恩里莱这时对科拉松还抱有幻想，他劝托伦提诺不要被马科斯利用了。同时，恩里莱向科拉松汇报了与托伦提诺会见时的情况。

不久，科拉松就发表形势报告说，“我不是真正地害怕马科斯的追随者，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不团结的。在这以前我们反对马科斯先生时，也有过同样的不团结。”对于托伦提诺宣称他要宣誓就职总统问题，科拉松诙谐地说，“我想那是在开玩笑，我们不要受他的干扰。”

托伦提诺对科拉松政府的不予理睬大为不满，更加紧了他们进军的步伐。

几天以后，几千名马科斯的追随者试图在马拉卡南宫示威游行。他们与政府的警察发生了冲突，有十几人受伤。这场游行的策化者是马科斯的远房侄儿、前军事情报部长、陆军准将罗兰多·阿巴迪拉。在科拉松执政前，他曾几次参与杀害反马科斯分子的活动。这次计划的目的是冲进总统府，扣押科拉松作人质。

托伦提诺隔岸观火，以期这次密谋军事政变如果能激起群众性的反科拉松的叛乱，他就示意马科斯手下的军阀夺取几个省的地方政府控制权。密谋者企图煽动起一场危机，迫使恩里莱接受他们的政府和恢复秩序。

政府从国外情报部门获悉了这个计划。一位军官承认由于阿巴迪拉策划这次叛乱让他害怕，他的士兵的大部分是阿巴迪拉的人。他害怕叛乱失败后遭到牵连，就向政府坦白了叛乱内幕。两个星期后，这场叛乱方被制止。

7 月份，新总统与马科斯支持者之间的对峙达到了危急关头：托伦提诺在继续宣布他将宣誓就职，他告诉马尼拉国际青年商会会员，时间就定在“8 月 15 日前”。按照 2 月份的选举时间计算，如果托伦提诺在 8 月 15 日之前没有进行总统就职仪式，他的副总统资格就要被取消。那时，科拉松新政府的新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科拉松与劳雷尔虽然形式上成了菲律宾的总统，但很多人还依照着过去的宪法去看待这件事情。

托伦提诺迫不急待地想宣誓就职，就是因为他认为，只要他宣誓就职，他就是法律上承认的菲律宾总统。他们抓紧了他们计划的实施。

二、马尼拉饭店事件

7月51日这一天，托伦提诺和他的支持者们用假名字住进了马尼科饭店。

这家饭店是美国人于1912年建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被焚毁，直到战争结束才得以修复。在马尼科这座城市中，它是一家最好的饭店，曾被评为东方7大高级饭店之一。它座落在黎刹公园旁边，是一个有18层高楼的建筑。570个房间，错落有致。整个建筑结构具有加利福尼亚教堂的风格。站在屋内的窗前，可以俯视美丽的马尼拉湾。这里经常聚集看很多外国记者，也是商业旅行者和来访的外交官员们最喜欢下榻的地方。新政府成立后，这里归国家所有。

7月6日，科拉松和拉莫斯一起到棉兰老的卡加延德奥罗市会见地方团体。

就在这一天，位于首都北面的奥科瓦斯军营的500名士兵受命向马尼拉进攻。有人将托伦提诺在马尼拉活动的情况透露给国防部。但是，国防部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国防部的官员说，他们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次听到类似的谣言，所以，也没有人认真对待此事。

到了中午，陆军司令部也接到了关于有军队行动的报告。

恩里莱正在比利亚莫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他在这里得悉卢内塔的一些官兵戴上了黑色袖章。恩里莱后来回忆说，“当他们开始带上袖章时，我们知道某种事情要发生了。我们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甚至有的参加者都不知道内幕。”他猜想，这支军队没有首领，是在大众控制之下。于是，他马上打电话给副参谋长、陆军少校萨尔瓦多·米森，就是他那天早上把部队调动的情况通知了恩里莱。中午，他又把消息告诉了拉莫斯。

据后来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实际上恩里莱的部下鼓励这次行动，并参与了这个计划。一位高级军事军官说，他们的目的在于激起百万“人民力量”的反应。他又补充说，没有材料证明恩里莱卷入了这一计划，仅仅是推测而已。

中午刚过，马科斯的支持者们立刻开始聚集在黎刹公园。他们准备在下午1时至5时在那里举行一次有组织的集会。因为集会是得到批准的，所以，政府派出大约有300名防暴警察布置在美国大使馆隔壁的陆军和海军俱乐部附近。而警车是在下午两点半钟左右发现了忠于马科斯的军队的活动地点。

警察当局说，当时他们正在通过一个市镇。他们听任了士兵的前进，因为他们怕发生“不幸的暴力冲突”。

于是，更不幸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大约有3000左右的马科斯的支持者参加了黎刹公园的集会。他们大多数看来是穷人，穿着马科斯时期的T恤衫和胶鞋。大约有2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乘坐15辆军车和吉普车来到会场。他们带有陆军乌齐来福枪和机关枪，套着黑色和红色的头圈，上面标有“护卫者”的字样。这些字母是绅士联合会、现实、无畏、坦率、鼓动者全国协会这些词的词首字母缩写。他们的姓名标牌用标签盖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士兵和来自伊洛尔戈（马科斯的势力范围）、卡加延（恩里莱的大本营）、巴丹和邦板牙等地的平民家园保安队队员。他们高视阔步地前进，摆动着马科斯“V”的标志。

防暴警察撤出来又突然返回了总部。他们听说马科斯的支持者将要向马

拉卡南宫进军，他们认为保卫那个地区更为重要。

下午3时左右，马科斯的支持者拥向马尼拉饭店并进攻这座大楼。他们让门厅里的人们赶快让出去，接着，他们就通过门厅，马上就占领了800美元一宿的麦克阿瑟成套房间作为指挥部。士兵和5000名马科斯的支持者混杂在一起。有些人还带着枪，枪上系着红、白、蓝、三色丝带。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初步获得胜利后，饭店内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人们呼喊“马科斯回来！”“托伦提诺万岁！”的口号。

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忠于马科斯的士兵操纵着小口径机关枪，沿着两个梯楼摆开。有一些士兵因为无事，就跳进游泳池里玩起来。放置在饭店里各处的自动售货机开始出售红、白色的马科斯——托伦提诺T恤衫。

托伦提诺在杂乱无章中，站在饭店的行车道上，向他们的支持者们宣读了马科斯的一封信：“我在此命令，签于我非有意地和不可避免地离开菲律宾，我授权托伦提诺为合法的国家领导人，直到我回到菲律宾。”

接着，托伦提诺在前最高法院法官塞拉芬·奎瓦斯主持下，宣誓就职。站在一旁观看的有：前新社会运动的领导大和一些忠于马科斯的将军们。其中在菲律宾比较知名的人士有：陆军准将乔斯·朱梅尔。他是全国民主阵线领袖托尼·朱梅尔的兄弟；退伍的陆军少校普罗斯佩罗·奥利瓦斯，他是前马尼拉警察总监，也是在谋杀尼诺伊案件中被宣判无罪的25个军官之一；达沃地区的前任地区司令员、陆军准将贾米·埃切维里亚也在场。除此之外，出席宣誓就职仪式的还有前马科斯政府官员（包括马科斯的律师、前议员拉斐尔·雷克托）和他们的支持者。

下午5时，托伦提诺在饭店内用电话和在火奴鲁的马科斯通了电话。马科斯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建议托伦提诺使用这家饭店作为他的行动中心。同时，马科斯还给其他参与事件中的亲信们打电话，每一次都通过一个熟悉他声音的电话记录员录下来作为对饭店内官员们的指令。

在频频不断的电话联系中，有一次，这位被废黜的领导人告诉托伦提诺，一定要坚守这家饭店。他指示到：“迪马波罗将于今夜晚晚些时候到，请你和他协同工作。”他说，“我派有3个人在饭店里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以后，马科斯告诉雷克托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容忍，不要向马拉卡南宫进军。

他又在另一次电话中说，假使你觉得军队即将进行攻击时，就要特别注意，我不愿意人民受到伤害，应使人民远离交火的地方。”

马科斯还命令雷克托，“告诉图林（托伦提诺）起草一个决议，送交白宫的里根总统，说你们希望我回去。”

下午6时，托伦提诺在14楼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托伦提诺在会上呼吁人们支持他的政府。他还宣布恩里莱为国防部长，并提名其他4人为内阁成员。

这时，已经有300名旅客搬出了饭店。外国新闻组织，包括美国电视网，在那里保持着他们原来的豪华总部的样子。饭店的服务一如既往。托伦提诺的军队和支持者在饭店走廊的门厅闲逛。

三、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马尼拉饭店事件

科拉松和拉莫斯很快就知道了马尼拉饭店事件。他们此时正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教室内召开地方团体会议。科拉松命令拉莫斯处理这一事件，而自己则继续她的早已安排好的卡加延德奥罗日程活动。

拉莫斯发出一封紧急警报，通知各指挥官说，“参加托伦提诺行动的 300 名军人是被引入歧途的马科斯顽固分子，而那个行动不是政变。重复一下，那个行动不是政变。”他说，国防部和军队的领导人一直是支持阿基诺总统的，她现在很安全，并正在指挥着武装部队。

随后，他到了科拉松主持会议的会场，向科拉松和在场的内阁成员们作了简单的汇报，结论是“局势在控制之中”。

拉莫斯命令防暴部队和警察用军车、救火车、刺铁丝网路障等封锁通往马拉卡南宫的道路。警察被派往保护公共机构，其他忠于科拉松的部队包围了饭店，在半公里长的半径内设立实际战区。在战区内，那些马科斯的支持者们焚烧了一些轮胎。

恩里莱命令军队不要和忠于马科斯的士兵作战，“因为如果我们发动了攻击，将造成一场大屠杀……最好暂时由他们去。”霍纳桑上校后来支持了这个决定，没有攻打叛乱者。他似乎并不是怕流血，而是恐怕打了不是敌人的人。他说，“当他们说他们是为恩里莱和拉莫斯而战斗时，我们怎么能攻打他们？”

晚上 10 点钟左右，恩里莱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宣称他拒绝托伦提诺的内阁提名，他说，“我们在菲律宾群岛上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科拉松·阿基诺政府。”“我不寻求另外的职务。没有必要恐慌。”他说托伦提诺必须对他的行动负责。

黎明，几百名士兵开始投降。从邦板牙来的部队说，他们被引上了错路。他们接到一份电报，号召他们出发到该饭店去支持恩里莱和拉莫斯，据说，这两个人已经变节投向托伦提诺。那是一个容易使人相信的策略，因为恩里莱在拜访马科斯老巢时，一点也没有反驳一些人对被废黜的总统的崇拜，从而使他们容易转而支持恩里莱。

早上，当局割断了饭店对外的电话联系。

科拉松总统仍旧按计划进行着她的工作，在卡加延德奥罗市的记者招待会上，她说，她将命令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控告托伦提诺煽动叛乱罪，因为他“非法就任”国家代理总统。她还命令菲律宾警察部队首都司令部，一旦发现他们开始暴动就逮捕支持托伦提诺的 300 名武装士兵。她说，“我一向在对付马科斯的追随者方面采取最大的宽容，但是现在太过份了，我除了命令采取必要的行动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就在饭店对外联系的电话被割断后不久，科拉松回到了马尼拉。在马拉卡南宫，科拉松召见了恩里莱和拉莫斯及其他高级军事官员。她问恩里莱，需要多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恩里莱说：“可能要 72 个小时，那时我们将有必要采取某些行动。”萨吉塞格建议只给叛乱者们 24 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不提出对叛乱者的控告。科拉松同意了。

接着，科拉松走出马拉卡南宫，在接待室的台阶上，含笑而平静地告诉在那里等候多时的新闻记者，“我想请公众放心，局势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下。我们大家可以照常进行我们的工作。”她说，“卷入到令人惋惜的冒险行动

中的军队，只有极少数是特别忠于马科斯前政府的士兵和军官。参加叛乱的大多数人，主要是被忠于马科斯者发动的叛乱引向了歧途。”她宣布说，“破坏法律必须受到惩罚。然而适当节制仍然是衡量我们作出反映的必要尺度。我现在宣布，无论如何，像这样的事件不容许再次发生。从现在起，将密切监视顽固派和类似的其他颠覆活动。”

科拉松面前有一位记者告诉她，她的拥护者们要组织起来向马尼拉饭店进攻，平息这场叛乱。

科拉松说，“这还不是要表示人民力量的时候。这次事件规模很小，不致于威胁到我们的民主政治，请他们努力保持冷静的头脑。”

接受记者采访后，科拉松接受了 220 名士兵的投降。他们向科拉松总统谢罪，并说他们是受了蒙骗。科拉松转头问拉莫斯，有多少士兵和军官受到了托伦提诺的这惑？

拉莫斯立即派人去调查清楚这一数字。

恩里莱接着宣布，限叛军在 24 小时内回到他们的营房，他们只要在 24 小时内赶到，他们就不会受到起诉。他对新闻记者说，“让我们别使用投降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愿让任何人受窘。我们要维护统一的军事指挥，我们将以最大的宽宏大量来避免使他们为难。”

恩里莱授命霍纳桑上校提任设在公园大看台上的归降委员会主席。恩里莱下令暂时关闭一个曾被托伦提诺及其党羽用来散布谣言并号召人民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的广播电台。接着，军事当局又关闭了几个其他从事类似活动的电台。

75 岁的托伦提诺害怕了。他躲藏在饭店门厅对记者说，他是被发生的事件拥推出来的。“在这些集会上，有许多压力迫使我宣誓就职。他们集会、他们呼喊：‘你宣誓就职！你宣誓就职！！’这就是人民，所以，我在服从人民的呼声中宣誓就职了。”

托伦提诺同时对另一个记者说，“我们没有占据这个饭店，我们是登记住进来的。占据和登记进来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马尼拉饭店的电源被切断了，又停止了房间服务。托伦提诺在下午 5 时 30 分，从饭店的防火楼梯爬出，乘一辆灰色汽车穿过卢内塔广场到陆军和海军俱乐部，来见国防部副部长拉斐尔·伊莱托及政府的其他代表。雷克托和埃切维里亚陪同他前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官兵乘车而来。少顷，托伦提诺返回了自己的家。

恩里莱再一次向留在饭店里的叛军申明：他非常欢迎他们的归来，凡是到军事当局这边来的人，不予处罚。经过 6 个小时的谈判，最后一批部队在次日清晨离开饭店，去往马卡蒂的博尼法西奥堡。军官们被允许带着他们的枪支离开饭店，并保证安全回到他们的部队。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如同没有发生这场事件一样。”

拉莫斯也对回到军营的官兵表示了极大的欢迎。“我们欢迎你们回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他说，“我们了解他们给你们施加了压力，这是你们两天前在马尼拉饭店参加托伦提诺事件的理由。”接着，他讲了军队保持力量，共同对敌的重要性。

恩里莱接着说，“我们不打算对你们中间的任何人给予羞辱、惩罚或为难。我甚至以我自己的荣誉、我的生命和我自己的地位来保证坚持这一点，做到我们对你们所许的诺言完全兑现。”

拉莫斯命令他们做 30 个俯卧撑。他与他们一起做操。然后，又与他们一起进早餐。他后来解释说，“做俯卧撑主要是减轻紧张气氛，要在所有菲律宾武装力量的现有成员中建立和睦关系，并强调穿军服者中间的团结。”

马尼拉饭店事件的最后一批平民参与者离去后，人们发现，饭店走廊到处都是零乱的烟头和烟灰、吃剩下的食物、果汁罐头、塑料袋、啤酒和劣质酒的空瓶子等。饭店工作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开始了对饭店从政治到卫生的清扫。

四、和平是无价之宝

一天半的反对派政变就这样被平息了，一些激进分子叫嚷着要严惩叛乱分子。他们指责科拉松太软弱，再不拿出一些措施来，这样的叛乱将层出不穷。

科拉松没有对此发表直接的见解。在接见来访的西德代表团时，她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支持者希望我表现出决心并逮捕那些反对我的人。但是，我的看法是，我不应该追究那些叛乱的追随者，而是要注意领导的动机。”

内阁也分成了两派：一要杀一儆百，儆戒犯罪者；另一派赞成不追究此事。

恩里莱已经许诺对这部分军队宽大，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科拉松总统的意图行事。他对主张处置那些士兵的人说，“你们说说都是很容易的。”他提到了很多叛军属于黑社会那些人。“如果你了解了‘护卫者兄弟会’的范围有多么广阔，你就会觉得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拉莫斯对有人说军队不是一批职业军人而是一帮匪徒而感到愤慨，他说：“怎么每个人都责备军队？”他建议可以对军官使用行政上的处分，如降级或调离指挥部。

劳雷尔插话说：“他们不应该被控告，那不就是一场政变？！”

另一些人争辩说，审讯可以给马科斯的支持者一个讲台。

科拉松让内阁成员们平静下来，说：“我们不愿意使托伦提诺成为烈士。”

很多人对审判托伦提诺是有戒心的，他们害怕托伦提诺的被捕，会造成新的示威行动的焦点。

科拉松在叛乱结束两天后宣布，对于叛乱的领导者均不予以刑事起诉，包括11名军官，只要他们效忠于宪法。她说，“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一事件未经流血而结束。当我要马科斯的支持者24小时内离开饭店时，我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点。现在看这个条件对他们是大大的有利的，让我们把这件事情给忘掉吧！”

“科拉斯宣布，她将禁止旨在推翻政府的叛乱和集会。阿罗约补充说，政府不禁止示威游行，但是不再允许哪怕是极小的叛乱。”

科拉松随后在每周两次的电视讲话中再三强调，如果马科斯的支持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数进行集会，他们将被驱散。如果军队再有人参与这种活动，那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也反驳批评好过于宽大的意见。

科拉松在一次主教——商人会议上说，“当你们想到这件事时，结果表明我们的仁慈是有价值的。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的生命。”科拉松建立一个以卫生部长艾尔弗雷多·本松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在这次事件中军队卷入的程度。拉莫斯也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科拉松对于在这次事件中军事情报部门的失职表示关切：“我的确为此事感到不安。我不能想象我们控制的军队，不能在事前知道正在进行的某些事情。”

对此，拉莫斯将军签发给他的司令官们一个通知说，马尼拉饭店事件表明，在某些单位指挥机构的连锁反应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些指挥官们控制不住他们的军官和士兵，致使某些部队在他们的长官不知道的情况下开赴马尼拉。他说，由于“错误地认识和理解政府在反叛乱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他们的这种行动。他要求指挥官们加强对他们单位的控制，并对军队开始进行一次关于政策的宣传和教育运动。他在通知中附发了总统的讲话稿

和录音，供他们使用。

美国的里根总统也发表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说他没有看到可以证明认为马科斯参与了这场企图实现的政变的材料。如果他卷入了这个事件，将会破坏美国的中立法，该法令禁止进行旨在动摇一个与美国和平相处的国家政府的活动。一个月后，当马科斯的电话讲话的报导在报纸上以重要新闻发表时，白宫宣布说，有必要审查马科斯的情况，看看是否表明他卷入了菲律宾党派的政治活动。一个美国国家的委员会开始调查这件事。

里根对此又发表谈话说，“我不能不顾这样的事实——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不可不顾——那就是他离开这个岛国之前，他不允许军方……采取行动，他不愿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流血或内战……所以他宁愿离开而不愿允许发生那样的事情。”

五、托伦提诺：科拉松·阿基诺的一个公开的政敌

天主教的主教们赞美她的这种姿态。

托伦提诺及其他同伙并不感激科拉松的宽大，他们拒绝宣誓忠于宪法，理由是他们认为宪法是非法的，因为它从来没有得到批准（这时，科拉松政府制定的新宪法正在讨论中）。

随后发生了几个星期的暗中的勾心斗角。

恩里莱说，政府以“温和的”态度对待知名的共产党人，同时，不能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托伦提诺。他说，托伦提诺在马尼拉饭店时所有的全部事情，不过是饮了几瓶威士忌。

但问题好像并不象恩里莱所说的那样简单。当政府给托伦提诺及企图政变的大约 40 位领导人们一个必须宣誓的最后期限后，这些反叛者并没有如期给政府一个满意的回答。期限过后，政府又另定期限，但他们仍然拒绝。

批评家说，科拉松优柔寡断且手段软弱。

科拉松对一位来访者说，她受穆罕默德·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感召。她对他说，“我还感到我的工作首先是拯救人的生命，我并不在乎被指责为对马尼拉饭店事件的反叛者过于手软。”

认为托伦提诺和他的同伙们所作的活动不过是一场喜剧的看法，被 7 月 20 日发生的事件所粉碎。当时，聚集在黎刹公园内的忠于马拉斯的人群，把一名身穿黄色 T 恤衫的 24 岁男青年殴打致死（黄色是科拉松的代表色）。

政府决定以反叛罪对托伦提诺及其同谋者起诉。同伙中包括前议长尼卡诺尔·伊尼格兹，几个前议员，4 个将军以及其他军官和前政府官员。科拉松仍旧是宽容地表示，如果他们宣誓即行赦免。他们必须发誓忠于共和国，承认根据自由宪法的现政府的存在，放弃使武力或暴力推翻政府。当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照此做了。

按照马科斯的法令，反叛国家的罪行应受严厉处罚。托伦提诺面临从最少 24 年的监禁到无期徒刑的可能惩罚。新政府的新宪法并没有取消这一条法令。阿罗约从马科斯时代就反对这条法令，他现在把这条法令叫做“理想的因果报应”。科拉松在电视节目中说，“我希望看到他们感到懊悔的具体证明，但是没有。”她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真诚的积极行动或者与我们合作的愿望。我们不能容许他们一直欺骗我们，我们也有权利得到公正。”

托伦提诺申辩说：他不应该被起诉，因为他没有在职宣誓书上签字，他的追随者中也没有人接受任命。他说，宣誓效忠是一个“公开羞辱”。最后，他答应宣誓效忠政府但不是忠于科拉松的新宪法，他把这一点从宣誓词中删去，因为政府不想羞辱政变参加者。后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托伦提诺说，“我仍旧认为我是马科斯政府中的一员，只是现在我们暂时停止活动而已。”

托伦提诺被马尼拉饭店起诉，要求他赔偿 80 万美元的未付帐单及损坏赔偿费。托伦提诺拒绝支付。他说，该饭店从国际报刊上免费广告中得到的利益抵消了损失后还有多余。国际广告使马尼拉饭店成为旅游者向往的胜地。没有办法，饭店提出了 90 万美元的损坏赔偿诉讼。

有人说，这一天半的政变企图是一件荒谬的玩笑。一家新闻杂志把对此的报导题为“一间搞政变的房间”。但是，另外有人说，这一事件预示着将有真正的危险，政府不应该这样轻易地把它丢开。他们奇怪，国防部必然知

道有军队从中吕宋岛开来，为什么它不禁止他们？有人得到的结论是：这个事件表明，这是忠于马科斯者和恩里莱力量联合的结果。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小兄弟们把忠于马科斯的人们算作是自己队伍里的人，而马尼拉饭店事件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如果人民群众响应他们的号召，那么忠于马科斯者、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以及他们在军队中的支持者就要向马拉卡南宫进军。从未公开过的本事件报告没有提到恩里莱卷入在内，但是，乔斯·康塞普西翁部长评论说：“根据证据，很难说军方事先不知道这一事件。”

某些军官和士兵相信，恩里莱和拉莫斯是叛乱的领导者，以致他们乐意与政府打仗，这是值得新政府方面注意的。他们担心，恩里莱这种支持犯错误士兵的表示和士兵对他的保护的感恩，加强了恩里莱在军队中的地位。

第十章天使伸出橄榄枝

毫无疑问，科拉松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民族和解问题。这个问题她竞选时就许下了诺言，她必须将此事与其它问题同时解决——菲律宾人民在马科斯 20 年的统治下，已经是生活在火深火热之中，他们也许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因为，他们与旧政权的反对派一起把马科斯赶下台的目的，就是渴望新政府给他们带来在生活本质上的改变。如果这个新政权和马科斯的旧政权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失望也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

科拉松深知这一点，从宣誓就职开始，她就着手了民族问题的解决工作。

一、把和平的希望给人民

新人民军最初是由菲律宾社会的民族矛盾产生的一个武装组织“霍克”过渡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风暴席卷到菲律宾。原来菲律宾社会的由于阶级压迫而出现的农民运动演变成为人民抗日军，它的菲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为“霍克”。到战争结束，这支武装已经在菲律宾社会形成了规模。他们以为他们在战争中对外抗日、对内保卫家园的贡献，使她们能成为菲律宾社会的功臣。他们向政府要官职，向美国人要地位。美国人要他们交出他们队员的名单。不久，这些人就成了菲律宾社会的反叛者，遭到通报逮捕。

“霍克”反对美国人同菲律宾人在经济上处于同等地位，反对他们的军事基地在菲律宾拥有永久性。“霍克”也让新国会必须同意这些看法。于是，美国人便以他们拒交手中的武器、阴谋颠覆，甚至说他们有过亲日的勾当而命令政府惩罚他们。1947年，菲律宾取得独立后，“霍克”仍旧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独立政府的安全部队和地方显贵的私人保镖开始把“霍克”和农会会员当作追杀的目标，老“霍克”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建立了人民解放军，军队成员仍称他们自己是“霍克”。他们要求实施人民权利法案，撤消对“霍克”队员的迫害，反对警察和私人保镖，释放政治犯，撤换滥用职权的官员，恢复民主联盟在国会的席位和进行土地分配改革方案：开始可以实行三七分成，最终废除佃农制度。但政府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政府与“霍克”之间的战争便越来越激烈地展开来。进入50年代，马格赛任国防部长，他听从美国人的劝告，停止残杀“霍克”队员，叛乱形势才有了缓和。马格赛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后，又对农民和“霍克”有了许多许诺，但实行的却很少。

进入60年代后，菲律宾共产党分裂，由乔斯·马利亚·乔马·西森担任主席的一派（CCP），主张延长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次年，他在打拉省与“霍克”现任司令丹蒂相遇。丹蒂随后率部下参加了CCP，并将“霍克”改名为“新人民军”，成为CCP的武装力量，开始与其为共同实现菲律宾土地改革与民主而进行长期斗争。

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新人民军已从1969年的300名战士发展到了1600人，或许已经达到了2300人（根据不同的报导）。他们自己宣称拥有几万人。而且，就在科拉松宣誓就职后不久，新人民军的领导政党——菲律宾共产党又作出了一次重大的改组。原党主席鲁道夫·萨拉斯和总书记拉斐尔·拜格西斯，因未经政治局讨论，私下决定抵制1986年的大选而受到党内的严厉批评，被迫辞职。新任党主席是蒂亚姆松。

蒂亚姆松原来是菲律宾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在马科斯军管后不久加入菲律宾共产党。1973年被捕，后释放，在城市搞了几年工运工作，后被派往东比萨亚活动，是东比萨亚地委主席。他在该地区的萨马岛组建新人民军，发展菲律宾共产党力量，成绩显著，后来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菲共全国城市委员会主席。

新人民军的成员不全是菲共人员，不少人是不满马科斯的统治的群众，甚至有些人民教师、修女、小商人也是这支军队的战士。由于他们庞大的组织机构和不断增加的队伍人数，使旧政府和新政权都不能轻视他们的存在。

恩里莱的军队也承认新人民军控制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地区，在73个省中

有 63 个省有他们的足迹。新人民军控制的萨马岛的大部分，棉兰老、内格罗斯、帕奈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在那些地区的农村，新人民军和支持它的所有平民地下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不同的地区政府，征收赋税和进行公正的赏罚。

菲律宾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左派联合组织——全国民主阵线，成立于 1973 年。它不但包括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还有许多进步的左派团体及个人。

由于尼诺伊与西森、丹蒂在 60 年代就有良好的交往，并曾经为他们提供过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新人民军的训练基地，所以，科拉松解决新人民军问题便胸有成竹。

可现实并不像想象得那样简单。

在宣誓就职的第三天，科拉松就下令释放了 39 名政治犯。她宣布说，政府将“毫不例外地释放所有政治犯”。3 天之后，科拉松政府释放了共产党领导人连同其他被拘留者，总共释放了政治犯

丹蒂司令被释放后，受到科拉松的婆婆多纳·奥罗拉的监护。多纳·奥罗拉起初并不认识丹蒂，只是在 1976 年审讯尼诺伊时见过他一面。当时，检察官控告尼诺伊下令杀了一个当地的农民领袖。丹蒂出庭作证说他收到了 100 万比索（当时约合 135000 美元），要他说出是“霍克”队员奉尼诺伊之命杀人的。多纳·奥罗拉被感动了，她告诉科拉松，“当马科斯他们对人民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说出这一席话，真是太勇敢了！”得知丹蒂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多纳·奥罗拉去问乔克·阿罗维，她是否应该做些什么？

出于同样的原因，科拉松邀请西森和丹蒂到她的办公室来，3 个人在摄影记者面前有说有笑地谈论开来。

接着，科拉松又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表示说，她准备同新人民军对话。“我已经与他们有过一些秘密的接触。”但有些事情并不能向所有的人公开。3 月 2 日，科拉松在黎刹公园参加感恩节弥撒时，宣布恢复“人身保护令”。她说，如果与新人民军对话取得成功，释放被马科斯关押的西森和丹蒂及其他反叛高级首领是必要的。

为了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向新人民军表示诚意，科拉松首先下令在棉兰老地区中部单方面停火，停止对新人民军和另外一支反政府武装——穆斯林军队的军事行动。她要军队把注意力转移到准军事部队方面，追回选举期间发给几百个马科斯支持者的非法武器。她同时还向军方发表讲话。在 3 月 22 日的菲律宾军事学院毕业典礼上，她向 2000 多名学员发表了演说。她说，她现在对菲律宾人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消除侵犯人权行为，“只有揭露错误行为，我们才能开始我们的新生。”“只有对过去做出诚实的判断，才能使今后有个干净的开始。过去的恶习要调查，确实有罪行或严重错误的军官和士兵要适当处理。”接着，她向叛乱分子呼吁，称他们是“我们在山上的兄弟姐妹。”“你们进行反马科斯的战争，因为他是最不公正、贪婪和残忍的化身。我同他斗争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她劝他们与政府和解，“不久，我将号召你们出来，重新与人民一起建设我们的家园。再没有理由继续打仗了。”

与此同时，科拉松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安置新人民军等反叛者计划的援助。但是，建立内阁委员会审查各部门提出的计划需 5 个月的时间，内阁认真着手做这件事情又需要 5 个月的时间。科拉松感到十分恼火。如果让反叛

政府的新人民军等武装力量回归，政府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提供土地、工作和住房。经过努力，一些地方的教会、社会团体帮助政府解决了这个困难，但还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政府去解决。科拉松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

科拉松在4月份对菲律宾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请求这块菲律宾左派宣传的场所和民族主义的温床上的同胞们，“向对和平改革没有你们这样耐心的兄弟姐妹们进行讲解，请求他们赶快回来吧！”她说，“我知道叛乱的根源在于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压迫他们的社会结构、我并不要求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正义社会的严峻看法。我只是要求他们给我们人民一个机会，来描绘和平时期正义与进步社会的他们自己的蓝图。”“共和国的军人是在我的指挥下，我对人民的安全、对他们新得到的民主政体的巩固和军队的荣誉负有责任。我不会对任何食言。”她的这次讲话，让很多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在访问达沃市时，科拉松仍加紧和解的努力。在一个女修道院中，她和168个反叛回归者呆了20分钟，她赦免了他们。他们中的4位代表告诉新总统，他们要得到安全上的保证和走向新生活的生活帮助。科拉松回答说，“如果我答应你们，我将保证给你们工作，那么你们就会发现，我没有对你们说真话。”她说，南方司令部的首长会对他们提供保护的。

当地教会和民间领导建立了一项安置回归者的计划，他们将得到的是科拉松建议、由当地政府或民间团体提供的帮助。在与军方的共同安排下，叛乱分子将他们的武器交给和解委员会而不是交给军方。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如果叛乱者对他们的安排不满意，他们可以重新得到这些枪支——科拉松对此非常感动，她在早些时候召开的讲演中声称，她“深为这些前反叛者特别年轻、勇敢和敏锐的正义感而感动。”她说，“这样的青春和美德本来可以用在为我们的国家做好事上，可是他们却浪费在战争中。这就是悲剧。”她说她注意到反叛的根本原因是贫穷，那些回归者需要有新生活的机会，政府应该设法让他们回来是唯一正确的。她说她正在考虑“武器交换”计划的可能性，以枪支交换来恢复正常生活和技能训练。她还注意到这一地区有33000公顷军用土地可以用来土改。

在访问棉兰老时，她答应那里的人民，要为他们解决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军阀的掠夺和准军事性平民家园保安队的暴行。这些人员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纪律，常常被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地方充当军队使用，或者独立攻击原来要由他们保护的居民。骚扰、敲诈、恐吓、杀戮成为家常便饭。科拉松走到棉兰老的公民家中进行座谈。人权委员会主席迪奥克诺请求她解散这批准军事部队，因为它的队员在农村犯有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罪。科拉松回答说，“我命令国防部长和参谋长，准备立即执行解除农村军阀武装和城市犯罪集团武装的任务。我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假定，即平民家园保安队是棉兰老农村安全的必要组成部分，并期望由参谋长向我提出使其继续存在的理由。”

可是，新人民军的全国领导人还有很大的怀疑。科拉松曾鼓励先进行地区性停火，一些地区得到了响应，但是，还有一些地区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双方都在谴责对方首先挑衅。

恩里莱从来就反对科拉松与新人民军的和解行为。他公开说，政府不可为了追求和解而牺牲国家的安全。他还说，对武装力量违反人权的调查和地方官员的更换应该慢慢而有选择地进行。他反对释放4个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包括乔马·西森和丹蒂司令。他们都是在马科斯统治时期被捕入狱的。而军队和工商团体一致认为，释放的激进分子会着手进行煽动，可能会使新

的经济形势动荡不安。

就在科拉松就职两周之后，新人民军与政府部队之间在比科尔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那里是新人民军势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位于吕宋岛的南部，在马尼拉以南 340 英里处。现任新人民军司令员发表声明说：“马科斯不是唯一的问题”。他说，还有其他需要由政府解决的社会问题。接着，全国范围内的袭击和伏击此起彼伏。他们说，他们不会放下武器来响应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停火要求，但和解不是不可能的。在一份声明中，他们向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保证，她结束战斗的呼吁“是会得到响应的”。他们强调他们期待的比“停火更多”。他们希望看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更多的实质性变化。”

二、步履艰难的和平之路

新政府在对待反叛者方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科拉松主和，恩里莱主战。这样，科拉松的和解计划一直是推着向前进行的。新人民军同新政府交战后，科拉松建议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把政府军队和准军事团队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暴行收集成册。恩里莱对此表示反对。于是，人权委员会主任、修女玛丽安妮·迪玛拉南被告知不要调查与恩里莱有关的滥用权力事件，尽管人们都知道他曾为了个人的恩怨下令杀了人，也曾主持过进行军事暴力行为的政策。但是，刚刚建立了的政权需要一个稳固的基础，军队的忠诚还是一个问号，科拉松需要恩里莱留在政府，站在她的一边。但当恩里莱说不允许国际大赦组织——一个国外力量要来菲律宾国内进行人权调查时，恩里莱与科拉松总统再次发生了冲突。拉莫斯将军支持科拉松允许国际大赦组织来菲律宾访问的决定。

科拉松释放了乔马·西森和丹蒂司令后，军队和国防部又传出了政变的谣言。改革武装部队运动这时出现了公开和秘密的两大部分成员，他们开始组织它的有关机构网络，希望有朝一日总统与国防部长分道扬镳。一个忠于科拉松的原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成员，怀疑有一些人在他何失败的政变中所抱的希望还盘据在他们的心头。一个恩里莱从前的法律伙伴、国民党的领袖说，这个党现在变成了许多前马科斯新社会运动成员的家。科拉松也承认，“当然，还有一些仍旧忠于马科斯的人，我们不能回避……他毕竟统治了20年。我经常征求军方的意见，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我的。”

科拉松限共产党在6个月时间内对她提议的停火会谈作出反映。她感到如果没有一个最后的限期，新人民军将会漫无止境地推迟讨论。她告诉军方，她要就一个确定的不能延期的期限达成协议，在此之前认真举行谈判。她希望谈判能实现一个体面的、持久的和平。如果她的努力失败了，她的政府将进行反对反叛者的战争，直到取得胜利。她让军队首先执行解决平民家园保护队和城市犯罪武装的命令，然而军方并没有坚决地执行这个命令。在马拉戈斯海军陆战队军营中，科拉松再次强调了她的命令。部队的官员说，他们已经把让军阀迪马波罗交出选举时期马科斯发给他们的武器的最后期限推迟到6月15日。对方只交出来68件枪支，保留了大约1700件，迪马波罗还为他的军队——“梭子营”举办了两个训练营。这种扩充行动得到了默许，因为要遵守穆斯林斋月的惯例。斋月在1月10日结束。如果他们不交出武器，军方就强迫他们。结果，他们没有理会军队的口头警告，军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拉莫斯告诉科拉松，收缴军阀的武器也要有一个最后期限。他将首先试一试说服的办法；如果说服不起作用，他就采取警察行动。拉莫斯担心反对迪马波罗的行动有可能成为穆斯林反对基督教徒和爆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线。

恩里莱则反对收缴他的北方的一个盟友——也是一个军阀的武器。

科拉松在马拉戈斯军营说，她将同恩里莱商量各地区实行60天局部停火的可能性。在此时期，地方领导人可以与反叛者在特定的地区建立联系和举行会谈。科拉松感到全国民主阵线的领导者对她呼吁停火的答复时间拖得太久。个别共产党人已派出非正式人员探听虚实。共产党的行动开始分散。共产党人已经允许地方指挥官有相对的自主权。科拉松认为这是她和平愿望最良好的开端，但是，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攻击她的停火计划是幼稚的。

恩里莱说，军方决不会制订地区性停火计划，决不会产生这种政策。“阿基诺夫人独创的唯一政策就是和解。”

科拉松承认，她对恩里莱和拉莫斯感到不安。“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很好共事。”她说，“很多人知道我与恩里莱的关系，我的意思是恩里莱以前曾经看管过在狱中的尼诺伊。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竭心尽力地与他处好关系。他们也在尽力地与我和其他文职官员一起工作。象其他一切事情一样，这也要有一个彼此适应的时间。”科拉松知道她现在还没有能够控制住军队。她说，并不是所有忠于马科斯的人都同贝尔断绝了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在谈判中提出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条件，那就是让军队不要过问政治——显然他们也知道政府与军队之间存在着矛盾。全国民主阵线主席安东尼奥·马利亚·托尼·朱梅尔告诉新闻界，游击队仍在战斗，因为军方没有改变他们进攻的姿态，“军方不同意停火。”另一个反叛者说，“总统也许是真诚的，但我们要等待，看一看谁的观点将最终占优势。”同时，反叛者还提出抗议说，还有400名政治犯仍被扣留着。

科拉松和拉莫斯在马拉卡南宫和政治犯特别委员会的代表会晤。这个组织要求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其主席也是一个修女叫迪玛拉南，她说，有一些人甚至在科拉松总统下命令释放之后仍然被关在监狱中。“问题是有名人物被释放了，无名小卒却还被关着。”科拉松对此感到万分惊讶，“在4个月里政治犯的名单没有减少，反面冒出更多的名字，这是令人不安的。”科拉松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研究政府如何能够加快释放500多名政治犯。

农村违反人权的现象减少了，却还在发生。科拉松接见一个从棉兰老来的代表团，它包括劳工领导人、前政治犯和全国民主同盟的官员。他们告诉总统，草率行刑、屠杀、封锁村庄和强迫村民搬迁的现象，在他们的地区继续存在着。

更多的人指责恩里莱不负责任。关键是恩里莱对政府和反叛者间的结果感到悲观，并对新人民军寻求和平的诚意表示怀疑。他说共产党人已浸透到了政府部门。总统府的一个官员说恩里莱的这些行为和言论，目的是在阻止和平的努力。人们感到政府和军队间的分裂因素正在增长。有一家报纸报导说，新总统正计划把恩里莱从内阁中赶走。而恩里莱声称说，如果总统要将他免职，他就打算离开。有传闻说，恩里莱在内阁会上又提前离去，他同总统的支持者发生了争执。

科拉松说，“我不是一个抛弃朋友或怀疑任何人的人。”她说恩里莱离开内阁会议，是为了预先约定的在全国教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接着，她义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谣言是不实在的。她说，她的文职政府和军方之间一切都很好。她补充道，“如果情况不妙，也许我就不会再出席这种会议了。”她对于有传言说马科斯的余党支持恩里莱并不担忧。“他们可以发誓忠于他们想忠于的任何人，我不期望他们发誓忠于我。”她承认军阀仍旧是个问题。就在她谈此话的同一天，马科斯的余党真的在他的家乡北伊洛尔戈省宣布支持恩里莱。

各种报导增加了内阁中人权派和军方在关于同新人民军和谈的人权政策上的冲突的内容。同时，忠于恩里莱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军官正在建立他们的网络。这些人虽然只是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一部分，但他们是科拉松实施和平停火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科拉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三、天使伸出橄榄枝——一次成功的民族和解

就在托伦提诺在马尼拉饭店导演的那幕反叛政府的闹剧刚刚拉开帷幕之时，科拉松作为和平的使者来到了棉兰老岛北海岸的卡加延德奥罗市。这个地区一再发生新人民军和政府士兵、半军事性组织之间的冲突。其中的一个组织叫塔德，是由狂热的宗教信奉者组成，该组织以把被俘虏的人剁成肉酱而名声狼藉。科拉松在这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和平活动后，马上她又着手处理另一宗类似“案件”。

康拉多·鲍尔韦格神父是一位42岁的传教士，他曾领导他的教区部族居民和新人民军订立了7年联盟，以反对把许多部落祖遗土地给予马科斯的木材公司。当地居民还反对在奇科河上建立4个水坝，因为这些水坝一旦建成，就要淹没菲律宾很大一片土地。新政府建立后，康拉多·鲍尔韦格神父切断了与新人民军的联系，建立了他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要求建立科迪拉勒山区5省的自治邦，不让任何军队进入；停止奇科河水坝的建造，停止塞洛菲尔资源公司和植物纤维公司的一切业务。这两家公司均属于马科斯的老朋友所有。

科拉松召见了巴茨·阿基诺，请他参加她政府的工作。

“什么工作？”巴茨问。

“去和鲍尔韦格神父谈判，作为我个人的特使。”科拉松信任地说。

“可以，但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巴茨说。

科拉松笑笑。她的情报部门说明鲍尔韦格很乐意这一谈判，科拉松告诉巴茨：“要弄清楚鲍尔韦格的愿望是什么。”

康拉多·鲍尔韦格已经停止了传教生活，与当地村民科拉松·科特尔结婚。这位姑娘1984年被军方拘留，一直被监禁到科拉松·阿基诺执政才被释放出来。巴茨通过一位新闻记者和左派活动人物与鲍尔韦格的妻子见了面，她邀请巴茨到科迪拉勒地区去。

巴茨和鲍尔韦格的人会谈了3次，他告诉他们科拉松总统希望在这个地区建立和平。鲍尔韦格的人说他们也听说了科拉松总统的许多传闻，他们说，他们相信科拉松，因为她也是马科斯的受害者。

一个星期后，巴茨终于见到康拉多·鲍尔韦格，他带来了400名支持者和军队。在第二次会见中，巴茨倾听了这位领导人的苦情和要求。他们自己人中间也在辩论今后应当做什么。最后，鲍尔韦格同意下山来会见科拉松总统，并为他的军队提出了要求。

巴茨返回到马尼拉，问科拉松总统是否同意接见鲍尔韦格和他的军队。

“当然，立刻请他们来！”

巴茨说：“这看来太像是投降了。如果使他丢失了面子和信誉，他将不再是一位有力的领导人，他是不会同意的。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式，特别是现在他正准备与政府谈判的时候。”

科拉松总统的保安卫队希望谈判在总统府进行，军方要求谈判在他们控制下的地区进行，鲍尔韦格则希望科拉松总统能到他的家乡阿布拉省举行。他很想让科拉松总统看看那里人民的贫困状况。

一个星期后，科拉松总统与鲍尔韦格双方终于在会晤地点上取得了协议。他们都同意在马尼拉北面160公里的科迪拉勒地区属政府管辖的达塔山小旅馆举行，因为这个地区发生过战争，现在杳无人烟。

巴茨用直升飞机把鲍尔韦格请来，当他们到达旅馆时，有两个营的军队守卫在这里。鲍尔韦格带来了百人以上的支持者，他们在门口被要求把武器留下。科拉松总统也乘直升飞机，在上午10点和她的部长们到达这里。

他们共同进入一个庞大的餐厅，双方各10位代表坐在一张木桌两旁。大多数科迪拉勒来的领袖们在地板上或蹲或坐。他们有些人在外衣里边缠着腰布。

开始谈判前，他们饮着酒。这是由旅馆供应的加利福尼亚产的白葡萄酒，酒里放着一枚比索硬币，象征着团结。鲍尔韦格解释说，在两个交战集团开始谈判时，我们的习惯是先来一种礼仪式的祝酒碰杯，目的是带来人们希望的两军之间的团结。

科拉松接着开始讲话。她说，她来此是奉献“我的友谊和政府帮助解决你们的问题的真诚的，这样，我们才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发展和前进。”“我了解，前政权长期忽视你们的遭遇，他们掠夺你们的自然资源，促使你们为正义而斗争。”她加重语气说：“全国人民正义而持久的和平的关键也许就在科迪拉勒。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努力正成为一个窗口……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了，意义是全国性的。”

鲍尔韦格告诉新总统，科迪拉勒人民的斗争是被不必要的政府和多国公司举办的项目激起的。这些项目威胁和破坏着我们菲律宾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传统，对于这里的部族毫无益处。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和平、自由、团结和公正。我们四处努力寻找一个解决办法的理由，为的是免除不必要的生命损失。”

所有到会的科迪拉勒的代表都讲了话。他们共同感谢科拉松总统的到来，并告诉她，他们人民的问题和他们遭受的来自军队的种种凌辱。他们要求政府的帮助是最低限度的——小桥而不是公路。

科拉松总统的自然部长欧内斯托·马塞达作为政府的代表讲话。因为他能讲他们的伊洛卡诺语。鲍尔韦格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把他们代表的每一个发言翻译给政府官员。

恩里莱也随同科拉松总统一起来参加了这次谈判。他感到这次会谈比较愉快。他后来说：“我们可以为科迪拉勒人制定出某种自治办法，这将防止共产党人利用这个地区作为避难所。”

科拉松拿出由巴茨主持起草的谈判基础草案，这是一个双方停止侵犯的总协定，取消悬赏一万美元捉拿鲍尔韦格的决定，承认他的人民盼望的自决权和这一地区的非军事化。鲍尔韦格还希望允许他们各个部族参加商讨这一地区的任何其它政府项目。

科拉松告诉他们，他们反对的项目将要停止。木材公司的执照已经撤消，水坝计划也将要取消。她说要建立谈判小组来研究他们要求的细节。鲍尔韦格答应科拉松总统去新人民军处，让他们把军队撤出这一地区。他说他的人民将不干涉政府当局和正规警察的工作，并同意支持现在进行的政府项目的完成。恩里莱表示，军队保证不干扰他们科迪拉勒军队成员和他们同各省领袖们的商谈。

鲍尔韦格最后建议互相交换礼物，作为传统的当地和平仪式的一部分。科迪拉勒人要赠给科拉松总统一支长矛，希望科拉松总统也回赠他们一件武器，作为双方准备互相保护的象征。总统安全保卫人员认为总统不应手持长矛，转手把它交给了恩里莱；拉莫斯得到了一只木盾和一把斧子。部族的领

导们希望得到一支现代的乌齐枪作为交换。恩里莱迟疑了一会，命令部下给他们M—6阿马利特步枪配以黄色丝带。

科拉松总统的礼物是一串念珠和一本《圣经》。她把这礼物交给了鲍尔韦格。

四、走进穆斯林

与此同时，科拉松同南方穆斯林叛乱组织也开始了接触。菲律宾的穆斯林约有 100 万人，他们居住在棉兰老和其它几个小岛上。由于宗教信仰和种族的差别，他们同当地的天主教徒在土地和生意上发生矛盾，彼此结怨很深。后来，从北方迁来的基督徒以及菲律宾人、外国公司，都想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开采金矿、伐木和在农业方面寻找财富，为此使几万棉兰老的穆斯林失去了家园。在马科斯执政的 20 年里，他把穆斯林的大量土地和资源出售给他的亲朋好友和外国公司，使岛上穆斯林人口从 1913 年的 90% 减少到 1976 年的 40%，他们的土地拥有为总面积的 17%。后来，又出现了半军事性组织的反对穆斯林的恐怖活动。很多人认为这些活动是由想夺取穆斯林剩留土地的公司和个人资助的。穆斯林从基督教省长和市长那里得不到保护，他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

1968 年，他们建立了“穆斯林独立运动”。一年以后，菲律宾大学政治学科教授、当时仅有 27 岁的努尔·米苏阿里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同时，组织了反政府的武装部队。他们提出的目标是脱离菲律宾而独立。他们得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支援。

1976 年，马科斯政府的军事管制法实施。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突然爆发了起义，估计在这次战争中死亡人数有 5 万到 10 万人，有 20 万以上的难民逃到马来西亚。米苏阿里于 1976 年被流放到中东。那一年，在伊斯兰大会组织的倡议下，马科斯政府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曾经在利比亚签署了给穆斯林居住的 13 个省份颁发自治的“的黎波里协议”。但是，马科斯政府并没有执行这个协议。马科斯也曾派人包括其夫人伊梅尔达在内的代表前往利比亚活动，恳求阿拉伯国家进行斡旋，促使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能同政府和解，结果也没有成功。

米苏阿里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重新为他们提出的目标开始与政府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

在菲律宾居住的穆斯林还有两个派系：一个是曾经是米苏阿里手下第二号人物的哈希姆·萨拉马特领导的“摩洛穆斯林解放阵线”，一个是迪马斯·庞达托领导的“莫罗穆斯林解放阵线”改革派。这两个较小的集团主张自治而不是独立，他们组织间的区别主要是部落的不同和他们的领导人在各省力量的不同。全穆斯林军队大约有两万人，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他们有时和国家军队发生零星战斗，但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政治上组织群众。

穆斯林的政治家一贯运用自治的题目来赢得选票。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对继续战斗不感兴趣。持温和态度的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也迫使米苏阿里放弃他的分离主义要求，一个重要的支持者为此还减少了对他们的财政支持。

1981 年，尼诺伊在流放期间会见了米苏阿里，提议恢复“的黎波里协议”，让政府从棉兰老撤回基督教部队。尼诺伊和米苏阿里是在马科斯军事管制时期的“患难朋友”，他们的友谊是在马科斯的监狱中开始的。科拉松没有想到丈夫生前的这一交往，为她解决菲律宾国内的民族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她任总统之后要做的事情太多，对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问题该如何处理，她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又是巴茨探听到消息，说米苏阿里有与新政府谈判的愿望。巴茨亲自前

往，去看望米苏阿里。米苏阿里的要求仍旧是“摩洛哥民族解放阵线打算在 13 个省份试行自治”。巴茨为他安排了与科拉松总统会面的时间。

科拉松与米苏阿里的会面是在 1986 年的 9 月下旬。那时，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刚从新加坡访问归来。巴茨问她是否准备同米苏阿里会面，地点安排在哪里更合适？他说，米苏阿里希望科拉松总统能到霍洛去，那是穆斯林历史上的中心。霍洛在苏禄岛上，处于棉兰老岛和马来西亚的中间，这个地区几乎 50% 在米苏阿里的控制之下。在与分裂主义作战的高峰时，军队轰炸过那里，从来就没有一个菲律宾的总统去过那里。科拉松思考了一会儿，说：“好吧，只要有助于带来和平，我就去霍洛。”

科拉松想与恩里莱、拉莫斯一起同往。军队官员们却不同意她前往霍洛会见米苏阿里。他们争辩说，这样将给他的组织以一个合法的地位，米苏阿里应该到马尼拉来。他们还想请科拉松总统接见那个地区的基督教和其他穆斯林的领导者。与米苏阿里敌对的穆斯林组织也希望科拉松总统能在总统府接见米苏阿里，这样就显得总统没有偏袒米苏阿里一伙。科拉松对此告诉她的顾问们，“米，苏阿里不了解我，我必须向他表示我是有诚意的。我不顾这么多反对意见飞到霍洛去，就是想让他知道，在寻求和平方面我不在乎礼节问题。”

科拉松在动身前往霍洛之前，在马拉卡南宫为棉兰老的其他穆斯林及基督教领导人举行了一次晚宴。他们担心她会对米苏阿里作出让步。他们不愿意脱离菲律宾或成立自治的穆斯林共和国。科拉松再三向他们表示保证不会出现分离的穆斯林国家。

政府派部队去霍洛保卫安全。军队布置在去迈蒙的沿途，迈蒙离霍洛有 8 英里。同时，政府的海军舰队在这一地区的海岸线上游弋。在霍洛，米苏阿里和大约有 100 名追随者正在召开大会。1 万人中有数千人带着自动步枪或掷弹筒。政府与摩洛哥民族解放阵线的和平谈判就在这里举行。米苏阿里来到一艘马来西亚的炮艇上，举行了 10 年来在这个国家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我们的斗争不是共和国的具体问题，我们从来不是菲律宾的一部分。”

接着，他又在 9 月 2 日至 4 日举行的摩洛哥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曾经是一个国家，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国家，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开，包括菲律宾。”他这时所说的话与他在签定“的黎波里协议”之前所说的话完全一样。参加这次大会的其他两个与其对立的组织也受到米苏阿里的影响，和他一起呼吁起来。

9 月 5 日，科拉松乘坐一架军用飞机于上午 8 点 45 分抵达霍洛，受到拉莫斯、恩里莱以及数千名穿着鲜艳色彩民族服装的陶萨格人的欢迎，他们拿着摩洛哥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和黄色的标有“愿真主祝福您的使命”的旗帜欢迎她。她先会见这个地区的高级军事官员，然后到达会议所在地——距海军陆战队旅部半英里的霍洛市区圣玛利利亚学院里的加尔默罗女修道院。该处建筑物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四周站满了军方和摩洛哥解放阵战线的警卫小分队。

谈判于上午 10 时开始，在女修道院的接待室进行。米苏阿里走进室内，环绕四周的警卫，风趣地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些保卫吗？”

科拉松回答道，“不要。”她让她身边的卫兵离开。

科拉松与米苏阿里单独会谈起来。因为没有空调设备，两边墙上的百叶窗抬起有 8 寸高。双方大约有 30 人紧靠着大楼墙壁倾听着他们的谈话。巴茨

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气氛相当的紧张，“每一个人忘记了他们手中的枪，只管竭力去倾听他们的谈话。”

最开始的 15 分钟是科拉松总统一个人说话。她对米苏阿里说，“我到这里来，不顾许多与我关系密切的人的劝告和反对。如果我不是确信我们能够共同做些有助于推动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和平事业的话，我是不会这样做的。信念把我带到这里，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得到和平。”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马科斯，现在他走了，该是我们寻找和平的道路的时候了。”

科拉松总统感觉到米苏阿里在认真地听着她的见解。他注视着自己，科拉松觉得他是想用目光压倒她或者在估量她。于是，她说：“你一定觉得为难，因为我的丈夫经常对我说，穆斯林教徒认为妇女是二等公民。即便从我一个妇女的角度上，就寻觅和平而言，我是很坚决的。”

米苏阿里说他被总统的“勇敢的真诚姿态”所感动。他也坦诚地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我必须得到我的许多穆斯林兄弟的允许才能来到这里。事实上，我来到这里是违背了统治我们人民 400 年的遗训和传统的。我们一直相信我们的领袖决不和我们敌人的领袖会晤。但是为了和平、为了我们的人民，我违反了这条遗训。”

接着，他们把话题转到停火方面上来。

科拉松总统说，她希望米苏阿里能够为棉兰老岛带头走出一条达成协议的成功之路。米苏阿里说但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说他将与各省其他穆斯林磋商这件事情。

科拉松说：“我是人民的领袖，我从来就不需要磋商。而有些事实让我相信你就是穆斯林的领袖。”她停止了继续谈下去的打算，让巴茨、恩里莱和拉莫斯等随她而来的将军们和部长们进来。米苏阿里也让他的部下们进来。他们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了停火问题并口头上同意发表一份公报，说明双方将“支持继续停止敌对行为的建议”。他们没有谈自治和分离的问题。

科拉松总统离开后，恩里莱说军方也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没有时间。阿基诺夫人行动很仓促。过了一回儿就拍照，情况就是这样。”拉莫斯将军被留了下来，写一份要发布的新闻，而与米苏阿里签定协议的是巴茨·阿基诺。

会晤结束时，双方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继续交换意见。米苏阿里和他的其他领导人对科拉松能到霍洛来感到由衷地敬佩。他们怀疑军方是否会遵守总统的意图。

科拉松次年与穆斯林的另外两个派系也签定了停火协定。

五、在寻求和平的道路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科拉松与菲律宾共产党的和谈努力一直在继续中，相比之下，只是进度比较缓慢。

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的领导们一直猜测，新政府的文官和军人们到底谁能最后战胜对方，拿出统一的口径来面对他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正在进行整风。他们发现了他们中间的一些“渗透得很深的特工人员”，因而“清党”成为他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随着部分地区的停火，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又怕这种可能产生的威胁会分裂他们的队伍，于是，他们对外活动的公开组织——全国民主阵线决定任命一个使者同政府谈判。共产党通过他们的官方报纸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在考虑停火，但不交出武器。因为虽然科拉松总统是开明的，可是她的政府却是一个“彼此冲突的力量的脆弱联合。”他们相信她掌握的权力是不稳定的，因为她在武装力量中缺少自己的亲信集团。

科拉松决定自己来亲自处理与菲共、新人民军之间的谈判。渐渐地，双方通过谅解与交流，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1986年8月，科拉松政府和全国民主阵线双方都指定了各自的谈判代表。政府方面的代表是农业部长米特拉、人权委员会主席前参议员迪奥克诺和审计署署长特奥斯托·金戈纳，全国民主阵线的谈判代表是安东尼·苏梅尔和萨图·奥坎波。官方的米特拉和迪奥克诺一向被认为是“激进派人物”。能为菲共及其部分左派所接受。全国民主阵线的苏梅尔和奥坎波过去都是马尼拉的名记者。苏梅拉在军管时期转入地下，后来在棉兰老组建全国民主阵线，成为该组织的缔造者和发言人之一。奥坎波原是《马尼拉时报》经济版编辑，后来成为全菲记者协会副主席。1975年被马科斯政权逮捕入狱，坐了9年监狱。1985年才乘假释之机逃出。

起初，全国民主阵线方面提出首先要谈判如何解决谈判小组的人身安全问题，以及探讨新人民军不能放下武器的原因（他们认为为是军方不断向新人民军进攻造成的）。不久，他们又提出谈判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讨论如何实行停火；

（二）重点磋商如何在菲律宾成立联合政府。

为了表示和谈诚意，他们声明：

1. 菲共、新人民军和全国民主阵线的人员尊重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
2. 新人民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也将驻守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村庄和城镇，不准出击；
3. 决定释放全部被捕者和停止从国外寻求武器。

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

1. 释放仍被关押的政治犯；

2. 解散民防部队及各种准军事部队：

3. 撤走部署在菲共控制地区内的政府军队、指挥所和检查哨；

4. 严惩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政府官员；

5. 严禁拷打、绑架和谋杀；

6. 废除一切镇压法令和法律；

7. 停止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不准外国军事顾问参与菲军的训练。

全国民主阵线的要求条件触犯了美国和军方，在科拉松看来，也确实有些条款难以做到，比如停止接受外国援助。和谈进度变得缓慢起来。到了9月份，突然发生了原菲共主席萨拉斯及其妻子、警卫被军方逮捕的事件，谈判就此而中断。

全国民主阵线明确表示，萨拉斯等3人不释放，谈判不能继续。

萨拉斯39岁，原来是菲律宾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参加反美学生运动，后上山打游击，代号“比洛司令”。1977年，菲律宾共产党主席西森被捕入狱后，萨拉斯接替了西森的职位。1986年3月，萨拉斯辞去主席职务，但他仍然是菲共中央委员。他因患甲状腺肿瘤，不久前秘密返回马尼拉，化名进入菲律宾医院动了手术。9月29日，就在他去医院复查时，在医院门口被捕。

军方因此而欢呼，说这是1977年以来“剿共”的最大收获。菲共则严斥此举是别有用心阴谋。

科拉松压力重重，她多方去做工作，并于10月下令释放了萨拉斯的妻子和警卫。她为顾全同军方的关系，把萨拉斯留下。与此同时，她又亲自与菲共代表会见，讨论达成局部停火的可能性。

科拉松总统的这一行为马上就得到了全民主阵线的反映。10月底，全国民主阵线提出停火100天的建议，对以前提出的先决条件不再坚持，另外又提出5点要求作为商量的议题。

和谈似乎又有了一线希望，引起国内外乐观的预测。不料，不久就又起了一个波澜。全菲劳工领袖、“五一运动”领导人、新成立的人民党主席奥拉利比亚在这个时候惨遭杀害。这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奥拉利比亚是1986年11月12日晚失踪的。次日，警方宣布他们发在安蒂洛城发现了奥拉利比亚和他的司机的尸体。奥拉利比亚双目被挖，嘴里被塞满报纸。他的双手被皮带绑着，只穿着一条三角裤，光着脚，全身刀痕累累，惨不忍睹。

菲共指责这是政府军队的暴行，坚持要迅速查明凶手，并发动全国总罢工以示抗议。11月20日，有50万人为奥拉利比亚送葬，队伍长达22公里。

科拉松对奥拉利比亚的遇害也感到万分震惊，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随后，她着手组织了一个由军政各方参加的专案调查组，同时她还亲自到菲律宾大学的教堂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她向奥拉利比亚的遗体告别，安慰奥拉利比亚的夫人。她的这些表现感动了包括奥拉利比亚夫人在内的所有人。当她步出教堂时，教堂内外1000余人向她欢呼起来。

全国民主阵线又一次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们知道停止谈判对他们双方都不利，只不过给了菲律宾国内的马科斯支持者一个嘲笑新政府的机会。11月26日，政府和菲共终于达成了双方停火60天的协议。11月27日（又是尼诺伊的生日）下午3时，在科拉松总统宣誓就职的菲律宾俱乐部签署了停火协议，协议生效之日定在12月10日（这一天是国际人权日）。经过双方同意，60天停火日期还可以延长。在停火前30天，双方讨论人权、土改等问题。全国民主阵线主席奥坎波表示，可以考虑把新人民军并入政府军队中，并组织有菲共参加的联合政府。

自此，新政府与菲共之间的和谈算是有了突破性、实质性的进展。一些西方评论家说，这是科拉松总统送给菲律宾人民最好的圣诞礼品。很多人计算，这 60 天的停火非同平常：这期间有圣诞节、新年，而且还有次年 2 月 2 日对宪法的公民投票，这对菲律宾新政权的稳定，对顺利地进行政府的重大工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停火抱有浓厚的兴趣，官方的许多人并不赞成停火，菲共内部也有些人想不通。有人仍进行着捣乱、破坏。可菲律宾人民喜欢停火，他们说，停火就是好，我们老百姓至少可以喘口气。

1986 年 12 月，由官方和全国民主阵线以及社会贤达组成的 5 人停火委员会开始负责监督停火。停火委员会主席是安东尼奥·福蒂奇斯大主教。该委员会从 12 月 15 日开始工作，双方和谈则从 1987 年 1 月 6 日开始。政府首席和谈代表特奥菲斯托·金戈纳提出双方谈判议程，包括社会改革、土改、对新人民军特赦及解决其就业问题等等。全国民主阵线则提出 10 点内容的新议程，包括释放萨拉斯和其他政治犯、废除马科斯发布的“镇压命令”、改造军队、彻底土改、废除美国军事基地、成立联合政府等。

科拉松总统当即表示，废除美国军事基地和成立联合政府这两大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因为宪法对此已经有规定。于是两方处于谈一谈停一停的状况，未有大的进展。但停火委员会主席福蒂奇斯已提出，希望停火时间能继续延长，因为和谈前景是乐观的。而且，停火以来，双方冲突事件虽有发生，毕竟较过去大大减少，伤亡幅度也在下降，这对国家和人民无疑都是有利的。菲律宾人民欢欢喜喜地度过了 1986 年的圣诞节和 1987 年的元旦，不少新人民军战士下山同亲人团聚，这对他们来说，已是多少年没有的事情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错综复杂的，安宁的局势是刚刚有了一个开端。1987 年 1 月 22 日，农民组织为了要求政府立即进行全面而彻底的土改，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总统府前的门迪奥拉大桥时，却受到一些身穿海军陆战队军装的人的枪击。有 10 多人当场死亡，近百人受伤。群众情绪激昂，纷纷指责这是军方蓄意制造的事件。与此同时，一些右派人物也站出来，说“停火已经让新人民军得到了重整的机会”，“菲共在停火期间发展迅速”，“再不‘剿共’，全菲就有赤化的危险”等等。他们力主用武力镇压，指责科拉松对菲共和新人民军“软弱”“姑息”，甚至说科拉松光凭威望解决不了共产党问题……

马尼拉充满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对此，全国民主阵线宣布：政府无和谈诚意，科拉松总统控制不了军方，新人民军不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60 天停火到期即结束，不再延长。

科拉松得知门迪奥拉大桥事件后，立即赶回首都。她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要进行调查，惩办凶手；她还亲自看望了死伤人员的家属，欲尽力平息这一事件。她对此事的发生和停火不能延长表示遗憾，希望和谈以后能够恢复。

科拉松对待菲共和新人民军，过去一直是采取和谈的方针，甚至她还有吸收菲共参加联合政府的打算。但是，在左翼势力的压力下，她的调子也变了。她在 1987 年 3 月 22 日的讲话中说：“对付左、右两派的恐怖活动，不能单靠改革，而且要靠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拔剑战斗，那么我就要在军事上赢得一系列的胜利。”从此，科拉松一面着手同新人民军的一些分子进行个别接触，计划达成局部地区的停火协定；另一方面则要求政府军队提高警戒，随时准备出击。……

西方报界评论说,不管怎么说,同菲共以及摩解取得的协议,是科拉松·阿基诺执政以来最出色的成就。美国官方对菲共疑惧颇深,但也支持科拉松试一试同菲共和谈的政策。更有趣的是,美国众议院亚太事务委员会主席索拉兹在1986年圣诞节前夕访问菲律宾时,除了同科拉松等政府官员会谈外,还主动要求召见全国民主阵线的代表。事后,该组织的发言人苏梅尔说,他们同索拉兹会谈了两个多小时,是在“非常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彼此都向对方提出一些问题,也各自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1987年4月,菲共又表示可以考虑恢复和谈,其谈判代表奥坎波说,中断和谈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但他没有讲明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今后还是谈谈停停,因为谁也不愿意丢掉和平的希望。但是,由于彼此条件和要求相去甚远,要达到完全和解是很不容易的。

第十一章给菲律宾的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菲律宾的经济问题，一直是政府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而这问题的产生，又是与菲律宾社会机构密切相关：富人由于拥有财富而跨入政界，通过政界与世界的交往，富人就拥有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在菲律宾，富有者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部门都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请看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内阁高级官员个人资产净值比较：

姓名	职务	资产净值
科拉松·C·阿基诺	总统	17720603.55 比索
多伊·H·劳雷尔	副总统	19404383.00 比索
何塞·安东尼奥·冈萨雷斯	旅游部长	81490568.45 比索
何塞·康塞普西翁	贸易和工业部长	31400436.00 比索
海梅·王彬	财政部长	28775155.00 比索
胡安·庞塞·恩里莱	国防部长	23534447.35 比索
拉蒙·米特拉	农业部长	17257200.00 比索
维克特·齐加	总务部长	9013552.21 比索
维格贝托·塔纳达	海关署署长	8743130.32 比索
阿尔弗雷多·本格松	卫生部长	8461406.00 比索
卡洛斯·费尔南德斯	运输部副部长	8406900.00 比索
埃米尔·翁平	国家食品局局长	7177460.00 比索
米塔·帕多·德拉维拉	社会福利部长	6290000.00 比索
小特奥多罗·洛克欣	新闻部长	5527974.47 比索
霍维托·萨隆加	总统廉政委员会主席	4289000.00 比索
拉蒙·迪亚斯	总统廉政委员会委员	4215718.05 比索
埃内斯托·马塞达	自然资源部长	3820000.00 比索
M·康塞普西翁·鲍蒂斯塔	总统廉政委员会委员	2265000.00 比索
阿尔贝托·罗慕洛	预算部长	1936654.00 比索
洛德斯·奎萨姆宾	教育部长	1863782.50 比索
勒内·萨吉萨格	总统发言人	450000.00 比索

（以上资料来源于《马来亚报》1986年4月18日头版·《每日快报》1986年4

月20日头版。）

一位菲律宾传记作家对内阁成员进行分析说：“分析一下阿基诺内阁成员的成份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个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集团是尼诺伊·阿基诺生前根本无法猜想到的。正如前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小希拉里昂·M·赫纳雷斯指出的，该组织成员只是在1983年8月尼诺伊被暗杀后才出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在科拉松·阿基诺政府里是‘最有权力的集团’，而他们反对的恰好就是尼诺伊和反对党所代表的主张：民族主义、经济独立、实现工业化和依靠自力更生。”

不知道读者对此有何思考？

在这样一个富人聚集的政府中，人人部想通过官职的提高来再一次增加自己的财富：政治家追求政治的目的，一是提高的自己知名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二是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只不过途径不同罢了。英国著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名言“生存还是死亡”之所以被后人推崇，无非它一针见血地道明了人生的目的——

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在这样一个政府中，怎样才能给菲律宾的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一、菲律宾：曾出卖肉体维持生存

让我们来看看马科斯给下一届总统留下了什么？

债务：260 多亿美元，是全世界第五大债务国。而且从 1984 年到 1985 年，经济两年负增长。

失业：失业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20%，半失业人数达到 40%。菲律宾最低工资每天不足 3 美元，而且在 10 个工人中就有 4 个以上的工人拿这个工资。人民教师每月只能赚到 75 美元。技术工人比这还要少。全国 60% 的居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仅马尼拉市就有 200 万人处于赤贫状态，60 万人无家可归。

除此之外，就是主要出口产品如砂糖和其它农产品找不到国际买主，中部岛屿有严重的饥荒……

菲律宾一直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它特殊的历史渊源，使菲律宾的财富都集中在 400 多个家族手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则越来越穷。而马科斯在他统治的 20 年中，为穷人解决问题的手段就是敞开国门，让赌博、卖淫、吸毒和洗钱变为“合法”。

当然，马科斯并没有公开说明这个“允许”。他与伊梅尔达都坚持说，他们的新社会里不存在犯罪、吸毒和卖淫。可事实上，菲律宾的卖淫业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他们与泰国的曼谷曾经争夺过性旅游最佳地点的称号。在这两座城市中，据保守估计各有 10 万名妇女“合法地”从事所谓的“友善事业”——担任女招待、女服务员、摇摆舞演员和按摩女郎，也就是说充当妓女。这些统计数字仅仅包括那些在有许可证的场所工作的、有健康证明书、并且定期进行性病检查的妇女。实际上的数字已经超过了 30 万，还有一些不受约束地、半职业化地在地下场所当暗娼。

同时，曼谷和马尼拉也在童妓和年轻男妓的数量上互为竞争对手。马尼拉及其卫星城镇共有 4 万名童妓，曼谷则有两万名。在这两个国家中，每年又都有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们被卖为奴，送往日本、南朝鲜的妓院里无偿地工作，或者供欧洲、澳大利亚的同性恋者和鸡奸者淫乐。

泰国与菲律宾的性交易有一个主要不同之处：泰国是在一连串的军人政权统治下兴旺起来的，很难将其归咎于某个领导人或政党；菲律宾则完全是在马科斯的统治之下开始盛行的。泰国是一个崇奉佛教的国家，宗教宽容和性宽容自古以来一直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并不认为性交易是可耻的。温文尔雅的前总理克里·巴莫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说：“我认为说我们的身体对西方人很有吸引力是过奖了。”可在崇奉基督教的菲律宾，由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欲观念和过分强调妇女的贞操，这种“行业”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正是因为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认为已经无法为穷人提供一条生活出路，因此，性交易被马科斯政府默许，而且总统本人也与日本的大地痞组织如山口组和中稻会合作，共同出资从事性交易。在军管期间，一般人是允许在午夜外出的，但按摩院和桑拿浴室可以继续营业，在里面工作的女郎也不受限制。饭店、警察、妓院老板和妓女们串通一气——伊梅尔达为世界银行年会在马尼拉的召开建造了许多豪华饭店，使得这些饭店急于拉客。新建的马尼拉市中心饭店因容许卖淫业并从中收回扣而臭名昭著。拉马达饭店把用日语印刷的住店规则小册子，分给“那些带着女士的日本客人”。这家饭店在收取 10 美元非正式俱乐部会费后，才允许客人带女人进入客房……

日本的地痞组织用贿赂手段与马尼拉的商人、政府高级官员和总统府的密友建立长期的互利关系。地痞组织的高级成员在马卡蒂商业区开设了办公室，利用进出口公司和旅行社为幌子，进行非法的地下交易。菲律宾的官方偶尔也会采取些措施，那是菲律宾的歹徒和警察在提醒日本人要求利润分成。在镇压之后，移民局和旅游部的官员们就会为地痞组织的头面人物出面干涉，以防止他们被捕或被驱逐出境。移民局的官员们只要能得到2万比索，就可以给逾期滞留的地痞分子办理签证延期手续，或者给前往东京妓院的菲律宾小姐提供文件证明。

这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年轻姑娘用短期签证前往日本，然后就消失在浴室、酒吧和妓院里。整个过程是这样开始的：由日本地痞组织支持的马尼拉职业介绍所雇用一些滑头滑脑的游客到农村巡视，用令人羡慕的工作为诱饵来诱惑漂亮的少女们。在马尼拉，这些姑娘接受跳舞、唱歌的训练，成为正式招待员。然后，她们就列队等待日本人贩子的挑选。一旦一个姑娘被看中，她的照片将装入卷宗交给客户，主要是供酒吧经理选看。干得好的人贩子每年可以买200左右个姑娘，一部分供出口，一部分卖到国内。

在马科斯任总统的20年间，日本地痞组织得到在马尼拉活动的特许权后，运往日本、南朝鲜的菲律宾女郎人数急剧增加。菲律宾成了世界上唯一积极出口妓女的国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贫穷。许多菲律宾少女急于前往日本等国，即便这意味着从事收入较少的卖淫业。一旦到了日本，她们中的很多人可以在行为规矩的主人那里找到一份好工作，工资也高，每年都可以回国。

除此之外，菲律宾“盛产”男妓。位于马尼拉南方的内湖省的一个叫潘萨扬的小镇，居民不足2.7万，其中竟有3000名男妓——那里是同性恋者的朝拜地。这些男妓的主要主顾来源是法国、新西兰、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白人。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还被一些领养组织带出菲律宾。1983年底，澳大利亚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以墨尔本为基地、名为澳大利亚儿童赡养集团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安排与菲律宾男孩子发生性关系的事宜。

前往菲律宾玩弄童妓的全程旅游在荷兰、西德、美国颇受欢迎。专门介绍儿童卖淫的色情杂志《斯巴达克斯》不但刊登去马尼拉性旅游的广告，而且指导旅游者在当地如何找到童妓、如何谈价钱、如何逃避当地的法律；玩童妓者可以拍摄录相片以支付旅游费用。这类杂志还将录相带邮寄给顾客。美国是这些记录幼童详细性行为 and 施虐或受虐行为的影片和录相带的最大进口国和生产国。1980年，美国儿童色情业的营业额是10亿美元，而全世界的儿童买卖年营业额是50亿美元。

纵观马科斯的执政过程，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政府为菲律宾人民生活的有所改变所做出的任何策略，倒是这种色情业的“政策”的开放，使菲律宾人民多了一个养家糊口的赚钱机会。但卖淫者得到的“实惠”远远不如马科斯和他手下的官员们。有一名记者在他的一本《马尼拉春梦》的书中，详细记述了菲律宾的这一色情业，并总结到：马尼拉和曼谷的色情业的竞争，没有几年，菲律宾很快就将泰国甩到了后边。泰国逐渐在经济上飞快发展起来，而菲律宾的经济则走向崩溃。

面对这样一些社会现象，科拉松·阿基诺在竞选时就曾多次表示，新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减轻群众的贫困，创造就业机会，公平地分配国家的财富。

二、把马科斯的财富追回来

执政后，科拉松·阿基诺首先冻解、没收了马科斯及其亲信授刮来的不义之财，打破了20年间马科斯的亲信对菲律宾经济命脉——食糖和椰子业的垄断；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组织了霍维托·萨隆加为主任的廉政委员会，该组织负责追查马科斯在国内外的财产，这是相当艰难的工作。

费迪南德·曼努埃尔·马科斯于1917年9月11日出生在外祖父母的商店里。长大后，菲律宾人喊他为费迪，但在外国人面前，他称自己为费雷德或安迪。他小时候非常贫穷，和同伴们光着屁股在肮脏的街道上跑来跑去。

马科斯的母亲何塞法·埃德拉林·马科斯是一个工作勤奋的小学教师，同时在她父母亲的铺子里当售货员。她是一个坚强的、好逞强的、机智灵活的年轻妇女。她的一半血统是华人，一半是当地的伊洛尔戈人。她的父辈祖先是当地伊洛尔戈村庄的领导人物；她的华人血统则来自于她母亲的家族——克图利奥，是南伊洛尔戈省中、西混血的商人，拥有雪茄种植园和大住宅。

何塞法9岁时才接受教育，21岁上高中时，一个长得很英俊的14岁的男孩子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马里亚诺·马科斯。据说，马里亚诺·马科斯的祖父是该省一个西班牙法官的私生子，虽然从小也接受了文化教育，但为时并不很长。马里亚诺很小就上学读书，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早熟的孩子，14岁时，周围已经有许多女孩子崇拜他，何塞法也是其中之一。1916年，他俩偷偷结了婚，第二年便生下了马科斯。

北伊洛尔戈人、见闻广博的新闻记者、马尼拉华人社会则说，马科斯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叫费迪南德·蔡的华人。人们无法说清这个姓蔡的年轻人是怎样爱上了何塞法的，都说他们准备结婚，蔡的父母亲反对。“他们是旧式人物，坚持要儿子遵从传统，回到厦门讨一个正式的福建籍老婆。不巧，何塞法这时已经怀有孕身。因此，只好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丈夫，把她先送往马尼拉，以免她的情况传出去给蔡家丢脸。肯定是过了一场又哭又闹后，何塞法出于无奈，才勉强同意嫁给了同班同学马里亚诺。当然，蔡家肯定作出了让马里亚诺满意的安排。

何塞法给马科斯取名叫费迪南德，一方面是为了效法麦哲伦（也是费迪南德）和西班牙国王，而最重要的是，蔡家那位少爷的各字恰巧也叫费迪南德。蔡少爷温文尔雅，当时在菲律宾大学法学院读书，他后来服从家中的安排，从厦门带回来一个正式的中国老婆，蔡靠着他强硬的社会关系，在大学毕业便当上了法官。何塞法说蔡是马科斯的教父。

马科斯因为有非凡的记忆力，学习非常出众。他小学毕业时，差一点被选为致告别词的学生代表。只是因为他上3年级时交不起学费缺了几个的课程而未能实现——这时，他的父亲马里亚诺靠着强大的经济后盾，在政界青云直上。“政治事业上的需要，使马里亚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贫如洗。”他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亲朋好友身上，花在他不断到北伊洛尔戈省“争取支持”的旅游上。这样，直到马科斯走进大学校门之前，偶尔因交不起学费而缺课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过，马里亚诺对政治的兴趣，也使马科斯受到熏陶。政治，是一场充满虚伪、操纵和恩赐的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自我主义会被压碎、损害，谋杀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把马科斯带入这个政治世界的，正是谋杀。

1935年,马科斯的“父亲”马里亚诺竞选众议员,对手是一个叫胡利奥·纳伦达桑的原地方税务官,他曾担任过一届众议员。有意思的是,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众议员竞选,就以比马里亚诺多56票的结果当选。现在,他们又成了冤家,因为,纳伦达桑再一次击败了马里亚诺。马里亚诺怒气冲冲地说,纳伦达桑利用他当税务官的地位勒索到许多选票。纳伦达桑的支持者则借了一口棺材,把它绑在汽车里的无篷座位上,让一个人躺在里面,标明是马科斯,沿街游荡。马科斯看到了这一切,此时,他已经是菲律宾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同时他也参加菲律宾保安军的训练项目。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大学的手枪队里当一名神枪手,而且为此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选举后的第三天,即1935年9月20日,下了一场热带大雨,街上寂无一人。在纳伦达桑家,这位凯旋的候选人正和家人好友设宴祝捷,闹得很晚。10点钟刚过几分,他从桌旁站起来,穿过平台,走到栏杆旁边的洗脸池漱口刷牙。这时雨已停住,但院内的香蕉树还在滴水。透过平台上的亮光,纳伦达桑的轮廓清晰可见。忽然,从光滑如蜡的树叶丛中传来一声枪响,声音很大,一颗子弹射进了纳伦达桑的背部,穿过心脏和肺部。他气喘吁吁地叫道:“耶稣啊,玛丽亚和约瑟!我挨枪子了!”接着就倒下了。几分钟后,他就一命呜呼了。

3年之后,马科斯在菲律宾大学的宿舍里,被政府保安军士兵逮捕。他被指控为是杀害纳伦达桑的凶手。此时,他离毕业只有5个月,而且学习也非常优秀。他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准许他交保出狱。被获许出狱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菲律宾的名人;大学毕业时,他又拒绝了总统对他的赦免,再一次引起菲律宾各阶层的注目;他在监狱里进行了律师资格考试,竟把宪法倒背如流……

马科斯就这样走进了菲律宾的政治社会。后来,由于老劳雷尔的雄才善辩,他被释放出狱。马科斯到社会上谋求的第一个职业,是为他狱中的朋友当辩护律师。接着,日本人来了,他又应征入伍,参加反抗日本人的“战斗”。他机智灵活,善于应变,并能夸大他的功绩。对日战争结束后,他便跻身于政界。

1957年,他成为菲律宾自由党人的领袖。

1963年便当上了参议院长。

1964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之前,马科斯以参议院长的见面礼跳槽到国民党内。国民党借此控制了参议院,而马科斯获得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时,自由党分成了三派:一派支持现任总统马卡帕加尔,一派支持马科斯,另一派支持华盛顿看中的佩莱斯和劳尔·曼格拉普斯参议员。

马科斯使出全身解数,终于赢得了1965年总统大选的胜利。9个月后,他携夫人伊梅尔达出访美国,以保证支持约翰逊总统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换回了数百万美元“无单据资金”的现款和巨额贷款。他同他父亲相同的是,他们对政治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不同的是,父亲最后没有登上总统的宝座,一生两袖清风,而马科斯却在他任总统期间,成为世界上拥有上百亿美元资产的富翁之一。

马科斯在马尼拉宣称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菲律宾人民,但实质上,他与伊梅尔达的贪婪之手,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他们的海外公司遍布世界各地,时常有人把成袋的现款送到马拉卡南宫。开始,伊梅尔达还动手点一点现款的数目,后来她已经不在意现款的数目。他们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

行分别设立的秘密帐户有六七个之多，总存款数额达 15 亿美元。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他们在香港、荷属安德列斯、巴哈马群岛及英属开曼群岛的公司，将大笔钱财存入海外帐户……最后到马科斯离开马拉卡南宫，有人统计马科斯家族在海外存款高到 50 多亿美元。

马科斯和伊梅尔达是怎样掠夺到如此之多的财富的？

证据表明，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财源来自于：美国、日本付给菲律宾的战争赔款，菲律宾财政部的退伍军人福利金，作为马科斯“特别情报基金”存在银行里的其它赠款，按照世界银行的各种项目向菲律宾提供的贷款，没收 215 个以上本来属于别人的公司，将各种经济援助归于自己名下（例如，根据美国政府 1986 年的报告，提供给马科斯政府的 2.26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不知下落）。

马科斯夫妇挪用、骗取钱财的手法，概括为：敲诈财物、邮件骗局、电报骗局、勒索钱财、贪污公款、藏匿赃款和非法转移资金等。

……

我们无须再说明什么了。科拉松政府如果能如数追回马科斯夫妇的非法所得，无论对国家、对菲律宾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三、在农业经济上使把劲

科拉松还注意和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科拉松在她政府的中期发展计划中，把发展农业作为重点。这包括增产稻米和作为轻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她特别拨款 39 亿比索（相当于 1.95 亿美元）作为农业紧急的就业费用，救济贫困农民。同时，调拨 60 亿比索（相当于 3 亿美元）作为农村基本建设经费，取消农业产品的出口税，降低化肥、农药的价格和农业贷款利率，积极吸引外资支持乡村企业的发展。

1986 年 8 月，菲律宾技术资源中心发放 1.2 亿美元的贷款，专门资助发展农村企业。同时，科拉松批准在 5 个省搞小型农村基建试点。同年 10 月份，科拉松又在内湖省国际稻米研究所附近兴建菲律宾稻米研究所，旨在向农民传授科学种田的知识和方法，以便提高稻米的产量和质量。

黑人省过去以盛产甘蔗闻名，近些年，由于国际糖价暴跌，供过于求，致使数十万甘蔗工人失业。科拉松亲自前往黑人省视察，她建议将甘蔗种植土地改种其它农作物，以改变农业结构。

在新政府的努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的情况下，菲律宾 1986 年下半年的农业产品收成比例比上半年增长约 10%。如果按照这个增长迅速度，到 1987 年，菲律宾的粮食就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菲律宾是一个农业国。经过几代民族政治家的不断努力，菲律宾成为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尽管世界强国不断向他们伸进“援助”之手，菲律宾也有了自己的宪法和选举制度。但菲律宾没有摆脱农业，这就标志着菲律宾还是一个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国家。所以，要让菲律宾三分之二的农民逐渐富有，完成农业向工业的过度，在菲律宾首先要进行的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也就是进行土地改革。这是广大无地农民强烈而迫切的要求，也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科拉松注意到了这一点，执政后，便组织一批人积极制定土改方案。

1987 年 4 月，政府批准了一个“6 年加速土地改革方案”。该方案是由土改部、天然资源部、财政部、司法部、土改银行、菲大土改研究所、廉政委员会和总统府办公厅等许多单位派人参加，共同制定出来的。到 5 月份，全国许多地方召开座谈会，听取“6 年加速土地改方案”的意见。该方案计划在 6 年内将 390 公顷土地分给 200 多万农民，这包括地主拥有的稻田、玉米地种植园，政府闲置、没收和征购的土地等。

“6 年加速土地改革方案”预计将分 4 个阶段进行。方案规定个人拥有的土地由政府向地主赎买，有 3 种赎买方式：

（一）政府付给地主 10% 现金，90% 土地银行证卷（为期 10 年，年利 6%）；

（二）地主可以用土地交换政府拥有的股票或其它资产；

（三）地主可以同直接受益的农民作交易。如果农民愿意，可以用货物或现金换取地主的土地。分到土地的农民一般可以在 35 年内或 30 年内分期偿还现金给政府，年息 3% 到 6% 如果在 17 年内偿还，就不需加上利息。

实行这个方案一共需要经费 503.4 亿比索。1987 年就需要 37.38 亿比索。这笔资金，除了出售部分亏损企业和没收马科斯一伙的资产外，还需要向国外贷款。

1987 年 7 月，科拉松运用总统特权，颁布土改法令。

科拉松·阿基诺被许多政客认为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执政后，从不轻易行使总统的权利。但她下决心颁布土改法令，是为了防止国会对土改方案议来议去，拖而不决，影响她的“6年加速土地改革方案”的实行。她认为，一旦能将土地改革搞起来，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活跃农村经济大有益处。

但是，科拉松·阿基诺的土地改革进行得并不如意。当权派不少是大地主出身，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阻止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上改方案的进行。1987年5月以后，菲律宾的各大报纸不断透露说，在菲律宾拥有大片土地的跨国公司正同本地的地主勾结，阴谋把一些耕地变成建筑地皮，以躲避土改。另一些人则吵吵嚷嚷，对科拉松的土改方案进行挑剔。她的一个内阁部长说，“土地改革由于可能产生误解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把土地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拿来分给农民，可能被曲解为政府正在向‘左’转。大多数工商业者出身于拥有土地的乡绅，他们与土地和不动产有紧密关系，土改后可能会使工商业出现严重的恐慌。”

农民团体抗议说，即使是现存的土地政策也正在受到阻碍。在某种情况下，政府的工作官员对当地官员施加压力，要官员保护他们选民的产业，不使他们的土地包括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内。

“在棉兰老岛的南哥打巴托，从农庄产业中分到土地的种植谷物的佃农备受折磨，一个人被开枪打死，另一个人受伤，有10人被强行带走。这些行为，都是地主雇用武装打手干的。目击者认出了杀人凶手，但是凶手并没有被逮捕，地方官员对上层要有一个“态度”以便能“交待清楚”。

科拉松总统终于被迫表示：必要时，她可以交出其家族拥有的6400公顷庄园。其实，路易西塔种植园并不比其它地方强到哪里。马科斯在竞选前将它没收为国有之后，那里就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状况。居住在那里的3万人中，只有少数拥有长期职业，其他人都是榨糖季节雇用的临时工。余下的时间，他们便四处打工，每星期工作两至三天不等，而且工资也少得可怜。这些工人及其家属住在这个村庄里的草顶茅屋或用水泥块在农庄地上搭起来的房屋里。有些人家只有在开工榨糖时才能用上电灯。

科拉松的兄弟姐妹们还在为争回这份属于科胡昂科家族的产业与法院交涉。1986年12月，他们提出上诉。

在马尼拉饭店的一个新闻记者早餐宴上，阿尔瓦雷斯被提问到了关于路易西塔种植园的事情。有一位记者问：“把路易西塔种植园作为改革的典范是阿基诺总统在竞选中的诺言，她不什么不履行她的诺言呢？”

阿尔瓦雷斯回答说：“她是一个非常民主的总统，她一定会同她的兄弟姐妹说清楚的。……这里边有许多棘手的家庭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告诉记者：“让我们等待土地改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行吧！”

四、再找几条路

除此之外，科拉松·阿基诺总统还计划了另外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一) 提倡自由经济，鼓励私人企业发展。1986年4月30日，科拉松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发展银行年会上致词说，她的主要目标“是使政府较少地干预经济”，“我相信，恢复真正的私人企业经济将促进竞争、生产力和效率”。科拉松把从马科斯及其亲友那里没收来的公司和企业发售给私人，从税收经营方面给予私人企业各种鼓励和照顾。科拉松还特别调要要加强外贸输出，多生产质优价廉的出口产品，使它具有国际竞争力。

科拉松说，只有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促进外贸，才能促使菲律宾今后经济达到年增长率7%（这是科拉松政府的中期经济计划目标），为此，科拉松政府从1986年6月起，取消了木材以外的所有商品的出口税。在这之前，政府的经济部还拨款16.6亿美元作为公共建筑开支，刺激建筑业的发展，并计划在18个月内雇用100万工人。就业增加后，购买力自然会增加，这对私营商业就能起到扶植援助的作用。

1986年10月，科拉松向菲律宾商界透露，政府还在拟定经济改革方案，它的内容包括：削减赤字、重新振兴政府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强调发展银行和国家银行扶植私人企业等。科拉松形象地比喻说：“政府已经造成满垒，现在是要商界出击全垒球以便获得满分。”

(二) 敞开国门，面向世界。1986年6月和11月，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不顾菲律宾的政变谣言四起，先后飞往美国和日本，向这两个国家朝野介绍菲律宾的经济现状并寻求贷款。科拉松，阿基诺在9月份抵达美国。由于菲律宾特殊的提前大选和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结果，使科拉松·阿基诺成为全世界的名人。但美国政府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同。里根和他的顾问们不喜欢科拉松对叛乱、美国基地和外债等问题上的不肯定的态度，而科拉松·阿基诺对里根与马科斯之间的友谊、美国的援助迟迟不兑现也疑虑重重。但是，她与里根总统的会谈是很成功的，彼此都感到有了一种默契。午餐前的谈话预计10分钟到20分钟，结果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午餐上，里根总统讲了戈尔巴乔夫及世界其他领导人的幽默，使他们的会晤更加融洽。

科拉松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的援助而走到美国参议院。她没有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把她自己的思想拟成讲稿，站在美国的“栋梁”面前讲起了尼诺伊和他的追求，他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她也谈到了他们新政府对民主的信念，她告诉参议员们，尼诺伊的死“使我们恢复了勇敢和信心，只要有了这些，（人民）可以再次获得自由。于是就开始革命，革命把我带到民主最有名的故乡——美国的国会。”

科拉松并没有到此结束她的发言。她环视了一下四周，人们都屏住呼吸，倾听着她的讲话，她感到了一种满足。她接着说：“……在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被压迫者的避难所时，和我们站到一起吧——美国！”

科拉松的同行者抱怨她的讲话里“没有外交政策，没有经济政策，没有足够的政治家的风度……”但当科拉松走下讲台时，美国共和党多数党领袖参议员罗伯特·多尔说：“科丽，你打出了一个全垒球！”科拉松一笑，说：“我希望奠定一个基础。”

到日本去正是国内政变危机四伏之时，科拉松拒绝了顾问们的劝告，她说：“如果我不去，我们首先在心理上就输给了反对派们，他们还要将总统

的尊严当成笑柄。”而且，政变谣言损害了国家吸引国外新投资的努力，她说，她要试图打消在日本的这种影响。日本政府也理解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东京之行可能会导致她失去刚刚到手的王位，“他们也不竭力要请她前往，也是怕她因此而被推翻。”

科拉松·阿基诺一如既往地起程了。有人所报告说，她可能在马尼拉机场被暗杀，在她离国仪式上将有一架直升飞机上的神枪手对她开枪。科拉松对此一笑置之——她不能因为有一些恐吓就放弃了宏伟的计划。过去，菲律宾有40%的外援来自日本，日本方面援建的菲日友谊公路（又称贵族公路），起自北吕宋的卡加延省。穿越吕宋中部，经过比科区、未狮那止于棉兰老。这条公路对沟通吕宋和棉兰老两大岛，促进物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菲律宾还有二万多人在日本谋生。1986年3月，日方为了表示对科拉松新政府的支持，赠款10万美元救济菲律宾黑人省的农村儿童。而科拉松此次日本之行，主要是为了争取日方更多的经济援助和合作。她要求日本能给菲律宾贷款110亿美元，并鼓励日商多来菲律宾投资。

在此起彼伏的危机中，科拉松·阿基诺来到了日本。她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热情接待。日本天皇特意宴请了她，坐陪的有日本首相、内阁成员、众参两院议长等。日本天皇对科拉松执政后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表示敬佩”。

科拉松在中曾根为她举办的宴会上说：“我们希望能在菲律宾成功，在亚洲和整个世界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她还说：“我深信菲日关系将会更好。”她在日本下议长和上议长设的宴会上说：“我们需要援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日本对菲律宾的繁荣和希望表示出信心。”

中曾根事后赞扬科拉松“姿态甚为坦白、诚实，同样洋溢着爱国之情”，“她的每一言词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慷慨的女性”。

科拉松于6月5日回到菲律宾，她对记者说：“日本被证明是一个支持菲律宾发展的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和盟友”，“尽管菲律宾国内存在着政变的谣言，有不稳定的因素产生，但日本明确表示支持菲律宾政府，并慷慨地提供了援助。”

科拉松·阿基诺的美国、日本之行，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功。美国政府批准给菲律宾新政府2亿美元的贷款；日本政府决定向菲律宾提供1000亿日元的援助，其中包括404亿特别贷款，供菲律宾建设卡拉卡火力发电站；500亿日元贷款（作为第14次贷款）；还有无偿资金合作约为90亿日元。后两项都比以前同类贷款数目增多了。

科拉松·阿基诺在美国和日本有意同商界名流接触，请求他们到菲律宾来投资。她还将政府没收马科斯及其亲友的企业（约合18亿美元）向日本商人兜售。

接着，科拉松·阿基诺又派代表飞往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挪威等国广泛开展联系，力争做到外援多元化，外国投资多元化。加拿大政府答应在数年内给予菲律宾1亿加元的援助。

1986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给菲律宾5.9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财政部长海梅·王彬说，这是菲律宾经济复苏的转折点，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菲律宾所有债权国和债权银行的“总监”。人们都是马首是瞻。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批准给菲律宾新的备用贷款，那么，外国商业银行的3亿美元贷款（在马科斯统治时期未有发放的一笔）、日本进出口银行

的 3 亿美元的贷款以及重新安排即将到期的数十亿外债的偿还也都有了指望。

王彬接着又率代表团前往美国，与美商量重新安排外债的偿还问题。果然，菲律宾同其债权银行（483 家）推迟了 103 亿美元的外债偿还期，又获得 30 亿美元的新贷款。到期债款可以延长 17 年偿还，可以用投资证券代替现金偿付部分利息。菲律宾工商界对此欢欣鼓舞，认为债权银行无疑是让菲律宾有了一个喘息和重整经济的机会。

（三）开源节流。同时，科拉松政府还在政府的经费使用上大做文章。1986 年内阁会议上，科拉松作出决定：内阁成员出国履行公务，必须控制开支，任何部长都不得订购头等舱机票；不得住豪华旅馆。科拉松在会上说：“既然是一个革新的政府，就不能违背简朴的原则。”她不仅要求别人这样做，也能严于律己。她在执政后的许多时间里没有住进豪华的总统宫——马拉卡南宫。她宁愿每日从奎松市驱车上班，并用饭盒带一顿午餐。后来，为了节省时间，她与家人搬到了离政府比较近的一套住宅中，马拉卡南宫只是她会见国内外人士和办公的地方。她去美国访问，买的是普通机票，随身只带了两个皮箱。在她的积极倡导和带动下，1986 年 3 月至 9 月的总统办公室开支节余 3148 万比索，较 1985 年同期节约开支 1.3 亿多比索。

（四）发展旅游业。科拉松·阿基诺注意对菲律宾旅游业的发展和开拓。她认为，菲律宾旅游资源丰富，大可利用。她除了把总统府的一部分改为博物馆以吸引国内外游客之外，还组织专人研究开辟更多的旅游点和建设各种旅游设施。1986 年 8 月和 9 月出现了国外游客增多的现象，香港、台湾的来菲游客比前一年同期增长数字显著，其他国家如法国、泰国、文莱等地的旅游者明显增多。

据官方统计，1986 年观光业总收入为 6.5 亿美元，较 1985 年增加 27%。

科拉松·阿基诺通过与政府内阁成员的不懈努力，使菲律宾在她执政的第二年，就有了显著的成绩：

1986 年的经济增长为 0.13%；这个数字虽并不耀眼，但这是她的新政府在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乐园的开端。因为在这之前，菲律宾经济是负增长的。同时，新政府领导下的通货膨胀已大幅度下降：1984 年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为 50%，1985 年为 23%，1986 年就减少到 3.3%；“

外贸赤字也有明显的好转，1986 年 1 月至 8 月共为 8200 万美元，而 1985 年同期为 3.28 亿美元，外贸赤字下降了 75%；

汇率从科拉松·阿基诺执政前的 25 比索兑换 1 美元变到 21 比索兑换 1 美元；

外汇储备，1986 年 2 月底库存仅有 9.11 亿美元，到 1986 年底就上升到 20 亿美元；国内贷款利率在马科斯统治时期曾高达 50%，现在稳定在 15%，优惠贷款利率甚至下降到 12%—14%；

税收改善明显，1986 年第一季度税收亏损 11 亿比索，到了 4 月份，就开始趋于上升；到 5 月份，两个月的税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6 亿比索。

.....

如果没有国防部长恩里莱与一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对新政府时时进行威胁，使相当多的投资者还在观望、等待，菲律宾在科拉松·阿基诺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还会有更加显著的成就。同时，如果菲律宾的前总统马科斯离任前能留给他的臣民更多一些资产，他给菲律宾造成的灾难没有这么沉重，情况

也许会更好些。

菲律宾急需 70 亿美元的贷款，才能实现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的 6 年中期经济发展计划。贫富悬殊是菲律宾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10%的富人占有了国家总收入的 40%和可耕地的 90% ;而另一方面是四分之三的学龄儿童营养不良。1986 年，科拉松·阿基诺总统虽然尽心竭力地创造了 36 万个就业机会，但这还不到失业总数的一半——这是菲律宾的社会的的关键。失业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菲律宾的其它问题就会存在下去：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等。

1986 年 11 月，内阁批准了由经济计划部制定的 6 年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要求 1987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6.5%，今后 6 年每年创 100 万个就业机会，使菲律宾的失业率从当前的 36%下降到 1992 年的 25% ;贫困线以下(指一家六口年收入不足 116 美元)的人口从当前占总数的 59%下降到 1992 年的 45%——这是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为在任 6 年设计的一个宏伟蓝图。如果这蓝图能描绘在菲律宾的大地上，到 1992 年离任，科拉松·阿基诺总统就会问心无愧地对菲律宾、对全世界说：作为一个菲律宾的总统，该做的我尽力都做到了！

后 记

然而，科拉松。阿基诺最后也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菲律宾这个国家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天堂。

阿图拉·M·托伦提诺向新政府发动了一次“进攻”失败后国防部长胡安·庞塞·恩里莱又向科拉松·阿基诺提出了挑战——“上帝拯救女王”行动在科拉松与拉莫斯的共同努力下再次破产。流亡在外的马科斯将他的一部分财富换成武器运到菲律宾，马科斯在菲律宾群岛上的支持者时时刻刻窥视着推翻科拉松政府的机会；新人民军和菲律宾共产党人对新政府抱有的幻想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宣告破灭；由于长久得不到生活的改善，菲律宾民间的反政府党派又如雨后春笋；政府内阁中矛盾重重，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理想并不是要改变菲律宾，而是要改变自己……所有这些，对于政治上极其“年幼”的科拉松·阿基诺来说，都是沉重的包袱且难以承受，都是不可莫测的陷阱，难以跨越。

翻开菲律宾的历史，在科拉松·阿基诺之前，菲律宾先后出现了这样几位总统：

曼努埃尔·L·奎松；
老塞尔吉奥·奥斯米纳；
何塞·P·劳雷尔；
曼努埃尔·A·罗哈斯；
埃尔皮迪奥·基里诺；
拉蒙·麦格赛；
卡洛斯·P·加西亚；
迪奥斯达德·马卡帕加尔；
费迪南德·E·马科斯。

其中，在菲律宾总统岗位上有过4年经历的前总统迪奥斯达德·马卡帕加尔有一段记载在历史上的体验，那就是在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当总统，首先应该学会躲避陷阱。他总结出了躲避陷阱的几点经验：

一、总统被一些假借帮助他在事业上成功，实则许多情况下是为个人谋取私利的人包围着。这些人专会取悦总统，影响总统的决策，以致总统脱离了人民和现实。因此，一个总统在选择自己的顾问、助手和知己时，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和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基础，以使自己在选贤任能方面作出最好的判断。

二、贪污和腐化的巨大诱惑。一个总统自身应当坚决抵制不能容忍贪污行为，尤其是不能宽容家人有任何贪污行为。

三、在当一名政治家还是当一名政客之间能作出选择。不论政治结局如何，一位总统应当首先以人民的利益为决策的出发点，其次才是考虑他个人的政治地位。

四、必须意识到在我们社会中强大的顽固势力的主宰力量。这股力量对国家进步具有空前强大的不断阻碍的影响，由此导致社会的不公平并阻止人们以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更好的生活。在这一个令人生畏的力量面前，一个总统绝对不能后退或辞职不干。

五、需要坦率地承认多年来许多人生活贫困这一国家最基本的矛盾，必须把缓和老百姓的贫穷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一个总统必须公平地对待社会最底层群众，有正确的社会目标作指引。

六、冲动、轻率地行使总统权力而未恰当地遵守法律的作用。绝对不能为权力而权力。权力仅仅是一种服务的工具。对人民来说，有一个不是出于权力欲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而行动的总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七、对待批评意见采取何种态度——无论能否接受，都要摆脱掉权力意识，对批评不要用各种方法威胁、压倒和贿赂。

就凭科拉松·阿基诺单薄的“政治力量”，她根本无力去做到这一切。但是，历史不能否认科拉松·阿基诺。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在他的任期中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根本面目，而科拉松·阿基诺对菲律宾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她结束了马科斯 20 年对菲律宾的独裁统治，宣告马科斯王朝的覆灭。

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家自称是站在“马科斯必须走”的这派的报纸，在一篇题为《谁赢得了菲律宾》的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菲律宾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许多方面令人颤抖和备受鼓舞。迄今，这一事件也许仍旧意义重大，但并不象几个月前那样令人激动和兴奋了。许多矛盾现在仍未解决。新领导人控制全国的能力是软弱的，所以，出现更大骚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无论在新政府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局可能演变得多么糟糕，都不可能反过来证明马科斯政权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在马科斯独裁统治下，国家根本不可能变得更好，相反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迄今在菲律宾发生的多数情况是好的和鼓舞人心的，但是结果尚未出现。即便最终是个坏结果，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假如阿基诺夫人的努力导致灾难，又能怎样呢？反过来说，难道这样能证明那些支持她的人在所有相类似问题的争论上都错了吗？那些硬把一般性的教条上的胜利当作阿基诺夫人取得的独特而又实际的胜利的人，其实正在找麻烦——而且我们还认为他们正在否定这位菲律宾新总统取得成功的独特性。”

.....

我觉得该是结束这本传记的时候了。这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科拉松·阿基诺对菲律宾、对这个世界是尽力了！

谁也不能让世界一天变一个模样，只要他（她）对这个世界尽力，她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

科拉松·阿基诺大事年表

1933年1月15日，生于菲律宾打拉省富有的科胡昂科家中，名为玛丽亚·科拉松·科胡昂科。1942年日军侵占菲律宾，科胡昂科一家搬迁美国。科拉松就在美国费城的拉文山学院读中学。1946年科胡昂科一家离开美国回到菲律宾，科拉松一人留在费城继续她的学业。

1949年科拉松入美纽约圣文森特山学院主修法语和数学。1953年科拉松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进入马尼拉远东大学学习法律。年末，与菲律宾政界年轻的名人尼诺伊结婚。从此，科拉松的命运与尼诺伊的政治生涯联在了一起。

1955年23岁的尼诺伊当选为菲律宾康塞普西翁市副市长。1959年尼诺伊当选为打拉省副省长。

1963年尼诺伊脱离旧党，加入自由党，又成为打拉省省长。1965年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统治。1967年尼诺伊当选为参议员，并直逼总统宝座。

1972年9月21日，马克斯宣布在全国进行军事管制，尼诺伊被捕入狱。

1977年军事法庭以杀人、非法占有武器和进行颠覆活动等罪名，判处尼诺伊死刑。

1980年5月8日，尼诺伊被批准到美国作心脏手术。后定居在波士顿。

1983年尼诺伊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离开美国，回到祖国继续他的政治追求，在马尼拉机场惨遭杀害。

1984年菲律宾举行国民议会竞选，科拉松作为政府反对派一员走向街头，参加竞选活动。

1985年11月3日，马科斯宣布提前进行总统选举，日期定在1986年2月7日。

12月11日，科拉松与劳雷尔宣布一起参加正副总统竞选。

1986年2月7日，科拉松在打拉省路易西塔种植园投票。次日，她便宣布她是赢家，但马斯科也声称他以压倒多数票数获胜。

2月14日，美国总统里根派特使哈比卜来菲律宾调解。

2月23日，哈比卜调解失败提前回国。同时，以菲律宾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拉莫斯为首的军队改革运动倒戈，与政府军展开激战，迫使马斯科总统下台。

2月25日，科拉松在恩里莱、拉莫斯等人的支持下宣誓就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两小时后就宣誓再次就任菲律宾总统。晚上，马科斯一家人乘坐美国政府提供的直升飞机离开总统宫邸，前往夏威夷。

2月26日，科拉松宣布新政府内阁名单。劳雷尔为副总统兼外交部长、总理，恩里莱为国防部长，拉莫斯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3月25日，科拉松颁布自由宪法（菲史学家称之为临时宪法）。

8月中旬，科拉松与新人民军开始实质性谈判。9月5日，科拉松与摩洛解放阵线举行和平谈判。10月15日，通过制宪委员会制定出的新宪法正式送呈科拉松总统。

11月10日，科拉松出访日本，获得了10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11月23日，科拉松接受了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辞职。12月下旬，科拉松与全国民主阵线达成60天停火协议。

1987年2月2日，全国对新宪法进行公民投票。2月12日，科拉松在马拉卡南宫宣布1986年宪法获得通过，并在栗色书皮包着的宪法文本上签名。5月11日，根据新宪法规定，科拉松宣布进行参、众议员选举。

7月中旬，科拉松颁布新土地改革法令。

9月16日，劳雷尔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10月21日，在科拉松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大陪审团对马斯科夫妇提出起诉，主要罪状是：在在任期间，马科斯夫妇通过侵吞、盗用、贿赂等手段，把菲政府公款占为己有；把非法所得1.03亿美元转移到美国购买曼哈顿地产，并伪造证件隐埋其所有权等。……

1992年6月12日，菲律宾大选揭晓，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拉莫斯获胜。

6月30日，科拉松·阿基诺离任。

